

勤工儉學的發展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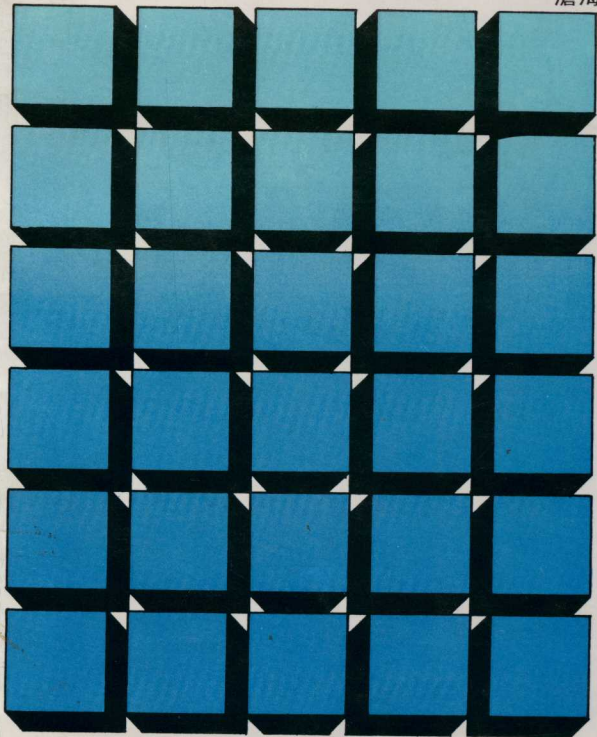


000771993



歷史—
滄海叢刊

陳三井著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內 容 簡 介

本書共收錄論著、譯作及評述十一篇，分甲編、乙編及附錄三部分。從不同角度，探討民初歐戰前後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倡導、發展與演變過程，論述其成敗功過，尤着重分析周恩來、鄧小平和張繼等人在整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闡明華法教育會、新民學會與里昂中法大學等團體和勤工儉學間的互動關係。作者行文流暢，取材新穎豐富，論斷平實客觀，為國內史學研究拓展視野，開闢一塊嶄新的園地。



滄海叢刊

勤工儉學的發展

陳三井著

1988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 勤工儉學的發展

作者 陳三井

發行人 劉仲文

出版者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四月

編號 E 64035

基本定價 肆元捌角玖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529.2

8745-2

序 言

勤工儉學的研究，自二十多年前美國學者布蘭德(Conrad Brandt)

①首開風氣之後，晚近已獲得海內外學者專家更大的注意②。近年來，除各項文獻資料的陸續整理出版外，研究成果的相繼發表也頗有可觀，甚至已成為學院中博、碩士論文的高作熱門題材。可惜後一項資訊在國內比較不易獲得，就個人所知，其中較著名者有美國的 John Kong-Cheong Leung③、Marilyn Avra Levine④，法國的王楓初(Nora Wang)⑤、Judith Van Der Stegen⑥，香港的陳敬堂⑦等人。相信假以時日，俟資料更詳全後，當會有更多的人投入研究，不斷的有更多的新專題出現。

筆者對勤工儉學的研究興趣，大致可以回溯到民國六十二年前後，與研究歐戰華工同時開始。當時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選取布蘭德的論文，讓兩位選修「法國史」的師大女同學試譯，譯文經過改正後，以〈留法歸來的中共黨徒〉為題，發表在《東亞季刊》⑧上。民國七十年，曾應正中書局之約，編纂《勤工儉學運動》一書，列入「中國現代史史料選輯」之一，自此對於有關的史料始有進一步的認識。在編書的同時，撰寫了〈勤工儉學運動初探〉一文，在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上發表，這可以說是我的處女作，也是這一系列研究專題的開始。

所謂「勤工儉學運動」，指的是民國初年歐戰結束之後，在李煜瀛、吳敬恆、蔡元培等人倡導下，鼓勵貧寒青年到法國「勤以作工，儉以求學」的一種留學活動，但由於人數衆多，流品複雜，思想和行動變

771993

2 勤工儉學的發展

質，實質上却是個相當錯綜複雜的課題。因此如果掌握的資料不夠，基本的背景不十分瞭解，實在難以下筆，也可能造成見樹不見林的遺憾。有鑒於此，我在七十一年承國家科學委員會的資助，到當年勤工儉學的大本營——法國，從事進一步的搜集資料工作。在這一年期間，除了有機會看到法國檔案機構所珍藏的各種檔案和期刊外，也大量閱讀到大陸的相關出版品。因此回國後，開始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一些個別的問題先做較深入的探討，從而為未來建構一個較大的 vision。譬如以人物而言，撰寫了〈張繼與勤工儉學〉與〈周恩來旅歐時期的政治活動〉兩文，透過正反兩種人物的比較而觀察這一運動的若干本質。以學會和團體來說，有〈新民學會之成立及其在法活動〉與〈民初旅歐教育的艱難歷程——里昂中法大學初探〉兩文，藉此釐清「新民學會」、「里昂中法大學」與勤工儉學間的一些基本關係。就地區來說，〈河南與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文，等於拿河南與湖南、四川、直隸等熱門省分做一反面比較，剖析了湖南等省勤工儉學風氣特盛的原因所在。以上六篇論文都收錄在本書的甲編中，構成全書的主幹，相信讀者透過這幾種不同角度的觀察，對勤工儉學的真象，當會有一個比較平實而客觀的認識。

乙編部分，有兩篇譯作，一篇史料介紹，一篇書評，主要在提供讀者史料資訊和知彼工夫，綜合起來，也有助於對整個運動發展的基本瞭解。

此外，〈五四時期工讀思潮的發生及其演變〉一文，可當做勤工儉學的背景看，探討的是國內版的勤工儉學，而與海外的勤工儉學相呼應，做比較。兩者在實行方法上雖有相異之處，然在精神上却是契合的，故收為附錄，以供參考。

在立志寫一部比較完整詳實的《勤工儉學運動史》願望尚未實現之前，這些文稿只是個人近年來研究此一專題，所能繳出的一張並不出色

的成績單。它的結集出版，除了方便讀者查尋外，主要是給自己一個隨時「耳提面命」的惕勵作用。

本書的問世，蒙留法前輩鄭資政彥荃先生大力推介，承三民書局劉發行人振強先生慨允出版，在此一併致謝。惟以成書匆促，錯誤之處，尚祈海內外方家學者不吝指正是幸！

陳三井謹識

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卅日

- ① Conrad Brandt, *The French-Returned Elit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Symposium on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2).
- ② 例如美國 *Republican China* 季刊將於1988年4月出版「勤工儉學」專號。
- ③ John Kong-Cheong Leung, *The Chinese Work-Study Movemen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tudent-Workers in Fran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Brown University, 1982.
- ④ Marilyn Avra Levine, *The Found Generation: Chinese Communism in Europe, 1919~1925*.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5.
- ⑤ Nora Wang, *Paris/Shanghai: Débats d'Idées et Pratiques Sociale, les Intellectuels Progressistes Chinois, 1920~1925*. Thèse Pour le Doctorat d'Etat, Université de Paris VIII, 1986.
- ⑥ Judith Van Der Stegen, *Les Chinois en France, 1915~1925*. Travail de Recherches de Maîtrise, Université de Paris X-Nanterre, 1974.
- ⑦ 陳敬堂, <中共旅歐總支部之成立>, 香港珠海書院碩士論文, 1982。
- ⑧ 陳三井、廖淑宜、林月蓮合譯, <留法歸來的中共黨徒>, <東亞季刊>, 六卷一期(1974. 7)。

勤工儉學的發展 目 次

序 言

甲 編

- 一、勤工儉學運動初探…………… 1
- 二、新民學會之成立及其在法活動 ……21
- 三、民初旅歐教育的艱難歷程 ……47
- 四、河南與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69
- 五、周恩來旅歐時期的政治活動……………87
- 六、張繼與勤工儉學 …… 121

乙 編

- 一、法國所藏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介紹…………… 153
- 二、留法歸來的中共黨徒 …… 165
- 三、鄧小平在法國的歲月 …… 181
- 四、評張洪祥、王永祥合著《留法勤工儉學
運動簡史》…………… 193
- 附錄：五四時期工讀思潮的發生及其演變 …… 207

勤工儉學運動初探

一、引言

二、勤工儉學運動的理論基礎

三、從「留法儉學會」到「勤工儉學會」

四、「華法教育會」與勤工儉學生的離合

五、里昂中法大學的設立及其問題

六、勤工儉學運動的逆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法國

七、結論

一、引 言

一部近代中國留學史，可以說就是一部國人「用夷變夏」的奮發圖強過程。就留學國別而言，先後雖有留美、留歐、留日之別，然為國儲材的目標並無二致，他山之石，同樣可以攻錯。就留學生的身份而言，同光年間的幼童留美，先後共遣送四批，約一百二十名，其年紀最輕，多為十二至十五歲之間的少年^①。光緒初年，福州船政學堂學生的留歐學習駕駛和製造，前後共有三批，合為七十九人，部分類似今

^①胡懷琛，〈上海學藝概要(二)〉，《上海通志館期刊》，一卷二期，頁五一四～五二三。

2 勤工儉學的發展

日公務員的帶職進修性質^②。而在中國留學史上性質最特殊者，莫過於民國初年標榜「勤以作工，儉以求學」的留法勤工儉學生。這批勤工儉學生的赴法，人數既多，流品亦最稱複雜^③，前後經歷的時間亦相當長久（約從民國元年至十五年），而於現代中國黨政軍事、文化教育、思想社會、經濟實業各方面的影響和衝擊，恐怕亦最為深遠。

二、勤工儉學運動的理論基礎

面對西方帝國主義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接二連三的挑戰，國人深切感覺拯救國家的努力，已刻不容緩，乃有派遣留學生出國留學的實際反應，藉此「履西域，接西土，肄西文」^④，希冀「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終而達成富國強兵之目的。同時，有識之士亦以為，中國之弱，在於國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故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⑤；果欲開通民智，恢宏器識，進而改良社會，更非注重一般平民與勞動大眾，先從教育上着手不可。勤工儉學運動的發起，可以說便是這兩種觀念的結合。

勤工儉學運動雖倡議於民國初年，盛行於歐戰結束之後，然其由

②第一批為卅五人，第二批十人，第三批卅四人，第三批部分於北洋艦隊及學堂中選取。參閱李緒武，〈清末船政學生之留歐教育〉，《東方雜誌》，復刊三卷一期。

③其中有年齡甚大者，如徐特立已四十三歲；有僅受小學教育即出國者；論其原來職業，則五花八門，應有盡有；論其知識與語文程度，則參差不齊，未經適當之甄選。

④梁啟超語，見〈適可齋紀言紀行序〉，馬建忠，〈適可齋紀言紀行〉（文海出版社影印）。

⑤梁啟超，〈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見〈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三冊。

來實有自。中國自清末以來，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實業不振，經濟發展落後，一般國民所得不高，故有志留學之士，多半出自中產之家，安得一筆巨款度數載生活於費用較高之歐美等先進國家，是故除官費生或家境富裕者外，其不省吃儉用，遇機會則兼工貼補，豈可得乎？時至今日，情形雖稍有不同，然性質並無兩樣。由此吾人可以斷言，中國一有留學生，不管是在歐美，或在日本，恐怕即有「儉學」的情形存在（即使官費生亦然）。儉學之不足，因現實生活所迫，只有繼之以兼工或勤工，這是極自然之事。工餘能學，或勤工而後力學，這都是難能可貴之事。若為工而不學，或勤工之後無心向學，則有違出國初衷，實不值深論也。

就歐洲的情形而言，早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即有名的蘇報案發生之後，年已三十九歲的吳敬恆（稚暉）由滬赴英，與同學一、二人實行苦學之生活。光緒三十三年（1907）吳稚暉抵巴黎，從事印刷事業，與李煜瀛（石曾）、褚民誼兩人同處住宿，試驗節儉之生活。同年，蔡元培與自費同學數人留學於德國柏林，亦實行儉學。宣統元年（1909），李石曾、齊竺山等人組織豆腐公司（Usine Caséo-Sojaine）於巴黎近郊哥倫貝（Colombes）地方，製造各種大豆食品，並由國內招去工人，除同宿同食，以減輕生活費用外，工作之餘亦從事習課，於中、法文及普通學科皆所講習，設為「以工兼學」之意^⑥。以上所述，可以說就是儉學會提倡之所由來。

勤工儉學固由實際生活中體驗得來，然提倡諸君，如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等，仍各有其理論學說。蔡元培所主張者為「勞動神聖」說，強調「作工為人類之天職，人人各作其工，人人始能各得其所需」；其次，蔡元培指出，「工之中自有學在也，習於工者，往往能

^⑥ <旅歐教育運動>（旅歐雜誌社發行，民國五年秋），頁四九～五十。

4 勤工儉學的發展

自出新意，符合學理」^⑦。由此種思想出發，彼之贊助「工學互助團」，支持「留法儉學會」^⑧，乃為理所當然之事。吳稚暉本人就是個苦行僧，他強調「學」與「工」彼此聯屬不分，「學止為工之預備，工止為學之實施，學者當工，工者亦宜學」^⑨。據此以觀，吳氏所主張者為「學工一體」，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李石曾早年研究農學（大豆），由農學而研究生物學，由生物而研究拉馬克（J-B. Lamarck, 1744-1829）的動物哲學，又由動物哲學而引到克魯泡特金（P.A. Kropotkin, 1842-1921）的互助論，他之倡議勤工儉學，贊成華工出洋，亦是以互助論為根據的^⑩。李石曾首先認為，「人類進化，由愚昧而趨於文明，由痛苦而趨於幸樂，其中因果之繁複，歧正之交雜，固不可勝道。然有可得而約言者，則學是也」。接着，他又指出，「夫學之一事，乃人生之必要，無異於飢者之需食。不幸而學與食二者，皆不能無代價以得之，然人多不惜勞力以求食，而鮮勞力以求學者。……果人皆力學，則社會無智愚之異等，人生無苦樂之不均矣！」^⑪。由上引可知，李氏比較着重「學」，認為「力學」或「勤學」可以解決社會智愚之不平等與人生苦樂之問題。

綜上所述，大體而言，蔡、吳、李三人於人生兩大問題——「工」與「學」的看法雖略有不同，然一言以蔽之，彼等之發起勤工儉學，實包含有兩層動機：一為高姿勢者，與清末民初一般知識份子所揭櫫的

⑦ 蔡元培，〈勤工儉學傳序〉，見〈旅歐教育運動〉，頁七二。

⑧ 李若一，〈蔡元培的政治思想〉（商務印書館，人人文庫，特185），頁一二三。

⑨ 吳敬恆，〈勤工儉學傳書後〉，見〈旅歐教育運動〉，頁七八。

⑩ 蔡元培，〈五十年中國之哲學〉，引自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北平：人文書店，民國二十四年），頁三五九。

⑪ 李煜瀛，〈勤工儉學傳引言〉，見〈旅歐教育運動〉，頁七五；〈李石曾先生文集〉（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出版），上册，頁一九五。

留學動機一樣，旨在尋求強國的技能，建國的知識和救國的本領；一為低姿態者，具有改良社會的用意，認為「讓年輕的中國人，去看看西方世界是怎樣有秩序，怎樣清潔美麗，將來回到家鄉，能够做到改良一個廁所，一個廚房，不隨地吐痰，不隨地便溺，也就收獲够大的了」¹²。

再就李石曾而言，他之發起勤工儉學，可以說是信仰「互助論」的一種實踐。「互助論」為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所提倡，與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的生存競爭說相代興。克氏根據對鳥獸蟲豸的觀察所得，修正了達爾文的進化論，謂人類進化，「不獨有競爭，亦有互助存在，互助的存留，不互助的淘汰。互助也是天擇作用留下而要他發展的一種本能，物競天擇的法則，因為人類知識的提高而近於停止」¹³。此一理論否定了動物界弱肉強食的觀念，與中國傳統社會所強調的互助守望精神有其契合之處，對於歷來飽受西方國家欺凌的中國人無異是一大福音，故深得梁啟超、李石曾等五四時期知識份子的信服。李石曾早年且是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他曾節譯無政府主義的「聖經」——互助論，發表於「新世紀」（*Le Siècle Nouveau*）週報，民國八年再修訂重刊於《東方雜誌》¹⁴，生平標榜不做官吏，行有餘力，則發起世界社，倡勤工儉學，幫助他人求學，互助進化，以進大同世界——無政府的理想境界，這些可以說都是信仰「互助論」的一種實踐。

¹² 秦孝儀，〈李石曾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報告詞〉，〈近代中國〉，第十七期（民國六十九，六，三十），頁四二。

¹³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食貨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五月），頁二一。

¹⁴ 參閱巴黎「新世紀週報」，第三十一至五十二號（1908,1~1908,6）；〈東方雜誌〉第十六卷五期至九期（1919,5~1919,9）。

三、從「留法儉學會」到「勤工儉學會」

「留法儉學會」(The Society for Frugal Study in France) 於民國元年由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齊竺山等人發起於北京。根據會約，「留法儉學會」乃一自由傳達之機關，而非章程嚴密之組織，其宗旨在「納最儉之費用，求達留學之目的」。凡年滿十四歲，欲自費留學而每年至少可籌五、六百大洋者，皆得為該會之同志。該會對於會員既不助資，亦不索償，惟有以言論或通信指導旅行，介紹學校等之義務¹⁵。按當時匯率，六百大洋約折合壹千肆百佛郎，或貳百柒拾元美金，並不足以應付學生在法之生活費用¹⁶。

「留法儉學會」並附設法文預備學校於北京（校址設於方家胡同北順天高等學堂舊址，其時蔡元培任教育總長，力為提倡，並由部中假以校舍），為學生補習法文，以吳山、齊竺山、齊如山兄弟負責，聘外交部顧問法人鐸爾孟(André d'Hormon)擔任教席。「留法儉學會」北京預備學校於民國元年春間成立，據李石曾等發起人之意，希望於五年內將有三千學生，用儉學方式西去，因為所定六百大洋的年費，中國父兄能為子弟負擔者仍是不少。但留法預備學校只辦了三班，經由此校赴法者，約在八十人以上，百人以下，其中第一班比較著名者有李書華、李宗侗、鄭毓秀（即魏道明夫人，後單獨去法）等人，第二班同學幾全為四川人¹⁷。至二次革命後，教育部索還校舍，

¹⁵ <留法儉學會緣起及會約>，〈東方雜誌〉，第十四卷，四期。

¹⁶ Y.C.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P. 105.

¹⁷ 李書華，〈碣廬集〉（傳記文學社，民國五十六年），頁二。

預備學校遂遷入四川會館，然警役隨時到校巡查，各生不堪其擾相率退學，校遂停辦。自此儉學會不復有大批人去法矣！

李石曾等人提倡出國儉學，何以趨重法蘭西，除了本身「居法較久，相習稍深」的考慮外，實有它的時代背景。這個時期內，法國對中國影響之大實在無法形容，自跨入二十世紀以來，法國大革命時的政治思想在中國青年革命者和維新者中間的風行可說一時無兩。在二十世紀開始的二十年間，它影響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領袖，如梁啟超、陳獨秀和不少國民黨的領導人物。陳獨秀二十多歲時就攻讀法文，後來十分羨慕和讚揚法國文明。在《新青年》的創刊號裏，他發表了一篇〈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的文章，宣稱法國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創造始者。他沒有引據充分確切的史實，就認為法國人「創造」了近世三個最重要的學說。拉法耶特(Lafayette)在他的〈人權宣言〉(La 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一文裏提出了人權學說(陳氏更認為美國的獨立宣言是拉法耶特起草的)。拉馬克於一八九〇年在他的《動物哲學》(Philosophie Zoologique)中已發表了進化論，比達爾文早了五十年。近代的社會主義則是源出於法國作家巴伯夫(Babeuf)、聖西蒙(Saint-Simon)和傅立葉(Fourier)，至於德國的拉薩爾(Lassalle)和馬克思(Karl Marx)，只不過把它發揚光大罷了。在很多方面，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份子受十八、九世紀法國民主思想和自由主義的影響，遠超過於受其他西方國家思想的影響。五四型中國知識份子的氣質，往往流露出法國浪漫主義(Romanticism)的痕跡。法國的烏托邦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和無政府主義，尤其是它們的純理論方面，也傳入了中國。遠在一九〇七年，在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就創辦了「新世紀」週報，宣傳社會主義和巴枯寧(Mikhail Bakunin)與克魯泡特金的理論^⑬。

8 勤工儉學的發展

除上述時代背景外，李石曾等人尚注意到下列幾項實際的因素：

(一)就教育本身而言，法國教育已脫離君神之迷信，為其他國家所無。緣一八八六年法國已廢除神學之專科，一九〇七年實行所謂國教分離，教育世俗化。而中國本無國教，教育並不受宗教之阻礙，故法國的教育觀念，最宜於中國。

(二)法國學費低廉，求學較易。法國公立小學為普及教育之根本，全免學費，人人可得而求學。中學為學問之要徑，價廉而制簡。大學為高深學問之建設，多不納學費，寒士、工民皆得與共之。總之，唯有法國教育，乃不分階級，為整個平民而設者。

(三)法國人對於他國人，亦親和而無畛域，即較無種族歧視，故於國人心理上較能夠適應¹⁹。

除北京「留法儉學會」首開風氣外，四川亦有朱芾煌、吳玉章等所發起之「四川儉學會」，設預備學校於少城濟川公學，經由此一線索或其他同抱儉學宗旨赴法者，亦達四十餘人²⁰。儉學會之發起，並不以留學法國為限，故吳稚暉、李石曾等復發起「留英儉學會」於上海，約有二十名學生送往英國²¹。此外，吳稚暉等人又倡設「留東儉學會」，廣為宣傳。歐戰前，亦有留德之同學，倡「留德儉學會」之議者，可見儉學會之宗旨，可適用於各處，但求學之普及而已²²。可

¹⁹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35-36.

²⁰ <旅歐教育運動>，頁六二～六五。

²¹ 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中華書局，民國廿六年版），頁八十八。

²² Robert A. Scalapino and George T. Yu, *The Chinese Anarchist Movement*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1), P. 47.

²³ <旅歐教育運動>，頁六三。

惜這些組織，因資料不多，無法作深入之探討。

及歐戰發生，法國兵士傷亡日衆，壯丁短缺，乃有委託惠民公司代招華工赴歐之舉²³。民國四年夏，李石曾居巴黎，遂與豆腐公司員工李廣安、張秀波、齊雲卿等人發起「勤工儉學會」(The Diligent-Work-Thrift-Study Society)，以「勤於作工，儉以求學，以進勞動者之智識」爲宗旨。入會者視個人力之所能，以助該會之發展，或各人實力求學，或助他人求學，或以書說之著述演講爲傳達，或以經濟爲傳達之助，皆由會員隨時組織而實行之。李石曾並撰「勤工儉學傳」，以廣宣傳。「勤工儉學會」成立後，李氏等更倡工作一年，讀書兩年之說，一面在國內設立預備學校，一面與法人共同組織「華法教育會」以爲推動，共謀學生出國與謀工之便利。此外，吳稚暉於民國五年在「中華新報」發表「胼盦客談話」長篇連載，以其親歷之經驗，爲勤工儉學廣爲宣傳、指導²⁴；華林於民國六年回國，極力鼓吹各縣籌縣費派遣學生，影響所及，留法勤工儉學幾爲舉國公認之惟一要圖，自總統以至學者名流莫不竭力提倡、贊助²⁵，是以至民國八、九年間形成一般巨大浪潮，前後擁至法國者近二千人，其中以湖南省爲最多，四川、直隸等省次之²⁶。

湖南一省幾佔赴法勤工儉學生全數之半，其原因頗耐人尋味。若細加分析，可得下列幾個答案：(一)從歷史上看，自同治中興(1862-1874)以來，湖南在教育上始終居於領導地位，現在它又想重新取得此一地位。雖然提倡勤工儉學的中國哲人中，沒有一個是湖南人，而事實上，

²³陳三井，〈歐戰期間之華工〉，〈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民國六十五年一月），第五輯，頁三三三～三七一。

²⁴〈吳稚暉先生全集〉（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民國五十八年三月），卷十八，雜著，附錄，頁四十六。

²⁵〈近代中國留學史〉，頁八十九。

²⁶同前註，頁九十二。

10 勤工儉學的發展

鼓勵學生出國，為他們籌募基金，並以監護人身份擔任學生調停工作的，都是他們^②。其中比較著名的湘省名流有熊希齡（秉三，曾任國務總理，財政總長）、楊昌濟（懷中，時任北大教授）；(一)就地理位置而言，湖南自古以來乃兵家必爭之地，尤其當民國初年南北軍閥混戰時期，兵災、匪災特多，青年人容易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抱負^③；(二)湖南設有華法教育會湖南分會以為推動，對學生之赴法者多給以津貼，以鼓舞其志氣；(三)湖南在毛澤東、蕭瑜、蔡和森的領導下，早就成立有「新民學會」^④的組織，抱著「多人打水始有鮑魚吃」的心理，對勤工儉學運動反應熱烈，並採取集體行動，大批赴法；(四)湖南災荒頻仍，貧者窮無立錫之地，故亦有抱集體逃荒的心理出國者，如蔡和森全家及何長工即其一例^⑤。

四川方面，除該省前辦有預備學校外，熊克武督軍曾以數萬元送第一批留法學生六十餘人到法，以後並常年如期由預備學校畢業後即以公費送往。直隸為「留法儉學會」的發源地，前此開中法協進會時，上自總統及各部總長、次長，及段督辦、曹錕督軍等皆曾捐贈鉅款；且「勤工儉學會」與僑工局關係密切，凡一切活動之進行，莫不受其補助，僑工局曾貸借旅費予預備學校畢業生赴法^⑥。

^② Conrad Brandt, "The French-Returned Elit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Symposium on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32; 陳三井, <現代法國問題論集> (學海出版社, 民國六十六年十月), 頁二二九~二三〇。

^③ 鄭學稼, <中共興亡史> (中華雜誌社, 民國六十八年一月), 第二卷, 第二册, 頁一〇一七。

^④ 關於「新民學會」的成立及其活動, 請參閱鄭學稼, <新民學會>, 收於 <中共興亡史>, 第二卷, 第二册, 附錄二; 李維漢, <回憶新民學會>, <歷史研究>, 一九七九年, 第三期。

^⑤ <中共興亡史>, 第二卷, 第一册, 頁八七~八八。

^⑥ <近代中國留學史>, 頁九十。

這些學生大部分在離開中國以前，便已經受過大學或中學教育。論其職業，有些則是教師、商店店員、技術人員或者新聞從業員。茲據日本「外交時報」及中國「時事新報」參以教育會的表冊，分別列表說明如下：

表一 教 育 程 度

學 校 類 別	人 數
高 等 小 學	三 十 人
工 業 及 工 業 專 門	約 百 人
師 範	約 百 人
商 業 及 商 業 專 門	二 十 餘 人
大 學	九 十 餘 人
中 學	四 百 七 十 餘 人
農 業 及 農 業 專 門	三 十 餘 人
醫 學	六 七 十 人
路 礦	十 餘 人
陸 軍	十 餘 人
法 政	約 三 十 人
茶 業	五 人
由 日 本 來 者	三 十 餘 人
由 南 洋 來 者	二 十 餘 人
河 海 工 程	五 人
京、保、辛、布、滬、 川等法文預備學校	三 百 餘 人

資料來源：〈近代史資料〉，第二期(1955)，頁192-3。

說 明：此一統計數字並不精確完整，但已顯示出，中學畢業生與經由法文預備學校出身者佔多數，兩項合計已佔總數之半。

這些學生到了法國後，只有少部份進了學校，大多進了工廠或在其他地方作工。凡欲入學者，分別送入蒙達集 (Montargis)、墨南 (Melun)、楓丹白露 (Fontainebleau) 三個中學，也有的送往里昂的一個中學，由赫里歐 (Ed. Herriot) 市長照料，其中以蒙達集中

表二 國內職業

職業類別	人數
工廠實習及技師	五十餘人
銀行服務者	五人
農場服務者	五人
普通經商者	二十餘人
政界	十人
學校教職員	六十餘人
新聞記者	十餘人
醫院服務者	二人
曾任軍官者	九人
書店服務者	四人

資料來源：〈近代史資料〉，第二期，頁194。

說明：此一數字更欠完整，其中有實際工廠工作經驗者不過五十餘人，而學校教職員出國深造的風氣仍然最盛。

學人數最多，因其收費最廉，每月食宿學費共只收一百五、六十佛郎^②。

表三 在法所入學校

校名	人數
中學校	五百二十二人
工業實習學校	二十七人(大多插班二年級)
電氣學校	三人
農業實習學校	七人
高等農業學校	八人
無線電學校	二十一人
造紙學校	二人
醫學校	二人
飛機學校	三人
巴黎大學	四人

資料來源：〈近代史資料〉，第二期，頁194-5。

②李璜，〈學鈍室回憶錄〉（傳記文學社，民國六十二年），頁六十三。

至於直接入廠作工，或入學數日而又轉入工廠者，其所入之廠，大都是造船、機械、礦冶、家具、汽車、發動機、電動機等工廠³³。據何長工的回憶，他們所作的，大都不需要手藝的粗活或一些服務性的工作，反正粗活細活，臨時雜工，什麼都做，碰上就幹。有的半夜起來，到市場打雜、推菜蔬，送牛奶；有的到火車站、碼頭去上下貨，給人搬行李，抱小孩；有的到街上倒垃圾，到旅館給人擦皮鞋；有的到建築工地當臨時工，推磚、搬瓦、扛洋灰、運水合泥，或者打掃工地，清除垃圾³⁴。但一年後，由於人數增多，遂發生工學兩難事情。

四、「華法教育會」與勤工儉學生的離合

「華法教育會」成立於民國五年。由中法兩國文化教育界人士所共同發起。以巴黎大學史學教授歐樂（Prof. Aulard）為法國會長，眾議員穆岱（Marius Moutet）為副會長。蔡元培為中國會長，李石曾為副會長。旨在促進中法兩國文化學術之交流，而介紹中國學生留法與組織留法之工人教育亦為其主要工作項目。「華法教育會」為了照顧勤工儉學生，特設一學生事務部。以劉厚（大悲）為主任。嗣將事務部辦事處遷於巴黎近郊的華僑協社³⁵，為學生覓住、覓校、覓工。「華法教育會」的職員與勤工儉學生間的感情，彼此本極融洽，職員熱心為學生尋覓工作，組織演講會，成立遊覽團，補習法文，不遺餘力。「華法教育會」且成立「留法勤工儉學生救濟互助會」，救濟貧

³³ 例如周恩來與李立三同被介紹到雷諾鐵工廠（Renault Factory）做雜工，搬運鐵礦石及鋼材，周只做了三個星期，就辭工不幹了。

³⁴ 何長工，〈勤工儉學生活回憶〉（工人出版社，一九五八），頁四十七。

³⁵ 華僑協社，成立於一九一九年八月卅一日，為在法華僑之公共機關，其性質略同於中國之會館。

病學生⁹⁵，對學生照顧尚稱無微不至。

後來，學生逐漸與「華法教育會」的職員發生意見，意見的發生，大約由於以下三端：

(一)換工問題。換工問題，牽涉甚廣，且不勝其煩。教育會職員之所以不肯為學生換工，實因到法者日衆，覓工不易。雖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學生之要求換工，或因體力不足，或因作苦工太久，各有理由，各有難處，因兩相隔閔而成隙。

(二)貸款問題。貸款一項，內容極為複雜。可能起於教育會會計遵守章程，慎重公款，並不輕易貸款予學生。而學生因迫於生計，貸款不遂，不免責言。例如春假及暑假期間送學生入工廠，無論有無存款，教育會概發一百五十佛郎川資。就車資、零用計算，大致已足夠。不料一到工廠，需租房屋，要買炊飲器具及工作服，並得等候一月工廠始給工資。遠在千數百里地方，臨時既無親朋可借，又無當舖可押。若寫信到教育會求援，快則二、三日始有回音。往往一日之糧，分作二、三日之用。不獨無錢的餓肚，即有存款者亦遠水救不了近火。如是最後寫信予教育會，不是罵娘，就是說要拿手槍來打。

(三)招待問題。凡學生坐船到法，「華法教育會」必派人到碼頭照料，其川資通常由學生合攤。若處理不善，即引起學生反感。招待上的惡感，以民國八年十二月到法的二百零四人為最甚。第一次是每人出招待費三十二佛郎，合計有六千餘佛郎，合國幣約八百元。此數若僅供招待員車費、伙食、薪資之用，未免太奢。第二次是由北京華法教育會代滙款項，每元係換八佛郎

⁹⁵卞孝萱輯，〈留法勤工儉學資料〉，〈近代史資料〉，第二期（一九五五），頁一七八。

五十生丁。而北京華法教育會有三千佛郎未匯往，遂攤派於由京匯款的學生名下，每元扣出五十生丁。因此學生發言寫信，不免露出一、二不平之語。以二百餘人的口與筆，遂形成一種輿論^{①7}。

其後學生人數愈來愈多，至民國十年初，留法勤工儉學生總數已逾二千人。此時法國正面臨經濟危機和失業問題，許多工廠停工，尋覓工作更加不易，致許多學生欲工無門，必須靠教育會所發的維持費度日。爲此，「華法教育會」照顧倍感困難，故雖一方面挪借經費勉力維持，但糾紛仍然迭起。身爲中國會長的蔡元培也受到攻擊，不得不毅然聲明教育會與勤工生脫離一切經濟關係：一方面電請教育部轉知各地教育機關，以「學生多不合所訂條件，既無作工志願，又乏工作技能」^{①8}，勸阻學生赴法。通告一出，在法的勤工儉學生大起恐慌，在希望幻滅下，遂爆發了民國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包圍駐法使館，向公使陳錄請願，要求生存權與求學權的風潮^{①9}。

五、里昂中法大學的設立及其問題

里昂中法大學，一稱里昂中法學院，法文名稱爲 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簡稱里大^{②0}。中法大學的創辦，乃吳稚暉海外中國大學夢想的實現；由於他的鼓吹，以及李石曾、張靜江、蔡元培等人的支持和贊助，遂得於民國十年十月正式開辦。里大成立有「中

^{①7} 同前註，頁一八三～一八四。

^{①8} <教育雜誌>，十三卷，三號，記事，頁一～二。

^{①9} 盛成，<海外工讀十年紀實>（文海出版社影印），頁六二～六三。

^{②0} 關於里昂中法大學，請參閱<吳稚暉先生一百十歲誕辰紀念特輯>，內有劉厚、鄭彥棻、李亮恭、黃魯生、蘇雪林等專文，記述頗詳，不一一註明出處。

16 勤工儉學的發展

法大學協會」(Association Universitaire Franco-Chinois)，即里大董事會管理。主要人物為中國會長蔡元培及法國會長雷賓(Lépine, 法國國立里昂大學醫學院院長)，首任校長是吳稚暉。里大名義上自稱為大學，其實不過是預備學校性質，不客氣的說，只是學生寄宿舍而已；因它沒有自設的專門課程，亦無自設的教師，其主要活動在於組織特別演講會及法文補習，所以等於是一所為初到法國的中國學生特別設立，供膳宿的法文補習班而已。不過，中國學生若自忖語文能够應付裕如，可以到法國國立里昂大學或其他專科學校上課或攻讀學位。

里昂中法大學的設立，除主事者亦為勤工儉學的發起人外，表面上看，似與在法的勤工生無甚關係，但一般勤工生則認為：(一)里大之設立，乃勤工儉學運動的結果；(二)創辦之當事人，其向法國當局建議及要求退還庚款時，均以來法學生日多為詞。且在中法大學未開辦前，曾以救濟勤工生的名義，收受各界捐款甚多，故在這批當時已走投無路的勤工生看來，里大的成立，正可解決他們的困境，當然寄以無限的希望。詎料該校成立，由於宿舍容量有限，所招的學生都由國內直接選送，而在法國者必須經過甄選（法文測驗）始可入住。這種捨近求遠，甚至類似過河拆橋的作法，自然引起在法上千勤工生的恐慌與難堪，也可以說是希望的幻滅，且普遍夾雜有被拋棄、被欺騙的感覺！因此他們發表宣言，並揭櫫「正當的爭攘，不是惡德」的口號，而在共黨份子周恩來（坐鎮巴黎）、趙世炎、李立三（隆郅）、陳毅、蔡和森等人的策劃下，遂有民國十年九月（里大未開學前）勤工生的進軍里大，強佔校舍風波，終而演出與法國軍警衝突的事件^④。結果，為首肇事的蔡和森、李立三、陳毅等約一百人均被強制遣送回國。這

④〈學鈍室回憶錄〉，頁八二～八三。

是里大的外憂。

外憂之餘，里大內部也鬧問題。原來中法大學雖說由中法合辦，但法方僅提供校舍（位於里昂西郊三臺山上，由 St. Irénée 古堡改建，每年僅收象徵性租金一佛郎），經常費則由中國擔負，因為大部分的錢來自廣東政府籌設西南大學的經費，所以廣東學生較受優待，不惟旅費由公家代出，每年學膳費豁免，並且每月還給數百佛郎的津貼。其他各省學生則每年須自籌膳費華幣六百元之譜。由於有這種不同的待遇，乃激起少數學生的不平，演出一次「二十八星宿大鬧天宮」的學潮^②。他們抗不繳費，提出平等待遇要求，甚至公開指責校長植黨循私，結果不但氣走了校長，里大校園從此亦不再平靜。自民國十一年以後，國內政局動盪不安，廣東方面的變動尤大，影響經費之分攤協助，時斷時續，從此以後，學校一直在經費困難下，苦撐待變！至一九四七年，由於經費來源斷絕，里昂中法大學乃宣告停辦。

六、勤工儉學運動的逆流——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法國

勤工儉學運動發展的高潮，正是中國共產主義在法國萌芽、滋生，共產組織在法成立、擴大的時期。勤工儉學的結果，由於主觀條件的欠缺，加上客觀環境的改變，以致變成「勤工無門，儉學無路」；在「既不能工，又無法學」的情況下，面對學業與失業的雙重打擊，少數勤工儉學生自然對現狀產生不滿，對領導者所代表的無政府主義及樂觀主義，懷有偏見^③，而易為共產主義所乘。第三國際也趁機派人

^②蘇雪林，〈一個五四時代青年的自白〉，〈吳稚暉先生一百十歲誕辰紀念特輯〉，頁七九～八十。

^③C. Brandt, "The French-Returned Elit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p. cit., P. 234; 陳三井，〈現代法國問題論集〉，頁二二三。

加以拉攏聯絡，將收容在巴黎「華法教育會」睡地板的部分學生，搬到拉丁區住旅館，並月給三百佛郎津貼，請人教法語，讀「人道報」(L'Humanité, 法共機關報)與「共產黨宣言」⁴⁴，日久遂形成一股無法扭轉的逆流，在法國激發宣洩，其餘波也一直盪漾不息，延伸到國內。學生運動政治化的結果，一幕幕的思想鬥爭與行動衝突在法國次第展開。首先，在中共份子周恩來、蔡和森等人的領導下，他們在民國十年先後發動了包圍巴黎使館與進軍里大兩次重大事件。其後，留法中共組織正式成立⁴⁵，發行《赤光》半月刊，與中國青年黨的《先聲》展開論戰，繼而演成一連串的流血鬥爭。俟這批人先後返國後，鬥爭的舞臺又由里昂、巴黎轉移到了廣州、南京，繼續激盪不已，這是後話。

七、結 論

一部勤工儉學運動史，可以說就是一部中國青年在海外奮鬥的辛酸血淚史。當吾人看到他們離鄉背井，流落異國，工不像工，學不像學，為生活而奔走呼號，叫天天不靈，呼地地不應的悲慘情狀，不禁令人一掬同情之淚！

無疑的，就本身所標榜的宗旨——「勤以作工，儉以求學」而論，勤工儉學運動是失敗的。失敗的原因，據李璜分析，主要有二：

⁴⁴《學鈍室回憶錄》，頁七十八～七十九。

⁴⁵中共在法的組織史，尚未公開。依李璜的〈留法勤工儉學與中國共產黨〉一文，當時有三個團體，即陳延年、趙世炎的社会主義青年團(S.Y.)，周恩來的「法共中國組」與蔡和森以「新民學會」為核心的集團。民國十一年七月，趙世炎依中共中央指示，在巴黎召開會議，將S.Y.改為「中共旅歐總支部」。參閱《中共興亡史》，第二卷，第一冊，頁一〇一。

其一為習慣上，中國知識份子一向不習勞動，在工廠或農田工作，體力十、九皆難勝任，無法勤工；其二在觀念上，五四以後的知識青年，言大志大，卻吃不了苦，一受挫折，即顯現不耐，無法堅持，而且「學生一降而為工人，貴人一旦而執賤役」，並非人人可得⁴⁶。事實上，以工兼學，往往勤工之後即難以專心向學；而不作工，經濟來源又告斷絕，亦無力求學，足見生活壓力之大。從儉學會的發起，到里昂中法大學的創辦，其間雖亦曾造就不少學術教育等各方面的人才，但不可否認者，這些人才恐怕多半是享有公費之人，與真正的勤工生似較無緣。

論勤工儉學，李石曾、吳稚暉為其實際負責人，他們發起這個運動的動機並無可厚非，但他們同樣不能推卸運動失敗的責任。這些應負的責任包括：事先但憑天真空想而無縝密計劃，把法國影像當做「現代性」(Modernity)的模型⁴⁷；組織不健全，因為反對偶像崇拜，厭惡權威，崇尚自由結合，標榜互助精神，無寧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本色；急躁求功，西化中國之念過切，以致選送浮濫；最後遇困難則退縮逃避，沒有堅持到底的勇氣。當然，以李、吳兩氏的性格而言，均屬先知先覺的理論家、提倡者，而非行政者、組織家，故由彼等實際領導此一運動，焉得不失敗！

勤工儉學的發起，原意在為國家培植人才，想不到卻成為孵育共產黨人才的溫牀⁴⁸。美國學者布蘭德(Conrad Brandt)認為，勤工儉學運動固然失敗，但遣送大批富有創業精神的青年學生到法，學習

⁴⁶〈學鈍室回憶錄〉，頁六十六。

⁴⁷C. Brandt, *The French-Returned Elit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p. cit., P. 231; 〈現代法國問題論集〉，頁二一八。

⁴⁸嚴靜文，〈周恩來評傳〉(香港：波文書局，一九七四年)，頁四七。

20 勤工儉學的發展

西方的各種方式，從這些富於進取心的青年學生當中，產生這麼多中國共產運動的領導者，亦絕非偶然之事⁴⁹。果真如此，這正是無政府主義者播種，而共產黨收穫。其結果也正應了一句中國俗話：「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

（原載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民國七十年十月，台北）

⁴⁹C. Brandt, "The French-Returned Elit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p. cit., P. 238; <現代法國問題論集>，頁二三二。

新民學會之成立及其在法活動

- 一、引言
- 二、「新民」一詞源起
- 三、成立日期新考
- 四、會章、會務與會員分析
- 五、響應赴法勤工儉學
- 六、在法組織與政治活動
- 七、結論

一、引 言

由於近代民族主義的風起雲湧，清末民初是學會活動蓬勃發展的時期，根據非正式的一項估計，晚清十六年間（1895-1911）國人所成立的學會約在六百個以上，而民國以後的十年間（1912-1921）亦當超過四百個^①。

新民學會是五四前夕，一批湖南師範生如蕭瑜（旭東、子昇）、蔡和森（林彬）、毛澤東（潤之）等人在長沙所成立的一個學會性質的團體，後來思想產生分化，一變而為具有堅強政治目的的組織，會

^①郭正昭，〈王光祈與少年中國學會（一九一八～一九三六）〉，〈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二期，頁九八。

22 勤儉學工的發展

員中的激烈份子以後大多走上社會革命的道路，成爲中國共產黨最早和最重要的幹部。所以，研究中共早期的黨史，不能不對新民學會的成立和發展情形有所瞭解。

新民學會可以說是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的急先鋒，由於湖南名流如熊希齡（字秉三，曾任國務總理、財政總長）、楊昌濟（懷中，曾任湖南一師教員及北大教授）的精神影響，以及蕭、蔡、毛等三人的積極推動，會員中贊助響應勤工儉學者極多，直接帶動湖南的留學風氣，使湖南參加勤工儉學的人數高達三、四百名之多，幾爲總數四分之一，居全國之冠。而且新民學會會員到法以後，繼續擴大組織，吸收新會員，並不斷從事政治性活動，使勤工儉學運動一開始即帶有濃烈的政治色彩，更使此一原本具有崇高教育理想的留學運動，困難叢生，不旋踵而告變質。故研究勤工儉學運動，自不能忽視新民學會在初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新民」一詞源起

「新民」一詞，乃是舊詞新用，據瞭解，文化的意義實多於政治的意義。其出處最早可以追溯到《大學》、《湯誥》。《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湯誥》：「作新民」。

到了清末民初，「新民」成爲最時髦的一個詞彙。尤其自梁啓超在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創刊「新民叢報」後，影響更加深遠。

「新民叢報」發刊告白說：「本報取大學新民之意，以爲欲維新我國，當先維新我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採合中西道德以爲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

論，以爲智育之原本」^②。梁啓超更撰〈新民說〉，釋新民之義，論新民爲今日中國第一急務，列舉新民的十六項條件爲公德、國家思想、進取冒險、權利思想、自由、自治、進步、自尊、合羣、生利分利、毅力、義務思想、尚武、私德、民氣與政治能力，主張新民之道，「應採補其所未無而新之，以建設中國一種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③。這是對「新民」的最佳詮釋，新民之說遂廣泛影響到一些自命進步與革新的知識分子。

據毛澤東自述，自幼喜讀「新民叢報」，崇拜康梁^④，「新民學會」的會名無疑根源於此。民國九年一月，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曾組織「新民會」，推林獻堂與蔡惠如爲正副會長，以從事民族運動^⑤。而晏陽初所領導的「平民教育促進總會」在民國一、二十年代所從事的鄉村建設工作，也就是一種「造就一批新民，以爲建國、禦侮憑恃」的紮根工作^⑥。可見全國各地，不分南北，無論階層，莫不以「新民」爲風尚，「新民」幾乎成爲當時有識之士所共同努力追求的目標。

「新民學會」一名，根據蕭瑜的說法，是毛澤東首先提出來的。當兩人初議發起時，毛澤東說：「既然爲學習的目的，不妨稱之爲『新民學會』」^⑦。鄭學稼則認爲，出之於蕭瑜的建議^⑧，這可能是誤讀蕭

②「新民叢報」（藝文版），第一號。

③梁啓超，〈飲冰室合集〉（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三十年六月），專集，第三冊。

④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p. 120; 埃德加·斯諾原著，陳雲翻譯，〈西行漫記〉（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七七年），頁一三〇。

⑤葉榮鐘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自立晚報社，民國六十年），頁八五。

⑥李孝悌，〈「平教會」與河北定縣的鄉村建設運動〉，參閱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聯經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一年），第八輯，頁三一四。

⑦Siao-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59.

⑧鄭學稼，〈中共興亡史〉（中華雜誌社，民國六十八年），第二卷，（一），頁一〇一八。

24 勤工儉學的發展

瑜自傳的結果。另有一說，會名由蔡和森提出，為大家所接受⁹。惟翻遍「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與「蔡和森文集」，並未找到有力的證據，不知文集的編者何所據而云然？

三、成立日期新考

關於新民學會的成立日期，由於早期文獻缺乏，真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最有趣的是，兩位最早發起人——蕭瑜與毛澤東，對於成立日期不是語焉不詳，就是錯得離譜。毛澤東曾告訴斯諾（Edgar Snow），他在一九一七年同幾位朋友，一道發起了新民學會¹⁰，而對於成立的時間則略而不提。蕭瑜則說，新民學會是他和毛澤東兩人於一九一四年組織的¹¹，顯然他把醞釀發起與正式成立時間混為一談，故有此重大出入。

茲將有關新民學會成立日期的其他不同說法，列表顯示如下：

時 間	作(編)者	資 料 來 源 名 稱	出版年代	備 註
1917. 秋	蕭 三	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	1949	鄭學稼、王思誠、郭廷以、劉紹唐、黃利羣等人同採此說。
1918. 4. 18	李 銳	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	1957	
1918. 4. 某一天	李 維 漢	回憶新民學會	1979	
1918. 4.	汪 澍 白 張 愼 恒	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	1980	
1918. 4.	王 興 國	楊昌濟的生平及思想	1981	
1918. 4月中旬	戴 緒 恭	向警予傳	1981	
1918. 4. 17	新民學會 會務報告	五四時期的社團(-)	1979	
1918. 4. 14	蕭 三	蕭三日摘抄(五四時期社團)	1979	
1918. 4. 14	蕭 三	毛澤東同志在五四時期(青年運動回憶錄)	1979	
1918. 4. 14	新湘評論 編輯部	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	1979	
1918. 4. 14	梁大為等	蔡和森文集	1980	
1918. 4. 14	張允侯等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1980	

創始會員之一的蕭三（子暉、植藩，係蕭瑜之弟），對於成立經過有較多的描寫，但籠統而不完整。他說：「（一九一七）暑假過了，同學們都從家裏回到學校。是秋高氣爽，楓葉開始脫落的日子，在湘江的對岸，岳麓山底下，在蔡和森同志的家裏——他家租住的『爲癡寄廬』內，集合了二、三十人。在吃飯的前後，人們在屋子裏，在河灘上討論學會的名稱、宗旨、章程，……。就在這一天，學會成立了。」^⑨

最早提到成立確切日期的是李銳，他說：「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八日的一個禮拜天，在長沙岳麓山瀟灘市蔡和森家，開了新民學會的成立會。」^⑩由於早期可靠資料不多，這一說法最流行，大致也爲鄭學稼^⑪、王思誠^⑫、郭廷以^⑬、劉紹唐^⑭、黃利羣^⑮等人及其他作者編者所採用^⑯。但鄭學稼進一步考證說，四月十八日並不是星期日，而是星期四^⑰，事實亦的確如此。李銳的說法犯了日期與星期不一致的

⑨ 梁大爲等編，〈蔡和森文集〉（北京，一九八〇），頁八三四，〈蔡和森生平年表〉。

⑩ Edgar Snow, *op. cit.*, p. 131; 〈西行漫記〉，頁一四三～一四四。

⑪ Siao Yu, *op. cit.*, p. 60.

⑫ 蕭三，〈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北京，一九四九），頁八十二。

⑬ 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北京，一九五七），頁七十二。

⑭ 鄭學稼，前引書，頁一〇一九。

⑮ 王思誠，〈毛澤東與紅禍〉（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六年），頁五十五。

⑯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六十八年），第一冊，頁三三四。

⑰ 劉紹唐主編，〈民國大事日誌〉（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二年），第一冊，頁一一四。

⑱ 黃利羣編著，〈留法勤工儉學簡史〉（北京，一九八二），頁一三一。

⑲ 採四月十八日說法者，就手頭資料所見，尚有下列二處：〈五四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一九七八），第一集，上册，頁一五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民國七十年，六月），中華民國七年一至六月份，頁四三九。

⑳ 鄭學稼，前引書，頁一〇一九。

26 勤工儉學的發展

錯誤，學期中利用星期日開會的可能性很大，而十八日顯係記憶之誤，所以這不是最後定論。¹

由於李銳的說法仍有漏洞，因此文革後討論此一問題的大陸作者都採取比較模糊的態度，不做日期的確定。例如，也是新民學會會員的李維漢回憶說：「一九一八年四月的一個星期天，在長沙岳麓山劉家臺子（又叫周家臺子）蔡和森家中召開了成立大會。」²¹汪澍白、張愼恆²²與王興國²³在他們的著作中，都謹慎的只提到一九一八年四月。戴緒恭則乾脆以四月中旬來表示²⁴。

研究「新民學會」，當然視《新民學會會務報告》或「會員通信集」為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毛澤東曾將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初會員之間的重要通信，按內容和時間彙編成三集《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並且在一些信的前面加上了醒目的標題和按語。第一集共十三封信，第二集共三十封，第三集有七封，所涉及的内容頗廣，包括國際國內大事、人生觀、宇宙觀、哲學思潮、新民學會會務、勤工儉學以及有關共產主義理論和共黨建黨問題的討論。《通信集》由長沙文化書社印發，未對外發行²⁵，故流傳不廣。最近陸續刊行的史料彙編，如《五四時期的社團》、《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新民學會文獻匯編》等，都摘錄或重刊了《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與《新民學會會務報告》。而《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一號明白寫着：「民國七年四月十七日學會成立，在湖南省城對河岳麓山劉家臺子蔡和森家開

²¹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歷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頁四。

²² 汪澍白、張愼恆，〈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歷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五期，頁四十八。

²³ 王興國，〈楊昌濟的生平及思想〉（湖南，一九八一），頁二〇四。

²⁴ 戴緒恭，〈向警子傳〉（北京，一九八一），頁三十一。

²⁵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上册，頁一五一。

會」²⁶。這份學會的正式文件，按理比較可信，但不知何故，海峽兩邊的學者除張允侯等所編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書曾指出其記載有誤外²⁷，對此似均視若無睹！當然，四月十七日也不是星期日，而為星期三，至此問題仍未完全解決。

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五四時期的社團》一書，發表〈蕭三的日記〉，對於懸案已久的新民學會成立日期問題，應該是一項重大突破！該日記是用毛筆寫在湖南第一師範附屬小學校的綠色直格筆記本上的，在四月十四號（陰曆三月初四日），星期日這一條下寫著：「新民學會今日成立，開成立會於對河灤灣寺側劉家臺子蔡君林彬寓。」²⁸蕭三本人也根據這日記所載，在一篇文章裏，一改三十年前那種含糊的說法，而這樣寫道：「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天，我記得，那是一個春光明媚，百花盛開的日子。在湘江的對岸，岳麓山下面，蔡和森同志的寓所裏，集合了十三個人。在吃午飯的前後，人們在屋子裏，在河灘上，討論學會的宗旨、名稱、章程……。就在這一天，新民學會成立了。」²⁹短短的記載，主要改動兩處：一、把成立日期由秋高氣爽，楓葉開始脫落的秋天，一變而為春光明媚，百花盛開的日子；二、將參加人數，由二、三十人減為確定的十三人。至此，以文字可靠的記載改正了過去純憑回憶寫作的錯誤，也解決了衆說紛紜的新民學會成立日期問題。

有了蕭三日記佐證，四月十四日的說法較合乎事實，且無懈可擊，

²⁶《五四時期的社團》（北京，一九七九），（-），補遺，頁五七五。

²⁷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上海，一九八〇），（-），頁一四〇。

²⁸《五四時期的社團》，（-），頁九。

²⁹蕭三，〈毛澤東同志在五四時期〉，參閱《青年運動回憶錄》（北京，一九七九），第三集，頁三。

遂爲「新湘評論」編輯部^⑩、梁大爲^⑪，張允侯^⑫、胡華^⑬等人所採用。後出之著作或史料彙編，應可以此爲本，不必重蹈前人之錯誤。

四、會章、會務與會員分析

新民學會成立的目的，是要「集合同志，創造新環境，爲共同的活動」。在四月十四日的成立會上，通過了由毛澤東、鄒彝鼎起草，經蕭瑜刪削的會章。會章共十一條，主要內容爲：

第二條：本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爲宗旨。

第三條：凡經本會會員五人以上之介紹及過半數之承認者，得爲本會會員。

第四條：本會會員須守左列之各規律：

(一)不虛偽；

(二)不懶惰；

(三)不浪費；

(四)不賭博；

(五)不狎妓。

第六條：本會設總幹事一人，綜理會務；幹事若干人，協助總幹事分理會務；任期三年，由會員投票選充之。

第七條：本會每年於秋季開常年會一次；遇必要時，並得召集臨時會。

^⑩「新湘評論」編輯部，〈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北京，一九七九），頁七十九。

^⑪〈蔡和森文集〉，頁八三四。

^⑫〈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頁一四〇。

^⑬胡華主編的〈中共黨史人物傳〉，其第四卷、第五卷、第六卷提到何叔衡、羅學瓚、蔡和森等人參加新民學會時，都已採用四月十四日的說法。

第八條：會員每人於入會時納入會銀壹圓，每年納常年費銀壹圓；遇有特別支出，並得由公決徵集臨時費³⁴。

從以上幾條可以看出，學會成立之初，只是一批有志青年努力向上，敦品勵學，互助學習的一種純學會性的團體。

在會務方面，並選舉蕭瑜為總幹事³⁵，毛澤東、陳書農為幹事³⁶，大家並交了第一次會費³⁷。

在長沙的會員，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曾在周南女校開過一次會，對會章略有修改，決議增設評議、執行二部，執行部下又設學校、編輯、女子、留學各部，並選舉何叔衡、李思安（欽文、女）為正副執行委員長，陶毅（斯咏、女）、周世釗（惇元）、毛澤東、周敦祥（女）、魏璧（韞庵、女）、陳書農、唐耀章（文甫）、蔣竹如（集虛）等為評議員³⁸。

民國九年春，毛澤東、李思安等因湘事由京到滬，此時會友在滬者計十二人，因陳紹休（贊周）等五人赴法期近，遂於五月八日，在上海半淞園召開一次送別會。名為赴法同學送別，實際上也是一次討論新民學會會務的會議。這次會議，對於學會的方針、會務的開展均有較具體的決定，茲分述如下：

(一)學會態度——學會應有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的作風。毛澤東主張學會本身不多做事，但以會友個別方式去創造各樣的事。

(二)學術研究——都覺會友少深切的研究，主張此後凡遇會友三人

³⁴〈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一號，載於〈五四時期的社團〉(-)，頁五七五～六。

³⁵同前註。

³⁶李維漢，前引文，頁四。

³⁷李銳，前引書，頁七十三。

³⁸〈五四時期的社團〉(-)，頁五七九；李維漢，前引文，頁六；

30 勤工儉學的發展

以上，即組織學術談話會，交換知識，養成好學的風氣。

(三)發刊會報——陳紹休、蕭植藩謂會友相互間應有一種聯絡通氣的東西，故主張急切出版會報，但爲非賣品，除相知師友外，不送與會外之人。大家贊成就在上海發刊，推陳紹休擔任徵集在法會友的文稿，毛澤東負責在上海付印。後因湘事解決，會友陸續離滬歸湘，遂暫緩發刊。

(四)新會友入會——都覺介紹新會員入會，務宜謹慎，否則不特於同人無益，即予新會友亦無益。遂議決介紹新會友宜有四條件：(1)純潔；(2)誠懇；(3)奮鬪；(4)服從真理。其入會手續規定如下：(1)舊會友五人介紹；(2)評議部審查認可；(3)公函通告全體會員，以昭審慎。

(五)會友態度——大意謂會友間宜有真意，宜懇切，宜互相規過；勿漠視會友之過失與苦痛而不顧；宜虛心容納別人的勸戒；宜努力求學。

(六)不設分會——學會前有在會友較多的地方設立分會之議，是日討論，覺無設立的必要，設分會反有分散會友團結力之嫌。如巴黎等會友較多之處，可組織學術談話會，定期召集³⁹。

新民學會在民國七年四月十四日於長沙成立的時候，共有十三人到會⁴⁰，可稱之爲創始會員，茲將此十三人的資料列表如下：

	姓名	別號	籍貫	性別	出生年	教育程度或出身	政治轉向	附註
1	毛澤東	潤之	湘潭	男	1893	湖南一師	共黨	未出國
2	蔡和森	林彬	湘鄉	男	1895	湖南一師	共黨	參加勤工儉學
3	蕭瑜	子昇	湘鄉	男	1894	湖南一師	國民黨	參加勤工儉學

³⁹ 同前註，頁五八〇。

⁴⁰ 此十三人各家記載頗有出入，李維漢則加上自己變成十四人，參閱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頁四。〈新民學會會務報告〉只列十二人，有羅學瓚（云熙），而無何叔衡、鄒蘊真二人。

4	蕭植藩	子暉 (蕭三)	湘鄉	男	1895	湖南一師	共黨	參加勤工儉學
5	陳紹休	贊周	瀏陽	男		湖南一師	共黨	參加勤工儉學
6	張昆弟	芝圃	益陽	男	1894	湖南一師	共黨	參加勤工儉學
7	何叔衡	瞻帖	寧鄉	男	1876	湖南一師	共黨	未參加
8	羅璈階	章龍	瀏陽	男		長郡中學	共黨	未參加
9	鄒彝鼎	鼎丞	湘陰	男		湖南一師		1919年病故
10	鄒蘊真	泮芹	漢壽	男		湖南一師	共黨	未參加
11	周名弟	曉三		男		湖南一師	共黨	未參加
12	陳書農	啓民	長沙	男	1898	湖南一師	共黨	未參加
13	葉瑞齡	兆楨	益陽	男		湖南一師		1918年病故

依上表，這十三名創始會員，可作以下幾點分析：

(一)論性別，十三人皆為男性，尙無一女性創始會員；

(二)言籍貫，十三人都是湖南人，充分顯示是一個地緣性質的結合；

(三)論年齡，除何叔衡已四十開外年齡較大外，餘多為二十出頭的青年；

(四)談教育出身，除羅璈階外，其餘多為湖南第一師範的前後期同學，可見初期這只是學校內部，尙非校際性的學會組織；學校畢業後，除兩人先後病故，何叔衡、毛澤東、羅璈階、鄒蘊真、周名弟、陳書農等人外，餘皆參加了赴法勤工儉學；

(五)關於以後的政治立場，除蕭瑜因與李煜瀛接近成為國民黨黨員，在國民政府任過職，葉瑞齡在一九一八年，鄒彝鼎在一九一九年病故外，其餘大都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蔡和森、張昆弟、何叔衡等人在一九三〇年代「革命」過程中被殺，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病亡，目前健在的尙有蕭植藩、鄒蘊真。

民國七年八月，學會開過成立會後，隨即加入的會友有下列九人：李維漢（和笙）、羅學瓚（云熙）、周世釗（惇元）、熊光楚（焜

32 勤工儉學的發展

甫)、熊楚雄(瑾玗)、陳昌(章甫)、傅昌鈺(海濤)、曾以魯(星煌)、彭道良(則厚)^④，使得會員數目增至二十一人。

民國八年下半年，在五四運動浪潮中，又在湖南吸收了一大批會員，有姓名可查者是：羅宗翰(耻迂)、張國基(頤生)、夏曦(蔓伯)、蔣竹如(集虛)、易克樞(閱灰)、向警予(俊賢，女)、陶毅(斯咏，女)、彭璜(殷柏)、李振翻(承德)、張懷(伯齡)、唐耀章(文甫)、沈均(均一)、李思安(欽文，女)、周敦祥(肫如，女)、魏壁(韞庵，女)、勞君展(啓榮，女)、謝南嶺(維新)、徐瑛(女)、劉修秩(繼庄)、鍾國陶(楚生)、張超(泉山)、姜慧宇(竹林)、劉明儼(望成)、歐陽澤(玉生)、楊潤余(女)、陳純粹、蕭道五、李雲杭、黃勝白等人。隨後，陸續加入的尚有易禮容(潤生)、任培道(振予，女)、吳家瑛(德庄，女)、賀延祐(女)、吳毓珍(女)、郭亮(靖筵)、謝覺哉(煥南)、陳子博、蔡暢(咸熙，女)、熊季光(作瑩，女)、熊叔彬(作璘，女)、許文煊(女)、周毓明(女)、戴毓本(女)等人^⑤。至民國九年底，會員總數已達七十餘人。

觀以上名單可知，(一)學會已由湖南一師純校內的學術社團，擴展為校際性的學會組織，會員已不限於一師同學，而發展到湘雅醫學專門學校、湖南蠶業講習所、湘鄉駐省中學以及長沙周南女校的師生；(二)新會員中女性會員佔十八人，比例相對提高，是其特色，這除了師友介紹與若干血緣關係外，大量吸收周南女校學生，是其主要原因。周南女校自校長朱劍凡於一九一九年暑假到任後，採取不少革新的措

^④此一九人名單，〈新民學會會務報告〉與李維漢的回憶互有出入，前者列有何叔衡、李維漢、鄒蘊真三人，而無羅學瓚、彭道良兩人，後者有羅學瓚一人，而無何叔衡、李維漢、鄒蘊真三人。

^⑤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頁六。

施，注意女子科學的教學，提倡學生自治，鼓勵學生參加社會活動，故在新民學會會員的影響下，周南女校的活躍份子如向警予、陶毅、魏璧、周敦祥、勞啓榮等都紛紛加入了新民學會⁴³。

五、響應赴法勤工儉學

積極響應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是新民學會成立後的一項重要活動，也是會員向外發展的一個主要措施。

由李煜瀛、吳敬恒、蔡元培等人所倡導的留法勤工儉學，到一九一八年夏天已進入高潮，積極展開，這時在湖南一師等校先後畢業的新民學會會員也面臨升學與就業的徬徨。不久，由湖南一師轉任北大教職的楊昌濟從北京來信，告訴他們法國政府又繼續到中國招募工人，正是赴法勤工儉學的好機會⁴⁴，這一來適時解決他們選擇的難題。

一九一八年六月，新民學會在長沙第一師範附屬小學召開一項會議，專門討論留法勤工儉學和會友向外發展的問題，到會者有何叔衡、蕭瑜、蕭植藩、陳紹休、周世釗、蔡和森、毛澤東、鄒彝鼎、張昆弟、陳書農、李維漢等人，咸認留法運動確有必要，應盡力進行，藉以「修學儲能，為救國救民培養人才」，並議決由蔡和森與蕭瑜專負進行之責⁴⁵。

會後，蔡和森受學會委託，於同年六月二十三日乘船離長沙去北京，籌備赴法勤工儉學事宜。蔡至北京後，經楊昌濟之介紹，先後會見北大校長蔡元培與李石曾，知留法儉學及勤工儉學頗有可為，乃函

⁴³戴緒恭，〈向警予傳〉，頁四十。

⁴⁴王興國，〈楊昌濟的生平及思想〉，頁一八三。

⁴⁵〈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一號，見〈五四時期的社團〉(-)，頁五七七。

告湖南會友，從事邀集志願留法之同志。起初願往者極少，至八月間始有二十五人由湘到京。此時會友在北京者已有蔡和森、蕭瑜、蕭植藩、陳紹休、張昆弟、鄒彝鼎、李維漢、毛澤東、羅學瓚、羅璈階、熊光楚、曾以魯等十二人。除羅璈階在北大文科就讀，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外，餘均在留法預備班，其中張昆弟、李維漢、曾以魯三人在保定育德中學留法預備班，蕭瑜、蕭植藩、陳紹休、熊光楚、鄒彝鼎、羅學瓚等人在北京高等法文專修館^④，蔡和森一人則在蠡縣布里村留法工藝實習學校，一面教國文，一面學法文，並負責管理這十幾人的學習和生活^⑤。

在勤工儉學的浪潮中，身為新民學會主要發起人之一的毛澤東卻決定留在北京，不去法國。據《蕭瑜自傳》說，毛澤東決定不出國的理由有四：第一是旅費問題，他籌不出幾百大洋的川資；第二、他自知沒有學習語言的天賦，在學校時，即使最簡單的英文拼音他也無法讀得準；第三、他認為留在北京可以繼續進修，而且為新民學會徵募新會員；同時，去法國留學的人也需要在國內有一個可靠的聯絡人；第四、他強調要成為一個成功的政治人物，學術研究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主要是要有能力組織一個政黨，並結合許多忠實的追隨者。總之，他無意為了讀書而出國，讀書只是一種結識朋友的手段，而留在國內卻可以結識更多的人^⑥。

新民會友中，首先赴法者是蕭瑜。一九一九年一月，因凡爾賽和會期近，他以秘書的身份，追隨李石曾赴法，為華法教育會辦理勤工儉學事宜^⑦。其後會友相繼赴法者共有下列幾批，分別是：

^④同前註。

^⑤《蔡和森文集》，頁八三五。

^⑥Siao-Yu, *op. cit.*, pp. 170-171.

^⑦Siao-Yu, *op. cit.*, p. 176.

第一批有羅學瓚，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由上海乘日輪「三島丸」出發，先到英國，九月二日抵巴黎，該批共有勤工生五十八人⁵⁰。

第二批於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乘法國郵船「寶勒加」(Paul Lécat) 號自上海出發，同船赴法的有一百六十二人，內有新民學會會員李維漢、張昆弟及湖南青年李富春、賀果、李林、余增生、任理、張增益等四十二人⁵¹。

第三批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乘法輪「盎特萊蓬」(André Lépon) 號出發，共五十餘人，內有新民會友蔡和森、向警予、蔡暢、熊季光、熊叔彬及蔡和森、蔡暢之母親葛健豪等人⁵²。

第四批成行的會友有蕭植藩、陳紹休、熊光楚、劉明儼(望成)、張懷(百齡)、歐陽澤(玉生)等六人，他們於一九二〇年五月九日乘法輪「阿爾芒勃西」(Armond Behic) 號出發。行前，在滬會友曾舉行送別會，並於啓航之日，握手揮巾，送之於黃浦江岸⁵³。

第五批有勞啓榮、魏璧兩位女會員，於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乘法輪「高爾地埃」(Cordillère) 號出發，同行者尚有蔡元培及直隸女勤工生劉清揚等人⁵⁴。

至此，新民學會會員到法國者共有十八人，除蕭瑜於一九二〇年十月一度回國外，其餘十七人之工讀情形大略如下：

蔡和森、蕭植藩、張昆弟、陳紹休、劉明儼、熊光楚、歐陽澤、

⁵⁰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五二八。

⁵¹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頁九~十。

⁵² 清華大學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 (北京，一九八〇)，第二冊，(上)，頁一一五。

⁵³ <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一號，參閱<五四時期的社團>(-)，頁五八一；<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七一八。

⁵⁴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七八二。

36 勤工儉學的發展

李維漢等人先後入蒙達集私立中學 (Collège de Montargis, 舊譯蒙達尼, 音誤) 學習法文, 有學校開給華法教育會的欠費清單為證⁵⁵。當時勤工生就讀中學之人數, 以蒙達集私中為最多, 據華法教育會一九二〇年十月的統計, 在該校就讀者達七十名之多⁵⁶。

幾位女會員如向警予、蔡暢、熊季光、熊叔彬則就讀於蒙達集女子中學 (Collège de Montargis, Jeunes Filles)。另初到法國的勞啓榮與魏璧則入南方一女子學校學習法文⁵⁷。

張懷在德勒 (Dreux) 的羅杜路私中 (Collège de Rotrou) 學習法文⁵⁸。

羅學瓚在法國中部克魯鄒 (Le Creusot) 地方一工廠內作電氣工。曾以魯在法國西南部一工廠作工⁵⁹。

六、在法組織與政治活動

新民學會會員參加赴法勤工儉學, 陸續到法國後, 除少部份外, 大都集中在蒙達集地方的男女中學補習法文, 故即以該地為活動中心, 形成國外分會。蒙達集係法國羅瓦列省 (Loiret) 的一縣城, 位於巴黎南方約有六十哩之處⁶⁰, 當時距巴黎約四小時車程⁶¹, 學膳費

⁵⁵ Archives National, 47AS2, B/6-2。據該項資料, 蔡和森、張昆弟、陳紹休、熊光楚、李維漢、劉明儼等人皆於一九二一年七月間入學, 九月間退學, 所欠費用在二百法郎至三百法郎之間, 顯係暑假短期補習法文之需。

⁵⁶ Ibid, 47AS1. A/2-1(4)。

⁵⁷ <五四時期的社團>(-), 頁五八三。

⁵⁸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頁七五八。

⁵⁹ <五四時期的社團>(-), 頁五八二。

⁶⁰ Nora Wang, Deng Xiaoping, *The Years in Franc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2. (Dec, 1982), p. 699. 另蔡和森估計約二百里, 以一哩等於二、七九四里換算, 約一八〇里, 即一百公里左右。

⁶¹ Siao-Yu, *op. cit.*, p. 179. 一百公里距離, 火車需時四小時, 恐為蕭瑜記憶之誤, 實際當一小時可到。

均較花都便宜，李石曾、蔡元培、汪精衛等人均曾在此地之男子中學念過法文，男女兩校相隔僅二、三百步，故會友之間朝夕可以相見^②。

由於毛澤東不出國，蕭瑜在巴黎近郊的華僑協社工作，故蒙達集的新民會友顯然以蔡和森為領袖。蔡和森初到法國，因校中功課淺，每日生活，全在空曠的公園中，不上課，「日惟手字典一冊，報紙兩頁」，「以蠻看報章雜誌為事」，希望一方面把各國社會黨、各國工團以及國際共產黨先弄明白，一方面將社會、工團、無政府、德漢克拉西（民主）四樣東西作一番研究，而暫不作組織的活動^③。蔡和森之所以把新民分會的活動暫且按住，不多吸收近千人的勤工生，主要還在加強學習，吸收新知，着重組黨理論的準備工作，俟機會成熟，擬在二年內成立一旗鼓鮮明，和俄國一致的黨^④。

學會現階段的發展方針既然崇尚潛在進行，到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為了適應新環境的需要，在李維漢等人的倡議下，遂於一九二〇年二月組織了一個「勤工儉學勵進會」，簡稱「工學勵進會」，參加成立會的有李維漢、張昆弟、李富春、任理、李林、賀果、張增益等人，羅學瓚隨後也加入^⑤。該會宗旨，可分積極與消極兩面。在積極方面，想聯絡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儲金、定書報、互相勉勵、疾病救助、工學交互，及為將來別種建劃之預備；在消極方面，可以免除孤獨生涯之煩苦，與環境誘惑之墮落及懶惰之預防等事^⑥。從最初的宗旨看出，

^② 蔡林彬寄出法國的家信，一九二〇年三月八日，〈蔡和森文集〉，頁二十四。

^③ 蔡林彬給毛澤東的信，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蔡和森文集〉，頁二十八。

^④ 蔡林彬給毛澤東的信，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蔡和森文集〉頁五十二。

^⑤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頁十。

^⑥ 羅學瓚給毛澤東的信，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五四時期的社團〉（一），頁二十二。

38 勤工儉學的發展

工學勵進會一開始是實行工讀主義的一個團體，還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團體⁶⁷。它雖然以湖南旅法的新民會會員為主，但只可視為新民學會的一個外圍團體。

第四批成行，於一九二〇年六月間到法國的陳紹休、蕭植藩等人從國內帶來上海半淞園會議情況的消息。根據半淞園會議關於「巴黎等會友較多之處可組織學術談話會，定期召集」的意見，新民學會會員遂決定在蒙達集舉行一次聚會。一九二〇年七月六日至十日，來自各地的會員在蒙達集森林⁶⁸共開了五天會，與會者有蔡和森、向警予、蔡暢、陳紹休、張昆弟、羅學瓚、熊光楚、李維漢、歐陽澤、蕭瑜、蕭植藩、熊季光、熊叔彬等十三個新民會友，以及一些外省的工學勵進會會員，共二十餘人⁶⁹。

會議的議程由蕭瑜所列，第一項是討論何者為中國革命的最合適計劃；第二項為介紹新會員；第三是蕭本人報告最近返國的任務和計劃。經蔡和森提議，將第一項與第三項對調，因為原列第一項議程，需要有較長時間的縝密考慮，故改放在最後⁷⁰。茲誌五天會議的大致進行情形如下：

第一日七月六日 個人感想（最近新知）

第二日七月七日 會務進行

第三日七月八日 會務進行（上午），求學方法（下午）

⁶⁷張洪祥、王永祥，〈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簡史〉（黑龍江，一九八二），頁六十九。

⁶⁸李維漢回憶是在蒙達集中學的教室，蕭瑜說是在森林裏，因利用中學教室另有其他非會員的中國學生出入，不够隱密，若在蕭瑜所下榻的旅館也有所不便，故蕭瑜的說法似比較合情理。Siao-Yu, *op. cit.*, p. 184.

⁶⁹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頁十二。

⁷⁰Siao-Yu, *op. cit.*, p. 186.

第四日七月九日 求學方法，個性批評（下午）

第五日七月十日 個性批評並對於未到會之會員之個性介紹。是日合案午餐，連會外朋友共二十餘人，飯後遊公園照相⁷¹。

這次會議最主要的決定是確立今後新民學會的方針為「改造中國與世界」，但會上對於改造的方法卻出現了分歧的意見和激烈爭論。以蔡和森為首的革命派，主張激烈革命，立即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即倣效俄國十月革命的方法。蔡和森所以堅決主張注重「國際色彩」，走俄國的道路，其理由有二：（一）俄國是共產主義之父，所以必須追隨俄國的領導；（二）從地理上看，中俄兩國唇齒相依，聯繫容易，一旦中國革命起來時，可以或明或暗的依靠俄國的支援，不論是經費或武器方面。

而以蕭瑜為代表的改良派，頗不以為俄式——馬克思式的革命為正當，而傾向於無政府——無強權——蒲魯東式的新式革命，故主張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為人民謀全體福利的革命，以工會合作社為實行改革之方法，因為「世界進化是無窮期的，革命也是無窮期的，我們不認為可以一部分的犧牲，換多數人的福利」⁷²。參加討論的有陳紹休、蕭植藩、李維漢諸人。李維漢與蕭瑜的主張相同，也不贊成俄國式的革命，他在會後寫信給毛澤東說：「社會改造，我不敢贊成籠統的改造，用分工協助的方法，從社會內面改造出來，我覺得很好。一個社會的病，自有他的特別的背景，一劑單方可醫天下人的病，我很懷疑。」⁷³

⁷¹蕭旭東給毛澤東的信，〈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一），下，頁八〇五～八〇六。

⁷²毛澤東給蕭旭東、蔡林彬並在法諸會友，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蔡和森文集〉，頁五十七。

⁷³同前註。

會上，對這兩種對立的主張，沒有展開充分的討論，僅決定將兩種意見寫信告訴毛澤東，希望聽取國內會員的意見。毛澤東接到兩種根本對立的主張後，即於同年十二月一日覆函蕭、蔡兩人並在法諸會友，對於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而於蕭瑜與李維漢兩人的意見，雖在真理上贊成，但在事實上做不到，故不表同意⁷⁴。

蒙達集會議，導致新民學會兩位主要發起人兼理論家蔡和森與蕭瑜思想的分化，此後雙方思想愈走愈遠，蕭瑜與李石曾、吳稚暉等人接近，從事以教育為工具的改良工作，蔡和森則一直與毛澤東保持密切連繫，終於走上俄國革命的道路。

蒙達集會議對於「工學勵進會」的組織表示滿意，建議推廣。同年八月，「工學勵進會」改名「工學世界社」，社員已發展到三十多人。該社重要負責人之一的李維漢，原本支持蕭瑜的主張，但經過與蔡和森的幾次長談並閱讀他所翻譯的一些著作和宣傳十月革命的小冊子後，終於也同意，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的。是年九、十月間，工學世界社在蒙達集開會三天，出席的社員有張昆弟、李富春、羅學瓚、李維漢、賀果、李林、顏昌頤、張增益、任理、蕭植藩、唐靈運、陳紹常、傅烈、王人達、侯昌國、郭春濤、歐陽欽、劉明儼、汪澤楷、尹寬、蕭拔、薛世倫、鄭延毅、成湘等二、三十人。經過熱烈的討論，大多數社員贊成以信仰馬克思主義和實行俄國式的社會革命為「工學世界社」的宗旨⁷⁵。蔡和森不是社員，卻應邀出席，在會上做了「怎樣救中國」的講演，並把自己從法文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抄成卡片，貼在開會教室的牆上，向大家講解，且參加了討論⁷⁶，對於「工學世界社」宗旨的改變產生很大

⁷⁴ 同前註，頁六十。

⁷⁵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頁十三。

⁷⁶ 戴緒恭，〈向警子傳〉，頁六十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六卷，頁十四。

的作用。

「工學世界社」是旅法勤工儉學中成立最早的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團體。它成立後，把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作為一項重要任務。該社搜集了幾百種新思潮書報雜誌和各種小冊子，其中有法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法國共產黨的「人道報」、《共產黨月刊》、《俄事評論》、共產國際的出版物「婦女聲」、「女權報」等，由社員分工進行翻譯和研究。他們還組織了一個「工學世界通訊社」，經常向國內各報刊發稿^①。「工學世界社」與「新民學會」雖屬兩個不同組織，但骨幹多為新民會員，至此宗旨又趨一致，儼然一體，今後在從事對外政治活動方面，更是亦步亦趨，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以蒙達集為中心的新民學會和「工學世界社」兩團體，在一九二一年曾先後領導參加了兩次勤工儉學生的政治活動，一次是二月二十八日的使館請願風潮；一次是九月二十日的進駐里大事件。

一九二一年初，赴法勤工儉學生已經到達一千六百餘人，但只有四分之一有工作，其他都「欲工無門」，唯賴華法教育會每天所發五法郎維持費度日。這時蔡元培到法，不但沒有為勤工生帶來好消息，反而發表聲明，斷絕與勤工生的一切經濟關係，這一來使學生大起恐慌，在希望幻滅下，遂爆發了二月二十八日四百多名勤工生包圍駐法使館，向公使陳籙請願的風潮，俗稱「二八運動」，結果學生數人被法國警察毆傷，在混亂中有一人被電車撞死，並有多人被捕。

使館請願風潮的主要領導人是新民學會的一羣如蔡和森、向警子、李維漢、張昆弟、蔡暢加上工學世界社的賀果等社員，他們從蒙達集

^①張洪祥等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簡史〉，頁七十一。

4.2 勤工儉學的發展

到了巴黎，住在華僑協社附近的一個兼營咖啡館的旅館內，連日與各地同學的代表開會商討進行方法，代表會提出爭取「生存權」、「求學權」的口號，要求發給學生每月每人四百法郎的補助，以四年為限。二月二十七日的代表大會為廣泛爭取社會各界支持，並向全體勤工儉學同學發出通告，向公使館和華法教育會發出請願書，向旅法上層人物發出請求援助書，向北洋政府和各省政府發出電報⁷⁸。

二月二十八日晨，四百多名勤工儉學生在巴黎示威遊行，並推派蔡和森、向警予、趙世炎、王若飛等十人代表晉見陳籙請願，雙方相持大半天，羣衆被警察驅散，代表十人被囚禁於警察局兩小時左右始釋放。使館請願風潮雖沒有達成原定目標，但迫使公使館延長發放三個月每人每日五法郎的救濟金，華法教育會也答應為失工學生找工作⁷⁹。

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日，向警予和蔡暢、勞啓榮、魏璧、熊季光、熊叔彬等六位新民學會會員，聯絡胡慕昭、林青萍、吳孟班、李志新、蕭珉、廖世劭等其他女學生共十二人，組織開放海外大學女子請願團，發出致國內女界的公開信，信中指出：「女子程度不足，實社會制度與教育所致……故程度不足，女子自身實不能負責，而負其責厥惟社會制度與教育，解決之者亦惟社會制度與教育」⁸⁰，要求女生有讀書的權利，要求即將成立的西南大學所屬的海外大學，招收女生。這可視為「二八運動」的餘波，又是同年九月發動的進駐里昂大學事件的前奏⁸¹。

里昂中法大學，亦稱里昂中法學院，法文名稱爲 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簡稱里大。中法大學的創辦，乃吳稚暉海

⁷⁸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頁十四。

⁷⁹ 同前註。

⁸⁰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一)，下，頁五二三。

⁸¹ 戴緒恭，〈向警予傳〉，頁六十七。

外中國大學夢想的實現；由於他的鼓吹，以及李石曾、張靜江、蔡元培等人的支持贊助，遂得於一九二一年十月正式開辦。中法大學的設立，除主事者亦為勤工儉學運動的發起人外，原本與在法的勤工儉學生無甚關係，但一部分勤工生認為，中法大學未開辦前，曾以救濟勤工生的名義，收受各界捐款甚多，故在這批當時已走投無路的勤工生看來，里大的成立，正可解決他們的困境，當然寄以無限的希望。及至該校成立，由於宿舍容量有限，所招的學生分別由國內北平、上海、廣州等地直接選送，在法者必須經過甄選始可入住，這種捨近求遠的作法，自然引起上千勤工生的恐慌與難堪，也可以說是希望的幻滅⁸²！

一九二一年九月五日，在克魯鄒工廠工作的一百四十七名勤工儉學生，在聶榮臻領導下，首先發出了爭回里比兩大學的宣言和通告。宣言上說：

「歷史告訴我們，正當的爭攘，不是惡德。經驗告訴我們，與的不如取的。里昂大學和中比大學，是中國平民教育的基礎。在歷史上，是因為我們勤工儉學生而後有。現在突變方向，任我們千數百勤工儉學生于顛連無告之中，而置之于不聞不問之外，所以我們要爭回。」⁸³

在致全體勤工儉學生的通告中，則揭示了進行運動的具體步驟：第一步就各地同學組織團體，籌商辦法，舉出辦事人；第二步即由各處團體，產生一全體爭回里、比兩大運動同盟；第三步即向法國方面及中國在法各要人運動，請為有力之幫助，並向里、比兩大學之當事人，作正式之談判，據理力爭，總期以和平達到爭回之目的。但若「兩校當事人，視我等困難如無睹，不肯容納我等之要求，則前途茫茫，

⁸² 陳三井編，〈勤工儉學運動〉（正中書局，民國七十年），引論，頁六。

⁸³ 「克魯鄒工廠勤工儉學生爭回里比兩大運動團」宣言，卞孝萱輯，〈留法勤工儉學資料〉，〈近代史資料〉，一九五五，第二期，頁二〇一～二〇二。

危急萬狀，勢不得不鋌而走險，為最後之行動，以求一總解決。」⁸⁴

「宣言」和「通告」發出後，得到其他留法勤工儉學生的響應和支持，遂在蔡和森、趙世炎、王若飛等人的領導下，在巴黎發起成立了「留法勤工儉學生聯合會」，以統一領導爭回里比兩大學的運動。爭回里大的消息傳出後，九月十二日里大的校務管理機構即用「里昂中法大學協會」(Association Universitaire Franco-Chinoise)的名義發出一份法文的「告留法中國學生書」，聲言中法大學是一所高等教育機構，所培養的人，「在回中國的時候，定當做教授，從事於各種相當科學的研究」。「對於收錄與考試學生，應呈驗文憑或經過考試」，並且「若非官費或有支付款項的確實保證，不能收錄。」⁸⁵這個通告無異粉碎了大部份勤工儉生想無條件進入里大的美夢。

「留法勤工儉學生聯合會」得此通告，立即通知各地勤工儉學生派代表到巴黎開會，共商對策。九月十七日，各地代表在蔡和森、趙世炎的主持下，一致通過「以開放里昂大學為唯一目標」，並提出「誓死爭回里大」，「絕對不承認部份解決」，「絕對不承認考試」三個口號。大會原定派出代表赴里昂與校方談判協商解決，但很快傳來了吳稚暉已從國內招收一百五十名學生，將於九月二十四日到達法國馬賽港，二十五日正式入校的消息，故引起大部份勤工儉學生的憤慨，表示除了直接行動外，沒有別的道路。九月二十日清晨，勤工儉學生代表大會發出如下緊急通告：(一)本會今日移駐里昂中國大學，巴黎方面留駐巴代表五人；(二)由本會於巴黎、聖日耳曼、楓丹白露 (Fontainebleau)、克魯鄒、沙多居里 (Chateau-Thierry)、墨蘭 (Melun)、蒙達集等處同學中組織先發隊百人，隨同本會出發，佔據里大；(三)各

⁸⁴「克魯鄒工廠勤工儉學生爭回里比兩大運動團」通告，同前註，頁二〇五。

⁸⁵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頁二十三~二十四。

學校各工廠勤工同學接到這通告後，請即日組織「援里隊」，陸續向里昂出發，最遲於通告到後四十八小時內，有代表三人以上赴里昂⁸⁶。周恩來、王若飛、李維漢、蕭植藩、徐特立等五人則留駐巴黎，負責聯絡，爭取聲援，並隨時與公使館進行交涉。

先發隊分兩批於二十一日晨先後到達里昂，合共一百二十五人。他們到達中法大學時，校方早有準備，將所有教室、房間的大門都上了鎖。先發隊只好在校后草地上暫待，並推派蔡和森等人為代表與里大當事人之一的褚民誼交涉。褚民誼與里大協會法國秘書給先發隊員加上「無錢、無學、革命黨」的罪名，通知當地警廳立派警察前來監視，並將隊員隨身所帶居留證與護照全行收去⁸⁷。

翌日(二十二)，全體先發隊員被警察強行送入蒙呂克(Monluc)兵營拘禁，其間雖有公使館派遣副領事李駿前往交涉，留巴黎代表周恩來、李維漢等人也與陳籙公使、吳稚暉校長有過談判，進行營救，但終歸無效。先發隊經二十餘天的拘禁後，終以四項罪名：(一)不得主權者許可，擅入人室；(二)侮辱市長；(三)發散傳單；(四)與共產黨的新聞記者接近⁸⁸，而於十月十四日被押送至馬賽乘法輪寶勒加(Paul Lécat)號回國，結束了一場以武力強佔里大校舍事件。這次被強制遣送回國的勤工生代表共一〇四人，內有新民學會與工學世界社重要份子如蔡和森、張昆弟、羅學瓚、賀果、劉明儼、顏昌頤、唐靈運、蕭拔、郭春濤等人⁸⁹。不久，已經和蔡和森結婚，並懷有身孕的向警予也從蒙達集啓程回國⁹⁰。從此，新民學會在法的活動無形中停頓。

⁸⁶ 周恩來，〈勤工儉學生在法最後之運命〉，〈旅歐通信〉(北京，一九七九)，頁五十。

⁸⁷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二十五。

⁸⁸ 周恩來，〈旅歐通信〉，頁五十五。

⁸⁹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頁十五。

⁹⁰ 戴緒恭，〈向警予傳〉，頁七十。

七、結 論

新民學會從民國七年四月正式成立，到民國十年七月中國共產黨組黨，新民學會逐漸停止活動為止，前後只有短短的三年多時間。

由於新民學會會員的參加與響應，壯大了勤工儉學的陣容；但也由於它的過份介入，激烈政治化的結果，使得一樁具有改良主義色彩，旨在為國家培植人才的留學活動逐漸變質，幾乎全盤斷送。

新民學會雖然還不是名符其實的馬克思主義團體，但在其發展組織與從事活動的三年多過程中，透過會員之間不斷的討論研究，自我批評，提供給會員一個思想訓練，思想整合的場所，並藉此吸收會員，訓練會員，為以後正式共黨的成立提供一個「水到渠成」的助力。新民學會在法國的會員雖然不多，但它以勤工儉學為歷練舞臺，利用大批勤工生「勤工無門，儉學無路」的不滿情緒，運用組織的力量，結合各種不同程度的同情者或外圍團體，投入一次又一次的社會政治活動，增進了實際的鬭爭經驗，吸收了從失敗中所得的寶貴教訓，培養了一些中國共產黨未來的重要幹部，這是不容置疑的歷史事實。

結果，無政府主義者播種，而共產黨收穫^⑨。這更是耐人尋思而又何其不幸的歷史發展。

（原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期，民國七十三年六月，臺北）

^⑨美國學者布蘭德（Conrad Brandt）認為，勤工儉學運動固然失敗，但遣送大批富有創業精神的青年學生到法，學習西方的各種方式，從這些富於進取心的青年學生當中，產生這麼多中國共產運動的領導者，亦絕非偶然之事。Conrad Brandt, *The French-Returned Elit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Symposium on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38; 另參閱 陳三井〈勤工儉學運動初探〉一文。

民初旅歐教育的艱難歷程

——里昂中法大學初探（1921～1948）

- 一、引言
- 二、創辦過程
- 三、經費問題
- 四、校務組織
- 五、學生來源與生活糾紛
- 六、思想活動
- 七、學習活動與成績
- 八、結論

一、引言

面對西方帝國主義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接二連三的挑战，國人深切感覺拯救國家的努力，已刻不容緩，乃有派遣留學生出國留學的實際反應，希冀「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終而達成富國強兵之目的。同時，有識之士亦以為，中國之弱，在於國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果欲開通民智，恢宏器識，進而改良社會，更非注重一般平民大眾，先從教育上著手不可^①。而欲輸世界文明於國內，必以留學泰西為要圖。惟西國學費，素稱浩大，其事至難普及，因有廣關歐陸學界，與

^①陳三井，〈勤工儉學運動初探〉。

48 勤工儉學的發展

苦學風氣之舉^②。這是民初李煜瀛（石曾）、吳敬恒（稚暉）等人提倡留歐儉學、赴法勤工儉學，乃至創設里昂中法大學等旅歐教育運動的由來。

所謂旅歐教育運動，就內容實質而言，主要以中法教育為骨幹。中法教育發起的動機，旨在謀中國學術之提高與普及，想從西歐到中國開鑿一道輸入學術的運河^③。以時間而論，中法教育四個字，幾乎隨中華民國的誕生而同時出現。以地域而言，它包括了國內、法國、比利時三大區域^④。綜合幾位曾致力於中法教育事業人士的看法，民初旅歐教育運動，約可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 (一)預備時期——從民國元年至民國七年，其時中法教育正在萌芽，人數較少，事業亦尚無確定之組織，然留法儉學會、勤工儉學會皆開始於此一時期之內，中法雙方並成立「華法教育會」以為鼓吹。
- (二)發展時期——由民國八年至民國十四年，中法教育運動，直到歐戰後，始有大規模的發展。例如巴黎大學中國學院、里昂中法大學的相繼設立，二千餘勤工儉學生的聯翩西去，法國學者班勒衛（Paul Painlevé）、儒朋（Paul Joubin 里昂大學校長）諸人之東遊，皆於短時期中有驚人之進步。
- (三)改良時期——民國十四年以後，則草創及已成之各事，逐漸入於改

② <留法儉學會緣起及會約>，〈東方雜誌〉，十四卷四號。

③ <發刊旨趣>，〈中法大學半月刊〉，第一期（民國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④ 就北平中法大學而言，大學本部有文學、哲學、理化、生物四科，即服爾德、孔德、居禮、陸謨克四學院；附設中學有男女四校，散布於京內、西山、溫泉等處；法國有里昂中法大學；比利時有曉露槐（Charleroi）工業大學。

良之途徑，隨時間之演進，而隨時加以整理改良^⑤。

里昂中法大學成立於民國十年（1921），為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等一批稍早鼓吹勤工儉學的哲人，與里昂當地熱心中法教育人士所共同創辦的一所海外中國大學，其目的在以比較經濟的組織，利用國立里昂大學及其他各專門學校現成之設備與師資，為我國作育有志深造之人才^⑥。里昂中法大學的設立，可視為中國旅歐教育的一項重大實驗，亦可看做中法教育發展過程中的一項具體成果；可惜後來因經費難以為繼，歷盡滄桑艱辛，終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關門停辦，而成為中法教育合作事業史上的一個絕響！

筆者搜集資料，研究勤工儉學運動有年，茲就法國所見材料及里昂中法大學所保存之檔案撰成本文，除擬對中法大學這一頁生動歷史有所闡述外，並將探討民初旅歐教育運動的成敗及其關鍵所在，以為日後我國留學教育之借鏡，並供關心中西文化交流人士之參考！

二、創辦過程

旅歐教育運動雖萌芽於民國初年，然留法儉學會因歐戰爆發而停止發展。及至歐戰結束，華法教育會所選送之勤工儉學生雖達二千餘人，然大多分派至工廠作工，其稍富有者，則入中學肄業，學習法文，且均分散居處，一直尙未有專為我國留學生而設立之高等學府。民國八年秋間，正當直皖戰爭之際，吳稚暉為有志留學之莘莘學子請

⑤ <李石曾君致留法學界工界同人書>，〈中法大學半月刊〉，第二期，頁三八；周太玄，〈中法教育運動與東西學術思想〉，〈旅歐週刊〉，第四四期（民國九年九月十一日），頁一。

⑥ 李書華，〈吳稚暉先生與里昂中法大學〉，〈吳稚暉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特輯〉；陳三井編，〈勤工儉學運動〉（正中書局，民國七十年十一月），頁四〇二。

命，撰「海外中國大學末議」一文，提倡以國內創辦大學之經費，移設大學於國外，如此教師既易延聘，環境亦較清高，且可免除種種政潮學潮之纏擾^⑦。吳稚暉心目中擬設之海外大學，最急者為兩處：一為法國，一為美國，而未及於已有甚多留學生之日本；法、美兩國，又先注意巴黎，「蓋歐洲學子，遠不及赴美之盛。欲使歐美潮流平均輸灌，故先及巴黎^⑧。」

吳稚暉的意見，獲得當時政治文教界有力人士如蔡元培、李石曾、汪精衛等人的贊同。

同時，法國的一批政治文教界人士對於歐戰以來成千勤工儉學生到法之事，並不陌生，為了擴大法國文化在中國的影響，為了促進中法之間的友誼關係，為了更有效組織雙方教育合作起見，他們也認為彼此交換意見的時機已到，因此海外中國大學就在班樂衛、儒朋之相繼訪華以及李石曾在法奔走交涉下，醞釀成熟並宣告成立。為何原先擬設於巴黎，後來卻改在里昂呢？這可以從商務關係、地利、人和與所提供的物質條件方面加以分析。

從商務關係來說，里昂是法國產絲地區，與中國的商務關係甚早。中國商品銷售里昂向來很多，尤以絲為最。里昂商會因而兩次派遣實業考察團到中國調查實業，並附設絲織品陳列所於商會，多列中國貨品。又於商會中設中文實用科，於里昂大學設中國文學課^⑨。

從地利上看，里昂是法國第二大城，居全國之中心，為「人文輻輳」之地，交通極其便利。

從人和方面言，眾議員穆岱（Marius Moutet），里昂市長赫里

⑦ 曾仲鳴編，〈法國里昂中法大學〉，頁一。

⑧ 吳稚暉，〈海外中國大學末議〉，〈吳稚暉先生全集〉。

⑨ 蕭子昇，〈里昂中國大學最近之進行〉，〈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清華大學編），二卷下，頁五八八。

歐 (Edouard Herriot), 國立里昂大學校長儒朋、醫學院長雷賓 (Jean Lépine), 不僅是中國之好友, 且為法國政教之權威, 其地位與聲望, 在法國與國際間並不亞於蔡、李、吳諸人¹⁰。尤其穆岱與赫里歐早在華法教育會時代即扮演重要角色, 開設中法大學之議, 更首先熱烈贊成。

從物質條件方面論, 里昂大學的分科及高等專門學校均尚稱完備, 僅次於巴黎。故里大校長儒朋曾言, 與其設大學於巴黎繁華之區, 不如創在里昂¹¹。赫里歐市長並稱, 在里昂西郊三臺山上, 適有報廢兵營一座, 內有房舍, 可容二、三百人, 周圍約百餘畝, 交通便利, 環境清幽, 最適於教育用地, 如有需要, 彼可設法撥用¹²。

總之, 里昂當地人士對中法教育所表現的無比熱心, 所提供的種種口頭承諾與物質條件的方便, 特別是有現成古堡可改用, 既省力又省事, 打動了李石曾等人, 無意中促成了海外中國大學在里昂的設立。事實證明, 選擇里昂, 在原則上是明智的, 因為此地外國學生比巴黎少, 在物以稀為貴的情況下, 中國學生將得到較好的照顧。

中國人在海外設立大學, 可說是破天荒的創舉。李、吳等這些理想主義者當初所懸的目標很高, 他們大概已看清楚, 經由華法教育會西去的數千勤工生, 「只得普通知識之人才¹³」, 並不符合理想, 故欲另起爐灶, 為華人謀永久固定之教育機關, 想為中國培養各處大學裏的得力教授與高等學者¹⁴。因為這個大學如果辦成, 必定可以溝通

¹⁰ 劉厚, <里昂中法大學始末記>, <吳稚暉先生一百十歲誕辰紀念特輯>; <勤工儉學運動>, 頁三九二。

¹¹ 曾仲鳴, 前引書, 頁一。

¹² 同註¹⁰。

¹³ 褚民誼 (重行) 致蔡元培函,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 二卷下, 頁五八五。

¹⁴ 里昂中國大學海外部的經過、性質、狀況, <勤工儉學運動>, 頁三六一, 三六三。

52 勤工儉學的發展

東西的文明，融合中外的學術，另創一種「新文明」，爲人類開一紀元。換言之，他們要藉里昂海外部那很平常的戲臺，唱起很高等的曲子；它強調不是創造人才，而要製造學者；不是製造資格的學者，要想製造眞研究的學者，也即絕不是要製造把學問當敲門磚的學者，而要想製造拿學問消遣終身的學者^⑮。

由上述創辦宗旨可知，這個大學當然並不專爲勤工儉學生而設。不過，勤工儉學生對它所表現的關切和希望，可能更甚於任何人。當大學尚在籌備階段，即有人投書《旅歐週刊》，對它提出四點熱切希望：(一)希望大學成爲模範的「平民大學」；(二)希望大學成爲國際的「文化運動中樞」；(三)希望大學成爲國內的「學術供給場所」；(四)希望大學成爲將來的「人才製造場所^⑯」。除了一、四點性質稍有不同外，其餘與吳、李等人辦學目標不謀而合；但校舍容量有限，當大批勤工生知道被擠於門外後，只有演出一場進軍里大，強佔校舍風波，在里昂造成很不好的印象^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甫告誕生的里昂中法大學，從此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一直在風雨飄搖中渡過！

三、經費問題

經費問題，是里昂中法大學最初開辦與以後維持的一項最大困難。

當海外中國大學籌議時，恰逢巴黎和會開會之際，當時中國本有退還庚子賠款條件的開出，但要求的用度，意見紛紜，使外人無所適

^⑮同上，頁三五九～三六〇。

^⑯〈對於里昂設立中國大學之希望〉，《旅歐週刊》，第十三期（民國九年二月七日），頁一。

^⑰里昂中法大學檔案，Lettre de M. Lépine à M. Chen Loh（陳錄），30 sep. 1921.

從。李、吳等人有意運動法國退還庚子賠款，在教育上使用，做為開辦中國大學的經費。李氏至里昂與儒朋、穆岱、赫里歐、雷賓等法國友人相晤，陳說此意，商量運動。但雷賓以為，「退還賠款，並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恐怕候款太久，建設中國大學之事，反至無形消滅。不若先得一校舍，由中法分擔小款，辦了一個雛形，可促成賠款的退還。」儒朋首先贊成這個意見，並提交里昂大學評議會討論，討論結果決議此校將來由里昂大學扶助，並向市政府索取公房做為校舍。市長赫里歐亦贊成，指出兵房一處，舊日教會學校一處及空地一處，任憑李氏選擇¹⁸。庚款遙遙不可期，設校又勢在必行，這是經費上必須另想辦法的原因。

李石曾在法國，曾就經費問題分別與出席巴黎和會我國首席代表陸徵祥以及法國教育部方面作了初步接洽。民國九年初，李石曾回國後，即晤吳稚暉於上海，並同往晉謁孫中山先生，當得孫中山先生熱烈贊助，並允致函廣州七總裁府，予以精神與物質之助。當時廣東政府正擬利用關餘創辦西南大學，經吳稚暉、汪精衛等極力爭取，終允在西南大學經費內撥出一部份，在里昂中國大學內，設一西南大學海外部，定出開辦費二十萬元，每年經常費亦二十萬元¹⁹。於是法國獻地，我國捐款，開辦費有了着落，褚民誼奉命立即開始校舍整修工作。

開辦費雖有了着落，然學校經常費則需到處化緣，依賴各方捐助：

(一)廣東政府最初答應年出國幣八萬元（歐戰前每元值法幣二法郎半，後為十法郎），派送學生百名，稱為廣東大學海外部。後以學生額數未滿，而以國幣計算，殊多不便，乃改為每年法幣約四十萬法郎。第一學年（民國十年至十一年），粵省經費，全數繳納。

¹⁸ 同註¹⁴，頁三四七。

¹⁹ 同註¹⁴，頁三四九。

54 勤工儉學的發展

第二學年（民國十一年至十二年），因廣州政變，款久未到。十二年九月間收得九萬多法郎。

第三學年，亦只收得數萬法郎，距預定數目甚遠。

自民國十四年元月起，確定每月寄與中法大學協會法幣二萬五千法郎，另寄學生每月每名一百法郎零用費。

自四月起，學生零用費亦由協會發給，以歸一律，統計每人每月五百法郎。

由上述可知，廣東之助款每況愈下，甚難掌握。

(二)法國政府年助經費法幣七萬五千法郎，內五萬法郎由外交部指撥，二萬五千法郎由教育部指撥，自開辦以來，均無短欠。當粵款欠發時，曾由中法大學協會商請法外部暫行墊借約三十萬法郎。此外，里昂市政府特別津貼二萬法郎，虹江省（département du Rhône）省議會每年助五百法郎，市政廳助五百法郎，為數不多，不過略表贊助中法教育事業之意耳^⑭！

(三)北京政府年給津貼法幣十萬法郎，數年來均能悉數照給，多於年初由李石曾經手寄至法國。惟當初由張弧以僑工局名義請求稅務處撥款時，在國務會議上曾遭否決，因海軍總長薩鎮冰、教育總長傅增湘、農商總長田文烈等人紛表反對，除認為法國學風不好外，更主張有款當辦於國內，不當送往國外。

(四)南洋僑商陳嘉庚（1874-1961）這時正辦集美學校，並議設廈門大學，對於在里昂設立中國大學，培養高級師資，極為贊同，並願每年出借新加坡銀十五萬元，作為學生進修貸款。意思雖好，惟辦校人恐將來貸款收不回來，反而不美，因而作罷^⑮。

^⑭ 曾仲鳴，前引書，頁四～五。

^⑮ 同註^⑭，頁三五〇。

由上述經費來源看出，里昂中法大學經濟基礎甚為薄弱，它至少有兩大致命傷：(一)除粵政府所提供的一筆開辦費（已用於修葺校舍）外，沒有一筆可觀的基金做為週轉之用，故於第二年當粵政府經常費不能如數續供時，便有週轉不靈、告貸度日之窘；(二)中法大學每年固定經費來源約六十萬法郎，而其中四十萬法郎約全額三分之二之數，仰賴政局並不穩定之廣東政府；一旦廣東政府的大財源——關餘——由外交團交給了北京政府，不但籌設西南大學的計劃落了空，且里昂海外部四十萬元的常年經費也成了泡影。

在經費來源短絀不穩定下，中法大學協會為免學校斷炊，曾一再函電向國內催討，頗傷雙方感情。而校內諸般措置，難免不因此精打細算，甚或因陋就簡，故糾紛時起，幾無寧日！

四、校務組織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七月八日，中法雙方簽訂正式合同。同日，組成中法大學協會（Association Universitaire Franco-Chinoise），以為管理中法大學之機構。

中法大學協會設名譽會長，中法各一人，分別由中國教育總長與法國虹江省長擔任；設名譽董事會（Comité d'honneur），法方名譽董事有歐樂（Aulard）、奧諾哈（Honorat）、保安卡萊（Poincaré）、班樂衛等人，中國方面有駐法公使陳籙等人。

協會最高權力機構則為董事會（Conseil d'administration），其董事（或稱理事）分下述三種：

第一種為創始董事（Membres Promoteurs）：法方為儒朋、雷賓、穆岱、赫里歐、古恒、馬祖烈將軍（Général Marjoulet，軍

區司令)等六人;中方爲蔡元培、李煜瀛、吳稚暉、汪精衛、高魯、褚民誼等六人。

第二種爲法定董事(Membres de Droit):法方爲里昂市長、虹江省議會議長、里昂商會會長、國立里昂大學校長等人;中方爲北京大學、廣東中山大學、廈門大學三校代表及里昂中法大學校長等。

第三種爲選任董事(Membres Elus):法方十人,多由商會中人士與教授選任,中方亦十人,有李廣安、李廣平、李麟玉、李書華、曾仲鳴、劉厚等人²²。

由於全體董事大會,每年固定只開一次,故協會另設一常務機構,即常務董事會(Bureau Administratif),實際處理各項事務,其組織與人事如下:

會長:雷賓(法)

蔡元培(中)

副會長:沙木拿(Chamonard,里昂商會代表)

高魯(中)

秘書:古恆(Maurice Courant,里昂大學文學院教授)

褚民誼(中)

司庫:達爾讓(Dargent)

中法大學校長:吳稚暉

秘書長:曾仲鳴

協會各項人事,以後雖隨時間演進而略有變動,但結構大致不變,即維持漢、法各半的原則。

²²Annales Franco-Chinoise, No. 1(1927).

根據章程，校中之行政、理財事屬之中法協會²³。會長無論在民事行爲或司法責任方面，對外均代表協會，並裁定各項支出²⁴。中法大學校長規定爲中國人，其本人與教授由董事會任命，並經大學評議會通過之。舉凡課程之安排，校務之管理，按諸所訂合同，應歸中國校長處置。

協會組織採取兩頭馬車的合作辦法，用意雖善，但並不切實際。就董事會結構而言，一大半中國董事人皆在中國，即使人在歐洲或法國，也不一定能夠到里昂出席開會，故自然形成開會時人少勢孤，並不平衡的狀態，遇有爭執，不一定能做出使雙方滿意的決定。再就常務董事而論，中國會長、副會長僅只掛名而已，實際無法出席會議，也不管事，故開會時往往只有華籍秘書或校長、秘書長一、二人參加，兼以中國人固有的謙讓美德，久而久之，易形成法國會長一人的獨斷與法國秘書的攬權。甚至協會秘書處一打字員邪內小姐 (Melle Chynet)，都能利用秘書古恒病篤之時，擅越職權，任意干涉學校行政，致引起學生公憤，聯名寫信致校長，必欲驅逐出校而後甘²⁵。

就校務而言，吳稚暉一向標榜同學自治，並不管事。實際上，學校受制於協會，校長受制於協會秘書，再加會計操於人手，並無多大實權。吳稚暉在任內，曾因設立翻譯秘書，爲學生爭取助學金並主張法方的七萬五千法郎津貼應全數用之於教學諸事，與協會頗生齟齬，這也是他到任一年就黯然離校的原因之一。事後，古恒到處寫信，對吳頗有微辭，甚至向蔡元培、李石曾建議，考慮改用法人當校長，而

²³ 曾仲鳴，前引書，頁二。

²⁴ 里昂中法大學檔案，Note Relative à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1921.

²⁵ 同上，Lettre des Etudiants de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à M. Le Directeur, 25 avril 1935.

以中國副校長助理之²⁶。古恒好攬權，與中國秘書褚民誼之間也相處不睦。以後繼任的中國籍秘書或校長，也都或多或少有大權旁落的無力感。但爲顧全大局起見，不得不委屈求全，甚少能够做到爲學生主持公道矣！

五、學生來源與生活糾紛

里昂中法大學開辦，民國十年七月，分別在北平、上海、廣州招考第一批學生，預定北平、上海各招二十名，廣州招一百名。北平的考試由李石曾主持，上海由吳稚暉負責，廣州則由南方政府教育廳主持²⁷。其報考資格規定，凡中學畢業持有文憑者，均可報考；若已大專學校畢業有文憑證明者，則可以免考。結果共錄取一〇五名，由吳稚暉率領，乘法國郵輪博爾多士（Porthos）號抵法。第一批學生由於匆促招考，兼之考選不嚴，故程度參差不齊，尤其法文程度不足（吳、李等人原來構想，先在中法大學修習兩年法文，故於此要求不嚴），造成以後頗多困擾。最令法國友人不諒解者，學生出國前多未經嚴格之體檢²⁸，故有因肺病必須入院修養者，有因重病被遣送返國者，而廣東生在法病故者即有姚冉秀、謝振芳、區藻暄三人²⁹。

在學生中，又分廣東大學海外部學生、本部特待生、本部免費生、本部自費生四種。廣東生與本部特待生除旅費由公家代出並免納學膳醫藥費外，每人尚月支零用費一百法郎；本部免費生免繳學膳醫藥

²⁶同上，Lettre de M. Courant à M. M. Tsai et Li yu-ying, 27. nov. 1922.

²⁷李亮恭，〈稚暉先生與里昂中法學院的誕生〉，〈吳稚暉先生一百十歲誕辰紀念特輯〉；〈勤工儉學運動〉，頁四〇五。

²⁸里昂中法大學檔案，Lettre de M. Courant à M. Joubin, 10 avril 1922.

²⁹曾仲鳴，前引書，頁一〇～一一。

費；自費生照第一學年之規定，男生年繳學膳費一千法郎，女生爲七百五十法郎³⁰。學生只因省籍不同或關係有別，而有了差別待遇，這不但反映了中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分裂局面，也顯示出主事者並無消除地域觀念，爲全中國造就人才的大魄力。

其後學生之來源，大約有下列幾種：(一)北平中法大學服爾德、孔德、陸謨克三個學院，每院畢業生前五名滿七十五分者送往里大，由平校擔負往返旅費並給每月零用費，學生入里大後食宿及在法國大學學費，概由中法大學負責。(二)廣州中山大學，以及江蘇、浙江、福建等省亦派送學生入學³¹，條件大致與平校相同。(三)中法大學每年到了暑假，亦按其經費及缺額情形，在法國酌招津貼生若干名，取錄條件十分嚴格，以自費留學法國在大學考得證書兩張或在專門學校肄業兩年以上者爲合格³²。爲儉學生、勤工儉學生之成績優秀者開闢一條入學坦途。惟里昂中法大學後因經費難以爲繼，自一九四三年起，即不再招收新生入學³³。

里昂中法大學雖稱大學，實際只是學生寄宿舍，等於爲中國學生提供一個講中國話、過中國式生活的海外之家而已！但根據法方資料，很強調它是一所師範學校³⁴，故校規緊嚴，加以管理作風又甚保守，學生常動輒得咎，有如置身在修道院中。例如某男生常到某女生房間造訪，男女生一同外出散步，稍有親熱舉動（如勾肩搭背），都成爲舍監報告的對象，而由協會秘書再以書面鄭重其事向吳稚暉校長報告³⁵。

³⁰ 同上，頁八～九。

³¹ 同註⁶，頁四〇三。

³² 《旅歐雜誌》，復刊號第二期（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一日），頁八。

³³ 里昂中法大學學生歷年入學統計表（見下頁表），資料來源參閱葉國榮〈里昂中法大學簡史〉，《歐華學報》，第一期，頁一二四。

³⁴ 里昂中法大學檔案，Note Relative à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1921.

³⁵ 同上，Lettre de M. Courant à M. Wou Tchi-Hwei, 14 juin 1922.

60 勤工儉學的發展

從學校開辦至關門二十餘年間，小自生活細節，大至學業功課、思想各種糾紛可以說層出不窮，但因資料散亂不全，頗難窺其全貌。爲節省篇幅起見，簡單列表說明如下：

年 度	入 學 數	費 別			
		本 校	廣 東	北 平	其 他
1921	138	76	62		
1922	23	23			
1923	3	1	2		
1924	1	1			
1925	11	11			
1926	14	4	8	2	
1927	24	15	3	6	
1928	44	21	2	5	16
1929	28	14	4	8	2
1930	12	5	2	5	
1931	14			9	5
1932	29	19		6	4
1933	18	2		13	3
1934	19	2		15	2
1935	23	1		19	3
1936	20	4		16	
1937	14	1		13	
1938	9	2		7	
1939	1	1			
1940					
1941	24	24			
1942	4	4			
共 計	473	231	83	124	35

編號	發生糾紛時間	爭對對象	當事人名	主要內容	抗議或處理方式	結果
1	1927. 2	協會	黃綺文、李佩秀	學生為求速進法文，特請准到巴黎入 Neuilly Pension，但該校為教會學校，協會藉口不得與宗教發生關係，令其退學，否則除名。	寫信透過劉厚，據理力爭	未遭除名
2	1927. 11	協會	張瑞矩	因在三民報發表文章，有攻擊法人之嫌，協會令其離校。	寫信透過劉厚，據理力爭	未遭除名
3	1929. 1	古恒	袁擢英	古恒未通知作者，擅將其論文超印一千餘本，出售書店圖利。	由劉厚提交常董會討論	除扣除印刷費外，賣得之款歸還作者
4	1929. 12	古恒	徐頌年	古恒未經作者同意，擅改其文章。	由代校長何尚平調解	撤回文章
5	1929. 6	古恒	葉馨	因論文之印刷遭古恒耽擱，而與印刷局發生不快。	建議與印刷局斷絕往來	不詳
6	1929. 4	古恒	汪德耀	該生要求赴意大利那不勒斯搜集論文資料，古恒以其曾出國參加兩次政治性活動，而從中作梗。	寫信透過劉厚，據理力爭	不詳
7	1929. 4	法文教授	王駿聲	與法文教授言語衝突。	由古恒從中調解	不詳
8	1935. 4	打字員	全體學生	打字員 Cheynet 弄權，引起學生公憤。	簽名上書要求校長予以解聘	宗真甫校長奔走無力，引咎辭職

62 勤工儉學的發展

9	1929.6	厨 房	全體學生	抗議伙食每況愈下。	發起人貼大字報，大家簽名響應	不 詳
10	1929.6	厨 師	吳 暉 永	因故發生口角，學生遭厨師及其子毆打。	經劉厚處理，建議開除厨師	未 開 除
11	1930.7	厨 師 ?	趙 之 偉	因故發生口角，繼以鬪毆，學生負傷。	經劉厚報請校方處理	工人被開除

六、思想活動

有關學生思想活動的資料不多，不過由於學校的創辦正處在一個五四以後、思想分歧的時代，復以無論在法國或國內都曾經歷一場國共之爭，再加協會會章禁止學生從事宗教宣傳或政治活動^⑤，故其間之暗潮洶湧，當可想見。

一般而言，里昂中法大學由於受到法國文化及吳稚暉、李石曾等創辦人的影響，標榜的是自由思想，不人云亦云，不胡亂叫好，不要求大家的思想侷限在同一範疇模式內，故在政治思想方面，大致不至於反動，在精神生活方面，不至太溢出時代精神的範圍^⑥。

與勤工儉學生不同，此地大部份同學都能以讀書課業為重，把思想與政治活動擺在其次。關於學生思想方面，第一批學生之一的蘇雪林認為，「五四思潮已轉了方向，而趨向於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成了我們所崇拜的偶像，胡適之在我們眼裏早已變成過時人物^⑦。」

^⑤同上，何尚平校長佈告，某年十二月十日。

^⑥<里昂中法大學學生之罪言>，〈旅歐雜誌〉，復刊號第一期（民國十七年九月十五日），頁四〇。

^⑦蘇雪林，〈一個五四時代青年的自白〉，〈吳稚暉先生一百十歲誕辰紀念特輯〉；〈勤工儉學運動〉，頁四六六。

稍後幾年，據代校長花狐（Colonel Faure）報告，則德國哲學家倭伊鏗（Rudolf Eucken, 1846-1926）、杜里舒（Hans Driesh, 1867-1941），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作家柏濟（Charles Peguy, 1873-1914）對於學生思想頗有影響³⁹。

雖然學生對政治活動並不熱衷，但學校一開始就有法國密探名布里梭（Bressot）者，以門房名義混跡其間，就近密切監視，隨時注意學生信件的收發與各項行動⁴⁰。在法國警察總局檔案中，至少可以發現兩件有關里昂學生思想活動的總報告。一九二三年八月，虹江省長向內政部報告說，里大學生大部分思想前進，其中有若干甚至是無政府主義者。學生們經常收到寄自德國、俄國的中文書刊、報紙或宣傳刊物，他們也申請簽證到外國旅行⁴¹。一九二六年九月，花狐的報告則對學生的黨派成分作了粗略分析，並提到有十數位廣東學生傾向陳炯明的競社（屬急進社會主義）⁴²。

里大學生雖然多能以功課為重，但對國內政局的演變仍密切注意，並不作壁上觀。在里昂當地及校內黨派的政治活動仍然活躍，故曾先後發生兩次重大事件：（一）民國十四年五月，在里昂各界合開的中山先生追悼會上，有人演說共產主義並攻擊法國政府，使到會之省長、市長憤而退席，會長雷賓因此逼學校秘書長劉厚（擔任追悼會主席，擬有共黨嫌疑）辭職⁴³。（二）民國十六年，廣東中山大學據中國國民黨

³⁹ Archives Nationales, F7. 13438, D°4, Colonel Faure au Ministre des A. E. M. Le Chef de la Sûreté, 16 sep. 1926.

⁴⁰ 里昂中法大學檔案，Lettre de M. Courant à M. Lepine, 24 Mars 1922.

⁴¹ Archives Nationales, F7, 12900, Le Préfet du Rhône à M. Le Ministre de l'Interieur, Direction de la Sûreté Générale, 28 Août 1923.

⁴² 同註³⁹。

⁴³ 里昂中法大學檔案，收駐法陳公使電，民國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駐法支部執行委員李星輝及里昂支部常務委員彭襄的報告，將四名共產份子龍詹興、謝清、彭師勤、顏繼金開除學籍，並取消公費⁴⁴。里大學生也不乏出國或到巴黎參加政治活動者，故有學生汪德耀、何兆清被疑為共黨宣傳⁴⁵，更發生湘籍學生陳書農到巴黎參加國民黨小組會議被毆事件⁴⁶。可見校內疑雲密佈，事件迭生，並不寧靜。

七、學習活動與成績

里昂中法大學只是一塊招牌，實際距離大學的標準甚遠，它的性質有點類似留法預備班，頂多是大學預科而已。因為它沒有自設的大學專門課程，也沒有自設的大學教師，其主要活動在於組織特別演講會與法文補習，以及為理科學生特設的數學、物理複習課等。茲分述如下：

- (一)特別演講會——演講會不定期舉行，早期可能多由中國學者擔任，後來則禮聘校外法國名流學者主講。根據「中法大學季刊」(Annales Franco-Chinoise)每期的消息報導，演講範圍從文學、藝術、哲學到科學，無所不包，恕難一一列舉介紹。
- (二)法文補習——由於最初學生來源複雜，法文程度參差不齊，故校方規定先念兩年法文，俟法文聽講有基礎後，再進

⁴⁴同上，國立中山大學來函，民國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⁴⁵Archives Nationales F. 13438, Le Ministre de l'Interieur à M. Le Ministre des Colonies, 19, nov. 1926; Le Prefet du Rhône à M. Le Ministre de l'Interieur, 15 Juin 1926.

⁴⁶A.N. F.7 131438, D°5, Colonel Faure à M. Le Chef de la Sûreté, 28 Juin 1927.

入國立里大或其他專校攻讀。初期校方開設法文班四班，共聘教師七位，負責法文教學，其後由於學生法文水準提高以及經費問題，班次逐漸減少，至一九三七年左右僅剩一位法文教師而已⁴⁷。

在校內設班補習法文，用意雖佳，但效果卻不大。第一、同居共膳者都為中國人，缺乏訓練語文的環境，與法國社會人士接觸少，對於實際瞭解法國生活、風俗、人情幫助有限。故有先見之學生都願赴外埠中國人少之處學習法文。第二、教學並非採取密集式，時數有限，練習機會不多，故進步緩慢⁴⁸。

(三)數學、物理課——里大學生中，文、法、音樂、美術等科學生固然為數不少，但理、工、醫、農等科所佔比例亦高，因此有關數學、物理、化學等課的複習加強，也有其必要，全視學生實際需求而開班，學校亦聘有專人講授。

里大從創校到關門近三十年中，前後共有四七三名學生註冊⁴⁹，其間里大每年均將學生各項考試成績對外公佈，截至民國二十一年(1932)十二月為止，共收學生三百四十一名，其各項成績統計如下⁵⁰：

⁴⁷ 李治華回憶片段，〈海內外雙月刊〉，第三五期（一九八二、五～六）頁一〇。

⁴⁸ 岑麒祥，留法第一次報告書，「國立中山大學日報」，民國十八年一月八日，第三版，海外通訊。

⁴⁹ 李應生，〈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六年里昂中法大學海外部同學錄〉，〈歐華學報〉，第一期（一九八三年五月）。

⁵⁰ 〈民國二十一年度里昂中法大學學生考試成績一覽表〉，〈勤工儉學運動〉，頁五二七～五二八。

66 勤工儉學的發展

- (一)獲博士學位共五十二人，理科二十三人（內八人得國家博士），文科十二人，醫科二人，法科七人。
- (二)獲碩士學位者三十八人，其中理科三十一人，文科五人，法科二人。
- (三)獲工程師學位者三十六人，內工科十二人，化學六人，電機十三人，礦學、製革造紙各一人，航空二人。
- (四)獲法國國授建築師學位者一人。
- (五)獲各校高等文憑計五十一張。
- (六)獲各校高等證書計二百二十五張。
- (七)美術學校、建築學校、音樂學校(1)第一獎三十七次，(2)第一獎狀及各等獎牌六十七次。
- (八)多藝學校 (Ecole Polytechnique) 畢業者二人。
- (九)三錫 (Saint-Cyr) 陸軍學校畢業者二人。
- (十)里昂及巴黎各大醫院(1)院內助醫一人，(2)院外助醫五人。
- (十一)得各機關及各大學特獎者十九人。

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六年這一段期間，尙未見同樣之成績統計，惟估計學生各項成就，應不低於前十年。惟白璧難免有瑕，其中亦有少數不肖，因好色而致貧病相尋，陷入精神錯亂狀態，遭學校驅逐者⁵¹。

八、結 論

里昂中法大學的創辦，在中外文教合作史上，尤其中法教育上，確屬一樁創舉；沒有吳、李等人的崇高理想，沒有蔡、汪等人的贊助

⁵¹ 里昂中法大學檔案，彭禮端致劉厚(大悲)函，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支持以及法國友人的熱心幫忙，將不可能實現。惟純就經費而言，它的最大致命傷，在於「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因此學校辦學始終在現實與理想中掙扎，在風雨飄搖中苦撐。在艱苦環境中所得的寶貴成果，雖然距離原先所懸的目標尚遠，但能培養出數百位始終堅守崗位，對國家社會有貢獻的各項專才，已屬十分難得！

從勤工儉學的鼓吹到里昂中法大學的設立，旅歐教育的發展經歷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重要過程。談旅歐教育，若不加上里大這一段，將使它黯然無光。素來好大喜功的主事者，終於體認到質變的重要性。比起「勤工無門，儉學無路」的大批勤工生而言，里大同學直如天之驕子，似貴族王爺。惟里大的生活，表面看來雖似平靜，並非沒有激流。由於學業的壓力，因為中法雙方觀念、習慣反應在管理上的寬嚴不同，所以一般學生並沒有「賓至如歸」的快樂，至少仍有「寄人籬下」的感嘆！

論旅歐教育，自有其時代意義與成功的一面，不能完全否定抹煞！然與勤工儉學的鼓吹一樣，吳、李等人之創辦里大，仍不能推卸但憑天真理想，急躁求功，計劃不縝密的弊病！他們勸人少掛招牌，自己卻照樣急於樹招牌，而且處處掛招牌。他們的理想源源不絕，也不斷到處設攤擺位，最後卻讓法國友人來收拾那難以收拾的爛攤子。他們有時遇困難而退縮逃避，不僅讓尊敬崇拜他們的青年學子失望，亦頗傷中法之間原本友好的感情！

教育乃是百年大計，高級人才的培養不能速成，更切忌因陋就簡，尤須縝密計劃，循序漸進，急躁不得！與友邦之合作事業，更宜量力而為，不必好高騖遠，否則不僅事倍功半，甚且可能得不償失！

（原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民國七十三年四月，臺北）

河南與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 一、引言
- 二、河南的招考情形
- 三、豫生分批赴法情形
- 四、在法工讀情形
- 五、結語

一、引 言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由幾位旅歐前輩如李煜瀛（石曾）、吳敬恆（稚暉）、蔡元培（孑民）、張人傑（靜江）、張繼（溥泉）、汪精衛（兆銘）等人所共同發起，倡議於民國初年，盛行於歐戰結束之後，是一項鼓勵家境不富裕的年輕人到法國「勤以作工，儉以求學」的留學活動^①。這一批把法國影像當成改良中國社會，促成中國現代化模型的知識菁英曾先後組織「留法儉學會」^②、「勤工儉學

^①陳三井，法國所藏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介紹，〈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第十二期（民國七十二年六月）頁四八五。

^②「留法儉學會」於民國元年由吳敬恆、李煜瀛、張人傑、齊竺山等發起於北京，其宗旨在「納最儉之費用，求達留學之目的」。凡年滿十四歲，欲自費留學而每年至少可籌五、六百大洋者，皆得為該會之同志。該會對於會員既不助資，亦不索償，惟有以言論或通信指導旅行，介紹學校等之義務。「留法儉學會」曾附設預備學校於北京，為學生補習法文，學生經由此校而赴法者共有三批約八十餘人，其中較出名者有李書華（物理）、李宗侗（歷史）、鄭毓秀（法律）等人。

70 勤工儉學的發展

會」^③、「華法教育會」^④等團體，大力鼓吹倡導，予有志留學者以必要的各種幫助和照顧。

歐戰發生以後，法國兵士傷亡日衆，壯丁短缺，兼以法國學費低廉，求學較易，更開啓了「勤工儉學」的大門，各省紛紛籌經費派遣學生前往，影響所及，留法勤工儉學幾乎成爲舉國上下公認之惟一要圖，上自總統、閣員，下至地方行政首長、學者仕紳，莫不竭力提倡、贊助，是以至民國八、九年間形成一股巨大浪潮，前後蜂擁而至法國者將近二千人^⑤，其中以湖南、四川兩省最多，廣東、直隸等省次之，河南、陝西、雲南、貴州等省最少^⑥。

二、河南的招考情形

河南古稱「文明中區，三王以來，迭爲都會」，然其地雖鄰近京

- ③「勤工儉學會」爲李煜瀛與豆腐公司員工李廣安、張秀波、齊雲卿等人於民國四年夏天在巴黎所發起，以「勤於作工，儉以求學，以進勞動者之知識」爲宗旨。入會者視個人能力之所能，以助該會之發展，或各人實力求學，或助他人求學，或以書說之著述演講爲傳達或以經濟爲傳達之助，皆由會員隨時組織而實行之。該會成立後，李氏等更倡工作一年，讀書兩年之說，一面在國內設立預備學校，一面與法人共同組織「華法教育會」以爲推動，共謀學生出國與謀工之便利。
- ④「華法教育會」成立於民國五年，由中法兩國文化教育界人士所共同發起，蔡元培爲中國會長，李煜瀛爲副會長；巴黎大學史學教授歐樂（Prof. Aulard）爲法國會長，衆議員穆岱（Marius Moutet）爲副會長，旨在促進中法兩國文化學術之交流，而介紹中國學生留法，組織留法之工人教育，在法國創設中文學校或講習班，亦爲該會之主要工作項目。
- ⑤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二十六年版），頁九十二。
- ⑥關於各省人數之統計，因時間先後不同，頗有出入。根據華法教育會民國九年十月之統計，各省人數較多者如下：

省別	湖南	四川	廣東	直隸	福建	浙江	江蘇	安徽	湖北
人數	331	279	238	111	87	84	70	38	35

（資料來源：法國國家檔案館勤工儉學專檔：47AS1 A/2-1(1)）

畿，卻因對外接觸與交通關係，民國以來風氣較為閉塞，教育亦不若沿海沿江諸省發達。至民國六年，全省公立中學計十四校^⑦，而做為高等教育指標的中州大學（國立河南大學前身）此時則尚未成立。

勤工儉學風氣的開展，首先有賴於地方本籍或寄寓之有力人士的號召，如直隸之有李煜瀛、齊竺山；上海之有吳敬恆、張人傑；四川之有吳玉章（永珊）、朱芾煌；湖南之有熊希齡（秉三）、楊昌濟（懷中）；廣東之有汪精衛（兆銘）、黃強（莫京）；福建之有陳炯明（競存）；山東之有王訥；山西之有閻錫山，均能造成聲勢，鼓動風潮，而河南則缺乏類似人物之號召。

除有力人士之倡導外，學會的推動亦功不可沒。在「留法儉學會」時代，除北京首開風氣外，四川與上海均設有分會，廣為宣傳。至「華法教育會」成立，長沙、成都、廣州、濟南、福州、陝西、上海等地均紛紛設立分會，以為推動。此外，蔡和森、毛澤東、蕭瑜等人在湖南所組織的「新民學會」^⑧與王光祈、蔡元培等人在北京所發起的「工讀互助團」^⑨，對於勤工儉學運動亦有推波助瀾的功用。而河南亦缺乏這方面的社團活動。

⑦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一），頁九十四。

⑧ 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初期為純學會性質的團體，後來思想產生分化，一變而為具有政治目的的組織，會員中的激烈份子以後大都成為中共最早和最重要的幹部。

⑨ 北京工讀互助團是成立最早，規模和影響也最大的一個工讀主義團體，於民國八年底正式成立。成立之初共分三組：第一組設在北京大學附近；第二組設在北京工業專門學校、法文專修館、北京師範學校三校附近；第三組則全是婦女，所以又名「女子工讀互助團」，設在女子高等師範附近。至民國九年二月，約有十個準備留法勤工儉學的法文專修館學生組織起來實行工讀，於是增設第四組。團員們一面從事辦食堂、洗衣、印刷、裝訂、製造小工藝品和販賣新書報等體力勞動，一方面分別在各校聽課。參閱〈五四時期的社團〉（一），頁三六七。

72 勤工儉學的發展

為了適應出國的實際需要，國內不少地方都開辦了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和預備班，其中大部份是既教授法語，又教授鐵工、木工、繪圖等技藝，但也有專門補習法語的。據統計，這類學校和預備班各地約有二十餘處，如北京有高等法文專修館，長辛店有高等法文專修館分館工業科，保定有育德中學附設高等工藝預備班，蠡縣有布里村留法工藝實習學校，天津有法國永和鐵工廠附設留法預備班，成都、重慶均有留法勤工儉學會預備學校，上海先後開辦法文專修學校、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科、青星學會附設法文函授學校和法文夜校，長沙先後開辦了游法機械科預備班、法文晚塾、法文新塾，福州有私立法政專門學校附設的留法預備班；廣州有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安慶有省立第一中學附設留法預備科等^⑩。河南於民國元年在省議會建議下，曾開辦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但以英文班為主，雖亦招有德法文等班次，大部份轉送上海同濟學校就學^⑪。

基於上述，河南在缺乏有力人士的號召與學會團體的推動以及應有的放洋留學準備下，對於勤工儉學的進行，自不如四川、湖南、廣東、直隸等省轟轟烈烈，如火如荼；但平凡中自成一格，代表另一類型，仍有值得一述之處。惟各項資料較少，或不易窺其全貌真相。

民初，河南選送到法國的公費生有徐炳程（旭生，哲學）、王尚濟（海帆，數學）、吳法鼎（新吾，美術）、余同甲（法律）、曹鍾華（法律）等五人^⑫，至民國八年勤工儉學風氣大開，河南省長趙倜為迎合潮流，俯順輿情，以示注重教育，特以私人名義提出派送學生

^⑩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上海，一九八〇），（-），頁一二六一—一二七。

^⑪劉真主編，〈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國立編譯館出版，民國六十九年），第三冊，頁一一三八。

^⑫李書華，〈隔廬集〉（台北，傳記文學叢書，民國五十六年），頁六。

赴法勤工儉學一案，經省議會討論通過後，指定由教育廳用招生辦法，每年招赴法勤工儉學生一次。每次以二十名為定額（本省籍），程度中學畢業以上。每人給予津貼七百元（限一次）。復託上海華法教育會送往法國巴黎華法教育會，介紹入工廠及學校。在法年限不定，歸國後須在本省服務三年^⑬。

民國九年，河南省教育廳按照省議會原定簡章，招考錄取省費派遣留法勤工儉學生楊中方等八名，言明每人先行發給路費二百元，其餘每名學費五百元，俟抵法後，滙由留歐學生監督按十二個月發給。教育廳並於十月四日行文華法教育會上海分會，以「青年學子重洋遠涉，國禁民風多所未諳，沿途恐多艱阻，而本省又限于經費，未能派員往送」，故請「費神招待，代購船票並指導一切」。該廳並強調各生於法語及普通各學科均尚足用，故請求免繳預備費。茲將該批錄取名單及有關資料表列如下^⑭：

姓名	年齡	籍貫	畢業學校
楊中方	二三	河南西平	省立汝南中學
楊寶三	二四	河南安陽	衛輝法文學校
李秉煊	二三	河南杞縣	省立第一中學
宋建寅	二三	河南宜陽	省立洛陽中學
王衍繪	二三	河南南陽	保定育德中學
趙同功	二二	河南鞏縣	省立洛陽中學
郭須靜	二四	河南沁源	北洋法政專校
連成中	二三	河南滎澤	省立第一中學

河南省教育廳除函送華法教育會上海分會以上八名公費生外，並根據簡章第七條：「如有自備資斧前往向學者，亦得遣送」之語，而於十月九日推薦南陽縣學生楊上人（北京高等法文專修館畢業），希

^⑬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頁四九三。

^⑭同前註，頁四四七～四四八。

74 勤工儉學的發展

上海分會同樣予以招待、指導^⑮。

此外，河南旅滬學會亦曾於民國八年底致函華法教育會上海分會負責人沈梁（仲俊），推薦豫生二十人前往，其中有的款項不足，有的報名過遲，通祈鼎力通融。茲將該批學生名單及資料表列如下：

姓名	學 歷 或 經 濟 情 況
余中楫	上海復旦大學中學科畢業，大同學院理科學生。 川資除船票外，可買四千佛郎。
張務遠	大同學院肄業，曾習法文，除船費外，有一千六百佛郎。
陳國榮	除船價外，有二千五百佛郎，餘款由西平縣教育會接濟。
呂夢庚	除船價外，有佛郎一千二百，餘款由其在法之族兄呂少臣接濟。
楊介臣	除船費外，有二千五百佛郎，餘款由家中接濟。
姜震寰	除船費外，尚有現款三千佛郎，餘款由家中接濟。
李 杞	除船費外，可買五千佛郎。
何慶瀾	除船費外，有三千五百佛郎。
凍春水	同 上。
凍文楷	同 上。
宋學曾	除船費外，有四千七百佛郎。
王增序	除船費外，可買四千佛郎，家中仍可接濟。
孟廣贊	除船費外，可買三千六百佛郎，家中仍可接濟。
李 洁	除船費外，可買四千一百佛郎。
韓甫熙	除船費外，可買四千五百佛郎。
李香山	除船費外，可買四千佛郎。
陳春生	同 上。
胡金鉞	除船費外，可買三千五百佛郎。
陳九鼎	同 上。
王玉鏡	除船費外，可買五千佛郎。

河南旅滬學會並說明，以上二十人皆體健年少，能忍苦耐勞，且曾學習英文。他們到滬後，將由該會特請北京各界聯合會代表丁肇青教授法文。諸生共有資費七萬一千三百一十佛郎，平均每名應有三千五百六十六佛郎，抵法後足可互相通融餘款。雖以交通不便或公款一

^⑮同前註，頁四四六～四四七。

時未能卽至，均有該會向省長及其家屬設法接濟，似與儉學會有關學費限制之本意尚不相違。

河南旅滬學會極爲重視此次推薦的成敗，並申明兩點理由，特請上海有關方面斟酌成全：

(一)妨礙進化—河南省風氣不開，教育久不發達。此次來滬二十人，在他省原不足奇，在該省實爲進化之起點。倘中道不能成其志願，「則守舊者藉口破壞，有志者短氣裹足」，該省人民程度將永遠停留在十七、八世紀以前之地位。

(二)挫折士氣—此次來滬者雖或有款不充足，而多數皆有五、六百元之譜。倘款少者不能乘船，則人生地疏，居久費重，其父兄未必相信再爲接濟；卽或接濟，而前款已盡，終因不足而坐困。款多者以來時較遲，待下次船至，款亦消耗，其結果亦與因款少不能起行者相同¹⁶。

三、豫生分批赴法情形

勤工儉學生的赴法，多半由上海搭乘法國郵輪出發，但法船每月通航一次，每次僅能容納學生百餘人左右。所以大批勤工儉學生到滬後，候船赴法在吃、住等方面的困難甚多。爲此，華法教育會上海分會特設立留法勤工儉學招待所和俱樂部，負責安排他們的住處，訂購船票和協助辦理出國手續等。卽使如此，勤工儉學生的赴法，仍非一帆風順。在上海候船期間，他們仍將遭遇一系列的困難和挫折。首先要親告友，典當借貸，向有關當局申請資助，以湊足赴法船資與途中所需款項及到法後短期內的學習生活費用。其次由於人多船少，仍

¹⁶ 同前註，頁四三八—四四〇。

須多方奔走，以便搶訂船票，捷足先登。有的人常常因買不到船票而滯留滬上，曠日持久，錢款用盡，以致無法成行¹⁷。

及歐戰結束後，法國物價高漲，經濟蕭條，覓工困難，巴黎華法教育會照顧不易，故李石曾於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十月自巴黎電囑北京華法教育會，對於勤工儉學生須按新定條件「慎重選取」，以後來法應「切實預備，嚴重取締」，並規定所帶旅費須較前成倍增加，致許多勤工生都因經費難籌而陷於進退維谷的困境¹⁸。

勤工儉學生自民國八年三月十七日第一批乘日輪「因幡丸」赴法起，至民國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最末一批乘法輪「智利」號赴法止，前後共二十批，約一千六百餘人。最初四批勤工儉學生都是從上海乘日輪出發的，船抵英倫後，再轉赴法國。因當時歐戰剛結束不久，法輪均忙於運兵回國，難有餘力搭載普通旅客。後經華法教育會與法政府交涉，自民國八年八月起，大批學生始從上海乘法輪直抵馬賽¹⁹。至民國十年初，留法勤工儉學生總數已近二千人，由於法國正面臨嚴重經濟危機和失業問題，許多工廠停工，尋覓工作更加不易，致許多學生欲工無門，必須靠華法教育會所發的維持費度日。為此，華法教育會照顧倍感困難，故雖一方面挪借經費勉力維持，但糾紛仍然迭起，身為中國會長的蔡元培也受到攻擊，不得不毅然聲明教育會與勤工生脫離一切經濟關係；一方面電請教育部轉知各地教育機關，以學生「多不合所訂條件，携款太少，又無勤工之志，且工亦難找」²⁰，勸阻學生赴法，於是赴法勤工儉學的高潮也就從此結束。

¹⁷ 黃利群，〈留法勤工儉學簡史〉（北京，一九八二），頁三十五。

¹⁸ 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一二九。

¹⁹ 同前註，頁一三二。

²⁰ 〈教育雜誌〉，十三卷三號；陳三井編，〈勤工儉學運動〉（台北正中書局，民國七十年），頁二八七。

河南選送學生本就不多，再加出發較晚，故大都集中在民國八年底前成行，茲將歷屆河南勤工儉學生赴法情形分述如下：

根據已公佈資料，前三批出發之勤工儉學生中，似無河南籍在內。

第四批於民國八年七月十三日由上海吳淞乘日輪「三島丸」出發，先到英國，九月二日抵巴黎。該批共五十八人，內有河南學生二人，他們是王增璧（二十歲，汲縣中學）、石磐國（二十一歲，北大預科）。出發前，上海學生聯合會曾假法租界尚賢堂舊址南洋路礦學校，舉行歡送會。同行者尚有湖南的羅學瓚等人。該船為日輪，除待遇苛刻，飲食粗劣外，學生又頻遭日本水手欺侮毆打^①。

第九批於同年十月三十一日乘法輪「寶列茄」(Paul Lécat)號出發，十二月七日抵馬賽。這班船人數多達一六二人（包括從香港登輪者五十餘人），為歷屆赴法人數較多的一次，內有豫籍學生張恆濤（河南南陽，上海大同學院）等九人。出發前，河南旅滬學會、寰球中國學生會^②、華法教育會均分別開會送別。這次因人數衆多，同學分別組成同舟代表團十四團，以便在船上互相扶助照顧，學生中較著名的有湘籍的李維漢、李富春、張昆弟、賀果等人。前參議院議長暨儉學會發起人之一的張繼與河南視學員，前河南師範學校校長王君亦同行^③。

^①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五二二～五二八。

^②寰球中國學生會為教育家李登輝（騰飛）於一九〇五年所發起。李氏，福建廈門人，幼年僑居馬來西亞，嗣遷美洲，畢業耶魯大學，後歷任上海復旦公學校教授、教務長、校長。李氏因覺招待留學生出洋及介紹回國留學生應聘等事，有組織機關的必要，乃發起此會，以圖進行。會址初設在上海靜安寺路派克路口，後一再遷移，至卡德路一九一號。民國三年後，由朱少屏負責辦理，並附設學校，會務日益發展。參閱 胡懷琛，〈上海的學藝團體〉，〈上海通志館期刊〉，二卷三期，頁八四七。

^③〈旅歐週刊〉，第八號，一九二〇年一月三日。

第十一批於十二月九日乘法輪「斯芬克司」(Sphinx)號出發，翌年一月十四日抵馬賽。該船載有學生一五八人，以湖南、四川兩省居多，江浙次之，內河南籍學生八人，皆為河南旅滬學會前所推薦之自費前往者，茲誌其名單如下²⁴：

余中楫—上海復旦中學科畢業，大同學院理科學生。

張務遠—大同學院學生。

王增序—開封第一中學畢業。

何慶瀾—開封第二中學學生。

凍春水—同上。

凍文楷—同上。

楊介臣—懷慶中學學生。

呂夢庚—同上。

未出發之前，已由儉學會幫辦沈梁將各生編成甲、乙、丙、丁、戊、己六隊，故上船時依次登船，毫無紊亂現象²⁵。同船之人尚有湖南女學生范新瓊、范新順兩人，係到法國李石曾所創辦之豆腐公司工作者²⁶，開女勤工儉學之先河。

第十二批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乘法輪「盎特萊蓬」(André Lépon)號出發，共五十餘人，內有河南學生七人，由河南旅滬學會張良坤送之上船。茲誌名單如下²⁷：

孟廣贊—商邱中學學生。

宋學曾—開封第一師範生。

²⁴ 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頁六八三。

²⁵ 上海時報，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²⁶ 民國日報，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²⁷ 申報，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陳國榮一同上。

陳九鼎一開封第二中學。

李 杞一開封第一中學生。

韓甫熙一同上。

姜震寰一同上。

本屆之辦理，乃在李石曾呼籲「慎重選取」之後，故出發學生較前爲少，計男生四十四人，以安徽籍佔大半，河南次之。同行者尚有湘籍的蔡和森²⁸，另有湖南女勤工生葛健豪（蔡和森母親，年已五十四歲）、蔡暢、向警予、李志新、熊季光、蕭淑良六人係乘坐三等船位²⁹。

第十八批於民國九年十一月七日乘法輪「博爾多斯」(Porthos)號出發，內儉學生七十一人，勤工生一百二十三人，女生三人，共一九七人，爲歷屆人數最多者。隸屬河南籍者十一人，其名單爲：³⁰

儉學一丁肇青。

勤工一鈕秉甲、張景仲、趙漢鼎、楊中方、李秉煊、王衍繪、連成中、趙同功、宋建寅。

女生一李湜。

本屆成行者多爲考取河南公費之學生，同船者尚有周恩來、傅鍾等人。至此勤工儉學生之赴法，已近尾聲，雖尚有兩次船班，但資料中似均無河南學生在內。

²⁸戴緒恭，〈向警予傳〉（北京，一九八一），頁四十七。

²⁹清華大學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北京，一九八〇），第二冊，(上)，頁一一五。

³⁰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七七七。

四、在法工讀情形

勤工儉學生到法後，先後透過「華法教育會」與「中法監護中國青年委員會」(Comité Franco-Chinois de Patronage des Jeunes Chinois en France 簡稱 C.F.C.)、「巴黎中法友誼會」(Association Amicale et de Patronage Franco-Chinois, 簡稱 A.A.F.C.)三個團體的安排與介紹，有的入學校學習法文，有的進工廠作工。

根據法國國家檔案館 (Archives Nationales) 所藏的勤工儉學專檔顯示，勤工生整體的學習活動範圍，前後涉及到法國二〇二個學校，其中有公私立中學，有職業學校，有專科，有大學，當然實際有中國學生就讀的尚不到此數。據華法教育會民國九年 (一九二〇) 十月的統計，中國學生在學超過二十人的學校有下列十二所：^③

校名	人數
1. 蒙達集私立中學 Collège de Montargis	70
2. 福列私立中學 Collège de Flers	47
3. 墨蘭私立中學 Collège de Melun	32
4. 德勒私立中學 Collège de Dreux	32
5. 穆南公立中學 Lycée de Moulins	23
6. 舍多蒂葉利私立中學 Collège de Château Thierry	22
7. 剛必安私立中學 Collège de Compiègne	22
8. 拜耶爾私立中學 Collège Bayeux	22
9. 楓丹白露私立中學 Collège Fontainebleau	21
10. 寇恩私立中學 Collège Cosne	21
11. 普洛萬私立中學 Collège de Provins	20
12. 坎城私立中學 Collège de Cannes	20

③ Archives Nationales, 47 AS1 A/2-1(3).

從上表可知，勤工生就讀者以私立中學爲主，公立中學只有一處。蒙達集人數最多，尚不包括女子勤工儉學生，如蔡暢、向警予等人所就讀的蒙達集女子中學在內。

華法教育會等三團體向勤工生推介之法國工廠多達八六九處，但因經濟不景氣，工廠裁員無缺，或條件不合，或廠方爲保護本國工人，被打回票者不在少數，故實際有勤工生做工者恐不到一半。根據華法教育會同年之統計，超過二十人之工廠有以下八廠：^②

廠名	人數
1. 聖德田列夫廠 (Leffaiive à St-Etienne)	53
2. 沙列特胡欽孫工廠 (Hutchinson à Chalette)	46
3. 哈佛勒史乃德工廠 (Etablissements Schneider à Harfleur)	45
4. 聖夏門沙凡工廠 (Chavanne Brun à St-Chamond)	40
5. 慧密尼鑄鋼廠 (Forges & Acieries de Firminy)	36
6. 聖夏門海軍熔鑄廠 (Forges & Acieries de la Marine à St-Chamond)	30
7. 葉丹馬雷工廠 (Etablissements Marrel à Etaings)	25
8. 勒克魯鄒史乃德廠 (Etablissements Schneider le Creusot)	20

勤工生所在的工廠種類繁多，其中最多的是鐵工廠，還有火車、汽車、摩托車、飛機零件、化工、木工、造船、冶鍊、鍋爐、電氣、橡膠、印刷、皮鞋、酒精、人造絲、製藥等廠。也有在礦山、農場從事勞動的。勤工儉學生分佈的地域很廣，北起第厄普 (Dieppe) 港，南抵尼斯 (Nice)、土魯斯 (Toulouse) 一帶；東起南錫 (Nancy)，西至翁熱 (Angers)，都有勤工儉學生在求學和工作。總之，在五十五萬平方公里的法國土地上，幾乎到處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③

^② Ibid, 47 AS1 A/2-1(4)。

^③ 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八。

8.2 勤工儉學的發展

河南勤工生在法入學與工作情形，限於資料，所知難以周全。第四批較早赴法的石磐國在蒙達集私立中學就讀^④，第十一批的凍文楷、何慶瀾入傑奴雅克（Genouillac）的農業實驗學校（Ecole Pratique d'Agriculture），有學校開給巴黎總領事館的欠費單為證^⑤。另同批的余中楫、張務源以及第十八批的鈕秉甲、張景仲、連成中則就讀於頌斯公學（Lycée de Sens），有學校與「中法監護中國青年委員會」的來往函件，也有他們六人（另加陳鐵）寫給「中法監護會」的中法文信件，大多與繳費問題有關^⑥。十八批的趙同功、趙漢鼎、李秉煊、宋建寅在舍多帝葉利私中補習法文，也面臨無錢繳費困擾。^⑦凍春水、韓甫熙、呂夢庚在墨蘭的傑克·阿米育私中（Collège Jacques Amyot à Melun）^⑧。另畢業自上海震旦、北大的丁肇青由「中法監護會」推薦入雨果公立中學（Lycée Victor Hugo）住讀，則遭校方拒絕，理由有二：（一）該生年已二十五歲，恐與法國中學生思想格格不入；（二）怕引起學生家長心理不安^⑨。豫籍女生李溥則於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六日轉入里昂中法大學（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專攻蠶桑^⑩，一九三二年通過國立里昂大學理學院碩士學

^④ 同前註，頁五二九。

^⑤ Archives Nationales, 47 AS2, B/1-3。

^⑥ Ibid. 47 AS6, B/15-29。

^⑦ Ibid. 47 AS2, B/6-18。

^⑧ Ibid. 47 AS3, B/6-38。

^⑨ Ibid. 47 AS5, B/15-6。

^⑩ 李塵生，一九二一～一九四六年里昂中法大學海外部同學錄，〈歐華學報〉，第一期（一九八三年五月），頁一三三。

位，並考得普通生物學高等證書⁴¹，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離校。

一般而言，「中法監護會」對於學生的服務工作做得相當細心而有耐性，一再為推薦學生入校就讀而與校長通信，並呼籲法人校長多注意勤工生的生活、娛樂、學業與學習精神⁴²。法國學校對勤工生照顧的好壞，因校而異，有的校長親自為中國學生補習法文，每天兩小時，不計報酬，遇勤工生有急病住院開刀，校長夫人並到醫院探視⁴³，熱情令人感動。有的校長以自己公館接待勤工生，供膳宿，早晚同桌共膳，順教法語⁴⁴。可惜學生在法，食宿學費樣樣需錢，日子一久，欠款愈多，學生無力支付，校長向「中法監護會」索要，「中法監護會」心有餘而力不足，只得推給已解散的華法教育會或中國使領館，以致糾紛迭起⁴⁵，不僅頗傷雙方感情，亦有辱國體。

節儉求學以增進精神生活既不可得，唯有勤工謀生，以解決物質生活。河南勤工生在法工廠工作情形大致是：

王增璧一賴華涉化學工廠 (Compagnie chimique du sud ouest à la Rochelle pallice)⁴⁶。

王衍繪、張景仲、宋建寅等三人在巴黎一家人造花工廠香百里 (Chambrelent) 工作⁴⁷，後來王衍繪病死在旅館兩日，無人過問，領事館推公使館，公使館推華法教育會⁴⁸。

⁴¹ 陳三井編，〈勤工儉學運動〉，頁五二二。

⁴² Archives Nationales, 47 AS4, B/6-56。

⁴³ Ibid, 47 AS2, B6/-16。

⁴⁴ Ibid, 47 AS3, B6/49。

⁴⁵ Ibid, 47 AS6, B/16-4。

⁴⁶ 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五二八。

⁴⁷ Archives Nationales, 47 AS8, C/14。

⁴⁸ 盛成，〈海外工讀十年紀實〉(文海出版社重印本)，頁六十。但名字誤為王演繪。

民國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勤工生在「欲工無門」，無路可走，希望幻滅下，遂爆發了四百多人包圍駐法使館，向公使陳籙請願，要求每年補助每個勤工儉學生四百法郎，以四年為期的風潮，俗稱「二八運動」。這場勤工生為爭取「生存權、工作權、求學權」的風潮迫使使館與華法教育會將國內滙來的捐款分發一部份給困難的同學。每人每日六法郎，從四月一日至六月底止，以三個月為期。五月十四日，中法雙方另成立「中法監護委員會」，籌款九十多萬法郎，繼續救濟學生到十月中旬，使勤工生勉可苟延殘喘。前後兩次領取維持費的豫生有凍春水、韓甫熙、張景仲、連成中、石磐國、鈕秉甲、張務源、余中楫、宋建寅、王衍繪、趙同功、趙漢鼎、姜震寰、陳嘉言、馮克毅、張劍初等人⁴⁹。其中除連成中一人為省費生外，餘均為自費前往者。

五、結 語

留法勤工儉學在中國留學史上，是性質最特殊的一頁。由於選送浮濫，水準參差不齊，人數過多，流品較為複雜，連蔡和森也承認「勤工儉學生好份子占最少數」⁵⁰，因此所受到的批評也最多。

在廣大的勤工儉學生中，主要可分為兩派：一、是積極參加學生活動，從事政治鬥爭的「革命派」。他們對勤工儉學的前景感到悲觀，對現狀產生不滿，因此思想走向偏激，使得一樁具有改良主義色彩，旨在為國家培植人才的留學活動變質，成為孵育共產黨人才的溫床⁵¹。這些透過勤工儉學之舞台的歷練而培養出來的共產黨員，為數

⁴⁹ Archives Nationales, 47 AS20~47 AS27。

⁵⁰ <蔡和森文集>（北京，一九八〇年），頁二十八。

⁵¹ 陳三井，<勤工儉學運動初探>。

當在百計，而以湖南、四川兩省籍爲多，較著名的有周恩來、蔡和森、趙世炎、陳毅、王若飛、李富春、李維漢、何長工、向警予、蔡暢、鄧小平（希賢）、李隆邛（立三）、徐特立、張昆弟、羅學瓚、陳延年、陳喬年、聶榮臻、傅鍾、蕭植藩、郭隆真、劉清揚、劉伯堅、林蔚等人。

另一派則是較不爲人所注意的「勤工儉學派」，或稱「讀書派」，他們雖然面臨環境與時代的嚴重挑戰，但始終堅持勤工的理想，一有儉學的機會，即埋頭苦讀，不計代價，勇往直前，從生活奮鬥中求取將來勤工儉學之完全實現。他們經過層層磨練，不少人終於學有專長，成爲科學家、工程師、教授、企業家或其他方面的專家，爲國家建設以及社會進步，貢獻出一份力量。舉其較著者有抗戰期間，擔任航空機械修理廠廠長的吳家鑄、李崇嶽，發明木炭汽車、無煙煤汽車的沈宜甲，主持後方醫院手術組之黃堅；終身從事化學工業之楊仲學（范旭東辦廠）、楊超（貴州化學廠），從事兵工業之賴持疆、吳爲霖，從事鐵路機械之黃田文（長辛店機廠總工程師）；建築湖南公路聞名全國之周鳳九（最後任西南公路總局局長），發展華東交通之江南汽車公司的吳琢之，創辦新式農場的陳國榮（豫籍）、周禮，發展各省農業改進所業務的莫定森、皮作瓊，從事製碱業之朱寶筠、樊德榮及紡織業之鄭家棣，乃至藝術家徐悲鴻、林風眠、李金髮等，類皆當年之留法勤工儉學生⁵⁹。抑有進者，他們雖然朝夕與潛在的馬克思主義信徒爲伍，同工共學，但出污泥而不染，絕不爲共產邪說所惑，在勤工儉學過程中不參加激烈政治活動，保持清純的本色，這無疑是大多數勤工儉學生的寫照。

⁵⁹ 朱伯奇，〈巴黎繽紛錄〉（香港南洋編譯所，一九六九），頁十六～十七。

86 勤工儉學的發展

研究勤工儉學運動史，不能一棒子打翻一船人，更不可忽視那代表大多數，默默奮鬥耕耘的一群！從河南勤工儉學生名單中，除陳九鼎外，似乎找不到第二個共產黨員，可見他們與其他大多數有志放洋的莘莘學子一樣，真正認清了出國的志向，不計成敗，始終貫徹「勤以作工，儉以求學」的初衷，為一部留法勤工儉學史留下平凡但卻意味深長的一頁！

（原載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十六期，民國七十三年六月，臺北）

周恩來旅歐時期的政治活動

(一九二一～一九二四)

一、楔 子

二、家世與早年教育

三、留學日本與參加五四運動

四、旅歐時期的政治活動

五、結 語

一、楔 子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巴黎市政府在巴黎十三區靠近義大利廣場（place d'Italie）的戈德弗魯瓦旅館（Hôtel Godefroy，位於Godefroy街十七號）牆上，為周恩來塑立了一塊方形的半身銅匾，並於其名字底下鐫刻一行字，載明周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留法期間曾住過此處（Habita cet immeuble lors de son séjour en France de 1921 à 1924），這家小旅館不僅周恩來等人租住過，也是中共旅歐黨團組織的所在地；更是其機關刊物——《少年》、《赤光》的編輯所。巴黎市政府為周恩來塑立銅像浮雕，是在周死後三年多的事情，當時周的遺孀鄧穎超及中共「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均曾應邀到場觀禮。

我們知道，周在法國停留期間，從事勤工儉學為時甚短，主要與

蔡和森、趙世炎、陳毅等人從事政治活動，領導示威遊行，由於擾亂社會秩序，為法國社會製造不安，曾被巴黎警察總局列為「危險人物」之一，幾乎遭到驅逐^①。事隔五十多年之後，法國當局如此做法，是不是意味法國重新肯定周恩來在法國的一切所作所為？抑或僅僅是一種現實的外交表態？個人以為，法國政府或民間團體若有意為中國人立碑塑像，首先應考慮三位提倡勤工儉學的領導人物——蔡元培（子民）、吳敬恒（稚暉）、李煜瀛（石曾），他們無疑才是法國人的真正朋友，至少是中法合作教育的原始發起人和有力推動者。

周恩來從一九二〇年年底出國，至一九二四年八月返國，在歐洲停留約四年左右，先後住過倫敦、巴黎、柏林，經常奔走於法、德、比之間。雖然到目前為止，他的行踪與活動仍有若干無法解開的謎，但是他的存在與參與，關係到整個勤工儉學運動的趨向和歷史發展，關係到中共在歐洲黨團的組織和活動情形，更關係到中共與無政府主義者及中國青年黨之間在巴黎的思想和行動鬭爭。所以說，周氏旅歐期間雖短，但他所從事的政治活動層面卻相當廣泛，而且具有複雜的多樣性，尤其無論任何一方面都居於一種舉足輕重的領導地位。而過去一些有關周恩來的傳記或論文，或由於資料所限，或因立場關係，對於他早期旅歐時期的種種活動，不是語焉不詳，就是錯誤不少，或不够客觀，因此有加以重新探討的必要，這是筆者撰寫本文的主要動機。

二、家世與早年教育

^①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頁五三。

關於周恩來的生年，過去中外文著作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根據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室所編的「周恩來青少年時代紀事」^②，周恩來生於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而與李天民^③、嚴靜文^④、唐國英^⑤等人所說的一八九九年稍有出入。原籍浙江紹興，從祖父那一代起始遷居江蘇淮安，所以周是在淮安出生，也算得上江蘇人。這一點包華德（Howard L. Boorman）所編的《民國名人辭典》^⑥，正好弄反了。

周家無論在紹興或淮安，都算得上地方大戶，人丁興旺，房屋田產不少，而且一門三舉人一秀才，但不久即面臨廢科舉、辛亥革命等大變局，家道逐漸中落。

周之祖父周攀龍（雲門），先在淮安縣當師爺，後任知縣，共生七男一女。周父劭綱（懋臣）排行最小，能力也較差，師爺未曾當上，只做過財政廳、縣府收發、文書之類工作^⑦。母萬氏，為淮陰知縣萬青選的女兒，工琴棋書畫，尤善繪仕女，是個才女。

周排行老大，下有兩個同父異母弟弟。早歲喪母^⑧，過繼給二伯父^⑨，由二伯母撫育長大。幼年常住外祖父家，接受的是私塾教育。

②《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天津人民出版社），第十五輯（一九八一），頁二。該「紀事」由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室參考周恩來全部資料、南開同學錄及各種報刊雜誌編寫而成，史實大體可信。

③李天民，〈周恩來評傳〉（黎明文化公司，民國六十五年），頁一〇。

④嚴靜文，〈周恩來評傳〉（香港，波文書局，一九七四），頁一二。

⑤唐國英，〈周恩來初期的政治活動〉，〈東亞季刊〉，十卷四期（民國六十八年四月），頁一一一。

⑥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 I, p. 391.

⑦胡華等著，〈周恩來的思想及理論貢獻〉（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頁一；李天民，〈周恩來評傳〉，頁一〇。

⑧周恩來究竟幾歲喪母，亦是衆說紛紜。嚴靜文說是四歲（〈周恩來評傳〉，頁一三七）；胡華等則主九歲（〈周恩來的思想及理論貢獻〉，頁三；〈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十五輯，頁三）；許芥昱（Chou En-lai, p. 5），李天民（〈周恩來評傳〉，頁一〇）等則未做確定。

⑨李天民，〈周恩來評傳〉，頁一〇。

一九一〇年，周十二歲，值辛亥革命前夕，隨四伯父（任奉天省度支司制用課主稿）到東北任上，先就讀鐵嶺銀崗書院，不久轉學，就讀瀋陽東關模範小學^⑩，小學教師介紹他閱讀章太炎主編的「國粹學報」與梁啟超創刊的「新民叢報」（一九〇二～一九〇七），兩者使他在中國文字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⑪，也使他接觸到若干新學，開闊了眼界。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周十五歲，到天津，八月考入南開中學（四年制，為張伯苓於清末所創辦），編入丁三班^⑫，比胡光廙、吳國楨、梅貽寶等人高一班^⑬。周在南開就讀期間表現不錯，尤其作文成績甚受校長賞識，曾得全校作文會考第一名^⑭。除功課出色外，周也是個活動力極強，喜歡參加各項課外活動的活躍份子，茲縷舉其較特殊者如下：（一）與同學共同發起組織「敬業樂羣會」，並創辦《敬業》月刊，他擔任副會長兼智育部長及《敬業》月刊的總編輯，曾撰俠義小說「巾幗英雄」發表；（二）他同時是學生會刊物——《校風》週刊的總編輯，曾撰寫許多健全團體、改革社會，求國家進步的文章；（三）為紀念南開學校成立十一週年，他曾參加話劇「一元錢」^⑮的演出，當

⑩《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四。

⑪李天民，〈周恩來評傳〉，頁一一。

⑫同前註，頁一四，〈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另作已三班，參閱十五輯，頁六。

⑬梅貽寶，〈大學教育五十年—八十自傳〉（聯經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一年），頁六。惟胡光廙生於一八九七年，他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即考入南開中學，應比周高兩班。參閱胡光廙，〈波逐六十年〉（新聞天地社，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再版），頁七五。

⑭胡華等，〈周恩來的思想及理論貢獻〉，頁八。

⑮「一元錢」，一名「炎涼鏡」，指出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使得「神州昏暗，天地為愁」。原著出之俄國虛無黨人 Sergei Kravchinski，由周作人據英文本，譯成「一文錢」，刊於「民報」第二十七期。參閱朱法源，〈民報的革命理論〉（臺大博士論文，七十三年六月），頁三六及頁四二五。此劇後甚為出名，多為相聲演員演出。

時風氣未開，社會上沒有男女同臺演戲的習慣，而南開又只有男生，所以周飾演女主角孫慧娟，穿旗袍演出，轟動一時；(四)他代表南開中學，參加天津校際演講比賽，獲得兩次第一名；(五)在班運動會上，他參加跳高獲得季軍，其所參加的勇隊，在籃球和排球比賽中均獲得冠軍，堪稱運動健將^⑩；(六)民國四年，當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時，周曾在學生團體集會上發表演說，強烈反對日本強加給我國的亡國條約，反對軍閥政府借外債打內戰，以後他也反對袁的稱帝^⑪。

三、留學日本與參加五四運動

民國六年六月，周恩來在南開中學畢業，時年十九歲。同年秋，他東渡日本留學，周在日本居留前後二十個月的生活費用，不由家庭供給，而是由他的朋友五位官費生每人每月津貼十元來維持的^⑫。他先在東京的東亞高等預備學校習日文，同時至早稻田、日本大學旁聽，兼補大學功課，預備投考東京高師，翌年三月應考未取。後來應同學之邀移居京都，準備入京都大學政治經濟科學習，亦未如願。

民國六年前後的東京，並不是一個可以靜心讀書的地方，因為二十一條之後，中日關係惡劣，留日學生不是輟學回國，就是組成各種

^⑩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七～一八。

^⑪ 胡華等，<周恩來的思想及理論貢獻>，頁一〇。

^⑫ 這五個人可能是嚴智開（南開創辦人嚴修之第七子，習美術）、蔡時杰（東北人，周之同班同學，預備報考士官學校）、張瑞峯（早稻田大學學生）以及韓姓夫婦（京都大學）。參閱李天民，<周恩來評傳>，頁一六；嚴靜文，<周恩來評傳>，頁二四；Kai-yu Hsu, *Chou En-Lai, China's Gray Eminence* (Doubleday & Company, New York, 1968), p. 236, Note 5.

團體，從事政治愛國活動，其中最大的團體是「新中學會」¹⁹。周恩來也參加該團體的活動，無心向學，逐漸對數學、理化等課程疏遠，而熱心追求新的事務，大量研讀社會科學的書刊，尤其受河上肇的影響甚大。河上肇是京都大學的經濟系主任，當時是日本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和傳播者，曾於一九一七年出版《貧乏物語》，一九一九年一月創辦《社會問題研究》半月刊。周成爲該刊的熱心讀者，除了《貧乏物語》外，並以極大的興趣閱讀了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精髓》、界利彥創辦的《新社會》等書刊。此外，他還讀了介紹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日本新村主義的文章。這一切開闊了他的眼界，使他的思想受到很大啓發，所以他曾寫道：『二十年華識眞理，于今雖晚尚非遲』²⁰。周恩來的東渡日本，可能是他有生以來思想受到最大激盪，醞釀轉變的第一個關鍵。

民國八年四月正是櫻花盛開的季節，周恩來因日本難以久留，便束裝返國，不久即趕上五四運動爆發。回國後的周恩來因張伯苓的關係，謀得一份校長室秘書的工作，張校長並允諾他將來入南開大學就讀²¹。這時他天天到南開去，全力投入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參加開會，聯絡同學，並與天津學聯負責人馬駿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自任主編，目的在揭露北洋政府的賣國陰謀，鼓吹愛國思想，並聲援各

¹⁹「新中學會」由南開畢業留日學生童冠賢、高仁山、劉東美、陳鐵卿、楊伯安等人發起，於民國元年暑假後創立，以聯絡感情，砥礪品行，闡明學術，運用科學方法，刷新中國爲宗旨。初時會員以留日學生爲主，就中以出身天津南開中學、天津法政學校的同學爲多，後來逐漸發展到國內各學校，甚至包括留學美、英、法、德各國的學生。參閱楊扶青等，〈新中學會紀要〉，收於《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續編，頁四六〇～六七。

²⁰《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二三。

²¹Kay-yu Hsu, *Chou En-Lai*, p. 22.

地的學生和羣衆運動。

民國八年九月，周又聯合郭隆真、鄧穎超、劉清揚等人成立「覺悟社」，認爲社會的進步，首在建立個人自覺，要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自決²²。覺悟社成立時，社員共有二十人，男女各半，都是天津學聯和女界愛國同志會的男女負責人和工作人員。社員用抽籤辦法以代號取名，例如周恩來爲五號，取名伍豪，鄧穎超是一號筆名就叫逸豪。覺悟社出版過一種不定期刊物——《覺悟》，它原定民國八年十一月五日出生，但因社員忙於學生運動以及印刷的延誤，所以直到民國九年一月二十日始出版第一期。這一期的兩篇重要文章——〈覺悟〉和〈覺悟的宣言〉，是經社員集體討論後，由周恩來執筆寫成，表達了覺悟社的宗旨和主張。此外，周恩來還發表了一篇題爲〈有什麼分別〉的短文和〈死人的享福〉、〈游日本京都圓山公園〉、〈四次游圓山公園〉、〈雨中嵐山——日本京都〉、〈雨後嵐山〉等五首白話詩²³。嵐山是京都最美的風景勝地。

覺悟社成立後，經常邀請北大教授如錢玄同、周作人等到社談話演講，民國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李大釗到天津，曾應邀到覺悟社談話，指導該社的活動，對於該社將不定期出版小冊子的辦法與不分男女的組合，十分贊成，並提出許多的建議²⁴。這無疑是周恩來與李大釗接觸的開始，當時李大釗在北京先後創立「社會主義研究會」與「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周恩來在赴法前當已有機會參加他們的活動²⁵。

²²〈覺悟〉（人民出版社影印，一九八〇），第一期（一九二〇年一月），頁二。

²³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北京，一九七九），第二冊，頁二九九～三〇〇。

²⁴〈三個半月的覺悟社〉，〈覺悟〉，第一期，頁八。

²⁵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7), pp. 117-118.

其後，平津的學生運動愈演愈烈，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造成「九一，念九事件」，周恩來、郭隆真等四名請願代表至直隸公署請願示威被捕，至七月十七日因律師劉崇佑之營救獲釋，共被扣押半年，在獄中周向難友演講馬克思的學說²⁵，可見他比同儕的信仰要來得狂熱。八月十六日，在周恩來倡導下，覺悟社社員十一人到北京，邀集少年中國學會、工讀互助團、曙光社²⁶、人道社等四個團體代表二十餘人在陶然亭開茶話會，商討今後救國運動的方向問題，李大釗曾應邀講話，指出各團體今後應有進一步的聯絡。八月十八日，這五團體在李大釗指導下，於北京大學通信圖書館召開各團體聯絡籌備會。經過討論議決五團體合組一個「改造聯合」，並制定了「改造聯合宣言」和「改造聯合約章」²⁸。這雖然只是一些空洞的口號，但已可看出五四時代的周恩來，其思想已較前更加開濶，他的活動範圍也已不再侷限於天津一地了。

四、旅歐時期的政治活動

經過五四的一場風潮，周恩來的思想更爲傾向馬克思主義，爲了「另闢一條新道路」，他決定到歐洲，於是參加了勤工儉學的行列，搭的幾乎是勤工儉學的最後一班船。旅費是南開創辦人嚴修（範菴）

²⁵《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四四。

²⁶曙光社於民國八年十一月在北京成立，成員是北京中國大學、法文專修館和俄文專修館等高等學校的學生。主要活動是出版《曙光》月刊。月刊的編輯是宋介，主要撰稿者有王統照、王晴霓等人。早期的《曙光》雜誌提倡科學救國和教育救國，強調美育是改造社會的根本手段，介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哲學思想，具有濃厚的學院氣息。參閱《五四時期的社團》，第三冊，頁四九。

²⁸《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四八。

及天津大律師劉崇祐所贈，兩人各資助五百元的路費²⁹。

民國九年十一月七日，周由上海搭乘法輪「波爾多斯」(Porthos)號出發，同船有一百九十七人，包括郭隆真、李福景等覺悟社社員或南開同學。十二月十三日抵馬賽³⁰，旋即乘火車到巴黎，在巴黎住半月有餘後³¹，於十二月底渡海往英倫，共停留五星期左右。此次周恩來以儉學名義出國，本志在留英，先計劃在英入大學讀書三、四年，然後再往美讀書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大陸遊覽³²。抵英後，他與南開同學李福景為爭取官費留英，即與愛丁堡大學交涉入學事，該校許其免去入學試驗，只試英文，但終未進成。原因有二：(一)該校十月開學，試期在九月，而這時才二月，中間尚有六、七月工夫，周不願久待；(二)英倫費用年須二百英鎊，合國幣千元之上，愛丁堡雖較省，亦不止千元，均比法國多出一倍以上³³。所以考慮再三，周恩來遂退而求其次回到巴黎學習法文，這個決定影響他一生至深且遠！

周回到法國後，曾在「阿里昂絲法語補習學校」或譯「法語聯合學校」(Alliance Francaise)補習一段時間的法文，法語自不够用，最後連法國大學的門牆也未摸到。他看書吸收新知，主要依賴英文書，而與第三國際的人士打交道，也多靠英語。他自稱拙於語言的天才，但不自量力的先後學過英文、日文和法文³⁴。周不必從事體力勞動，

²⁹ 李天民，〈周恩來評傳〉，頁一八。

³⁰ 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上海，一九八〇）（一），頁七七六，八一—二。

³¹ 據李璜回憶，民國九年春，於巴黎光明社曾見一東方美男子（指周恩來）在座。按此時周恩來尚在獄中並未出國，諒係李璜記憶之誤。參閱李璜，〈學鈍室回憶錄〉（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二年），頁七六。

³² 周恩來致陳式周，〈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北京，一九八二），續篇，頁七三。

³³ 同上，頁七四。

³⁴ 同前註。

故有較多時間以記者身份為天津「益世報」（天主教協會主辦）撰寫《旅歐通信》，而且寫得相當勤快，這也是他生活費用的來源之一。

周恩來在歐洲四年所從事的政治活動，主要可分成下列三方面加以敘述：

（一）勤工儉學的波瀾

周在法國先後至少參與過四次政治性集眾示威活動，目的有為勤工儉學生的工學前途，有為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其對象名義上雖多半為代表中國政府的官方人員，但也隱含西方帝國主義在內。茲分述如下：

甲、使館請願風潮

由蔡元培、李石曾、吳敬恒等人所發起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至民國十年初已經到達一千六百餘人，適逢法國面臨經濟危機，許多工廠停工，致許多學生「勤工無門」，唯賴華法教育會每天所發五法郎維持費度日。這時蔡元培到法，不但沒有為勤工生帶來好消息，反而一再發表聲明，斷絕與勤工生的一切經濟關係，令學生大起恐慌。國內北洋政府回電亦謂：「現時國庫奇絀，在法學生無錢無工者，惟有將其分別遣送回國，並責成公使館辦理」^⑤，對絕望之人更有如晴天霹靂，遂激發極端不贊成勤工之學生將於二月二十八日聚集大隊至公使館請願之事。

當此時機緊迫之際，旅法的國際和平促進會、北大留法同學會、中國化學研究社、少年中國學會分會、巴黎通信社、旅歐周刊社等六團體出面調停，於二月二十六日派代表兩人往公使館向陳籙公使要求臨時維持辦法，其談判結果有二：（一）現時在校同學，公使擔任暫時維

^⑤周恩來，〈旅歐通信〉（北京，一九七九），頁二二。

持，各校長決無令其出校之情事，倘有此種情事，可詢問公使館；(二)候工同學亦允暫時入校，與現時在校同學一律，但須三、四日之布置，方可實行³⁵。

二十七日晨，既到巴黎學生及各地代表開會討論第三者談判之結果。會議結果，以為使館既不能不維持，正可趁勢再為要求，其所要求之條件，即請使館向政府請求每人每月給四百佛郎，以四年為限；及里大、比大無條件開放，任學生自由入校³⁶。代表會為廣泛爭取社會各界支持，並向全體勤工儉學同學發出通告，向公使館和華法教育會發出請願書，向旅法上層人物發出請求援助書，向北洋政府和各省政府發出電報³⁷。

二月二十八日晨，四百多名勤工儉學生在巴黎示威遊行，並推派蔡和森、向警予、趙世炎、王若飛等十人代表晉見公使陳錄請願，要求解決工作、求學、發放救濟金等問題。陳錄謂使館無權應允，遂與留歐學生監督高魯及巴黎副領事李駿親赴使館附近之花園，向等候之學生說明，雙方爭持再三，不能解決問題，公使身陷重圍，最後引起法警干涉，卒以暴力驅散同學，代表在使館者久坐不去，至晚由法警挾之出，結果有數人受傷³⁸，廣東學生王木因跳電車跌倒，為車輾斃，肝腸斷裂，死狀極慘³⁹，屍體為法警拾去，次日，勤工儉學同人路經其

³⁵ 同上，頁二三。

³⁶ 同前註。

³⁷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參閱〈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一九七九）上册，頁一一六。

³⁸ 有關「二八事件」經過，各方因立場不同，說法不一。茲綜合李維漢、周恩來、盛成、天一等人說法，作一較客觀之敘述。

³⁹ 〈旅歐週刊〉，第六十九期，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二日，頁三。

地，見血堆中有殘肝兩片，特拾起貯酒精瓶中，以為請願之紀念^④。

「二八事件」的主要領導人是新民學會的一羣，如蔡和森、向警予、李維漢等人。周恩來留法較晚，又二月中旬始從倫敦回到法國，在巴黎近郊的哥倫比（La Garenne-Colombes）居住，一面到市區阿里昂絲法語補習學校學法文，一面以記者身份繼續為天津「益世報」撰寫通訊^⑤。故前面學生代表自一月起與使館間的種種交涉，他均未及參加。但他可能趕上了二月二十七日在巴黎一家咖啡館所召開的勤工儉學生代表大會^⑥，這次大會決定了第二天向公使館的羣衆請願。總之，周雖不是這次使館請願風潮的主角，但他關心勤工生的前途，始終注意整個事件的發展，則不待言。事後，他曾撰寫一篇長達兩萬多字的通訊——〈留法勤工儉學生之大波瀾〉，在「益世報」發表，詳細報導事件的來龍去脈，是同類報導中最完整詳盡，並具議論分析性者。使館請願風潮，可以說是周恩來介入勤工儉學運動的先聲。

乙、拒款運動

民國十年六月，北洋政府特派專使朱啓鈴、財政次長吳鼎昌到巴黎，據巴黎學界瞭解，表面上是代表總統徐世昌接受巴黎大學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而真正的使命是向法國借款三到五億法郎，名義是救災，其實是購買軍火等用途^⑦。借款條件以全國印花稅、驗契稅作抵

④晨報，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清華大學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北京，一九八〇），二冊上，頁四三〇。

⑤〈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四九。

⑥另一說，周恩來在「二八運動」時不在法國，他是事件發生之後才從英國返回巴黎。參閱戴緒恭，〈向警予傳〉（北京，一九八一），頁六八。

⑦據朱啓鈴事後應時報訪問表示，吳鼎昌受王克敏之囑，赴法接洽。當時中法實業銀行，基礎動搖，法國方面希望中國政府發行三萬五千萬佛郎之國庫券為之維持，並允由中法實業銀行，供給借款五千萬佛郎於中政府，以為交換條件。參閱〈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二冊下，頁五一五。

押，以滇渝鐵路建築權、全國實業購料權作交換。消息傳出後，旅法學生與僑胞莫不義憤填膺，華工會、中國留法學生聯合會、國際和平促進會、亞東問題研究會、巴黎通信社、旅歐週刊社等六團體遂成立「拒款委員會」，從事拒款的各項努力。拒款運動於六月二十二日展開，其時所進行之方法大略如下：

1. 通電國內，電文如次：

「申報轉各報館各團體鑒：朱啓鈴、吳鼎昌在法秘密借款三萬萬佛郎，條件嚴酷，旅法工商學界一致反對，望國人極力抗爭。旅法各界六千餘人同叩。」

2. 散布傳單，內容大都為報告每日間所進行之事實及拒款之情形。散布地點除巴黎外，且向在法之各地學校、工場及商店之僑胞投遞。

3. 以法文宣言送達法國國會議員、國務員、各報館及各重要人物，約一千餘份。「拒款委員會」所辦之事，以此項最為得力，巴黎報紙除登載全文外，且有附以評語者。

4. 致函詰陳籙公使，內容有「先生負外交重責，代表國家，宜有所表示」之要求。陳氏復函謂，此事出於誤會，請派代表至公使館面談，解釋一切。

5. 發通告致國內各團體及美洲、南洋華僑、留英留德學生會，勸其一致力爭。

6. 致函質問吳鼎昌，其函如下：

「知公在巴黎又密謀借款，希圖賣國，今請明告公，公如自愛，可速將此事打消，並即離歐，否則上天入地，必有人與公相見。」⁴⁵

⁴⁵ <旅歐週刊>，第九十一期，借款專號，頁一；<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北京，一九七九），頁八〇～八一。

「拒款委員會」先後於六月三十日及八月十三日在巴黎哲人廳(Société des Savants)召開兩次「拒款大會」，通過「拒款宣言」，宣讀周恩來所起草的借款真相的調查報告。在八月十三日的拒款大會中，陳籙公使不敢來，而派一等秘書王曾思代表解釋，力言借款簽字之說，實屬毫無根據，公使館始終未與聞其事，且法報之登載亦未嘗見。言時頗怒形於色，似怪同胞開會為多事，又時復以拳擊案，表示其不滿，致遭滿腔義憤之羣眾毆打。迨會場平靜後，張君勳起而質問，並提出兩條辦法，請眾討論：(一)應請公使即向法政府聲明，反對此次借款，並向法國各報要求更正，並無簽字草約之事，若借款仍然成立，公使及全館職員均應辭職，以謝國人；(二)以後凡關於中法借款之事，應交由留法各界所組織之外交委員會審議，得其同意，方能執行。是議提出後，經與會人多數通過，王秘書亦鼓掌贊成，當即照原議繕寫兩份，一份由王秘書當眾簽字，一份帶交陳公使簽字後，於一週內寄交委員會。當場並推舉袁子貞、謝東發、毛以亨、李書華、徐特立、李光宇、宋紹景、張君勳、李哲生、曾琦十人為臨時委員⁴⁶，至此，反對中法秘密大借款的奮鬥延續了兩個多月後宣告勝利結束。

這次拒款運動，旅法華人不論華工或學者學生，不分黨派，都一致聯合參加，故聲勢浩大，不單是趙世炎、周恩來等人的領導功勞。不過，周恩來的地位比上次「二八運動」重要，他雖未被推舉為十人委員之一，但他所扮演的角色在共黨份子中應僅次於擔任大會主席的趙世炎，他一開始即密切注視事件的發展，接連撰寫〈旅法華人拒絕借款之運動〉、〈中法借款之又一黑幕〉、〈中法大借款竟實行簽字矣〉、〈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訊〉等多篇通訊，揭露北洋政府與法國政府之間的交易，使秘密借款提前曝光，終告流產。

⁴⁶ 周恩來，〈旅歐通信〉，頁一四三。

拒款運動的主要對象雖是代表北洋政府的吳鼎昌和陳籙等人，但卻連帶惱怒了法國資本家及外交部，大大損害法國在遠東的利益。因此，由法國教育、外交當局結合實業界所組成，旨在救濟勤工儉學生的「中法監護中國青年委員會」(Comité Franco-Chinois de Patronage des Jeunes Chinois en France)，乃宣布停發維持費⁴⁷，使勤工生走投無路，剩下佔據里大一途了。

丙、進駐里大事件

里昂中法大學成立於民國十年秋天，爲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等一批稍早鼓吹勤工儉學的人，與里昂當地熱心中法教育人士所共同創辦的一所海外中國大學，其目的在以比較經濟的組織，利用國立里昂大學及其他各專門學校現成之設備與師資，爲我國作育有志深造之人才⁴⁸。當消息傳出，勤工儉學生奔走相告，無不喜形於色，以爲大家有了求學的出路。不料學校一成立，吳稚暉校長另從國內北平、上海、廣州等地招收一百多名「新科貴人」前來，捨近求遠，棄勤工生於不顧。此時勤工生的維持費又停發，他們在希望幻滅下，只好鋌而走險，提出「誓死爭回里大」等口號，並在趙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陳毅等人的領導下，派出先遣隊一百二十名左右，進佔里大校舍，結果被法國警方以「強佔校舍，擾亂治安」等罪名拘禁二十餘天後，集體遣送回國⁴⁹。

⁴⁷同前註，頁三一。

⁴⁸有關里昂大學的創辦情形，請參閱拙著，〈民初旅歐教育的艱難歷程——里昂中法大學初探（一九二一～一九四八）〉，〈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出版），下冊，頁九一～一〇〇六。

⁴⁹有關進佔里大事件，請參閱拙著，〈新民學會之成立及其在法活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十三期（民國七十三年六月），頁七八～八〇。

周恩來一開始即參與這次的行動，但他處事比較穩健謹慎。當各地勤工儉學生聯合委員會決定採取直接行動時，他提醒大家鬭爭是複雜的，鬭爭要講究戰略，要作兩手準備，故建議留下部份幹部負責後方工作^⑤，因此他和其餘幾位留駐巴黎的代表——聶榮臻、王若飛、徐特立沒有被一網打盡，事後得以四處奔走，進行營救。留巴代表曾往見陳籛，要求三事：(一)拍電安慰被拘同學；(二)用電話請吳稚暉速來巴黎，商定根本解決的事；(三)嚴重向法政府交涉恢復學生自由，即不能立時全體釋放，亦請先放十代表，好與吳稚暉到巴黎磋商一切辦法。第三者方面有石瑛、黃齊生兩人出面調解^⑥，但仍無法挽回一百餘位肇事者被遣送歸國的命運！

丁、反對列強之共管中國鐵路

列強共管中國鐵路之說，哄傳中外已久，惟自民國十二年五月發生山東臨城劫車事件後，乃有進而見諸實行之勢。七月二日，巴黎時報載：列強大多數已同意於在華設立萬國警察共同管理中國鐵路之議，不久即將見諸實行云。旅法華人聞訊，無不憤慨！是日下午，即由旅法華工總會、華法教育會、北大同學會、少年中國學會商議先行發起旅法各團體聯合會，以謀應付一切。次日下午四時，在華僑協社開旅法各團體聯合會發起會，計到會之團體代表有：(一)「先聲週報」社梁志尹、林秉照；(二)北大同學會許德珩、周炳琳；(三)旅法華工總會袁子貞；(四)「少年」雜誌社周恩來；(五)少年中國學會曾琦、李璜、陳登恪、黃仲蘇、余家菊；(六)女子勤工儉學會郭隆貞；(七)華法教育會何魯之；(八)湖南學生會徐特立。由何魯之任主席，提出預擬之六條辦法如下：

^⑤《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五八。

^⑥周恩來，〈旅歐通信〉，頁五五～五六。

- (一)請公使向法政府正式聲明，華人誓不承認國際共管中國鐵路；
- (二)向法報宣言，解釋內亂之原因，申明反對共管之理由；
- (三)警告國內各界，速起組織國民政府，反對鐵路共管；
- (四)招待法報記者；
- (五)致函留英、美、日、俄、德諸國華人，請其一致行動；
- (六)致函駐英、美諸國公使，請其設法打銷此議。

主席提出之後，由曾琦起而說明其理由，經衆逐條通過，並決定於七月八日在巴黎先開旅法各團體聯合會成立會，十五日再召集旅法華人全體大會。三日在協社會議之後，遂由是日到會之八團體及留法勤工儉學總會署名，發出通告，召集其他未加入之各團體，於八日午後三時，在巴黎中華飯店開正式會議。是日到會之團體代表，較前增加，計有：(一)華法教育會何魯之；(二)四川勤工儉學會吳從龍、劉一；(三)江蘇勤工儉學會吳琪、吳琢之；(四)湖南學生會徐特立；(五)旅歐中華航空學會吳家鑄；(六)江西學生會蕭健、彭樹敏；(七)旅法華工總會袁子貞；(八)「工人旬報」社王子卿；(九)北大同學會許德珩、周炳琳、陳沛、高維；(十)安徽學生會江世義；(十一)巴爾紱伯中國同學會曾向午；(十二)廣東半官費學生會胡國偉、梁志尹；(十三)「少年」雜誌社任卓宣、周恩來、尹寬；(十四)「先聲」週報社黃晃、馮業恭；(十五)少年中國學會曾琦、李璜、陳登恪；(十六)留法勤工儉學總會周楚善；(十七)「工餘」雜誌社李卓；(十八)巴黎十五區電話廠勤工儉學分會滕功成；(十九)學生總會周刊社陸宅桴；(二十)河南學生會楊介臣；(二十一)華工組合書記部蕭樸生、汪澤楷；(二十二)山西同學會令狐國光。

是日會議，仍由何魯之主席，議決之事如下：

- (一)通過三日八團體所擬之六條辦法；
- (二)通過曾琦起草之致國內各界電文；

(三)決定十五日在巴黎召集旅法華人全體大會；

(四)組織臨時委員會，推舉職員如下：

法文書記：謝東發、李璜

中文書記：周恩來、曾琦

會計：徐特立、袁子貞

招待：魯觀成、徐特立、李不隴、吳家籌⁵²

七月十五日下午三時，旅法各團體於巴黎社會博物館召開旅法全體華人「反對國際共管中國鐵路大會」。是日天氣雖雨，到會者仍有四、五百人之多。首由何魯之主席，述開會理由，次請曾琦報告籌備大會之經過，及國際共管之由來，為抵抗列強與掃除國賊，籲眾實行四大運動：(一)輿論運動；(二)羣衆運動；(三)革命運動；(四)暗殺運動⁵³。繼由周恩來報告其起草「告國內父老書」之理由，略謂：國事敗壞至今，純由吾人受二重之壓迫，即內有冥頑不靈之軍閥，外有資本主義之列強。吾人欲圖自救，必須推翻國內軍閥，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

是晚各團體代表，復開會議於巴黎一大咖啡店，討論旅法各團體聯合會之宗旨及組織，並另選正式委員。關於宗旨一條，曾琦提議以「聯合中國旅法各團體，實行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為宗旨，結果經大多數通過。組織則分書記、經濟、庶務、交際、新聞五股，書記股，設中文書記三人，法文書記二人，曾琦、周恩來當選為中文股書記委員⁵⁴。

⁵²《少年中國》（少年中國學會出版，上海中華書局發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影印）第四卷第八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附錄二，〈旅法華人反對共管中國鐵路紀事〉，頁一～二。

⁵³《曾慕韓（琦）先生年譜日記》（中國青年黨黨史委員會，民國七十二年八月出版），頁五四。

⁵⁴《少年中國》，第四卷，第八期，附錄二，頁五～六。

七月三十一日，「旅法各團體聯合委員會」在巴黎萬花酒樓舉行記者招待會。巴黎二十四家報館三十餘名記者及有關人士均應邀出席，對旅法華人反對帝國主義共管中國鐵路的奮鬥深表同情。翌日，法國各報或發表紀事或發表評論，紛紛表示支持旅法華人的愛國行動。

旅法華人反對列強共管中國鐵路的舉動，主要由少年中國學會會友如何魯之、李璜、曾琦等人所發起，但為示團結一致，不分彼此，亦約周恩來等人參加。曾琦雖被推舉為「告全國父老書」及「致駐法國的各國公使反對鐵路國際共管的公函」的起草人，但他特別提議要與周恩來共同商酌，以安周之心，且示並無排斥之意⁵⁵。惟這時「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已成立有年，他們假借愛國名義，在羣衆大會上宣傳共產主義。例如在七月十五日的大會上，周恩來的一席話，無異在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並主張用革命暴力和統一戰線實現上述目標⁵⁶。劉清揚先引述某領事私人談話，謂中國現狀如此混沌，非借外人的勢力來壓迫一番，中國國民是永遠不會覺悟的。次說救國方法，大意謂五四之救國運動是盲目的，惟有共產主義的革命才算是真正的救國運動⁵⁷，認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非聯合蘇俄，不足以言革命救國⁵⁸。後來會場秩序大亂，甚至發生鬪毆，啓開了日後與中國青年黨間進一步的流血衝突。

(二)中共旅歐組織的發展

在中共組織未正式成立前，法國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團體有三：(一)是由蔡和森所領導，以蒙達集(Montargis)為大本營的新民

⁵⁵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頁九四。

⁵⁶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七六。

⁵⁷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二冊下，頁七七五。

⁵⁸ 李璜，前引書，頁九五。

學會，至民國九年六月已有會員十六人。七月初旬，新民會友在蒙達集舉行一次聚會，確立學會的方針為「改造中國與世界」，逐漸走上俄國革命的道路^④；(二)是李維漢、李富春等人所領導組織的「工學勵進會」，後改稱「工學世界社」，有社員三十多人，民國九年九、十月間，該社在蒙達集開會三天，經過熱烈討論後，大多數社員贊成以信仰馬克思主義和實行俄國式的社會革命為宗旨^⑤。(三)是趙世炎、李隆邛(立三)為首的「勞動學會」，他們在使館請願風潮發生後，仍相信勤工儉學主義，反對蔡和森依賴維持費為生，拒絕勤工的主張。於是他們發起建立「勤工儉學者同盟」，獲得熱烈響應，使人數由十餘人增至二百餘人。他們又與同情勤工儉學的人重組「留法勤工儉學會」，在民國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其宗旨為「本工學主義及互助精神，實行動工儉學以謀社會之改進，而勞動與互助為勤工儉學會會員共同的信條」^⑥。該會並動員了許多勤工生入廠工作，大部份集中在克魯鄒(Le Creusot)工廠區。但由於客觀事實的困難——工廠停工，有工作者終居少數——主張勤工者在工作上體驗到勤工的困難，於是與「反對勤工者」漸漸了解而取得一致的態度。從克魯鄒區的勤工生首先倡議開放里大，可以看出勤工理論的支持者已改棄勤工，轉而在求學方面尋求自己的出路。所以勞動學會、留法勤工儉學會和工學世界社終於合流起來，在進佔里大事件中遂取一致的行動^⑦。易言之，勤工派最後亦改弦更張，與蒙達集的新民學會與工學世界社

^④參閱陳三井，〈新民學會之成立及其在法活動〉。

^⑤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冊，頁一一五。

^⑥張伯簡，〈勤工儉學變遷略史〉，〈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一冊，頁一一九。

^⑦陳敬堂，〈中共旅歐總支部之成立〉，〈東亞季刊〉十六卷一期(民國七十三年七月)，頁四二。

等「革命派」，同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中共旅歐組織的發展，依其時間先後，大致可分下列三個階段加以敘述：

甲、共產黨小組

大約在民國十年三月間成立，該小組之成立應在「二八運動」之後，比北京、上海的共黨小組為晚。據張申府（崧年）自述，小組以他為中心進行聯繫，與陳獨秀常有書信來往⁶³。按張原為北大講師，與陳獨秀、李大釗為共黨北京小組的三個最早成員，後來應里昂中法大學之聘，與蔡元培、陳大齊於民國九年十一月月中旬同船出國，陳氏係往瑞士研究實驗心理學，張君係到里昂幫理大學事務⁶⁴。同年年底到法國後，因里昂中法大學（中國學院）正在籌建，未正式開學，張申府即在巴黎住下，首先介紹在國內已經認識的劉清揚入黨，接著透過劉清揚的關係介紹周恩來入黨（張自稱在民國九年八月的北京陶然亭茶會上已認識周，但可能不如對劉熟悉）。同時又與原為上海小組成員的趙世炎、陳公培取得聯繫，於是這五人就在巴黎成立共產黨小組。這個小組沒有別的稱呼，對外也不公開共產黨員的身份。民國十年七月，當中共「一大」要在上海召開前，曾接到國內寄來通知，也提出在黨小組討論，後因時間緊迫，路遠（恐怕路費也有問題），未能參加⁶⁵。所以法國黨員雖比日本為多，當時卻沒有派代表回國參加「一大」的成立。

巴黎共產黨小組雖然成立，但並無實際工作表現。學者氣味濃厚的張申府既非實幹者，也不熱心參與活動，所以小組名存實亡，在以

⁶³張申府談旅歐黨團組織活動情況，〈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八七。

⁶⁴〈旅歐週刊〉，第六十一期（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頁三。

⁶⁵同註⁶³。

後的拒款、里大事件兩大風潮中，小組成員趙世炎、周恩來毋寧是以個人身份，積極扮演了領導的角色。

乙、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

除共產黨五人小組外，最熱心組黨者應首推新民學會的領導人蔡和森。早在民國九年七月的蒙達集會議上，蔡和森即主張要組織一個「主義明確，方法得當，和俄一致的共產黨」^{⑥⑥}，其後透過各種活動的經常接觸，蔡和森與非新民會友的趙世炎和周恩來，對組黨問題也有所計議。民國十年「二八事件」後的某一星期天，蔡和森和周恩來登上巴黎聖母院(Notre-Dame de Paris)塔頂，在暮色蒼茫中，二人討論建黨之事，周恩來說：「當前最具體的問題，就是我們首先要組織共產主義團體，這是最急的要事」^{⑥⑦}。組黨之事後因里大事件，蔡和森、李立三、陳毅等大部分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幹部被遣回而中斷。

就周恩來而言，他到法後常與趙世炎等一起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經過對各種主義反復推究比較以及和同志間的多次討論，「思想本來未大定」，對主義認清較晚的周恩來終於民國十年十月（抵法一年後），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⑥⑧}。他曾鄭重的說：「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⑥⑨}，又說：「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

^{⑥⑥} 蔡林彬給毛澤東信（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蔡和森文集〉（北京，一九八〇），頁五二。

^{⑥⑦} 〈蔡和森文集〉，頁八三九。

^{⑥⑧} 「伍的誓詞」，原載天津「新民意報」副刊「覺郵」第二期（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收於〈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天津一九七九），頁二七〇。

^{⑥⑨} 「西歐的『赤』況」，原載「覺郵」第二期，收於〈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頁二七五。

很堅決地要爲他宣傳奔走」⁷⁰。

民國十一年三月，周恩來移居德國柏林，這時旅歐黨小組成員最多不過十人，大都集中在德國。他們鑒於勤工儉學生和旅法華工的分散各地與不團結，都認爲有儘快組成青年團的必要。於是周恩來、張申府、張伯簡、劉清揚等七個黨員聯名寫信給趙世炎，「促於五一告成」籌建工作。趙世炎爲此立即離開他工作了半年的法國北方，於五一勞動節那天回到巴黎，隨即奔走於蒙達集、里昂等地以統一意見，至五月底始籌備就緒⁷¹。

民國十一年六月間，在巴黎西郊的布隆恩(Boulogne)森林召開成立大會，參加者有旅法、德、比等國代表共十八人，周恩來由柏林前往參加。會議決定將團組織定名爲「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通過了章程和工作計劃，並選舉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三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由趙世炎爲書記，周恩來爲宣傳委員，李維漢爲組織委員，會議還決定出版刊物《少年》。討論章程時，周恩來提議加入組織者應當宣誓，有人反對，認爲這是宗教色彩。周恩來解釋說，宣誓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帶有政治約束力，譬如袁世凱曾經宣誓忠於民國，但他以後做了皇帝，人民就說他叛誓而討伐他⁷²。其後又增補王若飛、陳延年、尹寬三人爲執行委員⁷³。陳延年、陳喬年兄弟本來信仰無政府主義，經趙世炎等爭取後也陸續加入該組織⁷⁴。少共在性質上是團的組織，而不是黨的組織。

同年十一月下旬，旅歐少共派李維漢攜帶公函歸國，向團中央匯

⁷⁰ 同註⁶⁸。

⁷¹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三六。

⁷²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六六～六七。

⁷³ 同註⁷¹。

⁷⁴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册，頁一二〇。

報工作，並聲明「願附屬於國內青年團爲其旅歐之部」，經中共中央同意，於是少共於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於巴黎郊外召開臨時代表大會進行改組。這時旅歐青年團的團員已由原來的三十餘人發展至七十二人。（計旅法五十八人，旅德八人，旅比六人）。出席代表四十二人，會議由趙世炎任主席，任卓宣等四人爲記錄。會議決定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將「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改稱「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之部），並將原來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爲執行委員會，會上並通過了周恩來起草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章程第一條明確規定，凡申請入會者必須做到「對於共產主義已有信仰」^⑯。大會並選出周恩來、任卓宣、尹寬、汪澤楷、蕭樸生五人爲新的執行委員，劉伯堅、王凌漢、袁子貞三人爲候補委員。執行委員會成立後，推選周恩來爲書記，尹寬主任「共產主義研究會」事，汪澤楷主任「學生運動委員會」事，蕭樸生主任「華工運動委員會」事，任卓宣主任「出版委員會」事^⑰。至十四年初，該團發展爲三百餘人，改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區」，至同年年底，又因團員陸續赴俄或歸國減少到一百餘人，組織便相應地改稱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地方團」^⑱。

丙、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

由於少共在性質上不是黨的組織，所以在民國十一年冬，已參加少共的中共黨員另組「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⑲，周恩來爲支部負責人之一。支部下設法國、德國、比利時三小組，茲誌其負責人與重要

^⑯「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收於《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二冊下，頁八四九。

^⑰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報告第一號，《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二冊下，頁八四六～八四七。

^⑱《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三七～三八。

黨員如下：

法國組——負責人為趙世炎；黨員有傅鍾、王若飛、李富春、陳延年、陳喬年、李林、任卓宣、鄧小平、劉伯堅、林蔚、郭隆真、余立業、蕭樸生、袁子貞、馬志遠、陳彭年、何長工、李季達、冉鈞⁷⁹。

德國組——負責人為張申府；黨員有周恩來、朱德、張伯簡、鄭太樸、高語罕、李季、孫炳文、熊雄、章伯鈞、謝壽康、廖煥星⁸⁰。

比利時組——起初負責人為劉伯堅與聶榮臻，後來是江澤民。黨員有熊味根、黃士韜、甘瑞、張貴元、喬丕成、喬丕顯、萬監周、張熙等人⁸¹。

中共旅歐支部在組織上是保密的，對外一切活動，都用旅歐共青團的名義出現，即使對共青團也不完全公開，黨支部和少共機關都設在巴黎十三區意大利廣場附近的戈德弗魯瓦旅館裏。當時黨支部和少共機關是重合的，黨員都參加少共組織活動，少共中具備黨員條件的則不斷轉為中共黨員⁸²。

綜上所述，中共旅歐黨團組織的最早領導人是張申府、趙世炎；

⁷⁹ 據張申府〈談旅歐黨團組織活動情況〉、江澤民〈參加留法比勤工儉學的回憶〉、施益生〈回憶中共旅歐支部的光輝業績〉（以上均見《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十五輯）等人說法，中共旅歐黨組織的名稱為「支部」，各地設小組。李璜〈學鈍室回憶錄〉、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陳敬堂〈中共旅歐總支部之成立〉等人則有總部，總支部下設支部之說，恐係與少共組織混淆之誤。

⁸⁰ 名單不完全，主要根據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一文而得。

⁸¹ 名單不完全，主要根據張申府前述談話而得。

⁸² 名單可能與共青團相重，主要根據江澤民的回憶而得。

⁸³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十五輯，頁七一。

112 勤工儉學的發展

民國十二年他們離開後，即交由周恩來負責；民國十三年八月，周回國後，則交由鄧小平、傅鍾、任卓宣等人負責。

周恩來旅歐期間，除促成中共組織的成立和發展外，尚有二事值得一提：(一)他經常奔走於德、比、法之間^③，介紹中國學生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幫忙辦理去蘇聯的各項手續，並安排他們的行程。據不完全統計，民國十二年三月，有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平、陳喬年、余立業、高風、陳九鼎、王凌漢、鄭超麟、袁慶雲、王圭、熊雄等十二人第一批前往莫斯科。同年十一月，劉伯堅、尹寬等亦繼之前往。十三年九、十月間赴莫斯科的有聶榮臻、蔡暢、穆清、傅烈、錢來杰、陳家珍、彭樹敏等二十餘人，同年底又有李富春等人^④。(二)在國共合作期間，周恩來、尹寬、林蔚等三人代表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到里昂與國民黨總部代表王京歧商談國共合作問題。王京歧，浙江嵊縣人，民國十年因參加里大事件而被遣送回國，民國十一年重新到法國，他在上海準備出國時，曾訪謁孫中山先生於環龍路四十四號中國國民黨駐滬辦事處。中山先生當面指示王京歧到法國後聯絡同志組織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⑤。雙方達成協議，決定共青團員八十餘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積極進行國民黨旅歐支部的籌建工作。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國民黨駐歐支部在里昂召開成立大會，周恩來在會上發表演說，並當選為國民黨駐歐支部執行部總務科主任。其後在

^③周恩來與第三國際間的來往（包括經費問題），乃至中共與法共及胡志明之間的關係，始終曖昧不明，由於資料所限，本文不擬探討。但可參閱 Annie Kriegel, *Aux Origines Françaises du Communisme Chinois*, Preuves, 209-210, août-sept, 1968.; Nora Wang, *Den Xiaoping: The Years in Franc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2, (Dec, 1982), pp. 698-705.

^④〈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頁五六~五七。

^⑤吳琪，〈周恩來同志青年時代在法德兩國的革命活動〉，參閱〈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一四二。

執行部長王京歧回國述職期間，周恩來曾代行其職務⁹⁵。

(三)對外思想鬭爭

中共旅歐組織一旦建立，一方面出版刊物以學習和宣傳共產主義，一方面爲了影響與爭取廣大的華工與勤工生，因此不可避免地與當時已存在的一些團體發生思想上之鬭爭，甚至行動之衝突。其中最重要的鬭爭對象，早期是無政府主義者及公教青年會，後期則爲中國青年黨。茲分述如下：

甲、《少年》與《工餘》的對抗

「工餘社」是旅法華工和勤工儉學生中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巴黎組織的小團體，成立年月不詳⁹⁶，其主要成員有華林（李合林）、陳延年、陳喬年、陳澤孚、畢修勺、朱洗、孟稜崖、李卓等人⁹⁷。民國十一年一月十五日，該社出版了一種油印月刊——《工餘》，由李卓編輯，前後共出二十三期，歷時三年半，至民國十四年十月，始與另一無政府主義刊物《自由人》合併⁹⁸。無政府主義主張摒棄一切國家政權，主張絕對自由，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否認無產階級建立政黨的必要，並把工人運動限制在經濟鬭爭的範圍⁹⁹。因此與「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少年》，發生激烈的衝突。

《少年》創刊於民國十一年八月一日，編輯所設在巴黎十三區那家兼做黨團機關的小旅館裏，由後來加入少共的陳延年、陳喬年負責刻寫蠟板和油印。《少年》是月刊，紅色封面，十六開本，每期三十

⁹⁵《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七七。

⁹⁷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第四冊，頁二〇九。

⁹⁸吳琪，前引文，《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一四四。

⁹⁹同註⁹⁸。

⁹⁰胡華主編，《中國革命史講義》（北京，一九六三），頁四三。

餘頁，中間曾停刊過兩個月，民國十二年三月一日復刊出版第七號，改為二十四開本，四十二頁，通信處改為巴黎西郊華僑協社轉交。自第十號起又改為不定期刊⁹¹。

《少年》的主要內容在宣傳共產主義，論證中國走共產主義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也用許多篇幅與無政府主義作理論鬭爭。首先，周恩來（筆名伍豪）在第二號上發表〈共產主義與中國〉一文，指出：「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已有十年以上的歷史，他利用中國人的惰性和容忍，竟與一些思想墮落者結成了不解之緣。他們都自命為提倡科學的人，其實他們只會高談那空想的藝術。高談幾個「真」、「善」、「美」的名詞，論到實在的開發實業的方法，恐怕除掉毀壞大規模生產，反對集中制度外，竟無什麼具體主張，……無政府主義既這樣空洞，所以具有無政府思想的蔡元培，自認為無政府黨人的李石曾、吳稚暉輩一遇到當前的政治經濟問題，才會手忙腳亂，弄出與無政府主義相反的主張出來。」⁹²

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論爭的焦點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工餘》發表了很多反對工人階級進行政治鬭爭、奪取政權以及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的論說。針對這種情況，《少年》發表了〈一個無政府黨人和一個共產黨人的說話〉（第七、八、十、十一號連載）、〈什麼是無政府黨人的道德？〉（第十一、十二號連載）和〈工人與政治〉（第十號）等文章，對《工餘》的論點予以還擊⁹³。

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少年》第六號出版，周恩來發表〈俄

⁹¹《五四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一九五九），第二冊，頁三九。

⁹²伍豪，〈共產主義與中國〉，原刊《少年》第二號，收入《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頁二二三。

⁹³《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四〇。

國革命失敗了嗎？——質工餘社三泊君>一文，針對無政府主義者三泊在《工餘》第九號發表的〈俄國共產主義失敗之原因及其補救的方法〉一文中對俄國革命五年來成就的否定和對新經濟政策的批評，進行了反駁⁹⁴。

乙、《少年》對天主教的攻擊

在比利時有位雷鳴遠神父 (Père Vincent Lebbe)，曾於一八九五年來華，一九一二年出任天主教天津教區副主教，還創辦了天津「益世報」。他在中國停留多年，說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雷神父在布魯塞爾設立有「中國學生公教家庭」，以為勤工儉學生介紹工作、介紹入學或向富人募捐以救濟勤工儉學生等名義，拉攏勤工儉學生信仰天主教。雷鳴遠曾經領着他們向天主祈禱：「俄羅斯已經進入地獄了，請求天主使中國倖免於共產主義的災難吧！」希望「天主挽救中國」，使中國免遭革命的衝擊，把共產主義思想當做洪水猛獸加以撲滅⁹⁵。

雷鳴遠神父的救濟勤工儉學生和反共做法，自然觸怒了這一批宣傳共產主義的激進者。他所辦的「青年會星期報」，被認為「猖狂惑眾」，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出版刊物——《工餘》，同樣構成共產主義的宣傳障礙⁹⁶，都是打擊的對象。因此早在《少年》第二號，周恩來即發表〈宗教精神與共產主義〉一文，明白攻擊天主教，認為「宗教是人類中的一種毒藥」，共產主義者對此種「犧牲弱者庇護強者，長人依賴性，誘人容忍，錮禁思想的宗教深惡痛絕」⁹⁷。

⁹⁴ 同前註，頁四一。

⁹⁵ 參閱江澤民，〈參加留法比勤工儉學的回憶〉；陳崇山，〈雷鳴遠破壞勤工儉學運動〉。以上兩文俱見《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

⁹⁶ 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報告第一號，〈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二冊下，頁八四五。

⁹⁷ 伍豪，〈宗教精神與共產主義〉，原刊《少年》第二號，收於《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第三冊，頁二七九～二八四。

民國十二年的夏季，歐洲曾發生一起中國學生上書羅馬教皇的趣劇。有三十二名留法勤工儉學生聯名給羅馬教皇寫信，請求教皇批准原海軍艦長，寄居中國多年而又精通中國語言文字的神父若利葉等數人，到中國去創立本篤修會。經《赤光》（《少年》改名）披露雷鳴遠事前寫給那些中國學生的密信，始知中國學生上書羅馬教皇之事，只不過是神父雷鳴遠一手策劃和導演的結果。《赤光》以〈羅拜在羅馬教皇腳下的中國學生〉為題，唾罵這些因「不堪生活壓迫而跑到法、比資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神父雷鳴遠跟前討飯吃的中國學生」是「無恥之尤」，並辱罵雷鳴遠為「無恥的宗教徒」，認為他的假借「留歐中國學生名義」上書教皇，是一件「令人髮指」的事情⁹⁸。

丙、《赤光》與「先聲」的論戰

民國十三年二月一日，理論的《少年》改組為實際的《赤光》，標榜唯一的目標在「反軍閥政府的國民聯合，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⁹⁹。周恩來為《赤光》撰寫的文章甚多，平均每期刊載四、五篇，主要在揭露帝國主義侵略擴張和軍閥禍國殃民的罪行，在此值得一述的是參加了《赤光》與「先聲」的論戰。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曾琦、李璜、何魯之、張子柱、李不韙、胡國偉等人在巴黎成立了中國青年黨，是即國家主義派。他們以「先聲」週報（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創刊）為據點，標榜反共、反蘇、反對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等口號，而與共黨展開論戰。茲將周恩來在「赤光」上所發表的相關文章篇名及主要內容列舉如下：

⁹⁸《赤光》第三期（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頁八～九。

⁹⁹《赤光的宣言》，《赤光》第一期（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頁一。

期別	署名	篇名	主要內容
三	伍豪	救國運動與愛國主義	指出「救國運動」與國家主義派狹義的愛國主義運動本質有別。
七	伍豪	實話的反感	嘲弄一般國家主義者有時因過分愛國，便要抹煞真理。
八	恩來	航空學會的害羣之馬	指出周培超（周道）為張作霖的走狗當翻譯
九	恩來	再論中國共產主義者之加入國民黨問題	答「先聲報」胡瑞圖、吳樵甫、威重三君針對國家主義派攻擊國共合作的論點加以反駁。
九	恩來	共管中國江河的新形勢	指責自稱愛國的國家主義派老強調反蘇，對列強共管中國無動於衷。
十	恩來	為周道事答湖南學生會書	答覆湖南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會刊於「先聲報」的公開信。

此外，林蔚撰〈批評曾琦君底神聖聯合與統一前敵〉（七期）、〈到底不愧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九期），任卓宣撰〈什麼叫造謠中傷〉（九期）、〈你們就會學像了曾琦〉（十七期）、〈哈哈！同床異夢！〉（十八期）、〈斥反革命的青年黨人對於孫中山之矛盾論〉（廿八期）、〈斥反革命的國民黨右派份子對於孫中山之背叛行為〉（廿八期），輝暉撰〈青年黨之與教徒軍閥和帝國主義〉（十七期），少元撰〈好利害的反革命報紙啊！〉（十七期），鄧小平（希賢）寫〈請看反革命的青年黨之大肆其捏造〉（十八期）、〈請看先聲週報之第四批造謠的新聞〉（廿一、二期），愚甫寫〈青年黨才是陳炯明在法所設立底反革命分部啊！〉（十八期），肇樞撰〈你們就是「反革命」和「軍閥的走狗」〉（廿三期）等，都是與「先聲」直接論戰的激烈文章。經常為「先聲」執筆的有曾琦、李璜、何魯之、張子柱、

黃日光、周宗烈、鄧孝情、王建陌、胡瑞圖、段慎修、胡瑞榮、梁志尹、林秉照、胡國偉等人，雙方由思想上的短兵相接，逐漸引起行動的衝突，最後演成流血鬭爭^⑩。

綜上所述，周恩來在《少年》與《赤光》兩刊的對外論戰中，都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在蔡和森被法國當局遣送回國後，周無疑是第一號的共產主義理論家，其次是任卓宣，至若鄧小平等其餘諸人似不值深論矣！

五、結 語

周恩來是一個典型的五四青年，他積極參與學校活動，辦刊物，組織學會，並關心國事，進而熱烈從事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

學生時代的周恩來，雖然認識李大釗，讀過河上肇的書，並轟轟烈烈的參加過五四運動，但在赴歐之前，他的活動舞臺侷限於天津，與「南陳北李」沒有直接師生關係，無緣積極參與他們所主持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或社會主義研究會的工作，所以當時的周恩來和一般激進青年一樣，只能算是一個潛在的馬克思主義信徒（Potential Marxist）。他的思想之轉變，乃至成爲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徒，應是抵歐一年期間內研究比較各種主義後的選擇。所以他自稱「先入黨，後信仰」，坦承「認清 cism 甚晚」^⑪。

^⑩關於中國青年黨與共黨論戰衝突的詳情，請參閱：

胡國偉《巴黎心影》，臺北菩提文藝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

李 璜《學鈍室回憶錄》。

曾 琦《曾慕韓（琦）先生年譜日記》。

^⑪「西歐的『赤』況」，原載「覺郵」第二期，收於《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頁二七五。

惟周恩來雖然到歐洲比蔡和森、李維漢、趙世炎等人爲遲，認識共產主義也較晚，但憑他個人的優越條件（英文好，文筆不錯，記憶力強，富調和性，具組織能力），卻很快一躍而爲旅歐學生界與中共黨團組織的重要領導人物。他天生是一個政治運動家、組織家，也是難得的宣傳家和理論家，因此無論在參加勤工儉學運動，發展中共組織，或共黨對外思想鬭爭方面，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有人把留法歸來的中共幹部分爲三派，像蔡和森、陳毅、李立三等屬於衝鋒陷陣的盲動派；鄧小平、聶榮臻是實際派；周恩來自稱性格上「多畏多慮」^⑩，其人冷靜、溫和，所以是所謂的穩健派。衡諸韋伯（Max Weber）的政治領袖三型——理智（rational）、傳統（traditional）、魅力（charismatic）^⑪，周恩來應屬於理智型。不論在旅歐時期的活動或回國以後所從事的工作，周恩來都能把握「因時制宜」的原則，謹慎應付，所以他不像蔡和森、陳毅等人很快遭到法國當局的驅逐，也沒有像任卓宣等人日後在巴黎瑣瑣入獄。回顧周恩來的一生，大多在從事危險的政治活動，但不管在與對手的談判過程中，或歷經共產黨內無數次的鬭爭風險，每次都能全身而退，倖免於難^⑫，多半應歸功於上述他的這些政治特質。

（原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期，民國七十四年六月，臺北）

^⑩同前註，頁二七一。

^⑪Raymond Aron, *Les E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 (Paris, Gallimard, 1967), tome III, p. 522; Raymond Aron (Translated by R. Howard & H. Weaver), *Main Currents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Durkheim, Pareto, Weber* (Penguin Books, 1979), Vol. 2, p. 209.

^⑫若干研究周的學者如李天民等，認爲周恩來向來沒有爭取「第一繼承人」的想法，此或爲其能「倖免於難」的原因！

張繼與勤工儉學

一、前 言

二、張繼的生平簡歷

三、張繼之迎拒社會主義

四、從「留法儉學會」到「華法教育會」

——兼論洪誠舞弊案之處理

五、法國行——對勤工儉學的實地考察

六、挺身而出——參與華工請願

七、結 語

一、前 言

張繼是個革命家，清末留日，早期追隨中山先生，從事革命工作，其一生對於革命事業的貢獻，論者已多，非本短文所欲贅述。

張繼留日期間，因受日人幸德秋水^①等之影響，信仰無政府的社

^①幸德秋水原名幸德傳次郎，一八七一年生於日本高知縣。少年時代即參加自由民權運動。一八八七年因觸犯保安條例，被逐出東京，後師事於中江兆民，思想上大受其影響。一八九二年，任自由新聞、萬朝報等記者。一八九三年以後開始涉足社會主義運動。一九〇一年，與堺利彥、安部磯雄、片山潛等組織日本社會民主黨，未幾即被禁止。一九〇五年赴美，思想逐漸傾向無政府主義，一九〇七年由美返國，在社會黨第二次大會中，高唱直接行動論，因而與主張議會主義的片山潛發生歧見終至分裂。一九一〇年五月廿五日，發生「大逆事件」，幸德被指為主謀，於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與同志十一名被處死刑。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紀怪物帝國主義》、《社會主義神髓》等。參閱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民國六十四年七月），頁三四八～九。

會主義，在東京與劉師培（申叔）共同發起「社會主義講習會」；其後赴歐，與創辦「新世紀」（Le Siècle Nouveau），倡導無政府主義的李煜瀛、吳敬恆遊，對無政府主義有更深之體認。民元後，追隨李、吳等人提倡勤工儉學，鼓勵學子赴法工讀，此亦無黨「互助論」的一種實踐。

惟張繼與劉師培、李煜瀛、吳敬恆相較，其於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涵養，並非天才橫溢之理論大師，而毋寧是較重實踐的力行者。他對勤工儉學的發起與倡導，亦復力行多於言教。惜張繼本人所遺留之資料不多，致事蹟淹沒不彰。本文之作，旨在補《張溥泉先生全集》、《補篇》、《續篇》之不足，對其與勤工儉學的一段關係，做一較完整而有系統之研究。

二、張繼的生平簡歷

張繼^②，字溥泉，先世山東，後遷河北滄縣。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八月三十一日（陰曆七月十八日）出生^③。七歲入塾，十六歲就讀保定蓮池書院，從吳汝綸（摯甫）攻經史。十八歲隨日人中島裁之赴日本游學，次年以拳亂回國。旋復渡日入早稻田大學，攻政治經濟，除

②有關張繼的生平，主要請參閱徐文珊撰：〈張溥泉先生年譜〉（收於《張溥泉先生全集》及《續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一冊（傳記文學雜誌社）；Howard L. Boorman（包華德）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 I, pp. 15-20.

③有關張繼的生日，徐文珊在《全集》及《續編》的年譜均作陰曆七月八日，此與張繼自撰回憶錄的七月十八日有出入（見全集頁二三〇），諒係校對之誤。「近代中國」雜誌社所舉辦之「張繼先生百年誕辰口述歷史座談會」及包華德所編之《民國名人辭典》，均採八月三十一日，即陰曆七月十八日。

照例上課外，專在圖書館翻閱中江篤介等所譯之《法蘭西大革命》、《民約論》等書，革命思想勃然以興^④。

張繼的革命歷程，頗為曲折，初入勵志會，繼與秦毓鎰等組青年會，一九〇一年與秦力山等創辦國民報月刊，昌言革命排滿；又組興亞會，主張中日同舉革命。二十一歲（一九〇二）始至橫濱識孫中山先生，又識章炳麟。同年，赴滬辦作新社，繼又返日。次年（一九〇三），以與鄒容剪留學生監督姚某髮辮，被逐回滬。與鄒容、章炳麟、章士釗等游，董理蘇報。及蘇報案發，改辦國民日報以繼之。一九〇四年，赴長沙，任明德學堂西洋史教習。十月，黃興舉義失敗，同走滬，以萬福華刺王之春案被捕。出獄，赴日，任留學生會館總幹事。一九〇五年八月，同盟會成立，任司法部 判事兼民報發行人及主編人。一九〇六年，遊巴達維亞、泗水、新加坡，旋北赴煙臺，冬末赴日。自清廷下詔預備立憲後，梁啟超等在日本東京組織政聞社，從事響應，聲勢甚盛，張繼到會，以日語厲聲斥「馬鹿」，又呼喊打，羣起響應，梁氏逃走，其勢瓦解^⑤。

一九〇七年，章炳麟因病辭民報事，張繼復任編輯，與日人幸德秋水、大杉榮、堺利彥、宮崎寅藏交，頗信社會主義。一九〇八年赴巴黎，參與吳敬恆、李煜瀛等所辦之新世紀週刊，一度至鷹山共產村實驗無政府主義。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經南洋歸國。民國元年，任同盟會本部交際部主任、臨時參議院議員。與李煜瀛、吳敬恆等共同發起留法儉學會，並為進德會會員。同年八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

④《張溥泉先生全集》（中國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出版，民國四十年十月），頁二三三。

⑤黃季陸，〈紀念張溥泉先生百年誕辰——個熱情純真的革命先進〉，收於《張溥泉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民國七十年八月），頁一。

黨，任參議。國會議員選舉，當選為參議員。二年四月，國會成立，當選為參議院議長。七月，以討袁去職，冬，渡日本。三年，赴歐，歷游意、法、英、美等國；五年四月，返滬。袁死，國會復會，與褚輔成等成立益友社。六年八月，自滬侍國父赴粵護法，任護法軍政府駐日代表。七年，返粵。八年，居滬，冬再赴歐考察，歷法、德、西班牙等國；翌年夏返國，任軍政府顧問。十年，任中國國民黨特設廣州辦事處幹事長、中國國民黨宣傳部長、北京支部部長。十一年，奉國父命赴保定、洛陽，答聘曹（錕）吳（佩孚），並赴北京與蘇俄來華代表越飛（Adolf A. Joffe）聯絡。十二年，奉國父命赴奉，說張作霖。

民國十三年一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當選中央監察委員；六月，提案彈劾共產黨。十四年七月，國民政府成立，任委員，未到任。十一月，與林森、鄒魯等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北京西山國父靈前，決議開除共產份子，移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上海。十五年三月，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滬，當選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十六年，任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並再訪日本。十七年返國，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司法院副院長、北平臨時政治分會主席。十八年，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當選中央監察委員，兼國民政府委員及蒙藏委員會委員。十九年，赴日答謝犬養毅等來華參加國父奉安禮。二十年，立法院長胡漢民去職，當選立法院長，辭不就。二十一年一二八事件起，政府遷洛陽辦公；三月任西京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二十二年二月，任中國國民黨華北辦事處主任，二十六年兼任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等職。二十八年兼任中蘇文化協會四川分會會長。又任中央慰勞團總團長。二十九年，任國史館籌備委員

會主任委員。三十四年，出席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連任中央監察委員。三十五年還都籌備國史館；冬，出席國民大會。憲政開始，任憲政實施促進會副會長。三十六年一月，就任國史館館長。十二月十五日病逝南京，享年六十六歲。

三、張繼之迎拒社會主義

張繼在辛亥革命前曾數度赴日，因讀《法蘭西大革命》、《民約論》等書，而生革命思想；又與秦力山、章炳麟、鄒容等革命同志交往，遂從事辦報等革命工作。張繼是個富有正義感，嫉惡如仇，「暴徒」型^⑥的革命人物，故在組織內曾因「贖金事件」^⑦，而與革命領袖有所齟齬，對外則有錦輝館棒打「文妖」^⑧及參加留東學界拒款運動^⑨之舉，凡此都可說明他敢愛敢恨的激烈性格與燕趙男兒慷慨悲歌

⑥ 梁寒操，〈中國革命黨的典型人物〉，〈張溥泉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頁五七。

⑦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清廷以革命風聲，震撼中外，乃命駐日公使楊樞向日政府交涉，要求驅逐中山先生出境。行前，日外務省設宴餞行，並贈程儀五千元，東京股票商鈴木久五郎亦餽贈一萬元，藉示好感。中山先生除留二千元作民報維持費外，餘皆持赴南洋。中山先生接受日政府及私人餽金事，未經衆議，故離日未久，會員章炳麟、陶成章、宋教仁、張繼等大起非議，竟將民報社所懸先生像除下，其後復提議免去先生總理職，而以黃興繼任。張繼甚而與獨排衆議的劉揆一大打出手。參閱〈國父年譜〉（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民國五十八年出版），上册，頁二二四；劉揆一〈黃興傳記〉（臺北帕米爾書店，民國四十一年出版），頁一六。

⑧ 一九〇七年十月十七日，梁啓超等三百餘人在東京開政聞社成立大會，革命黨人張繼等闖入破壞。詳情見民報第十七號（太炎撰「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

⑨ 留東學界為蘇杭甬鐵路借款事，於一九〇七年冬曾集會多次，張繼在會上慷慨陳言，謂路礦譬之麵包，人口所不可缺少者。中國之路礦為政府所壟斷，故其與我四萬萬同胞麵包之權操之政府，今為人民謀麵包計，非直接運動人民，使之知麵包之權不可操諸人始可。其後張繼反對招股之議，認為此乃「以有限之金錢，填無限之慾海」，幾與衆人大打出手。參閱神州日報，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四日、十二日。

之豪氣。

張繼後來對社會主義發生濃厚興趣，其轉變原因，一為與日本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大杉榮、堺利彥等的廣泛接觸往來^⑩，一為革命陣營本身的分裂，使他誤認為「三民主義不是世界上最高的主義」，而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也可以解決社會問題，所以「腦筋又變」^⑪。張繼對社會主義發生興趣，可能始於一九〇三年^⑫。按宋教仁譯述宮崎民藏對歐美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分類，將社會主義區分為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與土地均有主義三大派^⑬，張繼服膺的是無政府主義，甚至是破壞的無政府主義。

張繼並非先知先覺型的理論家，而毋寧是個身體力行的實踐者。他對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沒有重大創獲，其主要貢獻為譯介工作。首先，他將幸德秋水譯自意大利無政府黨人馬拉疊斯達(Erriico Malatesta, 1850-1932)的《無政府主義》(Anarchia)一書，轉譯成中文。是書有章炳麟作序^⑭，其目錄如次：(1)無政府主義及無政府黨之精神；(2)法國之無政府黨；(3)西班牙之無政府黨；(4)意大利之無政府黨；(5)

⑩張繼係透過北一輝之介紹，認識幸德秋水。據北一輝回憶：「不肖之介紹幸德秋水為禍，張(繼)君之思想意外地熱衷於無政府主義」(《支那革命外史》，東京內海文宏堂，昭和十三年，頁四九)。張繼、章炳麟曾有致幸德秋水書，內云：「拜啓。明日午後一時往貴宅敬聆雅教，乞先生勿棄。」(楊天石編，〈社會主義講習會資料〉)。〈張繼回憶錄〉自述：「與幸德秋水、大杉榮、堺利彥來往，尤佩服秋水學問。」(《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二三六)。

⑪張繼，〈在西安勞動營紀念週訓詞〉，〈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一九三～四。

⑫洪德先，〈劉師培與社會主義講習會〉，〈思與言〉，二十二卷五期(民國七十四年元月十五日)，頁二八。

⑬朱法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民報」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五十，民國七十四年六月)，頁一七六～八。

⑭太炎，〈無政府主義序〉，民報(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民國五十八年影印版)第二十號，頁一二九～三〇。

德意志之無政府黨；(6)奧大利、匈牙利之無政府黨；(7)瑞西之無政府黨；(8)英國之無政府黨；(9)美國之無政府黨；(10)結論¹⁵。至於譯書時間，各家說法頗有出入¹⁶，貝馬丁 (Martin Bernal) 發現張繼登在民報的目錄，與馬拉疊斯達的原著不同，故認為張繼於一九〇三年先譯《無政府主義》的日文摘要，再於一九〇七年譯完全冊¹⁷。這是比較合情合理的解釋。張繼翻譯《無政府主義》一書，主要仍以革命為前提，因為他說：「夫欲建設，必先大破壞。無政府可謂達於破壞之極點矣。今之中國正值破壞時代之初，而吾編譯是書，想必能受吾同胞之歡迎，藉其手以剷除此野蠻奴隸世界！」¹⁸

除譯介工作外，張繼並於一九〇七年六月底與劉師培（申叔、光漢）等人發起「社會主義講習會」，這是近代我國最早的無政府主義組織，並發刊「天義報」為其機關報。「社會主義講習會」以張繼、劉光漢署名，在「天義報」、「民報」、「新世紀」陸續刊登徵求會員廣告，並明白揭示其宗旨曰：

「近歲以來，社會主義盛行於西歐，蔓延於日本，而中國學者則鮮聞其說。雖有志之士知倡民族主義，然僅辨種族之異同，不復計民生之體裁，即使光復之說果見實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鑒於此，又慨社會主義之不明，搜集東西前哲各學術，參考互驗，發揮光大，以饗我國民。復慮此主義之

¹⁵ 民報，第十號，廣告。

¹⁶ 洪德先認為，張繼於一九〇三年將《無政府主義》一書，轉譯成中文，於上海出版。（參閱註¹²）；〈張繼回憶錄〉則將此事置於一九〇七年條（參閱全集，頁二二六）。

¹⁷ 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Cornell Univ. Press, 1976), p. 204, note 27.

¹⁸ 俄事警聞，廣告，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不能普及也，故創設社會主義講習會，以討論斯旨。」¹⁹

「社會主義講習會」與幸德秋水等人所成立的「社會問題研究會」性質相近，係一以演講活動為主的組織，沒有嚴格的入會規定，有興趣者只須將姓名、住址寄交該會通信所即可。屆時開會，即通知參加。

「社會主義講習會」經張繼與劉師培兩人連月的奔走籌劃，於八月三十一日假東京牛込赤城六町清風亭召開第一次大會，參加者多達九十餘人。先由劉師培宣布開會之宗旨，「不僅以實行社會主義為止，乃以無政府為目的」，並舉歷史、心理、科學三證，闡明學理上無政府主義最為圓滿。次由張繼報告，此次開會，在於證明無政府主義²⁰。然後延請幸德秋水闡釋無政府主義思想之真諦。幸德首先說明無政府主義及馬克思主義之異同，認為二派「雖主義大略相同，而行事之手段則相異」，因為「無政府主義欲為勞動者謀幸福，必先盡去資本家，並顛覆一切政府。政府由歷史上證之，有功於人民者甚少，不過以暴力加於人民而已。」²¹這篇演講對於「社會主義講習會」同人的思想，具有很大的澄清作用。因為，早期國人一直無法明確分辨，無政府主義及馬克斯主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²²。

以後歷次大會的進行方式，大致與第一次大會雷同。九月十五日「社會主義講習會」假江戶川亭舉行第二次大會，到會者約百餘人。先由劉師培演說中國民生問題，陳述農民之疾苦及中國曠土不耕、穀不敷食之狀況，並推論貧民棄農就工之由，致受作工之苦。次由張繼介紹日本堺利彥之學術宗旨，即請堺氏演說，由張繼翻譯，歷時二小

¹⁹《天義》（影印本），第三卷，頁五七；「民報」，第十五號，社會主義講習會廣告。

²⁰社會主義講習會第一次開會記事，《天義》，第六卷，頁一五二～四。

²¹「新世紀」（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世界社重印本），第二十五、二十六號，頁四。

²²洪德先，前引文，頁三三。

時。最後由張繼演說自由結合之益，並宣布散會²³。

「社會主義講習會」成立之初，計畫每星期集會一次，故於九月二十二日仍假清風亭召開第三次會議。是日天雨，又為中國中秋節，故到者僅數十人。由於主講人山川均因事未到，故改為國人自由演講，先後發言者有劉師培、章炳麟、景定成等人，另江西湯君謂無政府主義雖係高尚，然今日歐美尚未實行，恐終偏於空論，不若僅言民族主義。張繼聽畢，即起而解釋湯君之疑，力陳世界民生之苦及經濟界之趨向。並言各國民黨，多贊成無政府主義，以與政府為敵，必有實行之一日²⁴。

「社會主義講習會」雖原則上每星期集會一次，但根據記錄顯示，並未每星期如期集會。十月六日，該會召開第四次會於清風亭，是日大雨，到會人數亦不多。主要補請日人山川均演說，次由張繼等發言，大抵均辨明排強權與排外不同²⁵。

此後，「講習會」改為每月之第二、四星期各集會一次，會名也改為齊民社，但「社會主義講習會」的名稱仍繼續沿用²⁶。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之第二星期，「社會主義講習會」開會於清風亭。首由劉師培報告，次由張繼演說南洋羣島華民之苦及中國革命方法。再由劉師培演說中國經濟界之變遷，最後由日本大杉榮演說巴枯寧聯邦主義。十一月之第四星期，「社會主義講習會」復開會於清風亭，首由劉師培報告，次由張繼演說無政府黨大會事，次由大杉榮續講巴枯寧聯邦

²³ 社會主義講習會第二次開會記略，〈天義〉，第八、九、十卷合冊，頁二六四～六。

²⁴ 社會主義第三次開會記，同前註，頁二六六～七。

²⁵ 社會主義講習會第四次開會記略，同前註，頁二六七。

²⁶ 楊天石編，「社會主義講習會」資料，參閱〈中國哲學〉（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第一輯，頁三七四。

主義，最後由喬宜齋演說基督教中無政府共產主義²⁷。

十二月第二星期午後，「社會主義講習會」開會於清風亭。首由汪公權報告，次由日本山川均演說，再次由張繼演說，並報告無政府黨本部情況。十二月第四星期午後，「社會主義講習會」復開會於清風亭，首由張繼報告，次由大杉榮演說，到者約六十人²⁸。

從上述有紀錄可查的幾次活動可知，「社會主義講習會」的兩位最活躍人物，無疑是劉師培與張繼。張繼所扮演的是聯絡人、主持人、演講者、翻譯、參加討論者等多重角色，其於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建構雖不若劉師培重要，但對於會務的推進，卻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講習會」分「無政府主義及社會主義學術」、「無政府黨歷史」、「中國民生問題」、「社會學」等幾個科目。中國方面的講演者除張繼、劉師培外，尚有何震、章炳麟、景定成、喬義生、汪公權、陶成章等人，講題可考者有：(1)中國民生問題；(2)憲政之病民；(3)自由結合之益；(4)中國財產制度之變遷；(5)國家學之荒謬；(6)湖北、江蘇農民之苦況；(7)歐美社會黨之分派；(8)無政府之利益；(9)排強權與排外不同；(10)南洋羣島華民之苦及中國革命方法；(11)無政府黨大會；(12)中國經濟界之變遷；(13)基督教社會主義；(14)法律出於宗教說；(15)人之根性惡。日本方面的講演者除幸德秋水外，有堺利彥、山川均、大杉榮、宮崎民藏等，講題可考者有：(1)人類社會之變遷；(2)巴枯寧聯邦主義；(3)代議政治與革命；(4)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派別²⁹。

「社會主義講習會」先後約舉辦十次演講會，茲將歷次有關資料

²⁷ 「社會主義講習會」記事，〈天義〉，第十一、十二卷，頁四二〇。

²⁸ 「社會主義講習會」記事，原載〈天義〉，第十三、十四卷，另收入楊天石編，「社會主義講習會」資料，參閱〈中國哲學〉，第一輯，頁三九五。

²⁹ 楊天石編，「社會主義講習會」資料，〈中國哲學〉，第一輯，頁三七四～五。

表列如下：

次別	日 期	場 地	出 席 人 數	主 講 人	張 繼 角 色
1.	一九〇七、八、三十一	清 風 亭	九十餘人	幸德秋水	報 告
2.	一九〇七、九、十五	江戶川亭	百餘人	堺利彥	主持人、介紹、翻譯
3.	一九〇七、九、二十二	清 風 亭	數十人	自由發言	演 說
4.	一九〇七、十、六	清 風 亭	二十人	山川均	發 言
5.	一九〇七、十一	清 風 亭	不 詳	大杉榮	演 說
6.	一九〇七、十一、二十四	清 風 亭	不 詳	大杉榮	演 說
7.	一九〇七、十二、八	清 風 亭	五十餘人	山川均	演 說
8.	一九〇七、十二、二十二	清 風 亭	六十人	大杉榮	報 告
9.	一九〇八、一、二	清 風 亭	不 詳	山川均	
10.	一九〇八、三、二十	清 風 亭	不 詳	宮崎民藏	已離日

資料來源：〈天義〉第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各卷；

楊天石編，「社會主義講習會資料」，〈中國哲學〉，第一輯；
洪德先，〈辛亥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師大碩士論文、
民國七十三年）；

洪德先，〈劉師培與社會主義講習會〉，〈思與言〉，二十二卷
五期。

一九〇八年一月二日「社會主義講習會」召開第九回大會後，適因日本「金曜演講會」^⑩成員，為公開演講遭日本警察取締，而與警方發生衝突。堺利彥、山川均、大杉榮等人均遭拘捕，是為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屋上演說事件」。張繼是位活躍於「金曜演講會」的中國人，於事件中因為態度激烈，也遭到日本警方通緝^⑪。日警追捕甚急，張繼乃走京都，經由南洋，乘船赴法，從此「社會主義講習

^⑩為日人幸德秋水、堺利彥、山川均等人所發起，每週金曜日（星期五）集會，除社會主義外，旁及無政府主義，無論男女，均可自由前往聽講，並可質疑問題。參閱〈天義〉第六卷，頁一五五。

^⑪洪德先，〈辛亥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師範大師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三年六月），頁一一五。

會」少了一員健將。

張繼到巴黎後，最初參與李煜瀛、吳敬恆等所辦之「新世紀」工作，六月爲竟無政府主義之用，至法國東北部沙列威耳(Charle-Ville)附近之鷹山共產村(Colonie d'Aiglemont)，與七、八國同志實驗「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敝衣裸脛，每朝隨一俄人，以馬運菜到附近鄉間，鳴喇叭求售，如是者三月^②。張繼試驗無政府主義理想的結果，覺得根據當時中國客觀的條件，政治不足以維持安寧增進幸福；財產不足以滿足國民生活；而國家內外憂患叢生，人民的精神與物質頹落備至；經濟的生產分配，耗竭凌亂，莫之名狀^③。因此如夢初醒，認爲這種飄蕩浪漫的生活「雖不是落伍，但總是空想的」，甚至「拿國家民族作兒戲」，終於幡然改圖，立即回國，傾心歸之於三民主義，追隨中山先生共同致力於國民革命工作^④。

四、從「留法儉學會」到「華法教育會」 ——兼論洪誠舜弊案之處理

民國元年四月^⑤，李煜瀛、吳敬恆、蔡元培、張繼等人，「擬興苦學之風，廣闢留歐學界，俾青年子女得吸收新世界之文明，而進益於社會」，遂發起設立「留法儉學會」於北京。根據會約「留法儉學會」乃一自由傳達之機關，而非章程嚴密之組織，其宗旨在「納最儉

^② <張繼回憶錄>，<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二三六。

^③ 劉宗琮，<從寒山寺碑談到張溥泉>，<張溥泉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頁一〇五。

^④ 徐文珊，<北方之強一張繼傳>，（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七十一年六月），頁九六。

^⑤ 楊愷齡撰，<民國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九年五月），頁二八。

之費用，求達留學之目的」，凡年滿十四歲，欲自費留學而每年至少可籌五、六百元者，皆得為該會之同志。該會對於會員既不助資，亦不索償，唯有以言論或通信指導旅行、介紹學校等之義務。「留法儉學會」曾附設預備學校於北京，為學生補習法文，學生經由此校而赴法者約在百人之內。除北京「留法儉學會」首開風氣外，四川亦有朱芾煌、吳玉章等所發起之「四川儉學會」，設預備學校於少城濟川公學。經由此一線索或其他同抱儉學宗旨赴法者，亦有四十餘人³⁶。儉學會之發起，並不以留學法國為限，故吳敬恆、李煜瀛、張繼等人復發起「留英儉學會」於上海，彼此相通，廣為宣傳。

儉學會除「以節儉費用，推廣留學，而尚勞動樸素，養成勤潔之性質」外，亦含有「進德修身」和「整飭世風」之意，此與李煜瀛、吳敬恆等人所發起之「進德會」、「八不會」實有異曲同工之處。儉學會有誠約五項：不狎妓、不賭博、不吸煙、不飲酒，不為一切傷生耗財之事，與「進德會」所強調的個人進德修身項目大同小異，而儉學會的主要發起人如吳敬恆、蔡元培、張繼、李煜瀛等，亦同樣是「進德會」的重要會員。

及歐戰發生，法國人工缺乏，李煜瀛等人進而於民國四年夏發起「勤工儉學會」，以「勤於作工，儉以求學，以進勞動者之知識」為宗旨，並與法人共同組織「華法教育會」以為推動，共謀學生出國與謀工之便利。但由於「勤工儉學」所要求的條件比「儉學會」更寬更鬆，使得以後之赴法留學不僅產生「量變」，而且加上「質變」，製造不少糾紛與困擾。

從儉學到勤工的幾位主要言論鼓吹者，無疑是吳敬恆、李煜瀛、蔡元培與汪精衛。他們的主張和演說，經常透過《東方雜誌》、「民

³⁶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二十六年版），頁八八。

立報」、「時事新報」等管道，廣為流布，不僅發生全國性的影響，而且本身也因而在青年當中造成極大的魅力。張繼不是這方面的理論專家，在他的全集中少有片紙隻字談及，但他卻是個有力的支持者。他覺得「中國事事往往只要掛好招牌而不求實際」，故主張「要坐而言起而行的才，不要高談闊論的怪物」³⁷。這一點與李煜瀛、吳敬恆的作風顯著不同。他平常對勤工儉學着墨不多，但基本上，他以爲「工作係有絕對的價值，並非只是爲自己作工，實係爲中國作工，爲世界人類作工」³⁸，充滿世界主義的色彩，仍不脫無政府主義的論調。再者，他對於勤工儉學抱樂觀態度，認爲勤工儉學，即真正之德謨克拉西主義³⁹。

華法教育會成立後，國內各地也紛紛成立分會，張繼出任上海分會會長，副會長爲法國領事官魏武達（Auguste Wilden），評議員二人，一爲法國公立學校校長高博愛，一爲四川代表吳玉章，幹事二人，一爲法國特派駐華管理華工委員蘇榮理，一爲留法儉學會代表洪誠⁴⁰。民國八年在張繼出國考察前，曾明快果斷的處理了一件會內職員的舞弊案，不僅爲張繼的「嫉惡如仇」個性提供另一有力證明，亦爲整個勤工儉學運動史留下一段佳話。

民國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時事新報」刊出第四次赴法儉學生四十九人的一件公函，指稱上海留法儉學幹事洪誠（秉端）有藉勤工儉學欺詐漁利之行爲，其具體事實爲：

(1)代購船票，另索飯錢，中飽約在千八百元左右；

³⁷ 張繼，〈論英女現兒書二〉，〈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一一二。

³⁸ 〈旅歐週刊〉，第二十九號（一九二〇、五、二十九），頁三。

³⁹ 同前註。

⁴⁰ 〈華法教育會之組織〉，「時報」，一九一九年八月九日。

(2)代領護照，多收印花稅；

(3)代換法郎，剋扣兌價；

(4)巧立名目，冒收捐款^⑪。

翌日，「上海晚報」也以醒目標題——「良心呀！滅絕天良的洪誠，死絕良心的洪誠」，宣布洪誠三大罪狀如下：

(1)高抬船票價錢；

(2)剋扣法郎換價；

(3)私收華法教育會捐款並其他種種欺騙行為^⑫。

洪誠閱報後，即致函「上海時報」，對各項指控有所辯證^⑬。

上海留法儉學會因連日來接到許多學生責問為買船票、領護照等費與本需之款不符事，故由該會本屆赴法會員徐炳元、唐元梁、呂鳳蟾、陳祖堃、劉之謀、柳子賢等人發起，於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假座北四川路青年會童子部開會討論。到會者有張繼、朱少屏（寰球中國學生會總幹事）及本屆赴法學生百數十人，屆時由張繼任主席，因主角洪誠尚未到會，遂由主席派二人至全安客棧請洪君來會報告經過情形。等候中，主席張繼先行報告，略謂：「留法儉學會之發起在於民國元年，弟亦為發起人之一，其宗旨專為多送學生至法留學。但法國生活程度甚高，故儉學會亦即為經濟困難之學生而設。若說儉學會從中取利，則全無其事，何圖今日有此種奇異之事發現。今當將余所知之事及接得各學生來函責問之事為諸君報告之。洪秉端君，余初毫不相識，後由李石曾君介紹，謂洪君對於留法儉學會甚為熱心贊助，

^⑪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十月），頁四七〇～一。

^⑫〈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四七三。

^⑬同前註，頁四七二～三。

外面與法人交際亦甚熟悉云云。但李君並無提及委託洪君辦理上海留法儉學會，洪君亦未曾說及李君託渠創辦上海留法儉學會。後來不知何故，洪君個人竟發起組織上海留法儉學會，自任爲上海留法儉學會代表。其時余因觀其甚能辦事，故未曾追究。後接得『媚南』號船上學生來信，謂洪君甚不可靠；船費每人本只一百二十元，而現在洪君又索收十八元飯錢；至船上詢之船主，謂並無其事，請余調查云云。余接信後，遂往見法國總領事，詢問究竟船費多少？渠亦謂此次『盎脫雷篷』（André Lépon）號五十人，每人多收費三十八元，『媚南』號七十人每人多收費十八元，共計三千餘元，全數退還。現已將此項款共兌二萬二千餘法郎滙至法國。余先弗發表者，因欲使洪君改過。現洪君尚不承認，故不得不爲諸君一述也。至於每人收會費二元，章程本有。又收公費五元，則並無其事。護照費法國本免收，惟中英有印花費，如洪君多收，望諸位向渠索取。故今日之會，其宗旨專爲使洪君將所有多收各項費用完全交清，然後許洪君脫離關係赴法云。」

④ 這一席話，寬厚中仍帶嚴詞詰責之意，且證據確鑿，事實俱在，有如法廷斷案，對洪誠極端不利。

張繼說畢，適洪誠到會，遂請其登臺報告經手各種情形。洪君辯稱，「余今日到此與會甚喜，蓋可藉此表明余之心迹，並所有辦事之困難及余之苦衷爲諸君一述。第三屆四川留法學生六十人來滬時，適在抵制日貨風潮最烈中。但除乘日船並無他船，故均暫住於南洋公學，費用每日每人至少五、六角。是以護送員吳幹君焦急萬分。託余代爲想法有無法國船。遂同至法國郵船公司商酌四、五次，亦未蒙答應。此時吳君之焦急不可言狀，更有學生爲余云：無論船艙之好否，

④ <留法儉學討論會紀事>，「時報」，一九一九年九月廿五日，同前註，頁四七四～五。

總望余想法，即僅立錐之地亦所情願。後余用盡幾許心機、幾許精神，始蒙應許四等艙位百人，並每位均有床褥等物。如此余想必可告無罪矣！豈知吳君不知受何人指示，大與余爲難，致信與張繼君，謂艙位如何之不適，余如何從中取利等語。幸同時有與吳君同船學生宋國樞君與其兄之書信一封，則謂船上甚適，至各碼頭時均有人招待。由此以觀，可知吳君之所述全爲虛造。宋君之信現尚在余處。」後又述辦理各事困難情形，洪君繼謂：「自己費盡心血，自問於心當可告無罪，豈知現尚有許多不滿意於余之人，想出種種破壞余之方法。故余此次之赴法，一爲個人私意，一即欲見吳君當面責問，爲何無故想出種種方法破壞余之理由，抑因與余有深仇而以此報復，或受人指使，務必使其水落石出。」洪君復報告所有各項銀錢均已交清，惟各人領護照費及相片均在霞飛路留法儉學會事務所。但事務所已爲上海法文預備學校封鎖，「余與之理論不聽，遂不免起衝突，故余想請張繼君前往交涉。」張君當即允許。其後主席張繼詢問洪君收公費五元及護照費三元，可有其事，曾否全數交還？洪君答稱：「此項會費北京留法儉學會亦收，豈上海留法儉學會與北京之宗旨不同乎？但前張君謂不當收此項公費，故均早已交還。至於護照費三元尙爲多收，而北京留法儉學會每人收護照費五元，此豈又其宗旨不同乎？」張繼謂：「北京余亦當調查，如有虛僞亦當如此對待。」最後，主席鄭重宣布，留法儉學會所有今日以前之事均爲洪君負完全責任，今日以後之事與洪君完全脫離關係。衆人皆贊成，議決後，又推徐炳元、唐元梁、呂鳳蟾、陳祖堃、劉之謀、柳子賢六人爲代表，如有欠款向洪君索取，遂散會⁴⁵。

從上述可知，洪誠面對「高抬票價」、「剋扣兌價」、「冒收捐款」

⁴⁵〈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頁四七五～六。

等各節指控不是支吾其詞，便是強詞奪理，甚或大言不慚，堅不認錯。經主席逐條駁斥，終於無話可說，然最後尚想保全飯碗，又說：「我以後總盡心去辦。」張繼直截了當回答道：「謝謝你？辛苦……不敢再勞了！」⁴⁶張繼這一幕公審洪誠案，表現出他主持議會的明快作風，以及絕不姑息的公正態度，終於為儉學會除去一大敗類，真是大快人心！

翌（二十五）日，張繼即在上海申報刊頭登出醒目的「留法儉學會發起人張繼啓事」，內容如下：「上海留法儉學會已宣告，自本月二十四日起與洪誠君斷絕關係，所有本會會員除已交入會費兩元外，無論何種名義之款項，與定章不符交與洪君者，請通知本會，由本會向洪君索還。嗣後本會之進行，由華法教育會評議員、法國公立學校校長高博愛君擔任。赴法諸君可於每日下午四時到霞飛路本會事務所（尚賢堂對面）與高博愛君接洽為妥。」⁴⁷廿六日，上海新聞報亦登出同樣啓事⁴⁸以正視聽！張繼這種劍及履及，絕不姑息的作風，終於為儉學會除去一害羣之馬。

自洪誠案發生後，上海華法教育會與留法儉學會懲前毖後，為免其他人再受騙起見，特於報端刊登通告如下：

- (1) 凡進本會者，除納會金二元及應繳之護照印花稅外，不取絲毫雜費。
- (2) 本會對於會員之船票艙位能否如數辦到不能預料，惟本會力所能及之處當竭力圖之。

⁴⁶ 靜，〈丑態畢露的洪誠〉，「上海晚報」，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同前註，頁四七六。

⁴⁷ 「申報」，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一版。

⁴⁸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頁四七七。

(3)船票須各會員親往法國郵船公司購買，萬不可由人間接代辦，庶免欺弄。

(4)本會會員購買船票，須得高博愛君之介紹，否則不能享優特權。

(5)歐戰告終，法國現正運兵回籍，船票購定頗非容易，但運兵畢後當恢復舊狀。

(6)嗣後各省有志諸君於船隻未定之先，切不可遽行來滬滯候，以免多耗旅費。

(7)本會會員如受間接人欺騙者，望將確實證據送交張繼君或高博愛君，本會自與以相當處分。

(8)本會特重加整頓，並另行組織檢查，以免公眾受累⁴⁹。

洪誠經輿論不斷聲討制裁後，不但不痛加反省，反在報端刊登啓事，大言不慚地聲辯，渠「不惜犧牲個人金錢與精力，獨力發起上海留法儉學會，旨在爲法國青年學界開一方便之門」，不料「橫逆之來起於同志，覬覦不遂，造作蜚語，並將華人自辦機關斷送外人之手，言之實堪痛心」，且「此事之是非曲直必可大白於天下，處此萬惡社會中，不願再有論列，從此得卸仔肩亦復何憾！污蔑者自有良心之裁判！」⁵⁰

由此口氣看來，洪誠不僅並無悔改認錯之意，甚至始終堅持遭受污蔑。爲此，洪君不但事後未依規定將賬目清理賠還，且私逃至北京。留法儉學會與華法教育會遂向法租界公堂控告，經捕探緝獲到案。開庭提訊時，原告律師遜百克稱，會中一切事務均託洪誠一人辦理，致

⁴⁹「上海華法教育會留法儉學會通告」，「上海新聞報」，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同前註，頁四七八～九。

⁵⁰「上海留法儉學代表洪誠啓事」，同前註，頁四七八。

生種種舞弊情事，而會中所登之廣告費，均向學生收取，又向各學生提加船資及護照上印花稅，實犯詐欺取財之罪，應請堂上照新刑律訊辦，俾使天下各學生家屬知悉會中所託非人所致。被告亦延律師辯稱，被告在該會辦理職務，素來未有費用之處，所有多收各學生之船費，均已退回等詞。中西法官向被告詰問，所退回各學生船費有無證據？答有簿據可證。又問何以多收護照費？答稱充作會中經費。餘供支吾。中西職員會商之下，判以洪君犯詐欺取財，應照新刑律三百六十七、三百八十二條，禁押西牢二年以儆。事後，洪之胞兄洪蓮舫遞稟公堂，求請准予贖罪，經中西官核准，並判以：姑念洪誠年輕，准予贖罪外，賠償原告損失五百兩，堂費亦歸被告負擔^⑤。

洪誠案揭露勤工儉學組織各地經辦人可能發生之弊端，但環顧整個勤工儉學運動過程中，似只有洪誠一人被送官究辦，此益可說明張繼嫉惡如仇、不循私、不包庇的光明正大作風。

五、法國行——對勤工儉學的實地考察

張繼先後到過歐洲三次，茲簡單分述如下：

第一次為光緒卅四年（一九〇八），張氏年廿七歲，曾在法國試驗無政府主義，居留較長，留有詳細日記。

第二次為民國三年，曾遊意、法、英等國，翌年秋赴美。

第三次為民國八年，赴歐考察，歷遊法、德、西班牙等國，與勤工儉學運動有較多接觸。此次出國，前後約半年，正值勤工儉學運動高峯，惟無論年譜、日記均一筆帶過，甚為簡略，無法窺其行踪與活

^⑤ <留法儉學會中之敗類>，「時報」，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同前註，頁四七九。

動全貌，故擬從《旅歐週刊》、《華工雜誌》的記載中加以補充。

張繼於民國八年十月卅一日從上海乘法輪「寶列筋」(Paul Lécat)號，隨同第九批勤工儉學生一百六十二人（另從香港登輪者五十餘人）出發。學生中較著名者有湘籍的李維漢、李富春、張昆弟、賀果等人⁵²。張繼為前參議院議長暨留法儉學會發起人之一，因此等於華法教育會代表，儼然是這批學生之領隊。

船抵埃及波賽 (Port-Said, 卽塞得港)，張繼卽拍電巴黎華僑協社，內謂：「學生二百人，卽日抵法，請派人接待。」《旅歐週刊》將此消息披露，並加按語說：「此次（勤工儉學生）為數至多，故張溥泉親自送來也。」⁵³

十二月七日船抵馬賽，華僑協社按例派人前往招待。十二月十五日，巴黎華法教育會開會歡迎張繼暨新到之二百餘位同學。是日，中法人士到會者甚衆。首由該會幹事李石曾報告開會宗旨，次由張繼演說，對該批學生做了一番精神勉勵，略謂：諸君來此，皆係坐四等艙，雖經船上優待，可到頭、二等艙中去，然究甚勞苦，已算一半成功，其他一半，惟賴奮鬥。且此行除物質上之勞苦外，精神上更有一種危險，及豪俠之意味，更令人快意。再由華法教育會副會長穆岱 (Marius Moutet, 衆院外交委員會重要委員) 以法語演說，略云：「對於諸君來此，法人皆極歡迎。中法學術相類之點及關係皆甚深，諸君執兩國交換學術之樞紐，將來必有最大最好之影響。法人至華者少，其言論亦未必法人真相。諸君到法，卽知法國真正學術文明。自來國與國間之衝突，皆係兩國之隔閡。大戰原因，亦半由此。今諸君來此，

⁵² 清華大學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北京：一九八〇年），第二冊，上，頁九九～一〇六。

⁵³ 〈旅歐週刊〉，第五號（一九一九、十二、十三），頁三。

不但可免除隔閡，且又增進瞭解。」⁵⁴

張繼與第九批勤工儉學生到法後，因係歷屆中人數最多，故受到法報與法人特別注意。對政界頗有影響力的巴黎「時報」(Le Temps)報導說：「近有中國學生二百人到馬賽，同來者有前參議院議長張繼君，前湖(河)南師範學校校長汪(王)君，中國學生已來者，將近七百人矣！」另法國銷路最廣的「小巴黎報」(Le Petit Parisian)也大幅詳載中國學生到法，對於女生二人尤為注意，並將照片登諸報端。美國記者聞中國多數學生到法，次日即至招待學生各機關訪問週至，徧告以美國一千二百種之報章，該記者並主張美國開禁華人。此可見中國學生之來法，非僅影響留法學界，亦且影響華人在全世界之地位矣！另有與中國學生同船之法人某君，在馬賽上岸，曾向人言，親見同來法國之中國學生，人數既多，又無人維持，而在途中秩序異常之好，實為難得⁵⁵！

張繼在法，前後停留逾半年，其活動可從幾方面分述：

(一)參加僑界各項活動

旅法華人團體甚多，每逢元旦、國慶等重大節日或送往迎來之時，皆舉辦慶典或聚會，以資紀念並示聯誼。張繼一者在國內曾任參議院議長，地位崇高；一者為儉學會發起人之一，復為華法教育會上海分會會長，素來熱心中法教育，故往往在被邀請之列，他也樂於參加各項活動。

(二)應邀演講

⁵⁴ <旅歐週刊>，第七號（一九一九、十二、二十七），頁三。

⁵⁵ <旅歐週刊>，第八號（一九二〇、一、三），頁三。

張繼不僅樂於參加僑界各項聚會活動，而且以其名流地位，也經常應邀在會中演講。惟次數不多，有資料可查者僅以下四次：

(1)民國九年元旦，「旅法華工會」在巴黎華僑協社開大會，並歡迎張繼。大會由華工會評議長潘振東（瘦石）擔任主席，邀請張繼演說。其內容大意謂：「世界各處，對於華工，皆有厭拒之行爲，所剩者只有法國。但在法華工，又傳出不佳消息，諸君須要留心保留此最後之一道門。」⁵⁶言下對華工之遭遇與前途極表關切。

(2)巴黎華僑協社爲華僑界各團體之總會，有若中國之會館⁵⁷，爲發展中法學術，特每週舉行演講會一次。民國九年二月十一日第一次講演會，由張繼擔任演講，題目爲「巴黎價值」，在場聽講者有數十人，除學生外，亦有豆腐公司工人。張繼對巴黎之名勝及文學美術上有價值之地方，皆一一述說，極爲動聽⁵⁸。

(3)同年三月十九日下午四時，中法人士約二百餘人在巴黎開會，由法國參議院議員于格儒（Hugues Roux）主持，共有兩場演講，首由張繼講「中國革命與法國教育之關係」，次由法華教育會會長歐樂（Aulard）講「中法教育事業」，歷述中法間教育運動及大戰後中法教育勃興之情形，極爲詳盡⁵⁹！

(4)張繼自德回法後，即定期起程回國。惟因罷工法船開行延期，故六月初方能啓行。五月廿日星期六下午，華僑協社特開會歡送，學生工人到者甚多。張繼在會中有極長之演說，大意有二：（甲）對於勤工儉學持樂觀態度，並認勤工儉學，即真正之德謨克拉西主義。作

⁵⁶《旅歐週刊》，第十二號（一九二〇、一、三十一），頁三。

⁵⁷《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第一冊，頁一六一。

⁵⁸《旅歐週刊》，第十五號（一九二〇、二、二十一），頁三。

⁵⁹《旅歐週刊》，第二十號（一九二〇、三、二十七），頁三。

工係有絕對之價值，並非只是爲自己作工，實係爲中國作工，爲世界人類作工。（乙）述個人感想，略謂此次身游四國，與其人民風俗接觸既多，因而產生感想甚深，頗覺吾人仍當從目前實地著手，不當但尙高談各種主義，因有時代及地域關係，非先本國整頓不可。又謂此行歸國，當盡所能，必將爲國家做一些切實的事。次又述及此次遊德見聞，及對於德國的觀察，略謂德國之共和基礎，仍未大固，凡中等社會及知識階級，皆不甚歡迎民主，惟工人竭力擁護而已。德國與日本戰後關係更密切，在德國隨處遇見日本人，亦如在法之常遇華人。德人對於中國學生尙歡迎，其中有識之教育家，亦有欲仿照法國對華教育辦理之意。德人頗勤儉，一切組織均未大破壞，將來復原仍甚速。惟其軍人之勢力尙未全去，且均紛紛向海外作事，尤以到遠東者爲多，將來生何等影響，尙不可知。是日下午七時半，華僑協社各團體及國際和平促進會、旅法華工會等，在巴黎中華飯店設宴爲張繼餞行^④。

(三) 視察與參觀活動

張繼到法，主要爲瞭解勤工儉學進行情形，故華僑協社職員會決議，安排張繼前往有勤工儉學生之各中學校視察，事前則由華法教育會函致各校校長及同學。屆時，張繼除向各校同學演講教育會進行情形及國內工讀狀況之外，尤注意於各校教授法之改良，即時與校長、教習磋商，務期同學能得益處^⑤。

張繼之視察各校，並未排定週密之行程，俾作全盤有系統之瞭解。或因時間限制，僅就勤工儉學生之較爲集中地區進行訪問。^⑥三

^④ <旅歐週刊>，第二十九號（一九二〇、五、二十九），頁三～四。

^⑤ <旅歐週刊>，第十六號（一九二〇、二、二十八），頁三。

月五日，張繼往訪巴黎近郊的楓丹白露（Fontainebleau）及墨蘭（Melun）兩校，與中國學生及校長、教員晤談，並商量春假出校作工及分校補習、教授法改良各事^②。

張繼除視察學校外，並參觀勤工生所工作之工廠。在華僑協社安排下，張繼由樊狷夫、向迪璜、王鑑之及在社候工同學數十人陪同下，於三月間某日前往巴黎附近之汽車工廠（Renault de Billancourt），受到廠中人士極大歡迎，除殷勤帶領參觀外，並設宴招待。席間，廠主派代表致歡迎詞，後由張繼演說，向迪璜翻譯，所言皆關於中法親善及實業各事^③。

由以上各項活動看出，張繼在法停留期間，除與法國上層社會交往外，亦能邁出協社大門，深入各地各校參觀視察，廣泛與工人、學生接觸，實際瞭解勤工儉學的進行情形，相當難能可貴。

六、挺身而出——參與華工請願

張繼在法期間，除上述各項活動外，最有意義者莫如挺身而出，親自參與了華工的請願工作。緣華工招募時，因合同關係，由法陸軍部管理，陸軍部視同軍人看待，管理方式既嚴且苛，華工頗不能適應，故運動要求改歸工部管理。

民國九年四月六日下午一時半，華僑協社各團體及國際和平促進會（Comité Chinoise pour la Paix Internationale）^④等在巴黎哲人廳（Société des Savants），開討論華工問題大會，屆時到會者約百餘人，以張繼為會議主席，來賓有天津大公報代表胡霖、公使館代

② <旅歐週刊>，第十八號（一九二〇、三、十三），頁三。

③ <旅歐週刊>，第十七號（一九二〇、三、六），頁三。

表戴明輔、領事廖世功、照料華工事務員李駿、見習領事劉文彬、旅英學界代表任凱南等。各界參加者有巴黎通信社李璜、旅歐週刊社周太玄、華工雜誌社蕭子昇、醒報代表傅葆琛、華法貿易公司齊雲卿、國際和平促進會李書華、李玄伯、謝東發、謝壽康、王世杰、褚民誼、戴修駿、季宗孟、周覽、陳和銑，華僑協社代表華林、劉厚，華工會代表潘瘦石、馬志遠、龔續榮、田恩霖等人⁶⁵。

首由主席張繼致詞，對於集會的目的與討論的方向有明確的說明，大意謂：「今天為華工請願問題開會，凡華工受合同限制者，均不在本會討論範圍之內，何以故？第一、因華工在合同限制之下者，無集會自由權，在事實上未免做不到。第二、本會對於華工，為外界旁觀的研究，不過大家商議一個解救華工的方法，今天的會議，發起的是華僑協社與國際和平促進會，這兩個機關受了種種的刺激，見工人的苦況實在難受，所以請大家負救濟的責任。這兩個機關的人，看見許多的事實，大家不得不說說這一件事，提倡去救濟他們，所以要求公使領事及照料華工事務員，大家討論一個辦法，並希望今天的會大家設法維持中法兩國邦交上的好感情，又希望開導我們中國人，不要去反對法國政府。因華工的待遇不良，不是由於法國政府主張的，是由於下級辦事人辦理不善造成的。但待遇不好，邦交亦不能辦好，將

⁶⁵ 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以後，李宗侗(玄伯)、李聖章(麟玉)、王世杰(雪艇)等人以為和會中必將討論到山東問題，於是約同陳孟釗(和銑)、戴毅夫(修駿)、王來廷(鳳儀)等發起國際和平促進會，以反對日本對於山東的要脅。其組織簡單，並無主席或會長之設置。李聖章任中法文書記，周鯁生、王世杰任英文書記。和會閉幕後，國際和平促進會仍舊存在，不過目標轉為對華工與勤工生的輔導照顧。參閱李宗侗，〈巴黎中國留學生及工人反對對德和約簽字的經過〉，《傳記文學》，第六卷，第六期，頁四一～三。

⁶⁶ 〈華工雜誌〉，第四十六期（一九二〇、五、二十五），頁一八。

來華工都回去，必講法國的種種不好處，到那時就是我們要聯絡好邦交，亦很不易了，何以呢？因中國衆民的意見，既對於法國生惡感，政府上亦必受很大的影響。兄弟所以說這個問題，於中法邦交上很有關係。再一層請大家不要各存成見，我們中國代表公使領事與商學各界，最好是和衷共濟去做。兄弟今天主席，一無成見。因爲前幾天兄弟接了許多的信，皆是述華工的苦況，兄弟又親眼見了許多的事實，所以不能不竭力去幫工界的忙，拯救他們。兄弟只認得潘振東(瘦石)先生他的事，我是都曉得的。然潘君以外的工人，被法國軍人無故捉去送回中國的，還不曉得有多少呢？今天特請大家各出一片誠意，切實的討論討論。」^⑤張繼的這一席話，既客觀而又兼顧大體，儘量排除感情上的因素，不失主席不偏不倚的立場。

次由謝壽康報告華工會最近之各種運動及華工問題之根本要點。續由新近出獄之華工會評議長潘瘦石，歷述工人之苦況，及領事館僑工事務員等辦事之疏忽，並條舉事實以證明，言辭激烈沈痛，全場掌聲不絕。再由華工會副評議長馬志遠及華工代表龔續榮、田恩霈演說，對於工人身受之待遇及希望，均有詳盡報告。至此，主席起立言，工人方面發言已畢，乃請公使代表及總、副領事等演說。先由岳代辦公使代表戴明輔略述公使館自來對於華工問題之意見及地位，並聲明各團體對於華工事件有所決議，彼必轉達代辦，盡力去做。廖世功領事亦述明其個人對於華工改良待遇之意見，及其職權上之困難。副領事兼僑工事務員李駿因華工代表對彼攻擊甚力，故自己說明其職位及力量上之困難，並於華工代表事實上之指責逐條答覆。

其次，又由主席請到會者自由發言，於是張競生、李書華相繼發表意見。李書華說，法國所招來的華工，向來歸法國陸軍部管理，並

^⑤《華工雜誌》，第四十六期，頁一八～九。

且歸陸軍部殖民地工人局 (Service des Travailleurs Coloniaux) 管理，法人待遇華工，不但完全適用軍法，並且適用對待殖民地工人特別法，此舉無異承認華工為亡國之人，而三年自政府至駐法公使、總領事、副領事兼僑工委員，從無任何表示。因此，他要求立即正式向法國提出交涉^{⑤7}。

經過五小時的冗長討論、解釋，最後由主席宣讀擬就之「旅法華人大會對於旅法華工問題決議案」，並徵得眾人同意，其內容如下：

(1) 旅法中國公民，認中國駐法公使、駐法領事，各有直接保護華工及督責華工委員責任。茲決議要求公使領事及華工委員，分別向法國外交機關及陸軍部嚴重交涉，一面電請政府囑外交部，向法國駐華公使直開談判，要求政府顧惜中法友誼與華工的人權（嚴遵華工合同的精神），立即解除華工的軍事待遇。

(2) 旅法中國公民，茲決議以公民全體名義組織代表團，直接向法國國務總理、陸軍部及國會，要求解除華工的軍事待遇，並向法國他種公私團體另同樣活動。

(3) 旅法中國公民，茲決議由旅法華僑協社會同國際和平促進會，敦請旅法同人若干人組織臨時的團體，主持關於此次華工問題，對內對外一切事件^{⑤8}。

四月十三日，國際和平促進會依照上述決議案第三項，為研究華工請願問題，特召開旅法同人若干人商討，到會者有張繼、謝東發、李聖章、李玄伯、李書華、夏仲堅、褚民誼、戴宗孟、潘瘦石、及廖、李兩領事等人，所議決之事項如下：

(1) 由正副領事同岳代理公使向法政府請願問題正式提出辦交

^{⑤7}《華工雜誌》，第四十六期，頁一九～四二。

^{⑤8}《華工雜誌》，第四十六期，頁四五～六。

涉。

(2)由和平促進會、華僑協社、華工會各機關聯絡一氣，向法政府各方面運動（如陸軍部、工部、國務院、上下議院各機關），務期達到完全目的而後已。

(3)在請願問題未解決以前，亦當設法減少華工的困苦，凡華工有受法軍人之虐待，可按情來函於華工會，以便轉請領事館設法保護。

(4)凡華工有正式廢棄合同者，前被勒令繳存領事館之一千法郎，從此不必再繳，因領事館為華工廢棄合同問題，經和平促進會及華工會諸職員再三要求另訂新章，嗣後凡廢合同者，只照合同賠船費六百法郎於陸軍部（廖領事並擬設法交涉或以後即此六百法郎亦要減去），至前此繳存領事館一千法郎之舊章，至四月十三日為止，以後概歸無效，再以後凡欲廢合同者，如該廠總辦不管可直向華工會來函，以便轉請領事館辦理，正副領事從此對華工當盡完全責任⁶⁹。

四月三十一日，旅法華工會為進行工人請願及聯絡法國各界，特假巴黎中國飯店宴請法國衆議院議員穆岱及阿里野兩君，並請華僑協社、國際和平促進會、華法教育會、巴黎通訊社諸君及旅歐週刊記者作陪，張繼、謝東發兩人亦在座。席間談論華人請願事甚詳，穆岱君並為計畫一切手續，謂中國政府若提出交涉後，法國社會黨即可在衆議院提起質問，催促其政府⁷⁰。

五月二十六日，張繼（代表華僑協社）、李聖章（代表國際和平促進會）以旅法中國公民代表名義，偕同法國衆議院議員穆岱往見法國新總理密勒杭（Alexandre Millerand），詳述華工在陸軍部管理不良下種種苦況，要求將華工改歸工部管轄。法總理答稱，華工品類不

⁶⁹ <旅歐週刊>，第廿四號（一九二〇、四、二十四），頁四。

⁷⁰ <旅歐週刊>，第廿六號（一九二〇、五、八），頁三。

齊，優者少，劣者多，工部不願接收，如劣者全去，則可接收。張、李兩人又極言華工現受軍事管理的痛苦，若不改歸工部，其害將伊於胡底。密勒杭稱，可由陸、工兩部另行組織一特別管理機關，管理在法一切外國工人，包括華工在內。穆岱議員謂，將來組織特別管理機關時，除政府委任之辦事人外，各國工人也應舉出代表數人參合進行，以期辦理更易得法，為工人謀取更多便利。法總理答稱可行。至此華工請願事告一段落。華工表面上雖未完全達到改歸工部管理的目的，但法政府已允諾另行組織機關管理，結果尚差強人意^①。張繼旅法期間，除實地考察勤工儉學進行情形外，亦始終關心注意華工問題，一再參與獻計，並親自出馬，代表華僑協社，往見法總理，為華工改歸工部管轄事宜而奮鬥。

七、結 語

自清末至民初，從革命思想的勃興到排滿、討袁，乃至護法諸役，張繼所表現的乃是一個以民族主義為依歸，不折不扣狂熱進取型的革命黨員。在思想上，張繼多接受一層無政府社會主義的洗禮，他在日本與劉師培所發起的「社會主義講習會」雖辦理得有聲有色，他本人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然基本上，張繼並非從事思想領導的角色，而毋寧是提供行政與技術層次的支援。

從無政府主義的信仰到勤工儉學的發起和倡導，張繼與李煜瀛、吳敬恆所表現的領導功能亦有所不同。李、吳所展現的是思想層次、理論建構方面的開創性貢獻，所發生的是時代性、全國性、計劃性的特殊影響。而張繼所關懷者毋寧是勤工生出國的一般禮節、做工觀念

^①〈旅歐週刊〉，第卅號（一九二〇、六、五），頁四。

與身體強壯^②等生活細節問題以及華工前途等實質問題。可見張繼是個講求實際的人，他不崇尚「高談濶論」，^③而比較看重「坐而言起而行」。所以，他之親至廬山共產村實驗無政府主義，他之明快處理洪誠舞弊案，他之前往法國實地考察勤工儉學，乃至挺身而出親自參與華工的請願工作，皆可視為「行」的種種有力表現。崇尚空談，徒有理論，行事必難落實，張繼與勤工儉學的關係，除了是有力的贊助支持者外，更提供一層「行」的保證，使此一劃時代的留學運動，仍能產生為國家培植人才的實質貢獻！

（原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期，民國七十五年六月，臺北）

^②「申報」，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十版。

法國所藏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介紹

一、引言

二、國家檔案館的勤工儉學檔

三、五四前後旅歐發行的中文期刊

四、現代中國研究與資料中心的收藏

五、里昂中法大學檔案

一、引言

勤工儉學運動由李煜瀛（石曾）、吳敬恒（稚暉）、蔡元培（子民）等人所發起，倡議於民國初年，盛行於歐戰結束之後，是一項鼓勵家境不富裕的年輕人到法國「勤以作工，儉以求學」的留學活動。勤工儉學的發起，與以往的留學目標一樣，原意在為國家培植人才，想不到後來由於「勤工無門，儉學無路」，反而成為孵育共產黨人才的溫床^①，像日後共產黨的若干高級幹部，如周恩來、鄧小平、陳毅、李維漢、李富春、李立三（隆邛）、徐特立、何長工、聶榮臻等人，都是當年的勤工儉學生，可見這個運動影響之大。

勤工儉學運動的研究，晚近受到較大的注意，這由各項資料的陸

^①參閱陳三井，〈勤工儉學運動初探〉。

續整理出版可以看出^②。但做爲此一運動發祥地的法國，其有關資料之豐富，卻一向甚少人注意與介紹^③。筆者留意此一段歷史多年，一九八二年九月承國家科學委員會資助，到法研究一年，茲就涉獵所及，將有關勤工儉學之重要史料，作一拋磚引玉式的介紹，尚乞海內外同道有以指正。

二、國家檔案館的勤工儉學檔

在法國所保存的勤工儉學檔，是研究此一運動的第一手史料。一九七二年，若干先後參與其事的機關，特將它們的檔案移交給現代中國研究與資料中心保管，當時經手此事的是一位中國籍的唐小姐。但該中心限於經費與人手，一直未做有系統之整理，其間也曾應研究者之要求與讀者之好奇，酌予開放，故資料頗有散佚。兩位勤工儉學的重要見證人李璜與盛成，都曾翻閱過這批資料。

一九七七年，該中心獲得法國科學院（C.N.R.S.）經費之支助，始約聘兩位法國史學工作者杜柳絲太太（Mme Nicole Dulioust）與

②有關勤工儉學資料彙編者有

〈勤工儉學運動〉，陳三井編，全一冊，706頁，臺北正中書局，民國七十年。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清華大學中共黨史教研組編，共四冊，北平，1979—1981。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上），張允侯、殷鈺彝、李峻晨編，上海，1980。

〈新民學會資料〉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合編，人民出版社，1980。

〈新民學會文獻匯編〉，湖南省博物館歷史部校編，158頁，1980。

③李璜，〈巴黎現存關於留法勤工儉學生救濟實況檔案摘要〉，傳記文學，第二十三卷第四期，頁15-20。此文撰寫於該批檔案整理分類之前，對於內容僅作重點式之介紹，故難能窺其全貌。

巴赫曼小姐 (Melle Génèvière Barman)，負責整理編目。一九八一年，工作告一段落，並出版目錄一冊，列為該中心叢書之一^④。惟該中心主任白吉爾教授 (Prof. M-C. Bergère) 為妥善保存資料起見，已將全部檔案移交國家檔案館 (Archives Nationales)，其編號為 47 AS，故研究者如欲參考，必須移駕至位於巴黎第三區的法蘭克·布爾喬亞街 (Rue des Francs-Bourgeois) 六十號的蘇必士宮 (Palais Soubise)。在此，謹將勤工儉學檔的內容，作一簡單介紹：

1. 來源——這批檔案的主要來源有三，均為實際負責照顧勤工儉學生的機關：①華法教育會；②中法監護中國青年委員會 (Comité Franco-Chinois de Patronage des Jeunes Chinois en France, 簡稱 C.F.C.)；③巴黎中法友誼會 (Association Amicale et de Patronage Franco-Chinoise, 簡稱 A.A.F.C.)。但主要仍以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四日成立的「中法監護中國青年委員會」的檔案為主。

2. 時間——這批檔案的起迄時間為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四〇年，但主要以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為主，一九二七年以後資料較少，因為大部份所謂勤工儉學生多已返國或他去。

3. 內容——全部檔案共二十七箱，經整理後分為五大部分，茲分述如下：

第一部分為上述三個機關的一般性資料，全一箱，包括「中法監護中國青年委員會」與「巴黎中法友誼會」的各項會議紀

^④Génèvière Barman & Nicole Dulioust, *Etudiants-Ouvriers Chinois en France, 1920-1940*, Centre de Recherches et de Documentation Sur la Chine Contemporain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1981. 160 p.

錄，以及華法教育會所作的各項學生與工人的統計表。遺憾的是，一九二一年九月因進軍里昂中法大學而被遞解出境，搭乘法輪保羅列卡（Paul Lécat）號回國的一百零四人勤工生名單，已告失蹤。

第二部分為學校，共六箱，包括勤工生所就讀的二〇二個學校，其中有中學，有職業學校，有專科，有大學。透過前述三個機關與這些學校信件的往返聯絡，大致可以窺知勤工生學習活動之一斑。

第三部份為工廠，資料最多，共十一箱，涉及到全法國八六九個工廠，包括有名的雷諾（Renault）汽車廠或克魯鄒（Schneider-Creusot）大工廠。透過有關機關向這些工廠的介紹、交涉，大致可以瞭然勤工生的做工情形。

第四部分為證明，全一箱，為巴黎華法教育會發給勤工儉學生的身份證明。

第五部分為收據，共八箱，內中文收據六箱，法文收據二箱。這是勤工儉學生領取公使館救濟維持費的收據，在此可以找到陳延年、陳喬年兄弟，李維漢、張昆弟、李富春等人的親筆簽名收據。

國家檔案館除擁有二十七箱的勤工儉學專檔外，並典藏有內政部檔案，其中編號為 F7 者，為警察總局之檔案，內有八、九箱，為有關僑居法國的華人活動調查報告，時間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三四年，包括革命黨、華工、勤工儉學生在巴黎及其他各地的政治活動紀錄。

此外，法國外交部、陸軍部、海軍部、殖民部（後改為海外部）等單位的檔案處，亦各藏有與中國暨華人有關之檔案，因限於篇幅，不在此一一列舉，容後另文介紹。

三、五四前後旅歐發行的中文期刊

五四運動前後，中國旅歐的一些社會名流、青年學生以及工人，特別是在法國，組織了不少社團，如留法儉學會、勤工儉學會、華法教育會等，從事華工教育與留學活動，並出版了許多刊物，進行宣傳與報導此項活動。這些刊物目前在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所能找到，而且較為齊全者有《旅歐雜誌》、《華工雜誌》、〔旅歐週刊〕、〔華工旬刊〕等，茲依時間先後分別介紹如下：

1. 旅歐雜誌

《旅歐雜誌》是在法國中部名城都爾（Tours）出版的，為宣傳勤工儉學的早期刊物之一。該刊創刊於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八月十五日，係半月刊，三十二開本，每月一日與十五日出版，共發行二十七期，至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三月一日為止。

《旅歐雜誌》可視為華法教育會的機關刊物，因為該會的主要負責人，如蔡元培、李石曾、汪精衛（汪於民國六年一月間回國後，由褚民誼代理其編輯工作）等也是這個刊物的主編，該刊大部分文章也是他們撰寫的。

《旅歐雜誌》是「以交換旅歐同人之知識，及傳佈西方文化於國內為宗旨」。它的內容分圖畫、論說、紀事（有世界大事、國內要聞、旅歐華人近況）、通訊、叢錄雜俎等欄。該刊特別注意報導勤工儉學會的活動，以及旅法華工的情況，我們可以從這個刊物上找到有關五四以前中國青年學生在法國進行勤工儉學的重要材料。

為了宣傳與配合勤工儉學的進行，《旅歐雜誌》亦譯載歐美各國早期苦學出身的著名人物之傳記，作為勤工儉學者的表率，文章大部

分由李石曾執筆，介紹的人物有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盧梭（J.J. Rousseau, 1712-1778），傅利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等人。蔡元培為華工學校所編寫的講義，也每期在《旅歐雜誌》上發表。

法國國家圖書館凡爾賽分館藏有全套原本《旅歐雜誌》，但未裝釘。

2. 華工雜誌

《華工雜誌》的法文刊頭為 *Revue Chinoise Populaire*，在巴黎出版，為旅法勤工儉學會所編輯，可說是《旅歐雜誌》的姊妹刊物。該刊創刊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一月十日，先為半月刊，每月十日與二十五日出版。後改成月刊，亦三十二開本，每期約三十頁左右。《華工雜誌》共發行了四十九期^⑤，至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十二月二十五日為止。

《華工雜誌》以提倡勤、儉、學三者為宗旨，它的內容具有三項特色：第一，它的文章通俗易懂，即使是刊登了一、二篇文言文，也都另附白話。同時為了便利不識字的工人閱讀，該刊還附有拼音字母。第二，在這個刊物上，國內外新聞報導佔了很大篇幅，重要的新聞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情況，參戰各國工人的罷工等都有詳細的報導，於增進工人的時事知識與啓發工人的覺悟都產生相當的影響。第三，為了便利工人在工餘時間學習外國語，該刊每期都附載有英、法、中文會話對照。

國家圖書館凡爾賽分館藏有一至四十九期的《華工雜誌》，亦未

^⑤《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三集上冊謂：「它的出版期數在五十期以上，……根據當時國內刊物的廣告，已經出版到五十三期。但我們現在只見到第一至第三十期」，前一句話恐怕不確。

裝釘。

3. 旅歐周刊

「旅歐周刊」的法文刊頭為 *Journal Chinois Hebdomadaire*，在巴黎西郊的 La Garenne Colombes 發行，為旅歐周刊社所出版，周太玄是這個刊物的主編，大部份文章都是他寫的，李石曾、王光祈、曾琦、華林等人也經常撰文，可見這是旅歐知識分子所創辦的一個刊物。

該刊創刊於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每期四版一張，逢星期六出刊一次，售二十生丁，共發行九十三期，至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八月二十日為止。

「旅歐周刊」在發刊詞中為自己揭示了以下三個任務：第一，對於旅歐方面，除記述工學各界事體以外，對於教育的發展，團體的組織，生活習慣的改良，痛苦和不平事件的伸解，都是竭誠盡力的討論記載；既不願為激烈過當的批評，又決不取悅一時，依違兩可。第二，對於國內，除報告旅歐新聞外，還要常常登載西方學者在本報發表的論文，或是本報記者與他們為學術的談話；並特設學術新聞一欄，蒐集學術上的新發現，以供讀者的研究；遇有重大問題，也要請專家批評解釋。第三，該刊雖以旅歐為名，但並不以此自己限制，將作為旅歐以及美洲、南洋以及其他各處的華僑意志的交通，事實的聯絡。

「旅歐周刊」大致包含論說、新聞（世界新聞、國內新聞、學術新聞、旅歐新聞）、通信、隨感錄、讀者論壇等欄。這個刊物的最大價值，在於它的旅歐新聞欄報導和介紹了中國人旅歐各團體的組織、活動與勤工儉學的情況，這對吾人研究五四時期中國青年旅法勤工儉學活動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此外，它的論說與讀者論壇，也有助於我們瞭解部份留歐中國學生的思想傾向。

國家圖書館凡爾賽分館藏有全套九十三期的「旅歐周刊」，同樣

未加裝釘。

4. 華工旬刊

「華工旬刊」的法文刊頭為 *Le Travailleur Chinois*，亦在巴黎西郊的 La Garenne Colombes 發行，由旅法華工會（Association des Travailleurs Chinois en France）所出版。該刊創刊於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十月十五日，每期逢五出版，四版一張，每張定價二十五生丁，全部發行期數不詳。

「華工旬刊」與「旅歐周刊」、《華工雜誌》一樣，同為對華工進行宣傳教育的刊物，在其發刊詞中首先指出，「凡有人類的地方，就有華工的足跡」，但由於華工既沒有受過相當教育，又沒有團結力，所以無論在南洋或美洲，到處受人排斥虐待，因此有組織華工教育的必要。「華工旬刊」的出版，除在歐洲「聯絡華工個人的感情，消滅相互間的隔膜」外，並願代表華工，「以求國人的同情，輔助團體，以謀華工的教育」。

「華工旬刊」的內容，大致包括雜評、世界工人消息、國內大事述要、旅法華工新聞、啓事等欄，尤其旅法華工新聞一欄，載有各地華工消息，哀樂甘苦盡在其中，為研究歐戰期間華工最直接之史料。

國家圖書館凡爾賽分館藏有一至六期的「華工旬刊」；筆者又從國家檔案館的警察總局檔案中，意外發現「華工旬刊」第十二期與第十三期。

四、現代中國研究與資料中心的收藏

現代中國研究與資料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et de Documentation sur la Chine Contemporaine），簡稱中國中心，原屬

高級研究實用學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第六組，
現已脫離，另屬於社會科學高級研究學院(Ecole des Hautes Et-
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地址在巴黎第六區哈斯巴夷大道(Bd.
Raspail)五十四號的一幢十層辦公大樓，即人文科學館(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內。

中國中心是一個研究性的專門圖書館，凡臺灣、香港、中國大陸、
日本及歐美的出版品，像叢書、工具書、專著、期刊、報紙等相當齊
全，故已成為歐洲研究近代現代中國問題的重鎮，其情形一如漢學家
必定光臨巴黎威爾遜總統街(Avenue du Président Wilson)二十二
號的漢學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圖書館
一樣^⑥。

中國中心在歷任館長紀業馬(Prof. Jacques Guillermez)、畢
仰高(Prof. Lucien Bianco)及現任館長白吉爾(Prof. M.-C.
Bergère)領導主持下，以有限的經費和人力，在收藏方面不但豐富，
而且頗具特色。截至目前為止，它所收藏的書籍已逾一萬八千冊，其
中中文書約五千七百種，日文書五百種，西文書(包括英、法、德、
俄、義各種文字)約八千四百種。另中文雜誌期刊七〇五種，日文刊
物二十五種，西文雜誌四百多種，加上中文報紙四十五種以及微捲八
二五種^⑦，使得閱覽室與書庫皆有書滿之患。

中國中心除移交國家檔案館之勤工儉學檔外，其收藏方面與勤工
儉學有關者：

⑥有關巴黎漢學研究所的介紹，請參閱陳三井，〈巴黎漢學研究所的漢學研
究〉，載〈漢學研究通訊〉，第二卷一期(民國七十二年一月)。

⑦張振鵬、劉存寬，〈法國研究中國近現代史近況〉，〈近代史研究〉，1981，
2期。

1. 在中文期刊方面；有「旅歐周刊」一至五十一期，《少年》十一期，《赤光》十八期，《奮鬥》九期，「先聲週報」四期，均不全。北平中法大學在一九三〇年代所發行的「中法教育界」、「中法大學月刊」、「中法大學半月刊」，經常報導里昂中法大學的消息，前兩者在國家圖書館凡爾賽分館及中國中心均相當齊全，惟「中法大學半月刊」在中國中心只找到三期。一九二八年在里昂復刊的《旅歐雜誌》亦有一、二兩期。

2. 在微捲方面，有《華工雜誌》微捲十九期。

此外，有曾仲鳴編述之《法國里昂中法大學》，對於該大學創辦之經過，校務之組織，經費之分擔，學生生活情況及成績，交待頗為詳細。另由華法教育會廣東分會所刊行之《留法儉學會報告書》，也可看出廣東方面與這個運動的關係。蔡元培的《華工學校講義四十講》，當年由都爾中華印字局用大字排印，亦有微捲一份。以上都是他處難得一見，或尚未完全披露之資料，頗能補前述史料彙編之不足。

五、里昂中法大學檔案

里昂中法大學創立於一九二一年，歷經內憂外患，勉強維持近三十年，第二次大戰期間，里大校舍一度為德軍佔領，改為軍用醫院，勝利後始收回。至一九四七年，里大因經費難以為繼，各項活動始告停頓，校務也跟著結束^⑥。

里大結束後，大批書籍期刊、文書檔案及紀錄冊籍即集中堆放在該校原址女生宿舍的兩間寢室內，歷經數十寒暑，任其潮濕霉爛，乏

⑥ 李書華，〈吳稚暉先生與里昂中法大學〉，參閱〈吳稚暉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特輯〉，或陳三井，〈勤工儉學運動〉，頁402—404。

人過問。至一九七三年里昂第三大學正式成立中文系後，始將這批資料接管，並由 St. Irénée 古堡搬下山來。中文系因缺乏場所，已將所有書籍（包括線裝本）、期刊清點編號後移交里昂新建的市立圖書館保管，共佔用五排長書架，其中線裝古書約七千六百五十冊，平精裝鉛印書有三千冊，期刊約四百種^⑨，相當珍貴。

惟中文系因缺乏人手與經費，里大的文書檔案和紀錄冊籍，目前仍堆置在該系辦公室四個壁櫥書架上，估計約近百箱，比國家檔案館的勤工儉學檔至少多出三倍以上，可見資料之豐富。這批資料雖經初步整理，但未加編目編號，妥為裝訂，故不僅散亂不堪，且容易散失。其內容大致可分為下面幾大類：

1. 學生註冊登記簿五巨冊：里昂中法大學前後共有四七三名學生註冊^⑩，內女生五十一人。學生所填註冊資料，特依時間先後，裝訂成冊，內有各生之出生年月日、籍貫、國內住址、已獲學位、保送學校等資料，並附照片，於各生之背景，可一目瞭然。

2. 學生個人檔案：各生按外文字母姓氏先後編號，每人有一卷宗，留下各項生活與學習活動記錄。

3. 中法大學協會秘書處檔案：自大學籌備成立開始，秘書處即建立有完整的檔案，將其內部與對外來往函件，按時間順序，每半年裝釘一冊，每冊三百頁以上，共計三十冊左右，舉凡學校內外各項活動，鉅細靡遺，均在其中。

4. 中法大學協會會議記錄，常年報告暨會長雷賓（Lépine）、秘

^⑨ 參閱李塵生，〈法國里昂中法大學現存中文期刊〉，該文即將於《歐華學報》第二期發表，承李教授惠予借閱參考，特此致謝。

^⑩ 此人數係根據李塵生，〈1921至1946年里昂中法大學海外部同學錄〉，《歐華學報》，第一期（一九八三年五月）。

書古恆 (Courant) 函件：中法大學協會即里大之董事會，約每兩月開一次工作會議 (Réunion du Bureau)，每年開一次大會，決定學校方針與解決各項難題，歷次會議均有記錄可稽，甚為完備。會長雷賓與秘書古恆的個人函件亦均有副本保留下來。

5. 里大與國內各機關來往函件：這一部份多為中文，間亦譯成法文，有機關公函，有私人信札，地點以北平中法大學、孔德學院，江蘇省教育廳與中央大學，廣東中山大學暨福建、浙江兩省為主，內容多為資送學生、滙寄公費與回國路費等事。

6. 里大與駐法公使館、巴黎總領事館、里昂領事館、國民黨駐法支部、巴黎中國書報社來往函件：這一部份資料不多，亦多為中文。

7. 里大與里昂市政府、省長公署、國際聯盟、巴黎中法友誼會來往函件：這一部份多為法文，資料甚少。

8. 學生私函：這是里大前後期學生寫給中國籍主要負責人如劉厚〔大悲〕、曾仲鳴、褚民誼、宗真甫等人的信件，內容五花八門，最饒趣味，亦可看出求學過程的辛酸。但這一部份的資料最為零亂，往往沒有年份。

9. 學生成績報告、各項賬目、圖書採購及其他雜件等，為數甚多。

(原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期，民國七十二年六月，臺北)

留法歸來的中共黨徒

——C. Brandt 原著 陳三井 廖淑宜 林月蓮 合譯

- 一、前 言
- 二、學生赴法的思想起源
- 三、學生在法
- 四、組織與傾俄的意向
- 五、結 論

一、前 言

第一次聽到「中法共和」(Sino-French Republic)這個名稱是在巴黎十一月一個陰暗的早晨，當我拜訪一位自命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留法工讀學生保護人的老社會主義參議員時。當他談到這個名字陌生的「共和」時，就像法國人談到文藝沙龍一樣地自然；對他來說，就像當時反神職者一樣，認為那是個世俗的團體 (Communauté laïque)，服爾泰 (Voltaire) 的餘蔭！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學生為法國左派所利用，就像十八世紀，滿清官吏毫不知情地為那些中國哲人們 (Philosophers) 所利用的情況相同嗎？在這位老參議員塗着灰泥，鍍着金箔的房間裏，急進主義似乎已經停滯不進。

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留法學生的急進主義，並未停止，它仍然藉着本身的力量而躍躍欲動。他們組成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其組

織的大小和影響力與國內首次成立的政黨核心，同具重要性。它們的發展是平行的，也就是說，共產黨的巴黎支部絕不是上海總部的產物，也不是俄國爪牙的催生品。事實上，中國共產黨運動的興起，外在（法國）的助力比內在（中國）的助力為少。

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間，大約有二千名學生赴法，沒有一個人帶有強烈的急進主義思想。在法國，就像在中國，轉變成馬列主義的過程相當緩慢。周恩來抵達法國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是個無政府主義者，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也是如此。遲至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冬天，社會主義青年團（Socialist Youth Corps）才在巴黎出現，次年（一九二二年）七月，青年團便產生正式的中國共產黨（和在國內的上海總部一樣）。即使官方的共產黨歷史也承認，在法國的共產黨同志和中國的共產黨同志，在後來才有組織上的連繫。

在法國的同志有那些呢？這份名單頗令人印象深刻。我們已經提過周恩來及陳獨秀的兩個兒子，其中陳延年一直是領導黨的理論專家，直到一九二七年，上海清黨死亡為止。讓我們繼續列舉早在「人民政府」（People's Government）中獲有高位共產黨員。周恩來是國務總理，次於周的是陳毅，他是外交部部長；李富春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聶榮臻是國務院副總理兼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何長工，有一段時間是重工業次長，現任國務院地質部副部長。在黨的階層中，我們首先發現鄧小平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蔡暢是全國婦女聯合會主席；李立三是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兩個黨元老—徐特立及吳玉章；李維漢是統一戰線工作部主任；傅鍾是共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另外還有一些次要的人物。但是，更重要的，我們要舉出一九二七年後，國民黨清黨之前去世，而在一九二〇年代頗有成就

的留法共產黨員。在這些人中，最先應該提的是蔡和森，他是毛澤東的同學，在早期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我們將再敘述他。而他的太太一向警予，亦不可忽視，她是中國共產黨建立者之中唯一的女性，又是黨的首席婦女領導者。下一個要提的是王若飛，他在黨的階層中，扶搖直上，一直到一九四六年飛機失事死亡為止。西方學者很少聽過趙世炎的名字，但和他同時代的許多人，認為他是中共最傑出的理論家，直到一九二七年暴卒為止。陳獨秀的兩個兒子，前面已經提過了。這名單還可以再擴大，但只要多加一個任卓宣的名字就夠了，他是唯一重要的留法共產黨而和黨脫離關係的人，領導共黨歐洲總部達二年之久（從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但一九二七年為國民黨所逮捕，在臨處死刑時，他與國民黨取得妥協，自此成了國民黨的政論家。

細察留法中國共產黨的名單，竟然沒有今日在黨中最突出的人物——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名字，這真是令人驚訝。但是歷史研究發現奇怪的事，它顯示原來劉、毛兩人確實準備到法國去，毛甚至於還是專門贊助遣送大批學生，赴法學習現代知識和科技運動的領導人。後來，毛並未成行，其原因從未得到合理的解釋。劉曾學習一年的法文，其後便到莫斯科。以前，俄國似乎是中國青年急進主義者朝聖的合理去處。但事實大謬不然，歷史研究又發現了一件驚人之事。原來一九二一年（俄十月革命的後四年），一羣中國急進份子，到外國學習現代知識，他們不去社會主義祖國的俄國，卻反而到革命發源地的法國。

二、學生赴法的思想起源

中國學生大批赴法，可以列舉若干實際的理由，加以解釋：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不久，由於法國勞工短缺，導致人力市場供不應求，適合外人前往工作；二、當時法郎對銀圓的兌換率，有利於中國；三、法國生活情況，即使日漸轉壞，但仍然勝過遭受內戰破壞的俄國。諸如此類實際的考慮，當然是那些發動學生留法的人所不會忽視的。但實際的考慮和思想的考慮，是息息相關的，尤其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間，正當中國為高度理想所籠罩的氣氛下，要使學生赴法而沒有思想的推動力，是很難想像的。

這個原動力，首先來自一羣智識界的領導者，如吳稚暉、蔡元培及李石曾等人，他們通常被稱為無政府主義者，當然也是反對偶像崇拜者，但就他們與法國的關係而言，我們可以更正確地稱呼他們為哲人（Philosophers）。他們三人在本世紀的初期及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都曾在法國居留多年。就像十八世紀法國先驅者一樣，中國哲人也是反對偶像崇拜者，這些喜好綜合勝於分析，同時由於對將來充滿無限信心，與抱持堅固的樂觀主義的博學者（Polymaths），時常忽視目前的需要。中國哲人們也效法他們的法國先驅，把外國社會當做模型，正像服爾泰將帝王時代的中國理想化一樣，那些醉心於共和的黃帝子孫，也將法國第三共和視為女神。在西方國家中，唯有法國，已經除去兩個進步的障礙—君主政體和宗教教育，將可指引中國的迷津。法國是現代科學的發源地，但是如果沒有法國大革命所產生的十進位法，那來的現代科學？這幅畫面被描繪得如此的完美，所以中國哲人們不相信會留下不好的結局。

單憑信仰雖不能移動山脈，但在適當的距離下，仍可保持真實。中國哲人們相信，中國青年的精英，應該在法國接受教育，因為只有法國教育，是不分階級，為整個平民而設的。他們和里昂（Lyon）市長赫禮歐（M. Herriot）的關係頗為密切；透過這層關係，他們設法

在里昂設立一所中法大學 (Sino-French Institute)。他們也謹慎地避免和這位朋友，在意見上有所衝突。依照赫禮歐的意見，法國的技術教育，已於一九一九年崩潰；至於法國教室最可誇耀的民主，實際正是分離「我們兒童最可憎恨的不平等」^①。這或許是赫禮歐的誇大其辭，而中國哲人們相信平等 (égalité) 在法國已經獲得勝利，就像他們的法國先驅看到「道德科學」 (moral science) 在中國高奏凱歌一樣。

把法國影像當做現代性 (modernity) 的模型，一再展現在《新青年》這一份早期共和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急進派雜誌上。《新青年》，法文名為“La Jeunesse”，在法國也同富盛名。這份雜誌的主要創辦人是陳獨秀，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在一九一五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裏，他以極端的筆法，指出哲人們瘋狂的親法 (Francophilia)。他寫道：近代文明之特徵，厥有三事，一曰人權說，一曰生物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以為達爾文 (Darwin) 不過是拉馬克 (Lamarck) 的門徒，馬克思只是巴伯夫 (Babeuf) 的模仿者，陳獨秀指出三種現代性，皆拜法蘭西人之賜，他說：「世界而無法蘭西，今日之黑暗，不識仍居何等。」^② 早在一九一五年，陳對歷史有一個很荒謬的看法：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一件偉大的救贖活動 (Great Act of Redemption)。直到一九二〇年，他改做共產黨，他的歷史觀仍舊沒有改變；只是以俄國十月革命，代替了法國大革命。

對於陳和其他未來的共產黨徒，一九一九年或一九二〇年的早期，蘇俄的誘惑因而取代了法國的誘惑。但對於那些於一九一八年羣集北京、重慶和其他城市辦理註冊，選讀法文課程的數以百計學生，

^①Edouard Herriot, Jadis, p, 90.

^②《新青年》，一卷一號（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頁三。

卻非如此。在此之前，他們的眼睛中，不僅閃耀着 La Jeunesse 所描繪的法國理想影像，而且希望在法建立進步的中國無產階級核心。從一九一六年起，法國大量招募華工，以幫助戰後重建；中國哲人們便把這批華工，看成最富潛力的羣衆。只要施予適當的教育，他們豈不吸收大量的現代知識，而一旦回國後，不就很自然地成爲勞工先鋒嗎？當一九一八～一九年之交，希望建立華工在法國力量的部分理由，促使急進學生開始認真地學習法文。

這類學生是那些人呢？一開始應該側重於組織最龐大，在政治上最活躍的湖南人。自從同治中興（一八六二～一八七四年）以後，湖南在教育上居於領導地位；現在它又想重新取得此一地位。雖然中國哲人中，沒有一個是湖南人，而事實上，鼓勵學生出國，爲他們籌募基金，並以監護人身份擔任學生調停工作的，都是他們。無疑地，湖南人予學生留法注入了極強烈的原動力，後來，他們在法國，變成極強烈的政治色彩。很特別地，赴法留學的最積極學生羣，來自「新民學會」，這是由蔡和森和其同學（包括毛澤東在內），在長沙所建立的一個急進學會。

如同大多數中國學生一樣，新民學會的會員們，感到在國內前途非常暗淡，亟須到國外學習。他們有的主張到英、德或美國，但大部分「新青年」的讀者，卻選擇了法國。如此強烈的情緒，有助於使「新民學會」成爲「留法勤工儉學會」的附屬，透過此學會，哲人們實現了遣送二千名學生赴法的計劃。幾乎沒有一個人談到赴俄。當時確實如此，因爲在一九一九年冬，有一羣即將赴法的學生，在上海遇到一批以俄國作爲留學目的地的同學，後者試圖改變他們的原定計劃，但收效不大，因爲僅僅有極少數的留法學生改變初衷。

三、學生在法

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有二千學生到法，其中大約有一千六百人是工讀生，他們希望一面做工賺錢，一面讀書求學。但事實上，得到正式工作的，並不超過五百人；因為這時的法國正面臨經濟危機和失業問題。大多數學生，不得不依賴國內家庭的匯款，或甚至靠中、法政府官方的接濟。

毫無疑問的，這些學生的生活，必定非常艱辛，因在兩年之內，死亡者超過兩百人。同時，少數激烈份子，轉向了馬克思主義，是窮困導致整個社會的改變嗎？在若干情況下確是如此。但這個例子就和其他例子一樣，急進思想在那些沒有感到窮困的人身上，更形滋長。

大約有四分之一的學生，來自湖南省（這在前面已經說過），湖南省當局津貼學生的生活費，也遠比其他各省的學生，來得優厚。只有二百多名原籍廣東，和一小部份來自山東的學生，從他們本省政府中，得到相當的資助。然而共產主義卻使湖南人改變最多，四川人次之。共產黨在巴黎的領導權，因此享有「大陸派」(Continental Stamp)之稱，而與國民黨和留美、留英學生所形成的「海洋派」(Coastal Stamp)相抗。在法國，湖南人和四川人在共產黨員中佔居優勢，這很奇妙地，預示出今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地理組合。

難道不是很奇怪嗎？在法的湖南急進份子，幾乎都屬於新民學會，而在巴黎南方的蒙達集中學(Collège de Montargis)，已經成立了新民學會的分支。蔡和森、蔡暢、向警予、李維漢、李富春和李立三都上蒙達集中學。在此以前，他們都和毛澤東一起在長沙唸書。空間的距離，並未使老的同志關係中斷。長沙和蒙達集之間的消息，仍往

來不絕。沒有蔡的陰影，毛澤東一躍而為國內集團的領導人物，蔡毫不費力地成為蒙達集的領導者。大約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間的冬天，蔡也變成一個馬列主義的信徒。

蔡和一些同學，何以變為共產主義的信徒？這個問題很難有一個適當的回答。把這種轉變歸咎於第三國際（Third International）爪牙的陰謀公式，未見充分之吸引力；因為缺乏口頭和文字資料的支持。下一步驟，是找出與法國社會主義者和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以後的共黨接觸之情形。根據資料，顯示他們有過接觸，但不是很密切的關係，好像沒有一個中國急進分子，加入過法國左派，也沒有一個是屬於胡志明旗下的人。胡或許是中國人的媒介？三十多年以後，周恩來相信胡使他走向馬克思主義之路；但這個原因只是形式上的，周的禮貌在表面價值上看，甚難被接受。胡志明的傳記並沒有指出和中國人有密切接觸，只是在大集會或表演會上，中國人和越南人，正如中國人與法國共產黨一樣，偶而在一起出現。胡志明所辦的報紙—*Le Paria*，雖然也以中國名字—「勞動報」出現，但直到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時，它幾乎不曾提過中國或中國人，至少可以說，這個證據仍然是沒有結論的。

然而，我們不能任其漂泊沒有定論。雖然我們的來源缺乏聳人聽聞的線索，但也留給我們很深刻的印象。首先，撇開蔡何以成為共產黨的問題不談，無疑的，他和他的太太在改變其同胞的信仰方面，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有些人幾乎很快地加入他的行列；另外一些人則不然。例如：周恩來雖然是目前最有名的留法共產黨，但他絕不是最早的共產黨信徒。和他大部分的同志一樣，周恩來為了尋求改革社會的萬靈藥，一時沒有固定的行止。但時間有利於共產黨的發展，因為就像前面說過的許多學生陷入困境。此外，學生對他們的領導者（哲人）

希望的幻滅，同樣給予共產黨的發展以莫大的助力。哲人們個性樂觀，曾對學生有過歐洲如天堂的承諾，而事實上，學生飽受失業之苦，而且只有斷斷續續的唸書機會。簡而言之，他們已經接近地獄邊緣了。結果，他們不僅對他們的領導者，而且對領導者所代表的無政府主義及樂觀主義，懷有偏見。但是無論如何痛苦、失望，沒有一個中國人在此世紀接受悲觀的哲學。甚至於有些覺醒之人，卻以馬克思有條件的樂觀主義，代替無政府主義者的極端樂觀主義。

然而在法國，就像在中國一樣，無政府主義者播種，而共產黨收穫。關於這一點，我們現在就加討論。我們可以追溯法國在工作上，對於中國學生的影響。那些在雷諾（Renault）汽車廠，或克魯鄒（Schneider-Creusot）大工廠工作的中國學生，經常被法國工人以書信約出面談。然而，最重要的影響，來自法國的教授和教師們，根據資料，我們得知，法國教師們拿「人道報」（L' Humanité）或《資本論》（Le Capital）當做教材。甚至我們知道，一所有八十位中國學生上學的教會學校，他們的校長及副校長，都是共產黨員。學生可毫無困難地借故不上宗教課程，而以研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來代替。

在這種環境的薰陶之下，是不難想像中國學生，何以在法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另外，應該注意一個附帶的環境：中國人有羣居的傾向。雖然有些人選擇較偏遠的學校，以逃避他們的同胞；但幾乎一成不變的，「華法教育會」（Sino-French Educational Association）馬上派十來個中國人和他們住在一起。一些有怪癖的個人主義者，逃避到法國環境裏；就是這些人沒有變為共產黨。

然而，就整個團體而言，共產主義自有它對前途的展望，特別是當他們和當時的留法學生一樣，感到孤獨和挫折的時候。直到現在，我們仍把共產主義當做純意識形態來加以研究，好像它的組織根本不

存在一樣。在法國，於一九二〇～二一年，共黨組織事實上已公開存在，而且這種觀點，早已被接受，甚至一九二二年七月在巴黎成立的正規總部，已稍具組織規模；總部有六、七個職員，其中有兩位一趙世炎和陳延年，工作的時間較長。趙、陳和蔡和森組成一個三人宣傳小組，憑藉他們的人格感召力和說服力，來鼓吹他們的主義。在他們的領導之下，在法的中國共產主義，終於度過困厄階段，緊接着來臨的是由自己人組織的時期。

四、組織與傾俄的意向

促成中國學生留法的種種實際考慮，很快地，證明是實質上的失敗。法國經濟危機的日益加深，固然是部分原因，但組織的不健全，才是更大錯誤。雖然面臨失業的威脅日增，然而為哲人們所激勵的學生，仍然滿懷希望蜂擁而至。像大多數富於幻想的人一樣，哲人們做為一個提倡者，較勝於組織家；事實上，做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本來就不喜歡強有力的組織，所以想盡量避免其存在。他們所提倡設立的「留法儉學會」和「留法勤工儉學會」，沒有規定正式的職務，只保留最低限度的行政。一九一九～二〇年，他們依照相同原則，在中國設立許多小的工讀團體。這個傳統為留法學生所保存。一九一九年八月，他們成立第一個學會—勤工儉學學生會，宣佈互助是他們的最高原則，也沒有規定實際的行政工作。馬克思主義在此種環境下得以滋長，而列寧主義則不行。

組織需要經費，而大部分的經費都用為學生每日的生活費。哲人們所成立的學會，成為救濟的機構。在政治上，最能言善道的學生，立刻意識到有效組織的必要；但每當他們想成立一個組織時，往往因

經費短缺而作罷。終於在一九二二年冬天，他們得到了必要的幫助，最妙的是這個幫助，正來自他們屢次抗議示威的北京政府。

像當時大多數醉心改革的中國人一樣，學生們支持在廣州的國民黨政府，而反對合法的北京政府，因為那是軍閥們接二連三陰謀奪權的目標。學生們也和一般人一樣，可能懷疑北京政府，是否有利於中國；但它經常有利於學生，則是無可置疑的事實。雖然學生們曾在巴黎公使館前示威，然而公使陳籙卻懂得他們的心意。一九二二年秋，內閣的改組，終於使得李石曾為學生爭取到一筆可觀的接濟費。十月，新內閣在王寵惠主持之下，為學生通過了十萬大洋（大約合美金十萬元）。

扭曲的幽默，北京政府所通過的十萬大洋，終於使得它在法國的激烈抨擊者，形成了一個有效的組織——勤工儉學學生總會。不像它的無政府主義者先驅，這個團體擁有四位永久性秘書，其中只有一個長時期住在巴黎。這個永久性秘書就是任卓宣，後來變成中共在法的領導人。

任對其黨籍，一直加以保密，否則他便不可能從日後廣受共產黨影響的學生中，獲取高位。一九二三年初，他以黨的首席秘書身份，在巴黎公開露臉。共產黨的困厄日子是過去了。蔡和森、趙世炎和陳延年已離法返國。他們的地位已為彼輩所鄙視，被沾滿銅臭味的機器所取代，而錢來自「反動的」北京政府。

但北平的慷慨捐助，只不過為巴黎的中國學生創造一種新的氣氛罷了。蘇俄誘惑又接踵而至。在共產黨刊物中，包括胡志明的「勞動報」，開始出現莫斯科學生日常生活的誘人報告。一所為東方勞動者而設的共產黨大學成立了，且大言不慚地自我吹噓，這在我們西方，是那些大製造商幹的事。在巴黎的中國學生，雖然已經得到很多接濟，

但他們仍想獲得自由教育的延長，因此莫斯科新大學的宣傳，留給他們極深刻的印象。一九二二～二三年間的冬天，中國學生大批赴俄的浪潮開始了。

周恩來是這個運動的策劃者之一，自從蔡和森等一批領導人離去後，他的重要性大增。周過的是四處奔走，居無定所的生活，他對於法國工廠生活的體驗，只限於在雷諾（Renault）工廠的兩個星期。而後他奔走於比利時和德國之間，招募中國學生赴俄求學，並安排他們的行程。當他留在巴黎時，他的主要任務是以共黨首席談判者的身分，去與其他學生團體進行磋商。

當中國學生社團分裂成無數對立的小黨派時，這類的談判，就更為需要。一方面，當國內的國共合作進行得更為密切時，在法的共產黨員，獲得地方性國民黨同情者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那些不贊成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依賴蘇俄的人，擁護純粹的國家主義，而反對親蘇同盟所主張的國際主義。當親蘇同盟組織完備後，純粹國家主義者，也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結合力量，組成一個新的政黨——中國青年黨。在反對帝國主義的示威遊行的場合中，所有團體仍然採取一致行動；但特別在這種場合，或其他國慶慶典時，經常發生流血衝突。於是事後，周恩來總是去拜訪青年黨領導人，以平息爭論，而且時常和徐特立（最早的留法工讀學生，有一段時間是毛澤東的老師）一起前往。而在另一次的談判，周和李富春同去，李富春在青年黨領導人的日記上，被認為是「國民黨的代表」^③。

對於這項認定，我們無須驚奇。因為在法國，就像在中國一樣，要那些不是國共聯盟的人，來區別究竟誰屬於那一黨派，是一件日趨困難的事。直到一九二四年三月，國民黨才在巴黎設立一個正式總部；

③〈曾琦（曾慕韓）先生遺著〉，頁四六三。

當總部設立時，很自然地接受共產黨的幫助。任卓宣負責宣傳工作，而組織的重要部門，仍然操之於周恩來那幫共黨手中。早期國民黨總部，所攝的團體照片中，顯示周恩來坐在前排中央，而任卓宣和李富春則站在後面。難怪胡志明的「勞動報」，視中共為「國民黨的左翼」^④。

一九二四年一月，兩黨政府在廣州正式成立，加速了留法工讀學生團體的瓦解。對周恩來及李富春而言，它提供了一個回國，以便在擴大的兩黨階層中，爭取重要職位的好機會。對於另外一些人，則提供了留學俄國更美好的遠景。至一九二五年，尚有一千名學生，留在法國；但其中很少是第一批去的工讀學生。那些老的領導者，只有任卓宣留下。他領導一項示威運動，以支持上海的五卅運動，被捕下獄，經短期監禁，終於一九二五年二月離法赴莫斯科。

五、結 論

詳細觀察留法返國的中共領導階層，我們會因他們在國外經驗的雜陳而大感驚奇。有些人，像蔡和森、陳毅、李立三，一開始便表現出作領導人的傾向，他們因盲目地煽動叛亂，於一九二一年底，換來了被驅逐出境的代價，所以他們在法的生活經驗非常短暫。其他的人像周恩來、李富春，早期也表示他們對政治的傾向，但表現得較為慎重周密。起初他們只是跟隨那些比較出色，比較善於言辭的同志，直到共產黨已經穩固地成爲一個正式組織時，他們才躍居於領導地位。我們若誤解周不擅長外交斡旋，只要看看周當時已開始扮演日後第二號領袖的角色，就可使誤解冰釋。他捲入留歐學生的政治鬭爭很深，使人懷疑他是否深深打入外國社會。一個工讀生學習得少，工作也不

④Le Paria, No.32. (Feb-March 1925)

多，適與鄧小平、聶榮臻成了明顯的對比。後者的名字在當時鮮少提及。不像那些好出風頭的同志，鄧、聶才是名符其實的工讀學生，因此他們也被認為已深受法國生活習慣的感染。但這真正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人們有時候認為：在歐洲受過訓練的中共領導者，他們的世界觀比「本土主義者」（像毛澤東）的世界觀，較為廣濶。我們很難分析這種假說，尤其是像現在的美國人一樣，缺乏和中共之間的個人接觸。但是把他們分成「本土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也很難有可靠的依據，來判斷他們的世界觀。外國教育本身並不一定塑造開濶的心胸，而留在本土者的眼界，也並不一定狹窄。研究那些外表看來嚴峻的共產黨，我們必須尋找比較富有彈性之方式，着重於若干領導者的個性，而不能以他們在國外所受的教育遽下判斷。

因此我們不能一口咬定，在北京的留法集團，必定親法，同樣的我們也沒有理由，認定留俄的學生一定親俄。中國哲人和一九一九年以前陳獨秀之輩的親法言行，今日在北平已不多見。然而，應該記錄的是：他們開風氣之先，使得成千的中國青年湧向法國求學，並且在法國本土，成長了中國共產運動的分支。年輕時的周恩來，在巴黎寫道：「雖然我們是中國人，但我們的看法必須是世界性的（Cosmopolitan）」，他已將中國哲人和馬克思、恩格斯及列寧等人的教訓結合起來。這種結合可視為純粹的歷史興趣，正如我們視中共政府高度培養的國家主義一樣。但歷史之變成毫無相關性，僅只因為它在前進嗎？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話，那麼那些評估共產中國的西方人，可說很少符合這個原則。他們的評估幾乎一成不變地停留在歷史的假定上。有的激動地告訴我們：中國共產主義所造成的威脅，實源出蘇俄。也有的以同樣的熱情這樣認為：中共在一九三〇到一九四〇年間所發展

的某種程度自治，使它更爲中國化，而且更無危害。有人這樣警告說：中國帝國主義並非只爲其爆炸性人口尋找出路，並且要恢復古代王朝對藩屬國的宗主權。我們也聽過，牽強附會的歷史解釋，一方面是中共領導者一時的謹慎，而另一方面又是他們一時的魯莽輕率。每當共產黨依照他們的意願，訴諸殘酷的鎮壓手段時，就使我們想起，他們的政府形態是東方式的，而他們的政黨，根本不懂西方社會民主制度調和的影響。總之，我們從中國歷史上得到一個教訓，那就是緊密的適應北平領導者的每一種語氣和行動。

無論如何，這篇報告並不想教給人這樣一個教訓。它也不是爲鼓吹「中」法戲劇性的接近而作。然而，它有一目的：揭開中共歷史上，一般未被埋葬而鮮爲人知的插曲，以便對整個運動，獲得更透徹的瞭解。這個運動並非產生於像上帝安排好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土地上。事實上，它萌芽於一個普遍反對民族主義的時代。（共產黨的主要創立者陳獨秀，曾拒絕加入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組織，因認其過份民族主義）。沒有一個人能否認，馬、列和恩格斯是毛澤東思想的來源，但毛在聽到馬克思名字之前，他和其他中國青年的急進分子，已受到中國哲人們思想的洗禮。他們所造成的新紀元，被稱爲「中國文藝復興」。在我看來，它或許稱爲「中國的啓蒙運動」更爲妥切。中國哲人們是最極端的世界主義者，而他們的失敗，是由於想急速西化中國。其中李石曾爲了破除種族的藩籬，而大力提倡種族通婚。他的願望並沒有達成；但他的成就在於：遣送大批富有創業精神的青年學生到法，學習西方的各種方式。從這些富於進取心的青年學生當中，產生這麼多的中國共產運動領導者，亦絕非偶然之事。他們所倡導的運動，一方面導源於西方和世界主義者；另一方面也導源於中國和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將它的起因，歸結於單一的源頭，這樣子就會把握不住它

錯縱複雜的性質，也不能為真正的學術研究和冷靜的外交政策，提供服務。

【譯者小記】（譯文原載東亞季刊，六卷一期，六十三年七月）

本篇寫於中共與法國建交之前，原名“The French-Returned Elit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收於“Symposium on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一書（香港大學一九六二年出版）。作者 Conrad Brandt 曾獲哈佛大學博士，任教加州大學（伯克萊）。此文為其在「遠東之經濟與社會問題研討會」（一九六一年九月港大慶祝建校五十週年所舉辦）上所宣讀之論文。由廖淑宜、林月蓮兩同學擔任初譯工作，三井再校閱全文，惟因時間匆促，疏漏錯誤之處在所不免，敬祈讀者指正。

鄧小平在法國的歲月

——王楓初 (Nora Wang) 原作 陳三井 姚淑芬 羅玉絲合譯

(譯自 *The China Quarterly*, No.92, Dec. 1982 原題為
Den Xiaoping: The Years in France, pp. 698-705.)

鄧小平已經成為好幾本傳記的主人翁^①，但有關他早年在法國的歲月，絕大部分的傳記却都語焉不詳。然而，他在法國的五年時光是不可能默默而逝的，因為就在法國那段期間中，他在政治上首度嶄露頭角，並且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些事實是不容辯駁的，但此一段插曲，就一般的傳記而言，只有簡單一筆帶過，而且往往互有出入。例如，包華德 (Howard L. Boorman) 所編的《民國名人辭典》^②說：「鄧氏自從在成都上過一個留法預備學校之後，即前往上海，並在一九二〇年初由上海乘船赴歐洲^③。並沒有任何紀錄提到鄧氏在法國進入任何學校或大學就讀；至於他從事何種工作也不清楚。」正如包華德所指出，鄧氏在法國停留期間，純以加入中國共產黨駐歐支部及 (單純地提供技術) 替《赤光》印刷這兩件事著名^④。據來自蘇俄

①特別如：周荀編，〈鄧小平〉(香港，一九七九)；Chi Hsin, Teng Hsiao-Pi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Hong Kong: Cosmos Books Ltd, 1978)；和田武司、田中信一：〈鄧小平傳〉(中文版，香港，一九八一)。

②Boorman, H. L.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 II (Columbia, 1970), pp. 252-53.

③事實上，鄧小平與一羣四川同學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搭「博爾多斯」號赴法。參閱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上海，一九八〇年)。

④《赤光》於一九二四年二月在巴黎出刊，代替《少年》而成為中國共產黨駐歐支部的機關刊物。

的消息和鄧氏本人對斯諾 (Edgar Snow) 的說法^⑤，以及克萊恩 (D. W. Klein) 與克拉克 (A. B. Clark) 兩人合編的《中共名人傳記》^⑥，對此有更詳細的說明。據他們說，鄧小平曾介入一九二一年勤工生佔領里昂中法大學事件^⑦。在一九二二年參加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並於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其後不久，他離開法國前往莫斯科。至於離法時間，據《中共名人傳記》說是一九二六年，而《民國名人辭典》則列為一九二五年。中文資料方面直到最近，也未能提供較清楚的說明。例如，紅衛兵 (Red Guards) ^⑧ 所出版的一本傳記中提到，鄧氏加入中國共產黨竟是在一九二五年！根據這項資料，鄧氏住在蒙達集 (Montargis, 巴黎南方約六十哩處的小鎮)，受雇於一家工廠，從事橡膠鞋類的製作，並幫同事燒飯。

即使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六年間鄧氏的行事無法完全重建，特別是較早的幾年仍然模糊不清。但根據法國檔案^⑨，針對若干重點加以檢查仍有可能，尤其它可以補充一些空白。

或許鄧小平在前往法國時採用了化名——鄧希賢 (法國文件上拼

^⑤ Edgar Snow,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57) .

^⑥ Klein, Donald W., and Clark, Anne B. (eds).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5*, Vol. II, (Harvard, 1971), pp. 820-21.

^⑦ 第一次大戰後，各國協議將庚子賠款用於教育用途，一個顯著的成果，就是里昂中法大學的設立，由中法雙方共同遴選中國學生就讀。一九二一年學校開學前，一羣勤工生在共黨份子領導下，先行佔領該校。最後出動法國鎮暴警察鎮壓，並導致一〇四名勤工生之被遞解出境。

^⑧ 譯文收在《中共文化大革命》 (*Rev. Cul. dans la Chine pop.*)，巴黎，一九七四年，頁二七五。

^⑨ 這些資料保存在法國檔案館，屬於內政部的有文號 F⁷12906 的「共產主義在中國與德國」(一九二〇～二五)和文號 F⁷13438 的「中國人在法國」(一九一四～二七)，以及前殖民部的資料。

成 Teng Hi Hien 或 Teng Si Sien)¹⁰，一般官廳和警察僅僅知道他的名字而已。一九二〇年十二月鄧在馬賽上岸¹¹，他與一批來自四川的年輕人在勤工儉學會的贊助下，從上海出發到法國求學並工作¹²。鄧氏是這一羣人當中年紀最輕的一個，年僅十六歲而已。十二月十八日，他在外僑登記簿（可能在馬賽）上填明，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二日出生於四川，雙親為鄧文明和鄧恬治（譯音）¹³。

這以後的三年，小鄧一直逗留在法國，追溯他的活動輪廓是可能的，但年表上仍有若干空白。大致情形如下：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搭「博爾多斯」（Porthos）號
抵達馬賽。

十八日 辦理外僑登記。

一九二一年 一 至 三 月 就讀於拜耶爾（Bayeax）中學¹⁴。

一九二一年四月至二二年二月 在巴黎地區一家工廠工作，住在哥倫比（La Garenne-Colombes）¹⁵。

¹⁰ 鄧小平的姓名曾引起若干爭執。某些作者可能根據李璜一九七三年在臺北所出版的回憶錄，認為鄧小平實際姓闕。然而，這可能是李璜自己搞混了。來自四川的同一羣學生中另有關時杰其人，在法國警方紀錄中也提到過他。

¹¹ 據張允侯前書，「博爾多斯號」於十二月十三日抵達馬賽。

¹² 有關勤工儉學的史料，請參閱張允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北京，一九七九～八二年），三冊。

¹³ 入境號碼為一四〇。

¹⁴ 一九二〇至一九四〇年法國的勤工儉學檔案，原存國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院的現代中國研究與資料中心，現已全部移交國家檔案館，其編號為 47AS（譯者另按）。

¹⁵ 在蒙達集市政廳所作聲明，見一九二二年市政廳資料的外僑登記簿。

184 勤工儉學的發展

- 一九二一年 九 月 在共黨份子發動下，參加里大事件¹⁶。
- 一九二二年 二 月十三日 抵蒙達集，在市政廳外僑登記簿上登記的職業是體力勞動者。
- 九 月 三 日 離開蒙達集，前往沙蒂昂（Châtillon-Sur-Seine）¹⁷；就讀於沙蒂昂中學¹⁸。
- 一九二三年 二 月 二 日 回蒙達集，開始在胡欽孫（Hulchinson）橡膠工廠工作¹⁹。
- 三 月 七 日 離開胡欽孫工廠，仍留蒙達集。
- 六 月 十 一 日 離開蒙達集，據稱重返哥倫比²⁰。
- 直到一九二六年一月（？） 住在巴黎地區，從事工廠工作，特別是在比昂古（Billancourt）的雷諾（Renault）汽車廠工作²¹。
- 一 月 七 日 離開比昂古（自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以來，他都住在該鎮 Castéza 街三號），經由德國前往蘇俄²²。

¹⁶ 參閱¹⁹。如鄧小平參加了這次事件，無疑是小心謹慎的。因為除了領頭的趙世炎一、兩個例外，涉及本案的學生事實上均被遞解出境。

¹⁷ 蒙達集市政廳資料。

¹⁸ 沙蒂昂是靠近迪松（Dijon）的一個小鎮。這次停留是根據鄧氏離開蒙達集時所作的聲明而得。

¹⁹ 胡欽孫紀錄，一九二三年該廠僱工登記簿。

²⁰ 同註¹⁹，並見蒙達集市政廳資料。哥倫比位於巴黎西南郊。

²¹ 國家檔案館（簡稱 AN），F⁷12900，F⁷13438。

²² 同註²¹。

從上述年表可知，仍有許多地方模糊不清或不够確定。這可能是因爲，幾乎所有法國方面的資料都是根據警方的紀錄而來。假如從這些資料上顯示，鄧的成爲突出人物僅是在一九二五年夏天之後，那是因爲在那段時期前，他的政治活動毫無疑問地相當謹慎小心²³。事實上，據中國方面資料指出，早在一九二二年鄧即很明顯地同情並附和當時的共產主義活動。真確的時間是他在那一年加入少年共產黨，而於一九二四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二年夏天成立的駐歐支部）。然而，除開他的技術責任外，起先他似乎在這兩個組織中並未擁有任何地位。初加入中國共產黨，鄧氏實際負責的僅止於印刷，主要工作是印製共產黨宣言以及《赤光》刊物²⁴。由於這項工作，他在同志間贏得一個稍帶譏諷意味的稱號——「印刷博士」²⁵。他一直擔任這項工作直到離開法國爲止，有事實爲證：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警察搜查他位於巴黎郊區的最後住所，發現房間內遺有兩臺附有鋼板的油印機設備、捲筒以及幾包印刷用的紙張²⁶。

從一九二五年下半年開始，鄧氏已成爲法國地區中國共產黨活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這種竄升主要是因爲幾次對公眾的演說而來。所謂公眾，是指有限的中國僑民中的同情者。一九二五年八月，鄧希賢被選爲法國地區國民黨代表大會的代表，那次的選舉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獲得確認²⁷。如前所述，自一九二五年八月以來，鄧氏即住在

²³ 這當然不是一項通則，以周恩來爲例，至一九二四年夏天離開法國時爲止，他一直是中共駐歐支部與國民黨歐洲總支部的主要負責人。而警察機關很遲才注意到鄧小平，直至一九二五年一月才開始偵查他的活動。A. N. F⁷12900。

²⁴ 同註⁴。

²⁵ 國家檔案館至少藏有鄧小平以鋼板蠟紙印出的兩份小冊子，其時間爲一九二五年六月。

²⁶ A. N. F⁷12900。

²⁷ 得自一九二六年末在馬賽——上海航線的一條船上所擄獲文件（殖民地檔案）。

巴黎西南郊的比昂古小鎮 Castéza 街三號——一家專供中國人居住的旅館。事實上，鄧氏和他的兩個同伴——來自上海的共產黨員楊品蓀以及傅鍾合住五號房間²⁸。傅鍾和鄧一樣來自四川，當一九二四年夏天周恩來離開法國之後，曾經出任中國共產黨駐歐支部的書記²⁹。這三個人把時間奉獻在同樣的活動上。據警方報告說：「有兩個人和鄧希賢同住並抱持相同的政治見解。當鄧氏外出時，他們也形影不離地相隨」³⁰。表面上傅鍾居於比較次要地位這一事實，使我們對於傅、鄧兩人在中國激進圈中的個別重要性感到不解。實際上，我們可以這樣問：究竟是誰在庇蔭誰？是鄧小平被推擁出來保護傅書記呢？抑或他在一九二五年已經扮演著主要的角色？

事實可能如此。根據警方資料，鄧小平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伊西·列·穆林諾 (Issy-les-Moulineaux) 主持一項中國共產黨會議，雖然他並不是主要演講人。共有二十五個人出席這次會議，討論主題是「重建中國共產團體的必要」³¹；由於一九二五年六月示威運動所導致的遞解放逐，已使該團體顯得迷惘混亂。十一月十五日，鄧氏再度主持一項會議，這次集會主要是為紀念國民黨鬪士——王京歧。王在被法國驅逐出境後，於十月間死在被遣送回國的船上³²。在這

²⁸A. N. F⁷13438。

²⁹傅鍾是三十年代紅軍的政治幹部，接近張國燾路線；後來在延安成為毛澤東的崇拜者，並領導「抗大」的政治部門。在五十年和六十年代，他是「人民解放軍」的高幹。關於他到法國的情形，參閱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在〔北京晚報〕的談話。

³⁰A. N. F⁷13438。

³¹A. N. F⁷12900。

³²王京歧是國民黨歐洲總支部的領導人，患有肺病的他，雖然從未成為共黨黨員，却與共黨相當接近。他雖因病得以摒除許多政治活動，但仍在一九二五年六月示威事件後遭到驅逐。

個場合，共有四十七個中國人聚集在貝勒市（Belle Ville）波耶爾（Boyer）街的一間會堂中³³。警察眼線誤以為這些是來自色佛（Sèvres）或聖克盧（St. Cloud）的中國人。鄧小平先致開幕辭，宣布開會的主旨，並為十一位發言者的話做出結論。依據警方的紀錄，鄧氏曾如此表示：「我們呼籲在座諸人，繼續從事反抗帝國主義的戰鬥，並在心中永遠銘記我們已故的王京歧同志」³⁴。其後，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三日在同一個地點由「旅法華人援助上海反帝國主義運動行動委員會」³⁵所發起的會議中，鄧氏向與會的七十人（包括兩個安南人）演說³⁶。在這次集會上，共產黨員表示了他們的願望，希望促成他們所支持的馮玉祥將軍和蘇俄的接近。鄧小平並主張與蘇俄政府親善以對抗帝國主義。會議的結果，通過向駐法公使陳籙致送一份最後通牒，要求陳籙：（一）鄭重向法國政府及各國駐巴黎的外交團抗議他們的帝國主義；（二）致電中國各駐外使節，向其駐在國政府抗議帝國主義以及派遣戰艦和軍隊到中國的行動³⁷。整個看來，對中國外交官充滿直接的威脅。

鄧希賢也因另一種方式涉及一樁秘密行動而引起法國警方的注意。事實上，他和另一位共產黨員以及兩個中國民社黨黨員，包括被稱為 Paul Yang 的楊塞道（譯音），被懷疑幕後策畫一項針對中國青年黨，特別是青年黨領導人何魯之的告發運動。何魯之和他的青年黨

³³ A. N. F¹12900。

³⁴ Ibid.

³⁵ A. N. F¹13438。

³⁶ 這個委員會，名為「旅法華人行動委員會」，或稱「旅法華人援助上海反帝國主義運動行動委員會」，在共黨煽動下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成立，以支持五卅運動。

³⁷ 馮玉祥此時正掉轉槍口對抗他以前的盟友，被日本買通的張作霖。

朋友，在中國僑民中素以反共著稱，被激進份子控告，在六月的示威行動中出賣了他們。前述四人甚至被控企圖暗殺青年黨的領袖。「民社黨和共黨的領袖正公然地尋找有能力做案的個人」³⁸。這樣的計劃，即使存在（僅係警方片面處理青年黨的恐懼而來），終究沒有實現！

現在該是我們扼要地審視下一九二五年六月事件的時候了。正因此事，或更正確地說是它的不幸結果，大致可以讓我們理解鄧氏何以能在警方注視下竄起的原因。那時，中國僑民的革命運動主要由一小組所領導，其中最有名的成員可能是任卓宣。任氏也是四川人，一九二三年成爲中國共產黨法國分部的書記。因此，他是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巴黎中共黨徒及其附和者襲擊巴比倫街（Rue de Babylone）中國公使館的主要策劃者。當天，約有一百名中國人爲表示對上海「五卅」事件的支持，而佔領了中國政府在法國的外交館舍³⁹。此一事件激盪了法國輿論若干時日，但純屬象徵性的意義，結果引起普遍的鎮壓風潮，實際上「整肅」了中國僑民中的最激烈份子。經過迅速的調查，也可能得自若干中國人對當局的協助，共產黨徒及其夥友的身份被證實了。不久之後，他們之中約一百名離開了法國，內有四十七人是被驅逐出境的，其餘的則是自願離開。任卓宣和三個同伴被收押繫獄，聽候審判，而在適當期間仍須離開法國。這些事實可以說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各種急進會議何以出席率不高的原因，更可能解釋像鄧小平這樣一直扮演著技術性角色的人，何以必須追隨前人之步伐走到幕前的原因。我們不要忘記，一九二五年，這位「印刷博士」不過二

³⁸ A. N. F⁷12900。

³⁹ 詳情請參閱作者即將問世新作——〈打陳籙，巴黎的五卅運動〉。這次示威運動的領導人任卓宣，於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二八年脫離共黨。使用筆名「葉青」，他成爲三十年代的一位反毛理論家，後來是國民黨的主要宣傳理論家。

十一歲而已⁴⁰。時勢推動他爬升至共黨運動的最前哨地位，同樣說明了他在法國僅有六個月的短暫居留。他所從事的各項活動，特別是涉嫌共謀對付何魯之事件，很快引起警方搜查他的房間，這種搜查只是逮捕政治嫌疑犯的一部份。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的早上，比昂古三家專供中國人居住的旅館，包括 Castéza 街的一家，都受到警察的搜查。他們發現五號房間空棄著，好像這天以前就如此。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印刷設備外，房間的三個居住人遺留下書籍、期刊和各種紙張⁴¹。

因此可以肯定，那是一月七日鄧小平和傅鍾離開巴黎經由柏林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正如事後警察局報告所說的：「似乎這些人感到被懷疑而匆忙地溜走了」⁴²。

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法國分部的歷史地位，因此變得益形重要了。他是以前所謂的「第三代」領導者角色出現的。第一代領導者大都在一九二一年的里昂事件中離開了法國；第二代的領導者（除周恩來於一九二四年自行離去外）之被迫離開，則是一九二五年夏天事件的結果。然而可能主要由於環境的改變，所能盡力的不過是一場最後的、短暫的「困獸之鬪」。無論如何，法國檔案中並無任何資料，能使我們對鄧氏的行為和思想有足夠清楚的概念，以瞭解他的領導能力或特殊的政治哲學。在缺乏任何更進一步的資訊下，我們對於前面年表所提供的史實重建，應該感到滿足！

⁴⁰然而，警方根據外表，估計他大約二十三歲。若由一九二一年在巴黎所拍攝的一張著名照片看來，更令人感到驚訝！這張照片可以指認出少共法國分部的幾位黨員。〈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一書重刊過這幅照片。

⁴¹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的警察報告，A. N. F⁷13438。

⁴²與他們有關的驅逐命令，是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八日下達的，名單上另加「等候通知」字樣。參閱 A. N. F⁷ 14655「一九二五年～二八年遞解出境外僑一覽表」。

除開他的年齡（他抵法時，比同一條道路的大部分中國學生年輕二、三歲），鄧的旅程行踪也是很典型的一個。大多數的勤工儉學生遭遇同樣的人生浮沈，缺乏經濟來源；上省級中學，從事非技術性的工作，經常的變動移居，這是他們的共同命運。在思想急進方面，從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五年期間，大約有二百人成爲急進的共產黨徒⁴³，只有極少數對於左派一無同情。也有少數人在到法國之前便具有明顯的政治思想⁴⁴，但大多數的情形並非如此。這一點，急進者的行動發生了部份的影響，我們猜想，也與法國的環境同樣地有所關連。大部份參加勤工儉學的中國人，對於在法國一面追求較高層次的教育，一面尋找待遇優厚的工作機會都充滿幻想。實際上，一九二〇年代危機重重的法國很少有工作可以提供給這些外國人，即使在應徵時他們的資格也欠缺；他們的中國文憑並不能給予他們在大學就讀的地位，所以必須退而在若干中學所開的特別班上學。爲此，他們在攢積學費上遇到相當大的困難。他們之中大部份的法語說得不够靈光，加上所遭遇的物質困難，造成一種自然的趨勢，他們喜歡羣居在那些容易進入的學校或雇用外國工人比率較高的工廠（如雷諾汽車廠）四週。這種集中（過半數的中國僑民住在巴黎地區）使得急進者的工作更爲容易，因爲這許多年輕中國人所受的挫折，毫無疑問地爲他們的任務提供了背景。至於與法國工人或他們政治性組織和工會之間不可避免的接觸，是否也扮演一個角色？確定這方面的事情是很困難的。無論如何，正如鄧氏的個案所顯示，中國勤工儉學生明顯地有一種「劃地自限」（keep themselves to themselves）的傾向，他們的政治活動大致也以僑民爲限⁴⁵。

⁴³ 包括共產黨員與少年共產黨員。

⁴⁴ 有關周恩來的活動，參閱《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天津，一九八一年）。

在急進程度方面，鄧的傳記同樣提供了範例。從資料檢查所得，讓我們對他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有粗略的瞭解，顯示那是從少數一些基本資料（大部份源自蘇俄）滋長而來。據警方房間搜查報告指出，鄧和他的同伴擁有大量的中法文共產黨宣傳小冊子（例如中國工人、孫中山的遺囑、共產主義ABC等）、中文報紙，特別是在莫斯科所出版的中共報紙——〔進步〕^{④5}。事實上，在一九二〇年代，無論國民黨共產主義ABC，都不足為奇。同樣的，鄧氏在他的早年生涯，先以年輕急進的少共黨員身份加入共黨，繼而順從聯合戰線的指示成為國民黨員，最後遵照中共中央的訓示前往莫斯科，也沒有什麼不尋常之處。往後的事件發展可能帶給我們這種印象，認為那是最後這個階段留下最深刻的痕跡。然而，無論鄧小平或其他許多同伴^{④6}，我們不應低估他們在法國逗留期間的重要性。因為這段歲月扮演了一種不可或缺的導引角色。

（譯文原載問題與研究，第二十四卷，第七期）

④5 中國人與法共之間的關係，可以說問題甚多。理論上，法共透過其殖民組，對初期的中共興趣並不甚高，曾在其草創時期數度參與並在一九二五年事件後提供法律上的幫助。但有關這種幫助的重要性的方式，卻乏足夠的資料來加以說明。

④6 這種閱讀資料的貧乏，不僅說明了這些人的窮困，也表明了他們並非是長期不變的代理人（指共產主義信徒）這一事實；即使他們遭遇過短暫的失業，但大都在工廠工作。任卓宣住處在六月事件後被搜查，發現藏書頗多，則是一項例外。

④7 如果說對許多急進的中共黨員而言，法國意味或代表前往蘇俄的「候車室」，就某些情況來說，這就是一種訓練的標誌。自一九二三年四月開始，沒有一個中共黨員不是渴望著遵照指示，經由蘇俄返回中國。

評張洪祥合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簡史》

- 一、前言
- 二、內容概要及其論點
- 三、文獻資料上的特色
- 四、歪曲、竄改和不當之處
- 五、對本書的評價

一、前言

勤工儉學運動由李煜瀛（石曾）、吳敬恆（稚暉）、蔡元培（子民）等人所發起，倡議於民國初年，盛行於歐戰結束之後，是一項鼓勵家境不富裕的年輕人到法國「勤以作工，儉以求學」的留學活動。勤工儉學的發起，與以往的留學目標一樣，原意在為國家培植人才，想不到後來因為法國面臨種種經濟危機和嚴重失業問題，許多工廠停工，以致大批學生「勤工無門，儉學無路」，遂鋌而走險，從事變質的政治運動，最後成為孵育共產黨人才的溫床^①，像日後共產黨的若干高級幹部，如周恩來、鄧小平、陳毅、陳延年、陳喬年、蔡和森、蔡暢、向警予、趙世炎、徐特立、聶榮臻、何長工、劉伯堅等人，都是當年的勤工儉學生，可見這個運動影響之大。

① 嚴靜文，〈周恩來評傳〉（香港，波文書局，一九七四年），頁四七。

勤工儉學運動的研究，晚近受到海內外學者較大的注意，這由各項資料的陸續整理出版和研究成果的不斷發表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在這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尤其文革後它所出版的有關資料和研究成果，特別受到學界的重視。論史料的出版，較重要者有《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清華大學中共黨史教研組編，共四冊）、《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張允侯、殷毅彝、李峻晨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只出上册）、《新民學會資料》（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合編）、《新民學會文獻匯編》（湖南省博物館歷史部校編）、《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五四運動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冊）、《五四運動回憶錄續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一冊）。論研究成果，較重要者有《向警予傳》（戴緒恭撰，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恩來的理論及其貢獻》（胡華等著，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留法勤工儉學簡史》（黃利羣編著，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簡史》（張洪祥、王永祥合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能够對整個運動過程作一鳥瞰式的探討，只有前述的兩本簡史。在此，先對張洪祥、王永祥合著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簡史》作一評介。

二、內容概要及其論點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簡史》為卅二開本小冊，全書共一五六頁，除前言外，共分五章，約十萬字，並附刊周恩來、趙世炎、蔡和森、蔡元培等人照片及法輪波爾多斯號與布里村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舊址等圖片多幅，而且以巴黎艾非爾鐵塔為封面，除具地緣象徵意義外，並具活潑性，增加讀者閱讀興趣。

第一章追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興起，共分四節，首述近代留學生運動的發展。作者認為留法勤工儉學經歷了留法儉學會、勤工儉學會、留法勤工儉學會等若干階段的發展過程，直到五四運動以後，才形成了空前規模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對於李石曾、吳稚暉等人為什麼主張去法國留學，作者也有簡單的分析，認為：（一）法國是資產階級革命進行比較徹底的國家，無論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新學說的創立，都走在世界各國的前端；（二）清末，留學生制度形成一種變相的科舉制，當時「社會上總存有西洋一等，東洋二等，本國三等的偏見」，「無論是留學生的派遣或畢業後的任用或待遇，一般都以此種標準為根據，故留學歐美人員漸多，成為熱門。到法國留學，自然也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三）法國的生活費用較其他主要歐美國家低廉。其次介紹兩個推動勤工儉學的組織—留法儉學會與勤工儉學會，並論列這個運動的幾個主要發起人，包括蔡元培、吳玉章、李石曾三人。再為談華工教育與華法教育會，對於惠民公司招募華工到法國的情形也有簡略的介紹，而將重點置於華法教育會對華工教育的注重。最後談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主要介紹保定高陽縣布里村、南關育德中學、北京法文高等專修館三所學校。

第二章分析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熱潮，亦分四節。作者一開頭即指出，中國青年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和教育，「改變了青年人輕視勞動的舊觀念，因此在社會上出現許多實踐亦工亦學的「工學會」和「工讀互助團」等團體，並且在「勞動神聖」口號的鼓舞下，紛紛走上了旅法勤工儉學的道路。緊接著作者特別強調，「五四運動直接推動了旅法勤工儉學運動的發展。在這以後，一批又一批青年學生遠涉重洋，奔赴法國。湖南是當時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開展得最蓬勃的省分之一，作者認為主要是毛澤東與蔡和森在長沙成立了

新民學會，積極領導會友向外發展的結果。同時指出，毛、蔡等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目的，與華法教育會的宗旨有所不同，它不是爲了單純地學習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也不是追求什麼「科學救國」、「教育救國」，而是借助於這一活動，學習新思潮，培養革命人才，以便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的。繼北京華法教育會成立後，上海、四川、廣東、江西等省市，也都先後建立起華法教育會的分會，負責宣傳和組織本地區的留法勤工儉學活動，使得此一運動至一九二〇年間風靡全國，達到高峯。周恩來是天津五四運動著名的領導者之一，他曾發起「覺悟社」，因率領學生到直隸公署請願示威，因此被捕入獄，直到一九二〇年底始從上海乘法國郵輪赴法。

第三章討論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大波瀾，共分六節，第一節專述勤工儉學生的勞動與學習生活。至一九二〇年夏，赴法勤工儉學生已達一千三百多人，其中進入工廠勞動的有四百四十餘人，到學校學習的大約有六百七十人，其餘爲自由覓工或在巴黎華法教育會領維持費（即救濟金）等候工作。他們勞動的單位，分佈在法國各地七十多個工廠企業，比較集中的據點有巴黎、克魯鄒（Le Creusot）、聖德田（Saint-Etienne）、聖夏門（Saint-Chamond）、勒哈佛爾（Le Havre）、賴華涉（La Rochelle）、里昂等地。至於入校學習的情況，經華法教育會的聯繫安排，有六百七十人被分配到巴黎和外省的廿六所學校學習法文，其中大都集中在巴黎附近的楓丹白露（Fontaine-bleau）、木蘭（Moulins）、聖日爾曼（Saint-Germain）、蒙達集（Montargis）。蒙達集後來成爲新民學會旅法會員的大本營，也是留法學生中宣傳共產主義思潮的中心。第二節主要介紹工學世界社與勞動學會。工學世界社是旅法勤工儉學生中成立最早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團體，其前身爲工學勵進會，一九二〇年由李維漢、張昆弟、李富

春、任理、李林、賀果、張增益等人所發起，其宗旨在聯絡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儲金、訂書報、互相勉勵、疾病救助、工學交互，及為將來別種建劃之預備。同年八月，工學勵進會改名工學世界社，並於九、十月間，在蒙達集開會三天，經過熱烈討論，大多數社員贊成以信仰馬克思主義和實行俄國式的社會革命為工學世界社的宗旨，這一點受到蔡和森的影響很大^②。勞動學會是一九二一年初在巴黎成立的，不久移到勤工儉學生和華工比較集中的克魯鄒。發起人是趙世炎、李立三，主要成員有陳公培、劉伯堅、魯易、袁慶雲、周欽岳等。該會在醞釀建立時，曾準備定名為「共產主義同盟會」，但由於會員中意見分歧，有的人當時還不完全信仰馬克思主義，所以才叫做勞動學會。勞動學會的宗旨，最初也是篤信工學主義的，主張把留法勤工儉學活動堅持到底。第三節談二、二八運動。至一九二一年初，赴法勤工儉學生已經到達一千六百餘人，但只有四分之一有工作，其他都「欲工無門」，唯賴華法教育會每天所發五法郎維持費度日。這時蔡元培到法，不但沒有為勤工生帶來好消息，反而發表聲明，斷絕與勤工生的一切經濟關係，這一來使學生大起恐慌。在希望幻滅下，遂爆發了四百多名勤工生於二月二十八日包圍駐法使館，向公使陳籙請願的風潮，俗稱「二、二八運動」。這場鬥爭，勤工儉學生沒有達到預定的「求學運動」目的，但迫使中法當局做了某些讓步，例如，駐法使館允諾從三月起繼續發放候工同學的維持費，法國當局也乘機成立了「中法監護中國青年委員會」(Comité Franco-Chinois de Patronage des Jeunes Chinois en France)，負責聯繫安排學生的勞動和生活救濟；同時使整個留法學生進一步團結起來。第四節專敘反

^②陳三井，〈新民學會之成立及其在法活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期，頁七七。

對中法秘密借款的經過。緣一九二一年六月，北洋政府特派專使朱啓鈴、財政次長吳鼎昌到巴黎，表面上是代表總統徐世昌接受巴黎大學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而真正的使命是向法國借款三到五億法郎，做為購買軍火的用途。消息傳出後，旅法學生與僑胞莫不義憤填膺，於是華工會、中國國際和平促進會等六團體遂成立「拒款委員會」，從事拒款的各項努力。「拒款委員會」先後於六月三十日及八月十三日召開兩次「拒款大會」，通過「拒款宣言」，並痛打了駐法公使館的官員^③。第五節標題為中法反動勢力迫害留法學生。在拒款運動中，留法勤工儉學生發揮了重大作用，他們團結各界華人，以高昂的政治熱情和不屈不撓的精神，終於瓦解了北洋政府和法國間的借款陰謀。拒款運動的主要對象雖是代表北洋政府的吳鼎昌和陳籙等人，但卻連帶惱怒了法國資本家及外交部，大大損害法國在遠東的利益。因此，由法國教育、外交當局結合實業界所組成、旨在救濟勤工儉學生的「中法監護中國青年委員會」，乃宣布停發維持費，使勤工生走投無路，剩下佔據里昂中法大學一途了。第六節敘述佔領里昂中法大學的原因和經過。里昂中法大學成立於民國十年秋天，為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等一批稍早鼓吹勤工儉學的人，與里昂當地熱心中法教育人士所共同創辦的一所海外中國大學，其目的在以比較經濟的組織，利用國立里昂大學及其他各專門學校現成之設備與師資，為我國作育有志深造之人才。當消息傳出，勤工儉學生奔走相告，無不喜形於色，以為大家有了求學的出路。不料學校一成立，吳稚暉校長另從國內北平、上海、廣州等地招收一百多名「新科貴人」前來，捨近求遠，棄大批勤工生於不顧。此時勤工生的維持費又告停發，他們在希望幻滅下，

^③陳三井，〈周恩來旅歐時期的政治活動，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期，頁二七五。

只好鋌而走險，提出「誓死爭回里大」等口號，並在趙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陳毅等人的領導下，派出先遣隊一百二十名左右，進佔里大校舍，結果被法國警方以「強佔校舍，擾亂治安」等罪名拘禁二十餘天後，集體遣送回國^④。這次被押送回國的勤工儉學生代表共一〇四人，其中有蔡和森、張昆弟、羅學瓚、李立三、顏昌頤、賀果、魯其昌、楊立三、唐靈運、蕭拔、陳公培等湖南代表四十三人，陳毅、陳炎、周欽岳、金滿城等四川代表三十五人，還有湖北代表十人，安徽代表七人，貴州代表三人，浙江代表二人，福建代表二人，陝西代表一人，河南代表一人等，這些人回國後，都積極投入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洪流。

第四章探討中共旅歐支部與共青團的建立。里大事件在整個勤工儉學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對於全體勤工儉學生的思想產生很大的衝擊：(一)他們體認到，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壓迫下，窮苦人家的子弟想通過「勤工」達到「儉學」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些原來希望透過學習學到些技術，回國去搞實業、搞教育，以拯救祖國危難的勤工儉學生夢醒了。(二)從實際鬥爭中，他們體會到必須有一個嚴密的革命組織作為核心，擔當起領導責任，才有取得勝利的可能。基於這兩點認識，旅法勤工生乃積極起而組黨，建立革命性的團體。一九二二年六月間，在巴黎西郊的布隆恩森林(Bois de Boulogne)召開成立大會，參加者有旅法、德、比等國代表共十八人，會期三天，會議決定將團組織定名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通過了章程和工作計劃，並選舉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三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由趙世炎為書記，周恩來為宣傳委員，李維漢為組織委員。後來「旅歐

^④同前註，頁二七七。

中國少年共產黨」改稱「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之部），下設共產主義研究會、華工運動委員會、學生運動委員會，並成立出版委員會，負責出版機關刊物—《少年》。由於少共在性質上不是黨的組織，所以在一九二二年冬，已參加少共的中共黨員另組「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黨支部和少共機關都設在巴黎十三區意大利廣場（Place d'Italie）附近的戈德弗魯瓦旅館（Hôtel Godefroy）裏。當時黨支部和少共機關是重合的，黨員都參加少共組織活動，少共中具備黨員條件的則不斷轉為中共黨員^⑤。中共旅歐支部和旅歐共青團成立，先後出版了《少年》和《赤光》兩種對外宣傳刊物。《少年》的主要內容在宣傳共產主義，論證中國走共產主義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除攻擊比利時天主教會所辦的〔青年會星期報〕以及批判胡適所倡導的改良主義路線外，也用許多篇幅與無政府主義者作理論鬥爭。約在一九二一年年底，華林、李卓等人糾合在法國的無政府主義份子幾十人，成立了無政府主義派組織—工餘社，並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創刊《工餘》月刊，由李卓等負責編輯。無政府主義主張摒棄一切國家政權，主張絕對自由，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否認無產階級建立政黨的必要，並把工人運動限制在經濟鬥爭的範圍^⑥。因此，引起《少年》的反擊，原來信仰無政府主義的陳延年、陳喬年兄弟，最後也投入共產主義者的隊伍。

第五章標題為〈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重點在敘述中共組織在法國所從事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爲了響應國內國共合作的政策，中共旅歐支部和旅歐共青團也與國民黨旅歐支部建立了革命統一戰線，「努力組織工人、農民及小資產階級之革命分子」，使

^⑤〈周恩來青少年時代紀事〉，《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七一。

^⑥胡華主編，《中國革命史講義》（北京，一九六三年），頁四三。

之成爲「反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之主力軍」。在所謂「反帝」鬥爭中，主要有兩件事：一爲反對帝國主義國家之共管中國鐵路，一爲聲援五卅運動；在所謂「反封建」鬥爭中，主要指與國家主義派在思想和行動方面的衝突。至一九二五年下半年，中共旅歐黨員因聲援五卅運動，表現強烈的「反帝」色彩，相繼被法國、德國政府驅逐出境，於是有的輾轉到了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大學和中山大學學習，有的直接從法國、比利時、德國返國，投身另一個戰場的戰鬥，結束了勤工儉學運動。

三、文獻資料上的特色

這本小冊子，據作者自稱，主要在對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經過、發展及其主要活動，作一簡要的介紹，以期有助於了解這一運動與中共革命的關係，並進一步認識旅歐中共黨團組織在中共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據此可知，這是一本研究敘述性的著作，而非資料性的匯編，與《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等書有所不同。但作者在寫作過程中，曾獲當年參加留法勤工儉學和中共旅歐支部活動的李卓然、何長工、劉鼎、江澤民、蕭三（植藩）、唐鋒、房師亮以及張申府等人提供珍貴資料和圖片。同時，並得到中國革命博物館、清華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北京圖書館、天津周恩來同志在津革命活動紀念館、河北高陽縣布里村留法工藝學校舊址展覽籌備組、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湖南雙峰縣委宣傳部等單位的支持和協助，故在文獻引用和資料發表上，頗有前人所未曾使用者，雖尚未構成對整個運動的「翻案」效果，但至少提供一些線索，值得再做進一步之探討。

茲將書中在資料方面所顯現的突破，分別列舉如下：

(一)有關周恩來者

(1)周恩來在歐洲的行踪與活動，仍有若干無法解開的謎。書中根據巴文峻的訪問記，透露周恩來曾化名喬·耐特 (Jean Knight) 在法國中部的布盧瓦 (Blois) 待過，一邊學習法文，一邊進行社會考察 (頁六三)。這是《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續編》、《周恩來青少年時代紀事》(《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 及其他有關周恩來的研究所未曾提及者，值得注意。

(2)書中有不少珍貴圖片，例如周恩來攝於中共旅歐支部辦公處前的照片 (頁一〇五)，即為過去所未披露者。

(二)有關「工餘社」者

「工餘社」是旅法華工和勤工儉學生中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巴黎組織的小團體，成立年月不詳^①。但本書說約在一九二一年底成立 (頁一一六)，想必有所據，可惜沒有註明資料出處。

(三)有關里大事件的被逐名單

一九二一年九月勤工生一百多人強行佔領中法里昂大學事件，是勤工儉學運動史上極為重要的一頁，對於勤工生的前途與命運，乃至中共黨團組織在歐洲的活動與發展，都有重大影響。遺憾的是，當時被遞解出境，搭乘法輪保羅列卡 (Paul Lécat) 號回國的一百零四人

^①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北京，一九七九年)，第四冊，頁二〇九。

勤工生名單（原存法國國家檔案館的勤工儉學檔），已告失蹤^⑧，致情況難明。本小冊對全部名單雖未完全透露，但已就各省代表的確實人數有所交代，顯見有所本，已較先前各書清楚明朗。最近，香港珠海書院陳敬堂已將全部名單和省籍公開披露^⑨。

四、歪曲、竄改和不當之處

中共所發行的一般歷史著作，除了充滿教條與八股之外，也往往歪曲歷史，竄改資料，喜歡往自己臉上貼金，本書也不例外。茲分述如下：

（一）本書在前言裏頭，首先強調，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中，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發揮著主導作用，以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為代表，積極促進和領導此一運動的進一步開展。這不但違背歷史事實，而且自相矛盾。因為除周恩來外，毛澤東、李大釗均未到過法國，他們也都不是留法儉學會、勤工儉學會與華法教育會等大力推動勤工儉學團體的成員，何來發揮主導作用？相信即使毛澤東、李大釗思想的遙控，也不可能發生如此巨大有力的影響？中共方面一提到勤工儉學，十分惱怒李石曾與吳稚暉，所以這一說法主要在抹殺李、吳兩人對提倡勤工儉學的重大貢獻。本書除略為提及蔡元培發起成立留法儉學會，強調「勞工神聖」外，對於吳稚暉隻字不提，而指責李石曾是「一名官僚政客」，因為他反對勤工儉學生開展革命活動，所以就成為「勤工

^⑧ 陳三井，〈法國所藏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介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期，頁四八七。

^⑨ 陳敬堂，〈「進佔里大」事件與中共旅歐總支部之成立〉，〈珠海學報〉，第十四期（民國七十四年五月），頁二八〇。

儉學和華法教育會中反動勢力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一九二一年六月至八月間，旅法華人所從事的「拒款運動」，是旅法華人不論華工或學者學生，不分黨派，一致聯合參加，故能造成浩大聲勢，不單是趙世炎、周恩來等在巴黎組織了共產黨小組領導的結果^⑩。本書把功勞歸給趙世炎、周恩來兩人的領導和勤工儉學生所發揮的團結作用，這是言過其實的！

(二)同理，一九二三年七月間旅法華人的反對列強共管中國鐵路的舉動，主要由少年中國學會會友何魯之、李璜、曾琦等人所發起，加上二十二個團體共同奮鬥的結果，而不是中共旅歐支部和旅歐共青團領導的功勞。周恩來在這次所扮演的角色，雖比「拒款運動」重要，但並未如本書所說，在七月三日下午四時在華僑協社所開的各團體聯合會擔任主席（頁一三三），實際上擔任此次會議主席的是何魯之。研究歷史，應該「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否則混淆黑白，顛倒事實，如何取信於人！

本書除上述所舉，有意並故意歪曲歷史、竄改歷史外，對於資料的引用也動了手腳，即變造資料，以達其宣傳的目的。茲舉證如下：

(一)「**宣傳者**」變成「**領袖者**」——一九二〇年七月六日至十日，新民學會的留法會員在蒙達集共開了五天會，專門討論信仰主義問題和怎樣以「改造中國與世界」作為該會的方針問題。會上對於改造的方法出現了分歧的意見和激烈爭論。以蔡和森為首的革命派，主張激烈革命，立即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即倣效俄國十月革命的方法。而以蕭瑜為代表的改良派，則主張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為人民謀全體福利的革命，以工會合作社為實行改革之方

^⑩ 陳三井，〈周恩來旅歐時期的政治活動〉。

法^①。該書引用蔡和森（林彬）給毛澤東的信，指出共產黨是「革命的發動者、領袖者、先鋒隊、作戰部」（頁六十九），但複查「蔡和森文集」，這一段話卻頗有出入，原文是「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②，宣傳者變成領袖者，一語之差，真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一)孫中山與所謂「三大政策」問題—該書第一二五頁說，「中共『三大』正式確定了實行國共合作，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分參加國民黨的方針。孫中山也堅決採納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所謂「三大政策」，是共產黨杜撰的。在中山先生的著述或言論中，以及國民黨的宣言或議案中，並無「三大政策」這一名詞。「三大政策」來自北伐期間共產黨的宣傳口號。把「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事編為「三大政策」，解釋為新的或革命的三民主義，亦來自共產黨的製造。而其內容，尤非中山先生聯俄、容共及其農工政策的本來意義^③。

書中除以上所述歪曲、竄改等不當之處外，還有一些明顯的錯誤。例如：

(一)華工所乘坐郵輪，遭德國潛艇於地中海擊沉，造成死亡五百四十三人者，並非「妥業蒂斯」號（書一五頁），而是亞多斯(Athos)號。

(二)周恩來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搭乘法國郵船從上海出發，其輪船名稱，並非「波爾加」號（原書五十頁），而是「波爾多斯」

① 陳三井，〈新民學會之成立及其在法活動〉。

② 梁大為等編，〈蔡和森文集〉（北京，一九八〇年），頁五一。

③ 蔣永敬，〈孫中山先生與「三大政策」〉，珠海書院主辦，「孫中山先生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會議論文。

(Porthos) 號^①。

此外，本書的註釋，沒有完全合乎學術著作的要求；書末未列參考書目及索引，不但增加查閱的不便，也減低它的學術水準。

五、對本書的評價

本書的優點，在以通俗的筆法，對整個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作一鳥瞰式的介紹，由於文筆生動，敘事簡明，頗具可讀性；同時，它提供了一些線索，可做為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導引，這一點仍有它不能忽略的貢獻。

但誠如上述，本書由於立場偏頗，故意歪曲，宣傳色彩過濃，態度不夠謹嚴，故不能視為一本學術性著作，而只能看做宣傳性的通俗讀物。但在一本客觀而謹嚴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全史」尚未問世前，本書仍不失其參考價值！

（原載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2)，國史館，民國七十六年四月）

^①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上海，一九八〇年），第一冊，頁七七六；頁八一二附錄，歷屆勤工儉學生赴法一覽表。

附 錄

五四時期工讀思潮的發生及其演變

一、工讀思潮的發生

二、工讀主義的派別

(一)工學會

(二)工讀互助團

三、工讀組織的活動

(一)國 內

(二)國 外

四、工讀互助的成敗檢討

五、結 論

一、工讀思潮的發生

自民國初年以迄歐戰結束前後，一向「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中國知識份子，驟然改變了對體力勞動和勞工大眾的看法，一些前進刊物也紛紛認真的討論工讀的種種問題，一時蔚為風尚。

民初工讀思潮的發生，有其內在和外在的社會背景。就內在而言，中國自清末以來，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事凋敝，實業不振，經濟發展落後，民生困苦，有識之士以為，中國之弱，在於國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故提出「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①。為此，若要開

通民智，恢宏器識，進而改良社會，更非注重一般平民與勞動大眾，先從教育着手不可。蔡元培、李煜瀛、吳敬恒等人於民國初年之相繼發起留法儉學會、勤工儉學會，就是這層用意。

就外在而言，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革命的成功以及翌年冬歐戰的結束，對於中國知識青年的工讀思潮，都產生了重大的刺激。

俄國十月革命後不久，李大釗曾在《新青年》相繼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 的勝利〉等文章，除了竭力贊揚十月革命外，並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並不是那個帝國主義的勝利，而是「庶民的勝利」，全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他把勞工階級戰勝貴族、資本家，看作是「廿世紀的世界潮流」，這種潮流只能迎不能拒。他甚至號召大家：「快去作工！當一個工人！」因為「今後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②

及歐戰結束後，北京學界舉行提燈會慶祝。身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於十一月十六日在北京天安門所舉行的慶祝協約國勝利大會上，發表著名的「勞工神聖」演說。除了強調「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外，並呼籲青年們，「不要羨慕那憑藉遺產的紈袴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粟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乾修的顧問諮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最後他的結論是「此後的世界，是勞工的世界啊！」^③看法與李大釗一樣，從此「勞工神聖」這一口號，很快就在社會上，尤其是青年學生中流傳開

① 梁啟超，「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三冊。

② 〈李大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五月二版），頁111。

③ 孫常煒編著，〈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國史館，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出版），頁204~5。

來。以後，包括《新青年》在內的許多報刊雜誌都出現了「勞動專刊」、「五一勞動節紀念號」，宣傳勞動的重要意義，贊頌勞工階級的偉大。有的文章還批評了孟子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舊觀念，指出「這幾句話我們中國人從來把它看作天經地義的。但是到了現在，我們覺得孟子這話是毫無理由，絕對不能成立了。然而有這種覺悟的人，還是少數。國內大多數人的心理，還同孟子一樣，看勞心的人神聖的了不得，看勞力的人卑賤的了不得。這實在是萬惡無道的思想，我們要全力打破它」^④。

總之，五四運動前後，各種新思潮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像「洪水猛獸」般排山倒海而來，與工讀主義有關的新村理論、泛勞動主義、互助論也相繼引介入中國，使工讀思潮更形澎湃起來。

二、工讀主義的派別

所謂工讀，顧名思義，即是「半工半讀」，或「既工又讀」之意，但由於宗旨、手段、目的的不同，大致可分為下列兩大派別：

(一)工學會

工學會是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一部分在校學生和一部分畢業生所組成的工學主義團體。它的前身是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九日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而成立的愛國主義組織——同言社。後來這個組織的成員在討論有關人生、社會、教育等問題時，逐步接受了工學主義思想，並在同年五月三日正式成立了工學會^⑤。它

④《工學》，第一卷一號，參閱《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二集上册，頁290。

⑤《五四時期的社團》，第二冊，頁499。

的宗旨是要實行工學主義，達到一面作工，一面求學的目的^⑥。爲了宣傳和進一步研究工學主義的理論，該會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創辦了「工學」月刊^⑦。

工學會認爲，求學和作工都是人生所必不可缺少的活動，廣義的「工」應當包括勞力和勞心在內，並且特別強調了勞力的意義。

工學會的人一般都表示要和當時流行的工讀主義有所區別。他們分析工讀主義有幾種不同的解釋：

(1)「做工的人求學」，也就是勞動者的業餘教育，這是從事工人運動和工人教育的人所提倡的，是補救社會上勞力勞心分離的弊病的辦法。

(2)知識份子在學校中爲了培養健康的身體和高尚的道德，或者爲了實驗學理而進行的勞作教育和工場實習，這些僅僅是教學的輔助手段。

(3)貧苦學生爲了補助學費而半工半讀、勤工儉學。在這裡，勞動本身不是目的，只是爲了達到求學而採用的手段。

以上這三種工讀主義，在工學會會員看來，和他們的工學主義是有所不同的。他們的「工學主義」是「工便是學，學便是工」，「活到老，學到老，做到老」。所以他們採用「工學」一詞來代替「工讀」，並解釋兩者之間的差別說，「工讀」在以勞動的工資爲求學的基礎，其目的在求學，而勞動乃爲達到求學目的之手段，其勞動義務，至既滿足其所需求之學費而止。「工學」視作工求學二者，都是人類全體的正義，社會各份子的天職。「工讀」是社會一時的現象，是到必要

^⑥張洪祥、王永祥，〈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簡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頁27，註②。

^⑦〈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二集，上册，頁289。

時可以解除作工的義務的；「工學」是吾人立身社會的宗旨，也是理想社會的通則^⑧。

(二)工讀互助團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蔡元培與北大教授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學生羅家倫、王光祈等人共同發起「工讀互助團」。然真正倡議人實是王光祈，他在「少年中國學會」即主張「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氣」，提倡「團體生活與勞動習慣」。這一年北京女高師高材生李晟因受家庭經濟的壓迫而自殺，王光祈受感於心，在追悼會裡發了一個大願望，要努力設法使天下寒士能夠讀書。回寓後即草擬辦法，並得到蔡元培、陳獨秀諸人的支持，在北京晨報登出啓事，正式發起「工讀互助團」^⑨。

「工讀互助團」是一個空想社會主義的新村組織，它的口號是「人人作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據王光祈自述，他之所以發起這個小組織，有五個理由，茲歸納如下：

- (1)維持已脫離舊家庭的青年男女之生活，幫助他們與社會黑暗勢力奮鬥；
- (2)訓練男女青年的獨立生活，幫助他們不依賴家庭和社會；
- (3)幫助家境不好的優秀青年，可以自由讀書；
- (4)養成新社會一種互助勞動的習慣；
- (5)實現改革社會的實際運動^⑩。

^⑧ 同上，頁298~299。

^⑨ 郭正昭、林瑞明合著，〈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環宇出版社，民國六十三年五月），頁38。

^⑩ 王光祈，〈工讀互助團〉，〈少年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影印），第一卷，第七期，頁43。

2/2 勤工儉學的發展

王光祈發起「工讀互助團」的主要目的，在為「新社會築一個基礎」，在為「苦學生開一個生活途徑」，所以方式是溫和漸進的，而非激烈極端的；這個小組織雖含有「團體勞動，互助共產」的性質，但並非如該團第一團團員施存統所說，以解決青年男女「脫離家庭關係，脫離婚姻關係，脫離學校關係」等六大問題為導向^①，我們從下面工讀互助團簡章可以得到證明。

工讀互助團簡章

1. 宗旨：本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
2. 團員：凡志願入本團者須團員一人之介紹，經全體團員認可，得為本團團員。
3. 服務：團員每日每人必須作工四小時。若生活費用不能支持，得臨時由團員公議加增作工鐘點。廚中事務及打掃院宇，由團員輪流擔任。
4. 權利：團員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團員供給。團員所需之教育費、醫藥費、書籍費，由團體供給，惟書籍係歸團體公有。
5. 工作種類：暫分九種
(1)石印；(2)素菜食堂；(3)洗衣服；(4)製漿糊；(5)印信箋；(6)販賣商品及書報；(7)裝訂書報；(8)製墨汁及藍墨水；(9)其他。
6. 工作所得：歸團體公有。
7. 設備：設書報室及音樂室。
8. 組織：由全體團員組織團員會，選舉事務員；並討論團中重要事務，及審查新入團員。

^①施存統，〈工讀互助團底實驗和教訓〉，〈五四時期的社團〉，第二冊，頁425。

事務員設總會計一人，管理全團銀錢出入事務，會計若干人，分管各組會計事務。

設庶務二人，管理全團買賣及一切雜務。

事務員每月末日選舉一次，得連任一次。

組織細則，另行規定。

9. 規約：凡團員有怠於作工情事，由團員會提出警告，經繼續三次警告，仍不努力盡職，即令其出團。

10. 出團：團員得自由退出團體，惟須提出理由書。

11. 附則：凡團員不能入校聽講者，得由本團聘請教員，每日教授二鐘，若程度不齊，得適用單級教授制。本團預算及工作分配方法，另有細章。

本團簡章得由團員會隨時增改^⑫。

工讀互助團的發起，顯然也受到李石曾等人提倡赴法勤工儉學的影響。自李石曾等人提倡留法勤工儉學以來，國內青年思潮爲之大變，皆承認工讀主義爲實現新社會之惟一途徑，亦爲解決物質生活及精神生活之惟一方法，故一時赴法勤工儉學者甚衆。然國內有覺悟之青年爲數極多，因事實所限，勢不能盡數赴法，於是在王光祈奔走下，始有北京工讀互助團的發起。由此可知，國內的工讀互助團，便是國內的勤工儉學，主要爲解決國內青年實行工讀主義的一種方法。工讀互助團與勤工儉學在精神上雖完全相同，但實行方法則有相異之點：

(1) 工讀互助團係由少數同志湊集資本，爲一種小工業或小商業之組合，以共同工作所得之利，解決個人求學問題。

(2) 勤工儉學會則由多數同志，在他人所辦之工廠作工，以個人工

^⑫《少年中國》，第一卷，第七期，頁45~47。

作所得之利，解決個人求學問題。

據此，前者係團體的進行，損益由團體擔負；後者係個人的努力，損益由個人自負。前者係為自己工作（即工作所得之利全數皆由本團所獲）；後者係為他人工作（即工作所得之利一部份為廠主所得）¹³。

工讀互助團有本身追求的理想，故除與勤工儉學有相異之處外，並標榜與其他各種組織有所區別，茲分述如下：

(1)它不是慈善事業——慈善事業完全是「蹴爾而與之」的殘羹冷炙。工讀互助團的基本金雖是捐助得來，但那些捐助的人或是希望「理想社會」實現，故努力出資，籌辦一切；或恐怕社會革命快來了，趕快把自己的錢貢獻出來，將來或者可以免去一場流血的革命，因為工讀互助團是一種「不流血的經濟革命」。故就捐助的方面而言，決不是「蹴爾而與之」的慈善事業。而且團員中頗有自由捐款的，更可以認明絕非慈善事業。

(2)它不是職業學校——職業學校是在養成專門技術人才，為國效用。工讀互助團是在養成一般勞動互助習慣，以便將來改革社會，它的目的不在養成專門技術。職業學校招生以學術為標準，工讀互助團徵求團員以思想道德為標準。

(3)它不是《解放與改造》¹⁴所介紹的所提倡的合作，其不同之點有二：（甲）合作（Cooperation）承認資本，所以他們的資本是

¹³王光祈，〈工讀互助團與勤工儉學會〉，《旅歐週刊》，第30號（民國九年六月五日），頁1論說。

¹⁴《解放與改造》創刊於一九一九年九月，係半月刊，以北平新學會名義出版，主編有梁啟超、張東蓀、俞頌華，一九二〇年九月起更名《改造》，至一九二二年九月停刊。參閱《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上冊，頁352。

每年有利益可分的。工讀互助團的基本金是沒有利息的，亦不是誰的股份。(乙)合作所得的餘利，或按照股份給以利息，或依各個工人所得的工資多少，或依各個買客所出的錢多少，記在他們名下，當做他們入社的股本。工讀互助團營業所得的餘利全歸團體。團員各取其所需。因此工讀互助團比合作澈底，但是工讀互助團所需要的互助道德，更覺緊要。

(4)它不是半工半讀學校——因為半工半讀學校的課程，是有一定的，而且在本校求學。工讀互助團的課程是沒有一定的，無論入何種學校，都是可以的。

(5)它不是成美學會^⑮——因為團員所用的，都是他們自己血汗得來的。

(6)它不是其他各科工作的組合——因為工讀互助團是工讀並重的，它的宗旨不專在作工^⑯。

三、工讀組織的活動

工讀思潮發生後，從組織的成立到實際活動的展開，都要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和籌備。茲以國內、國外為界限，簡述它們的活動情形如下：

(一)國內——以工學會與工讀互助團為主。

^⑮成美學會之得名，大抵取「成人之美」之意，其章程不詳，乃胡適先生所發起。「以協助德智優秀身軀健壯，自費無力之國立大學學生，藉增進國家人才，並減少社會階級為目的」。吳相湘，〈北大廿週年紀念冊與傳記資料〉，〈傳記文學〉十三卷，六期。

^⑯王光祈，〈工讀互助團〉，〈少年中國〉，第一卷，第七期，頁49~50。

I. 工學會

工學會的會員起初有五十五人（內校外委員十人），至一九二二年五月發展到八十餘人。他們的思想傾向相當複雜，除受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實驗主義影響外，還表現了某些無政府主義傾向，對於新村主義也很感興趣¹⁷。

工學會的主要活動，是利用課餘時間，分組從事石印、雕刻、照相以及販賣書報、文具等工作。其工作範圍以不荒廢學業為限。茲將該會最初工作分類情形，簡介如下：

（甲）石印組——五月十四日成立，有組員二十二人。教授分為A、B兩大隊。已能印花邊、五彩及製造藥紙。

（乙）照相組——十月十一日成立，有組員十八人。

（丙）打字組——十月十八日成立，有組員八人。

（丁）雕刻組——十一月四日成立，有組員十人¹⁸。

其後復成立木板印刷組與書報販賣組，前者要求設備較簡單，承印信箋、格紙、收條等，專供學校及同學的需要，後者無非是一種間接的文化運動，販賣的書報不過五十多種¹⁹。

工學會究竟維持多久，迄今尚無足够的材料可以說明，但至少是四年左右²⁰。

II. 工讀互助團

工讀互助團的規模和影響較工學會為大，這可以從全國各地先後所成立的各類工讀互助團得知。工讀互助團的地理分布，除北京外，

¹⁷〈五四時期的社團〉，第二冊，頁499。

¹⁸〈工學會會務紀要〉，同上，頁514。

¹⁹〈工學會會務紀要〉，同上，頁515。

²⁰〈五四時期的社團〉，第二冊，頁500。

主要以沿江沿海的各大商埠城市為限，大致與「少年中國學會」和「勤工儉學會」兩個團體的地緣關係相結合。茲分述如下：

1. 北 京

甲、北京工讀互助團

北京工讀互助團是成立最早，規模和影響也最大的一個工讀主義團體。成立後共分四組，茲綜合各項資料，列表分別說明如下：

組 別	地 點	成立時間	人數	團 員 名 單	開辦費	工讀內容	備註
第一組	北京大學附近（東城騎河樓斗鷄坑七號）	1919 · 2	13	章鐵民、吳名世、孟雄、煥業、張樹榮、桂五、施存統、百棣、龔鴻、冰然、龔秀松、仰煦、張伯根。	523元	食堂股一 儉學食堂 洗衣股一 每日共洗 六十件 電影股	
第二組	北京工業專門學校、法文專修館、北京師範學校附近（西城翠花街北狗尾巴胡同五號）	1919 · 12	11	王恕、郭曾楷、張衡、張純、劉晦、劉豪、羅漢、李實、匡俗、歐遜、營久。	345元	平民消費 公社 平民洗衣 局 平民工廠 食堂 平民補習 學校	
第三組 (女子工 讀互助 團)	女子高等師範附近（東城北河沿十七號）	1920 · 3	4	錢 初 雅 繆 伯 英 何 琛 媛 韓 德 浩		織 襪 縫 紉 刺 綉	
第四組	法文專修館附近（景山東松公府夾道八號）	1920 · 2 · 4	9	張俊傑、賴慶禔（祝）、林大勗（學）、李深蔭、趙鴻恩、張遂能、劉鑫、蒲照魂、吳時英。	500元	消費社 食 勞 軒 織 襪 工 廠 北大旁聽	發行「工 讀」月刊，被 後禁
<p>資料來源：五四時期的社團(-)，頁367~448；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頁305~313；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 393~413。</p>							

北京工讀互助團的優點，據蔡元培分析，主要有以下四點：(1)所作都是小工，可以自由支配，不必仰仗工廠；(2)每人每日作工四小時，有許多時間可以求學；(3)設在學校左近，可以到校聽講；不能到校的，專請教員來講；(4)收入與消費，都由團體支配，各人於作工求學以外，不必分心，全憑自己的力量，用極少的經費，極簡的方法，可以盡工作的責任，達求學的志願，實行互助的主義²¹。

乙、北京中大工讀互助團

北京中國大學教職員亦於一九二〇年二月初發起組織工讀互助團，名為「中大工讀互助團」。以提倡勞動精神，實行半工半讀主義為宗旨，分為食堂組、學校勤務組、營業組、手工製造組、印刷組，先由前四組入手，暫以中國大學周刊社為籌備地點²²。

丙、北京毅土工讀互助團

自蔡元培、王光祈等人發起工讀互助團後，北京高等以上各校均次第興辦。交通部鐵路管理學校學生程燦，鑒於貧寒者求學之不易，特於一九二〇年二月上旬，集合同志數人撰成緣起並簡章數條，定名「毅土工讀互助團」，其內容與各工讀互助團均相彷彿²³。

2. 天津工讀印刷社

自從北京發起工讀互助團以後，工讀的計劃很受各地青年的歡迎，天津亦有同樣的發起。天津工業專門學校孔祥鵠、諶志篤等人，特組織工讀印刷社，以實行工讀主義，養成個人經濟獨立的精神。既定名為印刷社，社務即以印刷書報、廣告暨販賣雜誌、日刊為主²⁴。

²¹ 蔡元培，〈國外勤工儉學會與國內工學互助團〉，收入〈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第一冊，頁295-296。

²² 〈五四時期的社團〉，第二冊，頁482。

²³ 同上，頁490。

²⁴ 同上，頁479~480。

3. 上海

甲、滬濱工讀互助團

北京工讀互助團成立後不久，一部分旅滬的湖南學生於一九二〇年六月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滬濱工讀互助團，團員有十四人，都是家境比較清寒的學生。滬濱工讀互助團的宗旨和北京工讀互助團相近，但曾提出吸收工人入團，對工人進行文化教育的主張。團員們一方面分別在復旦大學、南洋專門醫學校、華法教育會夜校、外國語學社等校聽課，並透過陳獨秀的介紹擔任了教員、書記、校對等工作；另一方面又積極籌劃自辦線襪廠和擴大團體。但是，和北京工讀互助團一樣，滬濱工讀互助團也無法克服經濟方面的困難，而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宣言解散²⁵。

乙、上海女子工讀互助團

有天津女子師範畢業生平秀英，聯絡幾個同志，籌足基本金二千元，在狄思威爾路籌組女子工讀互助團²⁶。

4. 南京師範學校工讀互助團

這個工讀互助團共有三十二人，想透過演劇募金所得，籌辦工讀互助團，一者實踐半工半讀的生活，一者擔負指導社會、改造社會的責任²⁷。

5. 揚州第八中學工讀互助團

揚州第八中學的學生為求以工資充學費，也組成了一個「揚州工讀互助團」，但只在校內課餘販賣食品、書報，與「工讀」名實不符，也不瞭解「工讀互助」的真精神²⁸。

²⁵ 同上，頁457。

²⁶ 同上，頁472。

²⁷ 同上，頁475~477。

²⁸ 邵力子復張嘯坐，同上，頁492。

6. 廣東女子工讀互助團

廣東女界爲女子前途計，特於一九二〇年三月組織男女工學互助團，分機織、販賣、學校三科²⁹。

7. 武昌工學互助團

由武昌中華大學梁紹文、陳時、惲代英、陳昭彥等人發起，其組織大綱所包含的宗旨、工作分類、組織規約等，大致相同³⁰。

(二) 國 外

工讀互助團是國內的勤工儉學，初到法國的勤工儉學生仍帶有工讀色彩，曾先後組織純粹工讀之團體，茲分述如下：

1. 工學勵進會

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到法國蒙達集 (Montargis) 之後，爲了適應新環境的需要，在李維漢、張昆弟、李富春等人的倡議下，於一九二〇年二月組織了「勤工儉學勵進會」，簡稱「工學勵進會」。該會宗旨，據羅學瓚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寫信給毛澤東信中的說明，有積極和消極兩面。在積極方面，想聯絡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儲金、訂書報、互相勉勵、疾病救助、工學交互，及爲將來別種建劃之預備，在消極方面，可以免除孤獨生涯之煩苦，與環境誘惑之墮落及懶惰之預防等事³¹。信中提到的儲金，工學勵進會規定：會員每人每月繳納所得工資百分之十，作爲將來歸國後開辦實業用。可見工學勵進會一開始是實行工讀主義的一個團體，它想通過互助自救，堅持走亦工亦讀的道路，來達到改造中國的目的³²。一九二〇年八月，「工學

²⁹ 同註²⁸，頁485。

³⁰ 同上，頁473~474。

³¹ <五四時期的社團>，第一冊，頁22。

³²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簡史>，頁69。

勵進會」改名「工學世界社」，由於蔡和森的影響，從工讀主義的團體一變而為社會主義的團體。

2. 勞動學會

勞動學會是一九二一年二月中旬在巴黎成立的，不久轉移到勤工儉學生和華工比較集中的克魯鄒（Le Creuzot）。發起人是趙世炎、李立三，主要成員有陳公培、劉伯堅、魯易、袁慶雲、周欽岳、熊自難等。勞動學會的宗旨，開始也是篤信工學主義的，主張把留法勤工儉學活動堅持到底。因為當時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遭到了挫折，很多學生進不了工廠，又無錢求學，生活十分困難，所以在廣大學生中產生了能不能實行勤工儉學的思想問題。蒙達集的「工學世界社」的會員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實行勤工儉學是根本不可能的。要革命就要有知識，有知識就必須求學。主張發動求學運動，迫使中國政府給勤工儉學生發津貼，解決求學問題。而「勞動學會」的會員們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認為「吾人終信勤工儉學具有可能性，果使有工作，勤儉之人必可蓄餘資，以為他日儉學之用，即使不能儲蓄，則勞動自治，亦足自豪，終勝仰人生活不事生產者。」³³他們主張「不擇工作，動員各方面力量，首先解決學生的勤工問題。」

勞動學會比較重視工人運動。趙世炎、李立三等人經常利用工餘時間，幫助克魯鄒的華工組織工會、華工俱樂部和工人夜校。他們還規定，學會成員每人都必須找一個華工作朋友，以此為基礎，擴大隊伍。勞動學會會員周欽岳回憶說：「每星期日去他們住的工棚，談談生活工作情況，國內外時事，幫助他們寫寫信，或替他們辦點臨時託辦的事」³⁴，深受華工們的歡迎和信任。

³³ 周恩來，〈旅歐通信〉（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27。

³⁴ 同註³³。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使館請願風潮後，勞動學會仍相信勤工儉學主義，於是趙世炎、李立三等人發起建立「勤工儉學者同盟」，獲得熱烈響應，使人數由十餘人增至二百餘人。此外，他們又與同情勤工儉學的人重組「留法勤工儉學會」，於同年三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其宗旨為「本工學主義及互助精神，實行勤工儉學以謀社會之改進，而勞動與互助為勤工儉學會會員共同的信條。」^⑤該會並動員了許多勤工生入廠工作，大部分集中在克魯鄒工廠區。但由於客觀事實的困難——工廠停工，有工作者終居少數——主張勤工者在工作上體驗到勤工的困難，於是與「反對勤工者」漸漸了解而取得一致的態度。從克魯鄒區的勤工生首先倡議開放里大，可以看出勤工理論的支持者已放棄勤工，轉而在求學方面尋求自己的出路。所以勞動學會、留法勤工儉學會和工學世界社終於合流起來，在同年十月進佔里昂中法大學事件中遂取一致的行動^⑥。換言之，以趙世炎、李立三為首的「勤工派」，最後亦改弦更張，與蒙達集的新民學會和工學世界社等「革命派」，同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是國外工讀團體與國內工讀團體最大不同之所在。

四、工讀互助的成敗檢討

王光祈等人發起「工讀互助團」的主要用意，是要在每一個城市裏，組織一個男女生活的互助社，以幫助青年脫離家庭壓迫，培養獨

^⑤張伯簡，〈勤工儉學變遷略史〉，〈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第一冊，頁119。

^⑥陳敬堂，〈中共旅歐總支部之成立〉，〈東亞季刊〉，十六卷一期（1984、7），頁42。

力生活能力與互助勞動的習慣，並創造讀書上進的機會。

王光祈這一「工讀互助團」的主張提出後，當時得到蔡元培、胡適、陳獨秀等人的支持，並由他自己奔走的結果，募得了一部份基金，在北京首先組織起來。隨即有上海、南京、武漢及湖南等地的「少中」會友附和他的主張，也紛紛創辦起來。但他們所從事的工讀互助事業，無非是開辦小型書店、廉價食堂與手工業的製銷店等^①，限於資金，規模都不算大。

成立「工讀互助團」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讓青年男女認識工讀的意義，實踐「自食其勞」的生活，以不勞而食為可耻，藉此轉移社會風氣，顯示中國青年不是沒有奮鬥的精神，顯示中國青年不是在養尊處優、席豐履厚中過日子^②。此外，也讓青年男女試驗共同生產、互助合作、化除男女界限的新生活，為未來新社會建立一種新面貌。所以總的來說，精神層面的意義多於實質的意義。

但是，儘管「工讀互助團」具有遠大的理想，卻無法克服實際的困難，尤其是經濟上的困難。因成立不久，原來募集的款項用完了，勞動所得的收入又極其微薄，無法維持團員的生活。另外，在缺乏正確的思想引導下，團員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與集體生活方式之間也產生了許多矛盾，以至不能堅持下去。因此，北京工讀互助團的第一、二組首先失敗，前後不過維持兩、三個月，便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宣告解散。第四組是高等法文專修館幾個同志出資組織的，較之第一、二兩組，辦理得法，維持較久，但經過半年以後也都陸續解散了。

身為發起人之一的胡適，在一九二〇年四月於《新青年》七卷五

^① 郭正昭等，〈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頁38。

^② 周太玄，〈國內之工讀互助團〉，〈旅歐週刊〉，第19號（民國九年三月二十日），頁1~2。

號發表「工讀主義試行的觀察」一文，對這個運動的失敗，有相當透澈的分析。首先，他坦率的提出自我批評說：「照我個人的愚見看來，我們在北京發起的工讀互助團的計劃，實在是太草率了，太不切事實了。」繼而，他指出自己觀察到的兩件事實：(一)工作的時間太多，每人七時以上，十時以下，只有工作的時間，沒有做學問的機會；(二)做的工作，大都是粗笨的、簡單的、機械的，不能引起做工的人的精神上的反應。只有做工的苦趣，沒有工讀的樂趣。」

胡適進一步認為：

「如果做的工作，都帶有知識的分子，都能引起研究學問的旨趣，工作的時間就多一點也不妨。但是，現在各處互助團興辦的工作大概都是『挨役』(drudger)，不是工作(work)。現在互助團的團員打起『試驗新生活』的旗號，覺得『挨役』是新人物的一部分，故還能有點興緻。但是我預料這種興致是不能持久的！」

最後，胡適分析說：

「北京工讀互助團計劃的根本大錯，就在於不忠於『工讀』兩個字，發起人之中有幾個人的目的並不注重工讀，他們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組織』上。因此，他們只做了一個『工』的計劃，不曾做『讀』的計劃。開辦以後，也只做到了『工』的一小方面，不能顧全『讀』的方面。」³⁹

胡適是北京發起人之一，基本上，「他覺得『工讀主義』乃是極平平無奇的東西，用不着掛什麼金字招牌」。當初，他之所以贊成這種有組織的工作，乃是「希望用組織來幫助那極平常的工讀主義，並不希望用這種組織來『另外產生一種新生活、新組織』」⁴⁰。所以，

³⁹ 胡適，〈工讀主義實行的觀察〉，〈新青年〉，七卷五號(1920,4,1)

⁴⁰ 同上。

胡適認為，他們的失敗，在不是純粹的工讀主義^④。

戴季陶則以為，「要想用工讀互助團這一個方法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固然做不到；就是要想只拿來達半工半讀的目的，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他的理由是：

「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以世界的強力壓迫着自由勞動者的時代，無論什麼人，沒有不受這一個強力的支配。威迫各人的社會生活，妨礙學生的自由思想，為主的並不是家庭，不是官廳，不是學校，只是資本家生產法所代表的財產私有制。在這一種社會組織的下面，要想用很小一部分人的能力，一面作生產的工，一面達求學的目的，在事實上是做不到的。而且以不熟練的工作能力，不完全的幼稚的生產機關，要想獨立回復資本家生產制所侵蝕的『剩餘勞動時間』，更是作不到的。」^④

李大釗、陳獨秀對於工讀互助團失敗的原因，也紛紛提出檢討。李大釗認為，「在都市上的工讀團，取共同生產的組織」，是一項根本的錯誤，因為「都市的地皮、房租這樣昂貴，我們要靠資本家給勞動者的工資和高賈小業的蠅頭，維持半日讀書半日作工的生活，那裏能够？」基本上，他與胡適的看法一樣，主張採取純粹的工讀主義，把工讀與新村運動分開，讓「一部分欲實行一種新生活的人，可以在鄉下購點價廉的地皮，先從農作入手。」^④

陳獨秀以北京工讀互助團第一組為例，認為他們的失敗，「完全是因為缺乏堅強的意志、勞動習慣和生產技能三件事」，所以，「這都是人的問題，不是組織的問題。」^④他不同意胡適、戴季陶、李大

④ 陳獨秀，〈工讀互助團失敗底原因在那裡？〉，《新青年》，七卷五號。

④ 戴季陶，〈工讀互助團與資本家的生產制〉，《新青年》，七卷五號。

④ 李大釗，〈都市上工讀團底缺點〉，《新青年》，七卷五號。

④ 同註④。

釗等人的意見。

針對各方面的批評，身為實際發起人的王光祈指出，爲什麼不能實行工讀互助主義，主要是人的問題，不是經濟的問題。歸結而言，他認爲有下列幾個因素：

- (1)有一小部分人不了解工讀互相組織的精神，久而久之，遂覺得此種生活乾燥無味；
- (2)有的團員雖很了解工讀互助主義，但不肯努力工作；
- (3)大家對問題的主張不一樣，不能互相容納，互相了解，反而互相懷疑，造成感情不融洽，以致精神渙散⁴⁵。

楊賢江贊同陳獨秀、王光祈的看法，認爲「完全是人的問題，因爲團員沒有堅強的意志，沒有勞動的習慣，沒有生產的技能，再掛上一塊新生活的招牌，自然不能在經濟壓迫最劇烈的都市裏生存了。」⁴⁶

做爲北京工讀互助團第一組團員的施存統，曾在「星期評論」的「勞動紀念號」發表一篇「工讀互助團底實驗和教訓」的長文，一方面對於胡適、戴季陶、李大釗、王光祈等人的議論，覺得「有點不明真相」，一方面批評發起人之一的王光祈太相信自己的理想，將一切的失敗都歸罪於人的身上，而胡適則把一切失敗都歸罪於主義身上。他指出互助團的失敗，有兩個很大的原因，其說明如下：

- (1)經濟的壓迫——是外部的原因。「經濟的壓迫，在現社會的組織底下，無論那個都不能免的。現社會的組織是資本主義的組織，一般平民都做資本家的奴隸。凡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底下，不管你有怎樣的能力，都要直接間接受經濟的壓迫。我

⁴⁵王光祈，〈爲什麼不能實行工讀互助主義？〉，《新青年》，七卷五號。

⁴⁶楊賢江，〈工讀互助與勤工儉學〉，《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第一冊，頁300。

們如果有能力把資本家所掠奪去的資本收得回來，那才不至於受經濟的壓迫」。

(2)能力的薄弱——是內部的原因。「我們都是一羣二十左右的小孩子，都是不諳世故的小學生，能力薄弱，這是當然的事情。以我們這點薄弱的力量，要想單獨和一個詭詐百出的萬惡社會奮鬥，那裏有不失敗的道理！我們這個工讀互助團，隔離社會又太遠，對於社會實在的情形仍歸一點觀察不出。社會攻我們，只有經濟便可以；我們攻社會，又不曉得怎樣攻的路徑。我們本來要想去改造社會，有了工讀互助團，連社會都鑽不進，那裏還說什麼改造的話呢？我們的工作是在團體裏的工作，但是這種工作即使做了一世，能力也不見得會怎麼增長。換句話說，就是這種工作算不得專門技能，要求專門技能，還須到團外去。」

總而言之，施存統認為，「經濟的壓迫，能力的薄弱，都是工讀互助團試驗失敗的最大原因。什麼主義，什麼感情，和這一次的失敗沒什麼關係。」^①所以，不是工讀純不純的問題，也不是人努力不努力的問題。

五、結 論

五四時期的工讀主義者，在蔡元培、王光祈等人的引導下，懷抱有「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相結合，教育與生產相結合」的美好理想，希望建立一個人人勞動，沒有剝削，沒有壓迫，自食其力的社會。他

^①施存統，〈工讀互助團底實驗和教訓〉，〈五四時期的社團〉，第二冊，頁435~436。

們認為工讀主義是達到這個社會的最可靠的道路，不但從理論上加以鼓吹，而且試驗成立類似「新村」的工讀小組織，加以身體力行。

工讀互助團的成立，最值得稱述之處是一方面讓青年男女認識工讀的意義，實踐自食其勞，共同生產，互助合作，化除男女界限的生活；一方面顯示中國青少年並非沒有奮鬥的精神，同樣可以擺脫席豐履厚、養尊處優的生活，為中國青年男女樹立一個新榜樣。所以，其精神意義實多於實質的意義。

一般而言，工讀主義者雖然高唱「勞動萬能」和「勞動神聖」的新口號，卻無法完全拋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更難以和工人實際打成一片，或過著像工人一般的刻苦生活。他們所採取的是一種溫和的、理性的、人道的改良主義，希望透過工讀主義的宣傳與實踐，來達成感化全人類，改造社會的目的。但他們的活動範圍仍侷限在少數大中學校園裏，與廣大社會仍有距離，故所獲得的社會反響並不大。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工讀難以並存，無法在社會生根。最後，此一溫和具改良色彩的工讀主義的失敗，卻促成了主張激烈革命的社會主義派的崛起。

（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
臺北）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 (八)

書 名	作 者	類 別
文學欣賞的靈魂	劉述先	西洋文學
西洋兒童文學史	葉詠琪	西洋文學
現代藝術哲學	孫旗	藝術
音樂人	黃友棣	音樂
音樂與我	趙琴	音樂
音樂伴我遊	趙琴	音樂
爐邊閒話	李抱忱	音樂
琴臺碎語	黃友棣	音樂
音樂隨筆	趙友棣	音樂
樂林蕩露	黃友棣	音樂
樂谷鳴泉	黃友棣	音樂
樂韻飄香	黃友棣	音樂
樂圃長春	黃友棣	音樂
色彩基礎	何耀宗	美術
水彩技巧與創作	劉其偉	美術
繪畫隨筆	陳景容	美術
素描的技法	陳景容	美術
人體工學與安全	劉其偉	美術
立體造型基本設計	張長傑	美術
工藝材料	李鈞	美術
石膏工藝	李鈞	美術
裝飾工藝	張長傑	美術
都市計劃概論	王紀錕	建築
建築設計方法	陳政雄	建築
建築基本畫	陳楊美黛	建築
建築鋼屋架結構設計	王萬雄	建築
中國的建築藝術	張紹載	建築
室內環境設計	李琬琬	建築
現代工藝概論	張長傑	雕刻
藤竹工藝	張長傑	雕刻
戲劇藝術之發展及其原理	趙如琳	戲劇
戲劇編寫法	方寸	戲劇
時代的經驗	汪彭琪	新聞
大眾傳播的挑戰	石永貴	新聞
書法與心理	高尚仁	心理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 (七)

書名	作者	類別
印度文學歷代名著選 (上下)	廉文開編譯	文學
寒山子研究	陳慧劍	文學
魯迅這個人	劉心皇	文學
孟學的現代意義	王支洪	文學
比較詩學	葉維廉	比較文學
結構主義與中國文學	周英雄	比較文學
主題學研究論文集	陳鵬翔主編	比較文學
中國小說比較研究	侯健	比較文學
現象學與文學批評	鄭樹森編	比較文學
記號詩學	古樹添洪	比較文學
中美文學因緣	鄭樹森編	比較文學
中文學因緣	鄭樹森編	比較文學
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	張漢良	比較文學
韓非子析論	謝雲飛	中國文學
陶淵明評論	李辰冬	中國文學
中國文學論叢論	錢辰冬	中國文學
離騷九歌九章淺釋	李天宗	中國文學
楚辭與人間詞話述評	王宗樂	中國文學
杜甫作品繫年	李辰冬	中國文學
元曲六大家	應王裕忠	中國文學
詩經研讀指導集	王賢	中國文學
迦陵談詩二集	葉嘉瑩	中國文學
莊子及其文藝研究	黃錦鉉	中國文學
歐陽修詩本義研究	裴普賢	中國文學
清真詞研究範圍	王支洪	中國文學
宋儒風學價值	董金裕	中國文學
紅樓夢的文學價值	羅盤	中國文學
四說論叢	羅盤	中國文學
中國文學鑑賞學隅	黃許慶家 筮鸞	中國文學
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	傅錫壬	中國文學
增訂江皋集	吳俊升	中國文學
浮士德研究	李辰冬譯	西洋文學
蘇忍尼辛選集	劉安雲譯	西洋文學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 (六)

書 名	作 者	類 別
卡薩爾斯之	葉石濤	文 學
青囊夜	許振江	文 學
我永遠年	唐文標	文 學
分析文	陳啓佑	文 學
思想	陌上塵	文 學
心酸	李喬	文 學
離	林蒼	文 學
孤獨	林蒼	文 學
托塔少情	林文欽	文 學
北美情	卜貴美	文 學
女兵自傳	謝冰瑩	文 學
抗戰日記	謝冰瑩	文 學
我在日記	謝冰瑩	文 學
給青年朋友的信 (上)(下)	謝冰瑩	文 學
冰瑩書	謝冰瑩	文 學
孤寂中的迴	謝冰瑩	文 學
火天的鏡	趙衛	文 學
無塵的鏡	張默鈞	文 學
大漢心	張起鈞	文 學
回首叫雲飛	羊令野	文 學
康莊有文	向陽	文 學
情愛與文	周伯乃	文 學
湍流偶之	周天華	文 學
文學之	蕭傳文	文 學
鼓瑟	幼柏	文 學
種子落邊	葉海煙	文 學
文藝新探	周玉山	文 學
大累聲氣	周玉	文 學
實用文	姜超	文 學
林下生	姜超	文 學
材與不材之間	姜超	文 學
人生小語 (一)(二)	王邦雄	文 學
兒童文學	何秀煌	文 學
	葉詠琍	文 學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 (五)

書 名	作 者	類	別
中西文學關係研究	王 潤 華	文	學
文開隨之	糜 文 鼎	文	學
知識	陳 環 章	文	學
野 草	李 瀚 韶	文	學
李 韶 詞 集	李 韶	文	學
石頭的研究	戴 天 廉	文	學
留不住的航	葉 維 廉	文	學
三十年詩賞	葉 維 明	文	學
現代散文欣評	鄭 明 著	文	學
現代文學評論	亞 著	文	學
三十年代作家論	姜 穆 欣	文	學
當代臺灣作家論	何 欣	文	學
藍天白雲集	梁 容 若	文	學
見賢齊集	鄭 彥 茶	文	學
思 齊 集	鄭 彥 茶	文	學
寫作是藝術	張 秀 亞	文	學
孟武自選文	薩 五 武	文	學
小說創作論	羅 素 貞	文	學
細讀現代小	張 素	文	學
往 日 旋 律	幼 柏 斯	文	學
城市筆記	巴 斯	文	學
歐羅巴的蘆	葉 維 廉	文	學
一個中國的	葉 維 廉	文	學
山外有山	李 英 豪	文	學
現實的探	陳 銘 礪	文	學
金 排	鍾 延 豪	文	學
放 鷹 萬	吳 錦 發	文	學
黃 巢 殺 人 八 百	宋 澤 萊	文	學
燈 下	蕭 蕭 煌	文	學
陽 關 千 唱	陳 煌 陽	文	學
種 香 杆	向 陽	文	學
泥 土 的 香 味	彭 瑞 金	文	學
無 綠 廟 事	陳 艷 清	文	學
鄉 春 天 集	林 鍾 鐵	文	學
余 忠 雄 的 春 天 集	鍾 鐵 吳	文	學
吳 煦 斌 小 說	吳 煦 斌	文	學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 (四)

書 名	作 者	類 別
歷 史 圖 外	朱 桂	歷 史
中 國 人 的 故 事	夏 雨	歷 史
老 臺 灣	陳 冠	歷 史
古 史 地 理 論 叢	錢 穆	歷 史
秦 漢 史 稿	錢 穆	歷 史
秦 漢 史 論	刑 義	歷 史
我 這 半 生	毛 振	歷 史
三 生 有 幸	吳 相	傳 記
弘 一 大 師 傳	陳 慧	傳 記
蘇 曼 殊 大 師 新 傳	劉 心	傳 記
當 代 佛 門 人 物	陳 慧	傳 記
孤 兒 心 影 錄	張 國	傳 記
精 忠 岳 飛 傳	李 安	傳 記
八 十 憶 雙 親 合 刊	錢 穆	傳 記
困 勉 強 猜 八 十 年	陶 百 川	傳 記
中 國 歷 史 精 神	錢 穆	史 學
中 國 史 新 論	錢 穆	史 學
與 西 方 史 家 論 中 國 史 學	杜 維 運	史 學
清 代 史 學 與 史 家 學	杜 維 運	史 學
中 國 文 字 學	潘 重 規	語 言
中 國 聲 韻 學	潘 重 規	語 言
文 學 與 音 律	謝 雲 飛	語 言
還 鄉 夢 的 幻 滅	賴 景 瑚	文 學
葫 蘆 再 見	鄭 明 娟	文 學
大 地 之 歌	大 地 詩 社	文 學
青 春	葉 蟬 貞	文 學
比 較 文 學 的 墾 拓 在 臺 灣	古 添 洪 主 編	文 學
從 比 較 神 話 到 文 學	古 添 洪	文 學
解 構 批 評 論 集	廖 炳 惠	文 學
牧 場 的 情 思	張 媛 媛	文 學
萍 踪 憶 語	賴 景 瑚	文 學
讀 書 與 生 活	琦 君	文 學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三)

書名	作者	類別
不疑不懼	王洪鈞	教育
文化與教育叢談	錢穆	教育
印度文化十八篇	上官業佑	教育
中華文化十二講	糜文開	社會
清代科舉	錢穆	社會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劉兆璜	社會
國學家論	錢穆	社會
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	薩孟武	社會
社會學與中國研究	薩孟武	社會
我國社會的變遷與發展	蔡文輝	社會
開放的多元社會	朱岑樓主編	社會
社會、文化和知識份子	楊國樞	社會
臺灣與美國社會問題	葉啓政	社會
日本社會的結構	蔡文輝主編	社會
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	蕭新煌主編	社會
財經文存	王作榮	經濟
財經時論	楊道淮	經濟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錢穆	政治
周禮的政治思想	周世輔	政治
儒家政論衍義	周文湘	政治
先秦政治思想史	薩孟武	政治
當代中國與民主	梁啟超原著 賈叢標點	政治
中國現代軍事史	周陽山著 劉馥生譯	軍事
憲法論集	林紀東	法律
憲法論叢	鄭彥棻	法律
師友風義	鄭彥棻	歷史
黃帝	錢穆	歷史
歷史與人物	吳相	歷史
歷史與文化論叢	錢穆	歷史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 (二)

書 名	作 者	類 別
語言哲學	劉 福 增	哲 學
邏輯與設基法	劉 福 增	哲 學
知識·邏輯·科學哲學	林 正 弘	哲 學
中國管理哲學	曾 仕 強	哲 學
老子的哲學	王 邦 雄	中 國 哲 學
孔學的漫談	余 家 菊	中 國 哲 學
中庸誠的哲學	吳 怡	中 國 哲 學
哲學演講錄	吳 怡	中 國 哲 學
墨家的哲學方法	鐘 友 聯	中 國 哲 學
韓非子的哲學	王 邦 雄	中 國 哲 學
墨家哲學	蔡 仁 厚	中 國 哲 學
知識、理性與生命	孫 寶 琛	中 國 哲 學
遺逸的莊子	吳 怡	中 國 哲 學
中國哲學的生命和方法	吳 怡	中 國 哲 學
儒家與現代中國	章 政 通	中 國 哲 學
希臘哲學趣談	邱 昆 如	西 洋 哲 學
中世哲學趣談	邱 昆 如	西 洋 哲 學
近代哲學趣談	邱 昆 如	西 洋 哲 學
現代哲學趣談	邱 昆 如	西 洋 哲 學
現代哲學述評(一)	傅 佩 榮 譯	西 洋 哲 學
懷海德的哲學	楊 士 毅	西 洋 哲 學
思想與食困	章 政 通	思 想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劉 君 燦	思 想
佛學研究	周 中 一	佛 學
佛學論著	周 中 一	佛 學
現代佛學原理	鄭 金 德	佛 學
禪	周 中 一	佛 學
天人之際	李 杏 邨	佛 學
公案禪	吳 怡	佛 學
佛教思想新論	楊 惠 南	佛 學
禪學講話	芝 峯 法 師 譯	佛 學
圓滿生命的實現 (布施波羅蜜)	陳 柏 達	佛 學
絕對與圓融	霍 韜 晦	佛 學
佛學研究指南	關 世 謙 譯	佛 學
當代學人談佛教	楊 惠 南 編	佛 學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一)

書名	作者	類別
國父遺教類輯	陳立夫	國父遺教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一)(二)(三)(四)(五)(六)(七)	錢穆	國學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錢穆	國學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錢穆	國學
朱子學提綱	錢穆	國學
先秦諸子繫年	錢穆	國學
先秦諸子論叢	唐端正	國學
先秦諸子論叢(續篇)	唐端正	國學
儒學傳統與文化創新	黃俊傑	國學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錢穆	國學
莊子纂箋	錢穆	國學
湖上閒思錄	錢穆	哲學
人生十論	錢穆	哲學
晚學十言	錢穆	哲學
中國百位哲學家	黎建球	哲學
西洋百位哲學家	鄒昆如	哲學
現代存在思想	項退結	哲學
比較哲學與文化 (一)(二)	吳森	哲學
文化哲學講錄 (一)(二)(三)(四)	鄒昆如	哲學
哲學淺論	張康評	哲學
哲學十大問題	鄒昆如	哲學
哲學智慧的尋求	何秀煌	哲學
哲學的智慧與歷史的聰明	何秀煌	哲學
內心悅樂之源	吳經庶	哲學
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 一「哲學與宗教」一集	傅偉勳	哲學
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展 一「哲學與宗教」二集	傅偉勳	哲學
愛的哲學	蘇昌美	哲學
是與非	張身華	哲學



陳三井，台灣省彰化縣人，民國二十六年生，國立師範大學史地系畢業，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

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員、副研究員、淡江大學教授兼歷史系主任、國立空中大學教授兼人文學系主任。

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國立師範大學兼任教授。

著有「近代外交史論集」、「現代法國問題論集」、「鄭成功全傳」（合著）、「國民革命與台灣」、「中國國民黨與台灣」、「勤工儉學運動」、「華工與歐戰」、「人類的歷史」（合著）等書暨論文數十篇。

